

上帝的刺客

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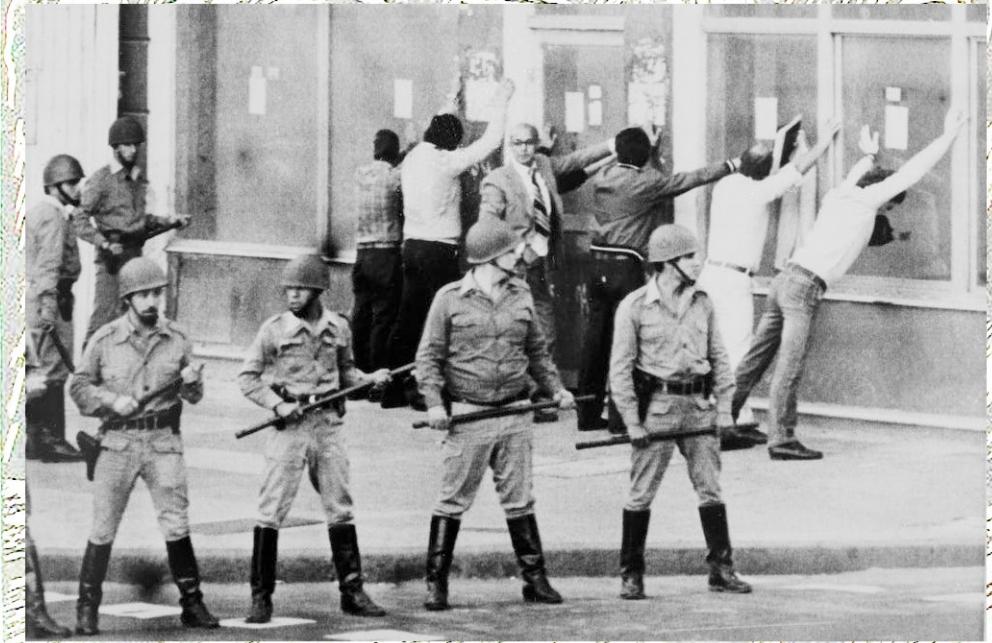
God's Assassins: State Terrorism in Argentina in the 1970s

帕特里夏·马查克与威廉·马查克合著

by Patricia Marchak, William Marchak

译者：余君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Canadian First edición, 1999



• 制作 圣彼得堡来信 公众号

上帝的刺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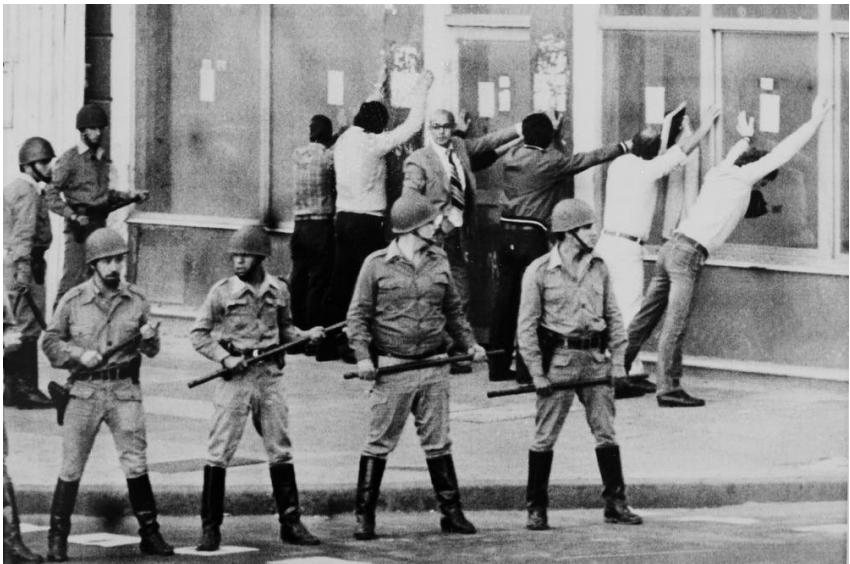
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

著者 帕特丽夏·马查克 (Patricia Marchak)

威廉·马查克 (William Marchak)

麦吉尔皇后大学出版社 1999

余君 译



• 制作 圣彼得堡来信 公号 •

目 录

上帝的刺客 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	3
译者序言	5
第二版译者序	14

第一部分 前言

第一章 前言	21
第二章 面对国家恐怖主义	27

第二部分 历史起源

第三章 暴力的历史	57
第四章 庇隆主义与军国主义	76
第五章 工会运动	102
第六章 一场短暂的革命	125

第三部分 暴力的加剧

第七章 肮脏战争	149
第八章 非法监禁	177

第九章 “进程”	199
第十章 革命者与动摇者	234
第十一章 图库曼省	264
第十二章 媒体与国际背景	288

第四部分 镇压的中央机构

第十三章 深刻分裂的教会	321
第十四章 第三世界神父运动	342
第十五章 军人的辩护	361
第十六章 其他军人的观点	394
第十七章 结论	426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早期的革命组织列表	433

上帝的刺客

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

1976—1983 年间，大约有三万阿根廷人在军政府时期“失踪”。大多数失踪者被军方杀害之前，在牢里经受了酷刑。在 1976 年的前两年里，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的准军事暗杀小组也谋杀了两千人。

《上帝的刺客》一书采访了各方参与者，借此讲述了阿根廷国家恐怖主义的故事。这些人包括军官、“第三世界神父”、（支持军方目标与手段的）天主教会高层、过去游击运动的成员、集中营幸存者、记者、工会活动家等等，都是在阿根廷经历过国家恐怖主义的人。帕特丽夏·马查克（Patricia Marchak）结合了这些采访与当时的文件和新闻报道，还有她对阿根廷历史的洞见，分析了国家恐怖主义的进程与原因¹。

《上帝的刺客》中的图表与生动的采访，展示了国家恐怖主义成因的复杂性，表明我们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主要游击队的领袖是个双面间谍吗？情报部门是否真的相信，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天主教会为什么转而反对自己的神父？通过采访，马查克揭示了在官方文件中永远见不到的东西。

帕特丽夏·马查克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系的

¹ 校订过程中，我删减了前言的大部分无营养的学术内容。——中译者注
(2024.7.18)

教授。

威廉·马查克 (William Marchak) 曾向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整个拉丁美洲的报社出口新闻用纸，在这一行干了三十年后退休。

（鸣谢略，本书为二人合著。）

译者序言

六七十年代社会斗争的历史对今天的国内读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这不仅因为它发生的社会环境与思想背景不复存在，还因为它不合时宜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而遭到了集体的默杀。

同样，拉丁美洲和整个第三世界都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提到阿根廷，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有足球、探戈和经济破产。但在当年，阿根廷曾经是城市游击队最活跃的地区。那里的人们几度推翻军政府，社会革命却从来没有接近胜利。而且，这里还发生了比同时期的欧洲更为残酷的国家恐怖主义，即“肮脏战争”。

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残酷的斗争就有重演的可能。工人阶级需要深入了解阿根廷阶级斗争的经验，认识到那里发生了什么，何以发生。为了不致白白牺牲，需要帮助起而斗争的工人阶级辨明方向，看到陷阱，避免这样那样的错误。

几十年来，在阿根廷，想必跟在任何地方一样，不欢迎对社会斗争的深入研究，以免自称团结了全民族的“革命领袖庇隆”形象掉色，现出原形——法西斯分子与利用工人学生的野心家。

但直到今天，扮演过“左翼领袖”的庇隆仍是许多群众的革命偶像。他们深受资本主义压迫，渴望出路，继续对庇隆主义抱有期待。要卸下这个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需要时间，更需要阶级斗争的洗礼。（当时没想到时代转换就在眼前。——25年中译者注）

为了理解庇隆，首先要考察法西斯主义¹，否则光看庇隆给予工人的种种好处以及庇隆在工人中间享有的声誉，很容易把他当做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可别忘了，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后的政策看上去也是那么美妙，比如打击了黑手党、让火车准点，甚至推出了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真讽刺）的八小时工作制。法西斯主义，即民族工团主义，也受到主流舆论淡化处理（课本只教你“反法西斯圣战”，而不教你法西斯的来源和本质）。因为它必然会涉及到阶级关系，也就是触及到社会的实质。这里我们先来谈谈意大利的民族工团主义，因为墨索里尼完成了这一理论，进行了最具代表性的组合国家的实验，间接影响了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实验。

民族工团主义的特点有：承认私有财产，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调和；崇尚民族主义，强化国家。意大利资产阶级选择法西斯是为瓦解阶级斗争的动力，再导引到推动民族工业的轨道上。阿根廷的庇隆更像是波拿巴，在各阶级都无力直接掌权时，跃居全社会之上，以法西斯的方式重组社会。

意大利法西斯掌权后，立刻镇压反对派。法西斯强制各阶级在组合国家中“各就各位”，宣布阶级矛盾由法西斯国家进行裁决。工人阶级不许以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资本家，而要任法西斯工会为自己的官方代表，不忘高举某种“工人运动”的大旗，再由法西斯政府出面主持公道，满足工人要求的“合理”部分。

组合国家的定义是这样的：只有国家承认的团体，才能成为工

¹ 以下参见《意大利独裁政治下的劳动组合》，《新生命》月刊，1930年，第三卷，第十二；《法西斯经济结构》，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法西斯运动问题》第六。网络上都有资源。——作者注

人或资方的唯一代表；劳资关系由国家工会和雇主之间的协议决定；劳资之间的冲突由“顾及双方与民族工业利益”的劳动法庭裁决；破坏生产的阶级斗争将受到严厉的镇压。

显然，意大利组合国家的劳动纪律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

至于法西斯工会，作为统治手段，它的垄断消灭了工人的阶级组织。它受到法西斯政党和国家的完全监督，不具任何的自主性。工会安排可靠的法西斯分子担任干部，工会的议程也由法西斯的劳动部门控制。多么可靠的代表！

意大利法西斯将自己理想的资本主义粉饰为田园，承诺永远美好繁荣的未来（这对于破产中产来说，可太有吸引力了），而它用以维持幻想的，正是同一个理想资本主义的权威和“劳动纪律”的暴力。雇主仍然在指导经济生活，工人阶级对社会权力的要求表现为法西斯工会在组合国家中的地位。工人阶级在民族工团的控制下，从来没有掌握过对于社会生产的权力，阶级斗争的动力不过是从未颠覆资本的方向导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用以建立和维持一个注定无法稳定的“超阶级国家”。

考察弗朗哥西班牙和萨拉查葡萄牙一样套公式就行了。

从书中能够看出，庇隆建立的阿根廷国家也是如此。本书作者叙述时采用的是令人生厌的“中立”语气，因为作者依附的主流学术总想“不偏不倚”地解读历史事件，其实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本书作者解释了各方的动机，结果只是合理化了“肮脏战争”。好在我们能从中读取出需要的部分。

革命运动失败了，随后国家通过镇压恢复了资本主义秩序，这就是在阿根廷发生的事。在这里，还需提到作者避而不谈（但是我

们可以读出)的两点。其一,1973年庇隆结束流亡回国之前,就做好了肃清左翼的打算。其二,支持阿根廷军政府的苏联早就不代表工人阶级的自觉斗争了,苏联的官僚集团想要的只是在国际上寻求暂时的政治互保,连它自身都害怕工人革命的前景,怕它动摇自己的权威。书中带着蔑称意味的“民粹主义”一词,无非在暗示群众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不可能自觉地认识自身的利益,而只是盲目地被动员、被利用。此书最大的价值在于作者的采访记录,因此我们将它完整翻译并公开,仅略过前言中无关紧要的部分和结论章充斥空话的一半内容(在此基础上我又删去了更多,正文不动。——25年中译者注)。作者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概念,只在根据所发生历史事件的现象来倒推原因,不断向自己提问,再不断否定自己的假说。看起来,主流社会学的全部智慧也不过如此。

本书的第一部分讲述了人们受历史事件的影响,无法从个人的角度认识到资本在以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重建市场秩序。阿根廷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国家恐怖,需要粉碎社会革命的幽灵以及工人的组织与福利,流亡归来的庇隆以及之后接手工作的军政府不过是满足这一需要的角色。从这些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后世界对青年的压迫,而资本主义向来是害怕青年的,它害怕一切的自主性、首创精神和它的古老价值观无法容忍的事物。那一整个世代的青年将自己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的前程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思考、行为和为了高尚事业而奋斗的生活,是当代青年所无法理解的。九十年代以来,当代青年的主要特征是对社会现实无动于衷、只求向上钻营且从未考虑过另一种生活方式,全然由资本主义精神滋养。

一位受访者说道:“我成长的那个时代,与今天大有不同。摇滚也一样——我当时醉心政治,但我也喜欢摇滚——但如果你想在

一个热衷政治的团体中谈论摇滚什么的，可不容易。这是错误倾向。革命才是主题。革命将由工人阶级进行下去。音乐是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我们从未去过舞会或迪斯科，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和世界建立了严肃的关系，这是献身。许多人在二十岁前就结婚了。我们把这视为献身，是历史使命的一部分。政治吞没了一切，你没法避开政治。去年，我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见到了一个二十多年没见的同学。他没有参与任何“事业”。他对我说，他不了解当初发生了啥。他感觉自己跟所有的圈子脱节。他说，那些年里，他过得很快，因为他对跳舞感兴趣，对生活有着“温和”的态度——这是今天大多数年轻人的作风——因此受到了大家的排挤。”

全书的结论章中这样写道：“没有经历过这些的年轻一代，对当时的事情没什么兴趣。他们父母一辈曾梦想过新的社会，有些人甚至对这样的父母表现出敌意。他们和全世界年轻人一样，热衷于同样的活动与想法——跳舞、恋爱、听音乐（尤其是美式音乐）、打扮时髦、买新潮玩意儿、读书上学、在社会中向上钻营。过去——即使是他们父母的过去——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他们也不怎么同情受害者。他们的激情来自消费主义，而不是政治；推动他们的是消费，而非公民权利。”

社会革命遭受沉痛打击之后，必然归于沉寂。在重新投入战斗以前，必须要花费时间修整和喘息。虽然几代人的精神麻木，对于老朽的资本主义也显得太久了。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为了理解庇隆年代，作者较为详尽地介绍了阿根廷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历史。国内读者对于七八十年代的火热斗争史诗一无所知，对拉丁美洲较为久远的苦难也鲜有所闻。不过，读者不必像主流学者那样执迷于细节，书中的材料已经足够

我们经过智力劳动来得出所需结论了。从阿根廷阶级斗争兴起的历史中，能看到胡安·庇隆是怎样在各方利益角逐的背景下，利用阶级间的力量对比实现自己的雾月十八日的。在“悲惨周”用机枪扫射工人，并不妨碍庇隆摆出一副工人救世主的姿态。书中提供的材料，揭露了庇隆的组合国家是怎样用舶来的理论在阿根廷支离破碎的社会上进行实践的。与意大利组合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庇隆主义在社会动荡时期，由于缺少工人阶级的自觉力量，完全垄断并引导了走向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动力，导致它在群众中间具有广泛基础。这也是为什么阿根廷在六七十年代，除了在（唯一拥有基层工人网络的）科尔多瓦的工业区，工人阶级始终没能像他们在法西斯西班牙的阶级同志那样对资本主义予以痛击，而只是完全被动地任人宰割。庇隆主义的包袱使得他们无法找到自己的道路。庇隆主义工会对工人阶级的束缚，要更甚于欧洲的左翼政党。

流亡中的庇隆以左翼领袖自居，于是反抗军政府统治的势力都自命为庇隆主义者，因而也是社会主义者，直到庇隆回国后露出真面目，甚至还没下飞机就开始清算他们。

第三部分所讲述的“肮脏战争”，即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对革命的残酷镇压，为其后的新自由主义铺平道路，最终建立资产阶级正常国家的过程。这并非是偶然发生的，因为阿根廷的“肮脏战争”的开端，正值世界革命的退潮以及新自由主义反攻开启之际。不仅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整个世界都在干着同样的事：由国家对革命者执行广泛而残酷的镇压。诸多左翼政党则扮演着帮凶的角色。这些无可救药的左翼政党跟工人阶级的利益彻底地分道扬镳，只要有机会占到议会政治的便宜，就忙不迭地大搞联合统战，不管对方是不是阶级敌人。

作者囿于主流学术的“中立”，不愿直截了当地指出庇隆归来后镇压左翼的逻辑：埃塞萨机场的蓄谋屠杀、不断收回给予左翼的承诺、背地里集结右翼势力和暗杀队，最后是在五月广场的公众集会上公开和左翼翻脸。庇隆归国后，原来的“庇隆主义者”迅速往左右两边站队，建制派、工会和游击队都产生了内部分歧。庇隆与反革命在自觉地准备反攻，左翼无知无觉，陷入麻木；工人的动员早就受到了庇隆主义工会的压制，游击队还在进行表演性质的活动，希望像以前的好时光那样，用城市游击活动换取支持和让步。

就这样，拉美最大的城市游击队在阿根廷轻易一笔勾销。我们有必要多说几句。在失去革命形势的社会中，游击队是无法与正规军进行拉锯战的。城市游击队曾是产生于革命需要的历史性工具。我们在对包括红色旅在内的意大利城市游击队（在笔者关于意大利六七十年代革命运动的另一本译作《黄金暴徒》中）的考察中，可以看出最初的游击队是作为无产阶级意志的表现而诞生的，它满足了工人阶级反抗压迫的愿望，其实践最初并没有脱离鼓舞群众士气的目的。但游击活动特有的逻辑产生了盲目的激情，再加上革命退潮的影响，这种激情正中了国家恐怖主义的下怀。（现在我对这种解释不够满意。本质其实还是想革命，但是不懂如何革命，见第二版译序。——25年中译者注）

这并不是说本不应该搞游击活动（但何谓阶级战争中的游击战？要我说，日本左翼几十年来全部的游击活动，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山上彻也对统治秩序的打击大。——25年中译者注），需要理解的是游击队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规律，要从它的整个历史时期来进行考察，就像要从整个世界历史来考察阿根廷历史一样。回过头看，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阿根廷本身还没有动力实现自己的社会

革命，即便是科尔多瓦起义，也远未达到当时欧洲工人斗争的高度。阿根廷远非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它的革命前途很大程度依赖世界革命的突破。（现在想想，革命者肯定是有能做的事的。看看科尔多瓦吧，为什么只有那儿的工人能组织起来，正面反击军政府？游击队反而一触即溃？——25年中译者注）历史对于没能实现革命的惩罚，就是野蛮。没有自下而上的彻底变革，拉丁美洲绝不能摆脱第三世界背负的苦难与悲惨。那一代的青年本能地懂得这一点，并坚信能以自己的双手开辟一个新社会，那里没有压迫和贫穷，没有军事独裁，没有对自己的生活指手画脚的老一辈，并且能够充分实现自己对于社会正义的理想。现实的苦难如此露骨，而革命的前景又如此接近。古巴和越南人民可以取得胜利，为什么苦难如此深沉的拉丁美洲不可以？在法国、匈牙利和中国都在发生着剧变，青年相信自己有着创造历史的力量，也正在创造着历史。

受访者提供的丰富素材，让我们对国家恐怖主义受害者的遭遇有了足够的认识。但在这段时期之后，为了重新加入议会政治的游戏，左派却和民主政府达成和解，那一整代人再一次被迫沉默。

从文中还能看出，用“社会治理”包装起来的军政府，并不是资本主义之外的事物。它意味着不受颠覆思想惊扰的日常生活、受舆论审查的大众媒体和掌握话语权的保守群体的活跃。而这，就是资本主义。

访谈的第四部分则讲述了教会的不同观点，第三世界的激进神父运动同样也是一场广受瞩目，国内读者却不甚了解的运动。这一部分中还包括了军人的自我辩解，他们自认为保卫了家庭、宗教和秩序，民主政府审判他们是不公平的。而其实，最不公平的是他们竟能如此轻易地逃过审判。他们本应领受阶级斗争的清算。阶级复

仇应当是无期限的。

希望这本书能够填补国内对于庇隆及其后的阿根廷阶级斗争史的空白，有助于理解革命与反革命。在此，感谢“马面”为第一部分提供的校对，并且容忍了我粗糙的底稿。感谢“科佩尼克鼹鼠”为本书编写的注释，假如没有他们几位提供的帮助，这本书的译制工作想必是没法这么快完成的。后期工作要比翻译本身更磨人呐。

2021年1月27日

修改于2025年

第二版译者序

拖了四五年，我这才有空（其实是没动力）校订自己的早期译作《上帝的刺客》。回过头看，我对初稿很不满意，必须修订一遍。第二版中，我删去了原书前言与结尾部分的大部分内容——全是正道学者的学术废话，对于我们挖掘阿根廷的阶级斗争史没有价值。正文部分原封不动，不同立场的当事人意见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比起“杯底暗藏毒酒”的阿伦特反共学术研究有价值得多。

书中的许多对话值得深思，这些细节还是交给读者吧（阶级斗争没那么困难，道理连初中生都明白，只是偏见和误区太多。有些人喜欢劝人“多读书”，但是思路不对，读再多书也没用。比方说，你要是想搞左翼“主流政治”，在阶级社会中往上爬，那你读完书，只会用漂亮话粉饰自己的钻营行为，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我指的“细节”是受访者说这话，是出于什么立场、有什么目的。至于扑朔迷离的历史谜团不是要害。纠结“某人是特务”实在没必要。有功夫搞合不来的同志或同路人，不如想想怎么打击资产阶级。扣工资了，打资产阶级；对象跑了，打资产阶级；牙疼了，打资产阶级……不敢面对真正的敌人才没出息，是本末倒置。

本书的价值在于一手史料：当事人的回忆，顺便介绍了阿根廷历史，学校里不教，别的地方应该也读不到（我的大部分历史知识都来自文献翻译，包括战间期的美国，战后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原本对我都很陌生）。记得第一次读时，简直压抑极了。

阿根廷的革命青年和工人阶级似乎一直在白白流血。多看看历史，你会感觉“人类总在犯同样的错误”。书中提到，在六七十年代，阿根廷青年不懂政治，凭一腔热血加入了庇隆运动，自以为追求“社会主义”，却稀里糊涂送了命。就像意大利（甚至日本）一样，青年想要革命，却不知道如何革命，等到工人斗争浪潮退却，就完全不知所措。有行动动力的人加入游击队跟国家作战，事后看好比“以卵击石”。（游击战不完全是“错误”，可阶级斗争是不对称的总体战，是各类斗争手段的配合。游击队应该打击资产阶级秩序的要害，而不是暴力机关的触角。）

还有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中，最初加入斯巴达克的青年也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光有革命的冲动，急不可耐地要上街跟军队干仗。道理是相通的：不能理解阶级斗争，就无法取胜。翻译本书，就是为了重新引入阶级斗争的思想，避免后人再走一遍弯路（怎么会不走弯路呢？毕竟被统治者没有自己的历史）。

而光有冲动，没有“求胜”的意念，麻木地困在日常的政治幻想中，也不行。那么，怎样培养正确的政治直觉？需要工人网络（组织形式可以多样，它不是严密的党组织，而是能让整个阶级一起行动，允许不同立场的积极分子参与协作，在斗争中共同成长的平台），需要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评判标准是阶级利益，目标是阶级权力。驱动你的是对工人权力的追求，而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进步”（没有权力，等你稍有懈怠，任何进步都能轻易一笔勾销）。做事前三思：能否使阶级力量对比更有利，能否推动无产者的自觉斗争。换言之，能否分化打击敌人，能否团结强化同志。

说是新序，其实我关于《刺客》没太多新想法，本书也缺少读者讨论。在此就总结近期的思考吧。比如说资产阶级国家是“九头

蛇”，有多个蛇头，共用一副躯体。军队是蛇头，工会是蛇头，主流政党与社会运动（包括庇隆运动）也是蛇头，遵循主流政治“斗而不破”的规矩。就像军队镇压工人，总工会压制工人，庇隆归国后就清洗革命工人（可惜阿根廷没给左派留一席位置。）

“九头蛇”的说法不是我提出的，资产阶级学者和文艺作品也经常提到。就算是老生常谈，也要反复强调，因为阶级斗争需要“敌我意识”。有产者总是自觉的，明确敌我关系，日常状态下会为了争夺利益大打出手，几个“蛇头”互相吞吃，但面对无产者的威胁，都懂得“顾全大局”。无产者总是不自觉的，这是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使然：没有权力，就没有自信，本能地靠向社会主流，抓住某个蛇头。所谓先锋队，就是工人阶级的自觉大脑，懂得求胜的艺术。

当阿根廷的统治阶级无法统治时，才“两害取其轻”，让庇隆扮演独裁者，利用阶级合作，把工人阶级的革命动力化为法西斯组合国家的基石。从这个角度说来，法西斯主义岂不是彻底的改良主义？毕竟道理相通，都是社会改良，也就是利用群众运动实现暂时的阶级合作。至于暴力，国家本来就是暴力机关。列宁不都说了，国家本质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镇压机器。（说到哲学，我个人认为，指导建立第一个工人政权后，哲学就完成了历史任务。再往后的哲学发展与思考，只服务于这个任务。）

自由派和中产市民总是幻想，只要到足够“民主”的地方，就能享受地上天国：国家不会阻碍他们弱肉强食的游戏。弱者就为市场而死吧。本书的正道作者也一样，三句不离“民主”和“多元化”。可惜了，如今是二零二五年，时代变了，历史没有终结，只有福山的妄言终结了。旧统治者阵营正在抛弃“多元政治”的工具。看来资产阶级搞这套也搞厌烦了。以前是大棒，后来是“参与感”，再

往后呢？资产阶级会拿什么治理社会呢？

距离当初翻译《刺客》已有五年了。这五年，我继续挖掘有关工人话题的文献。说实话，有好几回，我个人生活发生变动，本打算从中抽身，专心当“良好市民”的，但发现市民社会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当然我可不是边缘人，有在好好工作上学，这些翻译全是自愿的。我指的是归属感。人活在世上总得追求某项事业，不是么？（也许游击队寻死，也是无法与阶级社会和解，在寻求归属感，一了百了倒在战斗中，反而轻松了。我有时也想这样。）

二五年年初，人工智能飞跃发展，处理文字很厉害，似乎已经不需要我了。那我还有什么用呢？过去的努力算什么呢？算了，牢骚还是少发。也许我这几年也变了。总之当初的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工人阶级的事业更重要，我只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你明知该做什么，却没有做，那就是在犯罪。但既然做了，就要做好，负责到底。手头这些译稿，发表的还是未发表的，我都得校订到自己满意为止。

最后感谢科佩尼克鼴鼠又帮我编写了大量词条，真是帮大忙了。感谢吴季不辞辛劳帮我校订文本，制作文档。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补充的话

事后想想，七八十年代发生在亚非拉的“国家恐怖主义”是早有预谋的。或许镇压革命者是顺带的，主要目的是拔除各国的阶级合作，为“新自由市场”扫清道路。因为市场不再需要工会和左派

政党，统治者厌倦要求“分享权力”的奴才了。

各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各不相同，说明统治者也在摸索。或许亚非拉是“示范区”，搞出了方法，再输回心脏地区。比方说米莱在阿根廷的新自由改革后不久，美国就开始搞休克疗法了。

为什么军政府禁止了看似无害的一些东西？或许是压迫非常人能忍受，任何“美好”的事物都能唤起反抗现实的念头。

南美的阶级斗争这样残酷，或许是离俄国太远。十月革命之后的百年间，大地上实现了翻天覆地的社会改良。二十一世纪不容易饿死人，原因不是生产力发展了（资本增殖的代名词），而是列宁建立了工人权力，无产者以自身的威望要求了社会财富的所有权。

回顾阶级斗争的历史，可谓异常血腥残酷，但终究是收敛的，保留了“文明体面”的外衣（参见书中的一些阿根廷中产市民过得多么滋润），因为主流共产主义改良运动用工人的血弥合了社会伤痕。不然的话，世界就是个大拉美……

也许还要糟糕。因为以往的资产阶级内斗会让参与阶级合作的无产者承受伤害。如今，市场又不够帝国主义分的了，冷战战败国开始挑战战胜国。工人阶级暂时离开舞台，不再挡在前面当肉盾。或许世界的前景比“大拉美”还要糟，将会有无数的苦难与牺牲，才能使“市场信仰”彻底破产，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重新回归。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部分

前言



第一章

前言

1976年3月24日至1983年10月30日间，阿根廷约有三万人失踪。许多人遭到非法监禁，成千上万人流亡海外。遭绑架的人们关在全国数百个集中营内，受到阿根廷军队严刑拷打，最终惨遭谋杀。军政府控制了阿根廷，在人称“进程”（el Proceso）的国家重组过程中实施了恐怖统治。或许这帮军官意识不到，弗朗兹·卡夫卡¹关于官僚主义的经典小说《审判》的书名，在西班牙语中也叫做《进程》（el Proceso）。

军事政变之前，阿根廷经历了无政府状态和经济衰退，地下活动的武装团体称这段时期为“肮脏的战争”。从胡安·多明戈·庇隆的第三个任期（自1973年9月当选至1974年初去世）到庇隆第三任妻子玛利亚·埃斯特拉（以艺名“伊莎贝尔”著称）执政时期，政府部门组建的准军事组织三A团²杀害了两千人。此外，在游击

¹ 弗兰茨·卡夫卡（František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奥匈帝国捷克犹太裔小说家，西方现代主义和表现主义文学先驱，代表作《变形记》，《审判》。——中译者注

² 阿根廷反共联盟（La Alianza Anticomunista Argentina，AAA），简称“三A团”（Triple A），是阿根廷1973—1976年期间存在的一个右翼准军事组织，常以恐怖手段大肆迫害左翼势力、工会团体及左翼庇隆主义成员。1976年因财政丑闻被迫解散。——中译者注

队与军队的公开冲突中，至少两百人丧生¹（有些统计数字还要大）。

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军政府，目标都是消灭反抗分子、共产主义者、无神论者以及官方眼中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福祉构成严重威胁的反对派。大大小小的游击队组织成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这些武装团体参与了抢劫、绑架、暗杀活动。国内外的商人都成了游击队的潜在目标。游击队袭击军营，盗走军火，连一些装备都是通过绑架要人索取赎金，在国外购买的。总之，对于国家来说，颠覆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有政府撑腰的准军事组织三 A 团和后来的军政府，杀死的人远远不止游击队的成员。起初，显然无辜的年轻人、工会会员、学者、艺术家、记者、律师、神父、社会工作者、精神分析学家都纷纷遇害，或是锒铛入狱又在军事政变后短短几天内“失踪”了。天知道谁要死。谁也说不准什么构成犯罪，或者某个人是否有罪。你就算不参与颠覆组织，也绝不能说安全无事。有些人落难，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名字记在被捕者的通讯录里，或者偶然目击了一场绑架，又或者只是意外；有些人遭到绑架，只因秘密警察垂涎他们的财产；有些人是因为大人物不喜欢他们；有些人是因为谁也不知道的理由遭罪的。恐惧笼罩了整个社会，“失踪”愈演愈烈，而警察和宗教当局拒不承认发生这些事。这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游击队的绑架和炸弹袭击，加上准军事组织的绑架和炸弹袭击，是国家恐怖主义的直接诱因。但在游击队和阿根廷反共联盟（三 A 团）建立之前，阿根廷经历了很久的暴力。年轻人纷纷造反，反

¹ 这一估计数字由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提供，出自《各国政府的政治谋杀》（Political Killings by Governments）。第 50—60 页。——原注

抗接连不断的军事政变与军政府。工人反抗军队，不许军人控制工会活动。名为“第三世界神父运动”的小团体也威胁着强大的天主教会，把为穷人服务置于了“原罪与救赎”的布道之上。军方试图摧毁阿根廷独一无二的政治思想：庇隆主义，因为它成为了广大群众的偶像。虽然在 1973 年前，国家恐怖主义还没有系统性地建立起来，但军警滥用暴力早已成为了家常便饭。

阿根廷社会的暴力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阿根廷历史上，军队始终都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四十年代后期，胡安·庇隆领导下的工会也对反对派的分会和会员施加暴力。天主教会没有采取露骨的暴力，但也实行了严厉的极权。总之，这个独裁的社会无力实现——或者说，无法在实现后维持——社会冲突的合法解决。多元化没有出现，多样的政治与社会思想不受容忍。政治组织没有胡萝卜，只有大棒。整个司法体系、出版自由、学术独立、多党制度、警察系统的独立性，早已土崩瓦解。对立的利益集团在这样的社会中互相争斗。因此，从根本上讲，一切活动都是政治性的，各方都在要求权力。甚至早在庇隆 1973 年从西班牙流亡归国，到他去世后，伊莎贝尔·庇隆武力镇压运动之前，阿根廷就已经极度撕裂了，早已深陷泥潭、难以自拔。对于这段历史，有人可能会问：国家恐怖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解答，虽然回答的方式是间接的。本书的写作目的，比起解决历史问题，更多的是聆听经历恐怖年代的阿根廷公民。作为七十年代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者，受访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有些人讲述的是他们在政变前的焦虑，表示支持军队下场。另一些人则讲述了他们的愤怒、他们跟军政府的抗争。一些人告诉我们，他们为何成为革命者，加入游击队意味着什么，自己

又如何在七十年代活下来。一些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成为了“第三世界神父”，又如何在各自的教区和这个国家生存下来。另一些保守的教徒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支持军政府。军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恐怖主义是必要且合理的。这些采访没有为国家恐怖主义的起因提供什么“证据”，但是给出了丰富的素材，有助我们理解恐怖主义发生的背景、了解当事人的经历……但本书无关理论，而是关于个人经历的。受访者的自述是我们的一手资料。历史记录是对个人经历的补充。

本书的编排

我们会在讲述阿根廷历史的过程中插入访谈。开篇的访谈讲述了普通人面对社会暴力的经历。受访者给出了个人经历与思考，包括害怕军政府、支持军政府，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诸多观点。受访者当时卷入的事件，则在后续章节进行讨论。

第二部分关于七十年代初的阿根廷历史。第三章非常简短，介绍了阿根廷从建国至 1945 年的历史背景。第四章重点介绍庇隆执政的十年，至 1973 年前的（准）军政府时期。第五章关注后庇隆时代的工会发展，及工会与军政府的关系。这一章也包括了对动荡的六七十年代居住在工业城市科尔多瓦的民众的三段访谈。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详尽地讨论了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成立的游击队组织，并讲述了胡安·庇隆的归来。

第三部分有许多采访，提供了人们对 1970 年后暴力加剧的看法。采访中夹杂着当时报纸上的内容与传言。这一部分首先是对（胡

安·庇隆政府发起，后由伊莎贝尔政府接手的）肮脏战争的讨论。一位重要的阿根廷作家、几名年轻学生、一名游击战士讲述了肮脏战争对自己的影响。第八章是对肮脏战争时期的囚犯的专访。这些人对工会及其内部斗争，以及他们在监狱中的痛苦经历，提供了一手资料。

同样在第三部分中，第九章是对 1976 年政变后的“进程”的考察。第十章则是对一些前游击运动成员的采访。采访中流露着懊悔，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因为他们今时今日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往往与当时相去甚远。第十一章采访了贫穷的农业城镇图库曼（革命战士在当地大批牺牲）的幸存者。最后，第十二章，我们听取了一名出版商和一位编辑对军政府和游击队的看法。本章还探讨了国际社会对阿根廷事件的反应。

第四部分着重于社会的两大机构：天主教会和军队。教会内部对教会在镇压期间扮演角色的看法不一。军队内部的声音也不一致，有捍卫者、谴责者、怀疑者之分。这些采访揭示了，独裁时期的乱局和冲突，至今仍困扰着这些组织。

结论部分回到了本书开头的讨论。国家恐怖主义的起源和成因是什么？我们从访谈中的社会背景与进程，从采访者在那些事件的经历中，了解到什么？

我们要求读者按顺序阅读这本书，因为本书的采访中，人们讲述的经历、对事件的解释与认识，是层层推进的。一些受访者的猜想得到证实，或者被别人了解的东西否定了。一些人经历了悲剧，结果发现是白白受了苦，显得更悲壮了。对于一些人来说十分严肃的事物，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荒谬或是难以置信的。

这些采访不仅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讲述历史，而且告诉我们，国家恐怖主义有多么复杂。最初的印象完全变了样，三言两语什么也解释不清。读者会在书中找到贯穿历史的诸多支线。第一条关于蒙特内罗的一位领导人，一些受访者和几位作家认为他是双面间谍。第二条支线关于工会的内部冲突及其在恐怖时期对工会运动的影响。第三条支线关于天主教会步入千禧年时的困境。教皇敦促教会直面过去，但教会仍未承认自己在那场悲剧中的责任……

第二章

面对国家恐怖主义

这一章采访了曾在阿根廷经历过恐怖主义的人们。这些人不是游击队员，不是教会官员，也不是警察或军官，而只是时运不济的普通人。他们诉说着恐惧、困惑、愤世嫉俗和愤怒，也表达着悲伤、冷漠，甚至自鸣得意。军事政变是灾难，或是赐福。军队是白痴，或者是圣徒。社会生活完全乱了套，也有人照常过日子。这些都是社会动荡时期的普通人的声音。这些声音为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发生这些事，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解释。它们代表了身处事件中心之外的普通人的看法。

瓦尔特

1977年，我离开了军政府治下的阿根廷，我非常讨厌那儿的生活。住在阿根廷使我非常害怕。我当时十九岁，想着总有一个地方，人没有那么愚蠢，起码能讲道理，因为国内的人暮气沉沉的。我生活在恐惧中，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然后我就想，这个国家的现实是不合理的。肯定有另一种现实存在。

我为啥这么说？我时时刻刻都处在恐惧中。我为自己是年轻人而担惊受怕。比方说，我们都必须剃短发，不能蓄胡子。再比方说，

我们不能戴绿的东西、穿绿的衣服，因为绿颜色是游击队的象征。穿绿外套是不行的。如果你年轻又特立独行，那就危险了。你出门得随身带着身份证件。要是忘带了，你必须马上赶回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没有参加什么政治党派，但我啥时候都很紧张。

在阿根廷，“年轻”一直都非常危险。你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法律叫你们闭嘴。课照常上着，我们也继续学着，就像在另一个世界一样。我们尽量不谈别的，只谈学习方面的事。大家都怕自己的事情传到警察或军人的耳朵里。

塞巴斯蒂安

1970年，我十岁，还在上小学。我父亲是教授，在一个小小的社会主义政党里当左翼活动家。他的同志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阿根廷左翼应当重新审视与庇隆和庇隆主义的关系。1971年，我参加了党的会议。从那时起，我开始阅读本国历史。第二年，整个城市处处都是“庇隆归来”（Perón Vuelve）的标语。

我进入了公立中学。学校里的政治气氛很浓厚。庇隆主义青年团在学生当中举足轻重。学校里有很多十三、四岁的蒙特内罗和一些活动家的小组。我不是蒙特内罗，但我跟庇隆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很好，也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1974年，政府接管了我的中学。政治活动是绝对禁止的，所以我不再参加活动了。假如当年我没淡出，可能小命就没了。

我的家庭生活并不平静。父亲不得不再度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

大学。1966 年，昂加尼亚¹将军发起军事政变时，父亲曾被赶出大学。1973 年，胡安·庇隆的追随者埃克托·坎波拉²当选总统时，父亲回到了大学。但在 1975 年，政府再次接管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父亲又得离开那里。后来，他到布兰卡港大学教书，我们举家搬了过去。那年我十五岁。

布兰卡港离军事基地非常近。城里有强大的右翼和法西斯组织。七十年代的阿根廷没有保守派与自由派之分，只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没有中间余地。有一天，我想，大概是 1975 年的两三月份，武装分子在我们住的酒店露面。这些人持枪走在街头，说大学里教书的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要统统杀掉。这是我第一次目睹真真切切的暴力。

¹ 胡安·卡洛斯·昂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1914 年 3 月 17 日——1995 年 6 月 8 日），1934 年入伍。1943 年参加了推翻拉蒙·卡斯蒂略的军事政变。

1962—1965 年任阿根廷陆军总司令。1966 年 8 月参加了推翻伊里亚的军事政变，后出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取消了国有化和资本管制措施，实施艺术审查，取缔了一切政党活动。1969 年，血腥镇压了科尔多瓦群众起义，引发了全国工人和学生运动。1970 年被军方废黜，随后退休。——中译者注

² 埃克托·何塞·坎波拉（Héctor José Cámpora，1909 年 3 月 26 日——1980 年 12 月 19 日），出身意大利移民家庭。1945 年加入工党（Partido Laborista），支持庇隆竞选总统。1946 年加入正义党。1946—1948 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正义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46—1955 年任国会议员，在任期间于 1949—1955 年任国会众议院议长。1955 年庇隆下台后被捕，1957 年越狱后流亡智利。后于 1963 年回国。1971 年担任庇隆的代理人，领导“民族解放阵线”。1972—1973 年任正义党第二副主席。1973 年 5 月 25 日——7 月 3 日任总统，同年 6 月跟随庇隆回国，7 月 3 日辞职，为庇隆再次当选总统创造条件。同年 12 月任驻墨西哥大使，1974 年庇隆去世后辞职。1975 年 3 月改组庇隆主义左派青年组织为“真正庇隆主义党”，同年 4 月被开除出正义党。1976 年 3 月 24 日在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中，携全家到墨西哥驻阿根廷大使馆避难。1979 年获准流亡墨西哥，次年去世。——中译者注

我的父亲让我们冷静下来，送母亲、妹妹和我到了另一个镇上，到周末再来看我们。到了 1976 年，大学里的许多教授被军队抓起来了，大部分都失踪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系统性的失踪。我们知道有些人进了大牢，但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们觉得，他们过不久就会回来了。

1975 年下半年，父亲离开布兰卡港大学。全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祖母家里住了几个月。父亲焦虑不安，当时他有几个朋友被抓了，但他们既不是蒙特内罗，也不是左翼分子。有位朋友关了一个月后，不得不流亡出国。父亲很害怕，但从没想过自己可能遇害。他觉得，顶多关上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不会比这更糟了。另一位朋友在以色列大使馆工作，跟父亲在大学里见过面。此人告诉了父亲一个逃离阿根廷的方法。他说，要是父亲愿意，在四十八小时内就能送他到以色列。他说：“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想出国，我就会把你一家人送上飞机，四十八小时内就能到以色列。”然后父亲把这事告诉我们，问我们怎么想。他说：“我不想走。我想留下来，因为我问心无愧。”所以我们决定留下来。当然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的后果。父亲不知道，那时已经死了人。他知道蒙特内罗被绑架和处死。但他觉得：“嘿，我不是蒙特内罗，所以我没事。”当时这么想也很正常。

父亲觉得危险已经过去，不必再担心了，就带我们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但那里的气氛还是很吓人。我们天天都能听到警笛声，见到穿便服的武装人员，还有穿制服的警察或军人包围谁家房子。偶尔还有枪声。这些都发生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碰到这种事，父亲就叫我们躲进地下室。政变后，过了半年，警察找上了我家。

便衣警察上了我们家，叫门卫来敲门。母亲去应门时，来人说

是门卫。母亲问：“你要干什么？”当时是晚上十一点。那人说：“我有东西要给你。”母亲打开门，看到两人拿着枪，一人守在楼梯口。他们一副掏枪就要打的样子，推开门卫，闯入我家。

他们搜查了屋子。过了十分钟，他们发现屋里没有藏枪，便自称是警察，在军队的命令下行事。他们开始讲军队的坏话，表示自己不得已才对平民动粗。他们说要带走书本，统统烧掉，因为书才是真正危险的东西。我的父亲事先把所有“危险”的书，包括马克思和列宁的书在内，放进了地下室。所以警察没有找到这些书。但他们带走了让·保罗·萨特¹和左翼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²的书，还带走了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³的一本书。然后，他们抓走了我父亲。别的倒是没拿走什么。后来我们听说，每次警察闯入人家，都会抢走或弄坏东西，有时还会抓走女人。所以我们还算运气好的。

他们逮捕了父亲，告诉我们，要带父亲去布兰卡港的法官那里。

¹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中译者注

² 阿尔多·费雷尔（Aldo Ferrer, 1927年4月15日——2016年3月8日），阿根廷经济学家。1958—1960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经济和财政部长。1970—1971年任经济和劳工部长。1983—1987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银行行长。1999—2001年任国家原子能委员会主席。2011—2013年任驻法国大使。2016年逝世。——中译者注

³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原名里卡多·埃利塞·内夫塔利·雷耶斯·巴索阿尔托（Ricardo Eliécer Neftalí Reyes Basoalto），智利诗人、外交家。1917年起从事诗歌创作。1936—1939年期间参加西班牙内战，支持共和军。1943年回国，参加了智利共产党。1943—1949年任参议院议员。1949—1952年期间流亡国外。1969年被智利共产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退选，为阿连德助选。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1—1973年任驻法国大使。1973年回国，同年9月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后，准备流亡墨西哥前被捕，被强行带至医院，9月23日遭到毒害。——中译者注

第二天，我的母亲去了布兰卡港。那儿的法官说，他连我父亲的名字都没听过。谁抓走了你，就掌握了你的生死。他们要是发狂，就会杀了你。但父亲很幸运，他们是在演习，只是假装杀了他。布兰卡港的法官知道我的父亲被绑架了，但没有告诉母亲，因为他心里明白，父亲从家到布兰卡港的路上可能已经死了。法官不想多管闲事。之后的一个月，父亲杳无音讯。

我们找了警察。最后一位律师朋友取得了人身保护令，我们总算得知了父亲在哪儿。母亲带上食物和衣服去监狱看他。他们说（人不能见，但是）父亲会收到东西的。其实并没有。第二天，母亲再来时，他们说父亲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们又一次失去了父亲的行踪。十五天后，我们收到了第一份父亲从监狱写来的信。父亲入狱一年半之后，我们才能探望他。不知道什么法律判了父亲有罪，那相当于意识形态上的罪名。

我们在布兰卡港探望了父亲，下一次再见他，是在 1978 年 9 月的拉普拉塔。我忘不了，我们第一次见到父亲时，他对我们说，有个俄国小说家说过：“纵观各个国家的历史，有时最好的去处是牢房”¹。这么些年过去了，我觉得他是对的。这是出于两点：一方面，父亲为入狱而自豪，我也一样。另一方面，他没有“失踪”，这算是幸运的。

寻找父亲的过程中，我们见到了许多失踪者的母亲。那时，我们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们的消息很闭塞，因为母亲、妹妹与我没有多少朋友。老朋友一听到我们有难，都对我们避之唯恐不及。我们打给朋友，都说自己很忙，别再打给他们。我们很孤独……

¹ 出处不详，可能是索尔仁尼琴说的。——中译者注

父亲的一些朋友出狱了，他本人也在 1978 年 11 月出狱。我们听说，有些人前脚刚出监狱，后脚就遭到枪杀。他们在守株待兔。不知道是军队、警察，还是什么人干的。他们等人出了监狱，再干掉。所以说，得知父亲出狱后，我们整天守在监狱门口。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记得在他出狱那一天，我们从监狱去了车站，乘公交车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是个晴朗的好日子。后来，我们没再遇到什么麻烦。之后，政治党派重新出现，我们得知了失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这些是无法解释的。庇隆派在 1955 年的政变中被赶下台后，军方的镇压显得庇隆主义比它实际的样子好得多。想跟政府与军队作斗争、想跟这个国家里他们觉得是错误的事物作斗争的人，开始自称“庇隆主义者”。接着，那些自称反庇隆主义者的人，尤其是大地主和富人，发觉了危机的苗头。因此，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的权力交给军队，以便阻止这场危险的政治运动。这个异常古怪又强大的运动，像是某种爆发的文化。观点相左的人们、失去控制的强大军队、与军队对抗的恐怖主义者组成了这场运动。暴力日增月长。军队认为，最大的恐怖主义者就是理想主义者，也就是大学里的人。所以他们认为，在政治上，该杀的不是拿枪的，而是拿书的。他们觉得，拿书的人教唆人们拿枪。这一切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而灾难是无止境的。谁都可能戴上恐怖主义者的帽子。每个军人都想抓几个反对派和意识形态之敌，当作投名状。那个年头就是这样的。

马丁

政变前，我在政府部门当差。我的职务还算比较重要。我个人不做重大决策，但我经手的事务相当重要。我在工作上跟一些部门打过交道。它们势力庞大，有强大的政界影响力，我知道它们是如何影响经济政策的。工商业部长们和部门里的秘书都是业界的大佬任命的。就这样，他们把手伸进了政府，因为官员都是他们选的。

产业秘书处的大部分工作都在为私营部门开法律的后门。部门里的高层一口答应说客们的要求，而我们这些中层呢，就负责审查这些提案中，有哪些地方是违法的。

军事政变前两年，我去参加某个行业的调查委员会。一些国会代表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终于推进了这项工作。我奉命调查某家公司……要是没有工业部的官员从中作梗，这家公司得不到那么多的优惠条件。1976年，我和三位同事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列出了（这家公司）所有的违规行为，其中包括了日后成为凶手与帮凶的阿根廷人的名字。

不久后，我拿奖学金去意大利深造。我到意大利一个月后，政变发生了。又过了一个月，我收到单位的电报，说已经解雇了我。我花了五个月念完了书，回到阿根廷后，要求部门的新领导解释：为什么解雇我。他们没有明确回答我，但我得看出来，他们借两件事搞我：第一，（牵扯进前面我说的事的）官员在报复我。第二，（他们说）我属于一个左翼的革命党。这个指控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断言，我去欧洲这一趟，参加了第四国际在巴黎的会议。

这是胡说，全是一派胡言。我从没参加过什么第四国际的会议。

再怎么说，我来自极右翼家庭。另外，我回国不久，就体会到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运动，没有任何不可接受的政治观点。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党派，我跟革命运动八竿子打不着。左翼和右翼跟我都没关系。他们在扯淡。

我出国时，刚好碰上了第四国际开会。说白了，上面指控我们几个同事是左翼分子，就是想赶我们走。我从来没参加过政治活动。为此，我有合理的个人原因。首先，我在左翼和右翼中，都看不到可行的出路。两边都只会背教条。我觉得政治领袖和左翼运动的领袖都是自命不凡的家伙。左右两边都是如此。此外，还有我的家庭原因：我父亲曾被政治流放，为此后悔一生。父亲出身于法国，是二战的难民，隶属于维希政权。父亲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才发觉，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政治才能。他从未告诉我——但我能猜到——他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极有限地参与了德国在法国的占领活动。

我在意大利时，还不了解阿根廷的情况。回国不到几天，我意识到，这次的军事政变与以往的不同。它把恐怖主义“系统化”了，搞得人人自危。报纸大幅报道了军队占领布兰卡港大学的新闻。读完报纸后，我看开了：很明显，这是一场“猎巫”，跟中世纪没两样。那天，我急匆匆赶到岳母家里。我很害怕，因为我有一处书房，放的都是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的书。我不得不烧了一大叠书。

军队在我附近活动。军人关注每户人家的政治倾向，还会闯入民宅。没几天，一支巡逻队搜遍了我岳母家那一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片街区，搜查了一整天。军队基本上在城郊活动，四处搜捕工会领袖和左翼知识分子。其实，正如我们后来所知，军队——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警察——的做法，就是宁可错杀一百，也

不放走一个。

我曾和一位“失踪又出现”的人谈过。他的经历，可以用“重生”来形容。失踪的人很少有回来的。这个男孩蒙住了眼睛，受了多天的酷刑，才重见天日。他们想让他说出左翼活动家的名字，但他谁也不认识。后来发生一些事，军方发现抓错了人。囚犯总是蒙着眼睛。他们开车把他载到荒郊野外，告诉他，这是他重生的日子。那天起，他有了新的生日。他获救了，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我的一个老上司碰上同样的事。他以前在庇隆政府的左翼部门里当部长。他遭到绑架、酷讯、审讯。后来，他答应说出“名字”，条件是让他出门打个电话。他一出门，就到联合国办公室避难，逃出了阿根廷。

现在，我得讲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这种事在我一辈子里只发生过一次。那是一种预感。我梦到了我那个逃到联合国办公室的前上司，我俩走在街上，他跟在我身后。他告诉我，他必须躲藏起来，因为他们正在跟踪他，想绑架他。在梦中，我给了他一个安全的地址，到地方跟我碰头。自从我上一次见到他之后，已经好几年了。我醒来时，感到非常恍惚。

第二天，我就在街上遇到了他。那是在 1976 年，我刚从意大利回国不久。出乎我的意料，我告诉他昨晚的梦时，他告诉我，他正受到监视，每周必须向警察报道。大约两个月后，他就给绑架了。因此，那场噩梦之后，发生什么我都不奇怪了。我通过我们的共同朋友，得知了他遭到绑架的事情。后来我得知，他通过这位朋友得到了联合国庇护。这件轶事，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一位心理学家朋友说，这是一种对时间的焦虑。

许多人遭到绑架，或者不得不离开流亡海外。我本人既没有左翼倾向，也没有右翼倾向。但是和很多人一样，我们成天担惊受怕。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每绑架一个恐怖分子，就会抓走另外九十九个无关者。不仅是我这么说。1985年，一位军方高层在最高法院上承认了这一点。总之，我想说，除了国家恐怖主义之外，我也完全无法认同马丁内斯·德·奥斯¹部长实行的新的经济政策。那是当今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萌芽与开端。这项政策忽视了阿根廷在经济与社会层面的严峻问题……七十年代的阿根廷已经病入膏肓。这就是我的看法。但我认为，出路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让强大的国有部门和被迫参与市场竞争的私营部门并存。在这一点上，我是受到了法国传统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为什么拒绝从左到右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因为他们提出的是彻底的组合国家²或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我认为，他们对事物缺乏正确的认识。照我看，他们只会背教条，空谈毛的红宝书和弗里德曼³的册子。

所以说，我不可能参与政治。但我不是个有远见的人。我知道，自然是辩证的，但这辩证属于黑格尔式的辩证。人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现社会的内部矛盾，让社会得以发展。但解决矛盾的不是

¹ 何塞·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德·奥斯 (José Alfredo Martínez de Hoz, 1925年8月13日——2013年3月16日)，阿根廷经济学家。1957—1958年任萨尔塔省经济部长。1962—1963年任阿根廷农业和畜牧部长。1963年5—10月、1976—1981年任经济部长。1981年被迫辞职。2010年被捕，软禁在家中。2013年去世。——中译者注

² 组合国家 (corporate state)，法西斯主义即民族工团主义的国家形式。——中译者注

³ 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中译者注

市场之神，也不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只靠市场或者社会主义就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有一回，我差点卷入麻烦。法国寄来一些杂志给我。我去拿包裹时，跟审查官一起待了整整一个下午，等他一页一页地分析杂志的内容。杂志上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拉美军方。我不知道审查官能不能看懂，但他肯定能认出一些法语单词。我猜，就算到了现在，国家情报处¹里还留有我的有趣记录。我的父亲也留有案底，不过他是作为右翼……

阿纳托尔·埃尔曼

除开酷刑，军政府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届政府。我没看到有任何反抗。我没见谁在担惊受怕。大家都很随意，都在购物旅行，一切相安无事。七十年代早期的生活非常安逸。公共舆论以浪漫和轻浮的方式赞同反叛者。没有人觉得这些人真会搞暴力。要理解阿根廷社会，你必须意识到，这里没有法律，没有对与错的界限。人们受到一个极端问题的困扰，但与此同时，他们没有处理日常问题的合法制度。人人都用游行示威反对法律。

那个年头，我还没有醉心民主，但我加入了一些抗争团体。我上大学时，加入过很多个团体。我以前是鲍勃·迪伦²的粉丝。我对

¹ 国家情报处（Secretaría de Informaciones de Estado）：当时的秘密警察组织。——原注

² 鲍勃·迪伦（Bob Dylan, 1941——）：美国六、七十年代最著名的抗议歌手之一，在欧美反叛青年中拥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中译者注

天主教不太感冒，但我是关心穷人的。我不喜欢什么都让人做主。革命者都是暴力和专制的。他们想要革命，认为宣传蒙骗了工人。他们认为，要是消灭宣传，工人就会加入革命。1974年，我退出了。他们疯了……

不过，军队也一事无成。人民革命军只有两千人。而军队、警察、宪兵，加起来少说有二十万人。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机关，敲诈勒索样样精通。到了1982年，军队还是烂泥扶不上墙。军事指挥机关没有做过实战训练。缺少统一的军事指挥，三军在马岛¹根本配合不起来。他们疯了。整个庇隆—洛佩斯·雷加²时期也很疯狂。毫无道理可言。六七十年代的公共舆论也反复无常。

埃莱娜

我运气很好。1966年，我移居委内瑞拉，当时二十三岁。我在那里工作了八年，所以说，当我所有的朋友都加入游击队时，我没

¹ 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发生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又称福克兰群岛战役）。——原注

² 何塞·洛佩斯·雷加（Jose Lopez Rega）：曾担任庇隆侍从的前警察官员，后升为社会福利部长，作为顾问对胡安·庇隆与伊莎贝尔·庇隆有强大的影响。——原注

何塞·洛佩斯·雷加（José López Rega, 1916年10月17日——1989年6月9日），早年担任阿根廷联邦警察特工。1965年起担任庇隆的贴身警卫。1973—1975年任社会福利部长，1974—1976年任联邦警察总监，在此期间成立“三A团”，大肆屠杀左翼人士、工会成员及左翼庇隆派成员。1975—1976年任驻西班牙大使。1976年被迫辞职后，相继流亡西班牙、瑞士、巴哈马、美国。1986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引渡回国。1986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有跟他们一起遭殃。政变前不久，我回国那会儿，还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国内人人自危。神父们很害怕，因为一些修士遭到谋杀，所以教会没为人们提供任何帮助。大家都死气沉沉的。中产阶级和工人支持军方。做人都要低调。说实话，当时待在阿根廷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危险得多。我无能为力，只能低头过日子。

吉耶尔莫

1974年，我在拉普拉塔念完了高中。拉普拉塔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省会，将近五十万人口。拉普拉塔是传统的中产阶级官僚城市，有一所名声在外的古老大学，城市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围绕大学进行的。学生的生活是重要的。生源来自阿根廷各地和其它拉美国家。人们认为，比起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地方更小，上学也更安全。当然，出于这些原因，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本市的政治环境激荡。按人均计算，拉普拉塔显然是阿根廷失踪者最多的城市。可以说，本市的镇压也是最严厉、最高效的。这地方很小，大家都相互认识。想从家里把谁抓走，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

同大多数学生一样，我在国立学院读书，这是一所附属于大学的古老学校¹，每个中产阶级做梦都想要的地方，但这里也极为政治化。当时的每个政治组织，无论左右，在全国每一所学校里都有组织。所以，我在第四年也卷入了政治。我加入了学生组织，大家都

¹ 大学都与国内特定的一些学校具有特殊的关系。大学从这些学校招生。这些学校的课程设计，也是专为过渡中学与大学教育的。考入这些学校的竞争非常激烈。——原注

阅读和讨论马克思，政治倾向挺左的。我不是庇隆主义者，现在也不是。次年年末，我加入了一个小的政党，是从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有毛派倾向，但我很快退出了。

后来，出人意料的是，由于一些非常复杂的原因，这个毛派共产党支持伊莎贝尔·庇隆。你们能想象吗：阿根廷的毛派共产党支持伊莎贝尔·庇隆！有民族主义的关系：那一代人认为民主是美国的发明，而我们不相信美国。那为啥我们不支持那个女人呢？支持她就是支持妇女的民族运动。好吧，也许实际情况更复杂。具体想不起来了，但我肯定当时就是这样。

我在庇隆时代上大学。我决定脱离政治。从我高中毕业到大学二年级，我们有过三四位总统：上届独裁政府的最后一位军人总统亚历杭德罗·拉努塞¹将军，他筹划了胡安·多明戈·庇隆回国。然后是短暂的埃克托·坎波拉执政，接着是庇隆，再后来是伊莎贝尔·庇隆。到我读完大学，军人又掌权了。加起来有五位总统。设想一下，这样的大学生活就像在土耳其人围攻下的君士坦丁堡。我在军队的包围下读完了大学。日子真不好过。

我活了下来，是私生活帮了我。我决心脱离政治活动，不再过街头生活，也不再跟朋友开会讨论文学和政治。说实话，我的大多

¹ 亚列杭德罗·阿古斯丁·拉努塞（Alejandro Agustín Lanusse，1918年8月28日——1996年8月26日），1938年入伍。1951年参加了推翻庇隆的政变，政变失败后，判处终身监禁，1955年庇隆倒台后获释。1956—1958年任驻梵蒂冈大使。1960—1962年任高级战争学校副校长。1962—1968年任第一装甲师师长。1966年参与了推翻伊里亚的政变。1968—1973年任阿根廷陆军总司令。1970年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入侵智利推翻阿连德政府的要求。1971—1973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允许庇隆回国，大力推行工业建设，同时大力镇压工人运动。1973年总统选举失利后退出政坛。——中译者注

数朋友通过各种方式，加入了庇隆主义组织。他们大都加入了青年团，也就是蒙特内罗最年轻的支部。也许我对暴力没有兴趣——可能这一点很重要，我还要回到这一点上——我出身在工人区。我确信，我年轻时认识的工会活动者，没有一个会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坦白说吧，革命是中产阶级学生的幻想，他们希望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在我看来，青年团和蒙特内罗都是保守组织。我从未改变过这样的看法。

我的一些朋友给谋杀了。我高中班上的两个同学给绑架了。其中一个从警察手里逃出来后，跟我住在一起。他弄丢了自己的身份证。当时的身份证件跟身家性命一样重要。我试图说服他退出蒙特内罗，我俩吵了好久。他还是跟他们搞在一起，最后丢了小命。照我看，蒙特内罗是一群……我没法承认马里奥·菲尔梅尼奇¹（蒙特内罗的领导人）是哪门子社会主义者。我没见过他，但我从蒙特内罗那里听说了不少。那是属于中产阶级年轻人的某种法西斯主义。庇隆派在拉普拉塔从没赢过选举，五十年代的拉普拉塔人是反对庇隆主义的。在这个家庭传统浓厚的地方，新一代却离经叛道。我在军方眼里也不是什么圣人。尤其是在哲学方面，我在军队的眼里是亲共的。我确信，他们对每个人的底细一清二楚。

¹ 马里奥·爱德华多·菲尔梅尼奇（Mario Eduardo Firmenich，1948年1月24日——），早年曾参加天主教学生联合会。1970年参加了绑架和处死前总统阿兰·布鲁的行动，同年创建庇隆主义准军事组织“蒙特内罗”（Montoneros），担任总书记，在1970—1980年期间进行大规模恐怖活动，暗杀右翼政客，企图在阿根廷建立“民族”社会主义体制。1976年起，先后流亡意大利、墨西哥、古巴、巴西。1983年在巴西被捕，引渡回国，判处30年监禁。1990年特赦出狱。1996年起定居西班牙。2023年起担任尼加拉瓜总统顾问。——中译者注

蒙特内罗实施的绑架，比如绑架和谋杀主流报纸的主编¹，对我的同龄人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关心的是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学者家庭出身的十八到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大都支持蒙特内罗。他们大部分都加入了庇隆派组织。你可以在失踪者名单上找到这些人。换句话说，对于我这一代人，还有我父母那一代人而言，在大家的政治观念中，不存在一丁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问题在于革命，在于国民价值观念。要务实，有无数种办法解读暴力的使用。暴力是资本主义。暴力是不平等和贫穷。因此，对任何具体的个人施暴，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成长的那个时代，与今天大有不同。摇滚也一样——我当时醉心政治，但我也喜欢摇滚——但如果你想在一个热衷政治的团体中谈论摇滚什么的，可不容易。这是错误倾向。革命才是主题。革命将由工人阶级进行下去。音乐是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我们从未去过舞会或迪斯科，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和世界建立了严肃的关系，这是献身。许多人在二十岁前就结婚了。我们把这视为献身，是历史使命的一部分。政治吞没了一切，你没法避开政治。去年，我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见到了一个二十多年没见的同学。他没有参与任何“事业”。他对我说，他不了解当初发生了啥。他感觉自己跟所有的圈子脱节。他说，那些年里，他过得很糟，因为他对跳舞感兴趣，对生活有着“温和”的态度——这是今天大多数年轻人的作风——因此受到了大家的排挤。

军队在阿根廷酿造了惨剧。我不相信什么“外国干涉”的说法。

¹ 这里指的是《日报》(El Dia) 的出版商大卫·克莱斯布尔德 (David Kraiselburd) 在拉普拉塔遭到绑架，见第十二章的讨论。——原注

谁这么说，都绕不开一个问题：这个政府是从我们的社会中产生的。阿根廷人更得认清这一点。

何塞·路易斯·法谢

1970年，我四十岁，在马德普拉塔（Mar del Plata）¹当律师。当时，政府军和游击队正在火并。游击队受到境外势力，尤其是庇隆的煽动。革命者杀死了阿根廷史上的大人物阿兰布鲁²将军。蒙特内罗运动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顶尖学府的精英学生发起的，得到了第三世界神父的支持与庇护。同时，明显左倾的颠覆活动与游击队运动出现。它们比最初的蒙特内罗还要左倾。人民革命军受到古巴影响，领导人在古巴接受了游击战的训练。

我记得当时，我们镇上有位年轻的人民革命军成员，想脱离组织。他在酒吧里告诉我，他是怎么去的古巴，不留一点痕迹，也没有叫阿根廷政府知道。他在古巴接受了军事训练。他想离开组织，然后就失踪了。因为颠覆组织不允许成员退出。

在马德普拉塔，有些人属于革命组织，但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¹ 马德普拉塔（Mar del Plata），布宜诺斯艾利斯南边的沿海城镇。——原注

² 佩德罗·欧亨尼奥·阿兰布鲁（Pedro Eugenio Aramburu，1903年5月21日——1970年6月1日），1922年入伍。1950—1951年任驻巴西大使馆武官。1952—1953年任驻美国大使馆武官。1953—1955年任陆军卫生局局长。1955年8—11月任国家战争学院院长。1955年11月—1958年任临时总统。1958年退役。1963年发起成立“阿根廷人民联盟”，参加总统选举。1970年起，参与推翻昂加尼娅政权的活动，同年6月1日遭绑架杀害，普遍认为是蒙特内罗杀害他的，也有人认为始作俑者是昂加尼娅。——中译者注

准备在特定时机出来战斗。这是常识。我们都知道这些组织的存在，但认不出谁是成员。左翼和右翼都有这样的组织。右翼组织得到了军方背书。一场左派学生的聚会上，十几个右翼分子闯进来开枪，打死了一名学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右翼团体叫“三 A 团”，背后有政府撑腰。不论如何，左翼回击了，闯入法院旁边一间酒吧，打死了正在喝咖啡的年轻右翼领导人。此人也是律师。当晚死了六人。这是在政变之前发生的。凶手来自左边：武装的年轻学生。

我不在任何一方，我一直都是旁观者。但这一切使我感受到人们的不安与痛苦。人人都在等无能的伊莎贝尔倒台。我举个例子。1975 年，当时的工会领袖对政府的影响很大，还制定了沿用至今的劳动法。工会认为现状对它们非常有利，只想维持原样。

问：当时，你认为游击运动和工会有关系吗？

不。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吧。工会是这样在政府中掌权的：立法机关中有三分之一是工会的人。总工会¹仍然是站在庇隆一边的。我想说的是，颠覆组织的某些成员转入了地下，在地下作战。但大多数成员照常过日子，当医生、律师、兽医。他们当着平民百姓。组织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再为组织服务。

¹ 阿根廷劳工总联合会 (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l Trabajo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CGT) 是阿根廷的一个重要的工会团体，1930 年成立。早年持社会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立场。1937 年起支持社会主义。1945 年起支持庇隆。1955 年以后转入地下活动，多次发生分裂。1966 年工会内部多数支持昂加尼亞，导致再次分裂。1976 年军事政变后遭受重创，大批领导人遇害。1989 年梅内姆上台后逐渐右转，成员不断减少，影响力日渐削弱。——中译者注

我最近读了不少关于古巴的书，1990 年后，我也去过几次古巴。当年，古巴政府卖武器给游击运动。我认为，七十年代里，阿根廷的运动也从古巴得到了指示或武器。切·格瓦拉依照古巴提出的游击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在当年的马埃斯特拉山区，古巴游击队得到了外界同情者的支持，尤其北美的同情者给他们送来了钱和武器。

问：让我们回到阿根廷的军事政变问题。你欢迎政变吗？

是的，我高兴坏了，因为“误国”的时期结束了。我希望通货膨胀结束，政府更加平衡，而工会在保留地位的同时，不会掌控整个国家。我还希望阿根廷的经济能够立马增长。当然了，政府与游击队交战是必须的。回到 1970 年，军方在审理颠覆案件时，成立了特别法庭。颠覆分子都有律师辩护。坎波拉政府在 1973 年夺权之后，所做第一件事就是释放颠覆分子。那些人说，他们只反对军队，想要民主政府。但他们当街打死了特别法庭的一名成员。最后，伊莎贝尔下令剿灭颠覆分子。

要理解发生了什么，你必须认识到，这是真正的战争。虽然肮脏，但毕竟是战争。颠覆组织有军事密码、地下医院、特工机关、秘密间谍、社会关系。我们要分出谁是战斗人员，谁又是同情者与合作者。而每个战斗人员身后，都有金钱、药物、宣传等方面的广泛后勤支持。我估计吧，大概有一万名真正的战斗人员。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阿根廷有些地方是颠覆分子占领的匪区。北部的土库曼省还要交“革命税”。颠覆运动占领了城镇，公然袭击正规军……那次袭

击，我估计有五百名颠覆分子。这些战斗人员按照格瓦拉的游击理论，精心在多山的崎岖丛林中挑选了一处。还有很多战斗人员是城市游击队。他们抢劫银行，制造绑架，杀死不支持他们的人。他们还杀死了工会领袖，比如何塞·鲁奇¹和奥古斯托·范多尔²。

很难说军政府是否还有别的选择。这是战争，像所有战争一样肮脏，各方想要取胜，做的事都差不多。颠覆分子也一样，大搞酷刑和谋杀。我相信，失踪和受刑的人，没有颠覆分子说的那么多，肯定远远少于一万人。人们还想工作、学习、养家糊口呢。全国三千万人，这一万人还不到万分之三。这个数字里，我还包括了死者和受刑但没死的人。许多人与镇压者合作，告发同伴。现在他们倒逼起英雄来了。

问：你觉得，当时有必要杀死这么多人吗？

我再重复一遍，这一万人里包括了死者和受刑的人。我认为，死者也就三千左右，这三千人里，又有一半是死于跟军人、警察、宪兵的公开交战。

¹ 何塞·伊格纳西奥·鲁奇 (José Ignacio Rucci, 1924年3月15日——1973年9月25日)，1946年加入阿根廷共和国工人总联合会。1955年起成为冶金工会领导人。1970—1973年任阿根廷共和国工人总联合会总书记，期间支持右翼庇隆派。1973年被蒙特内罗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² 奥古斯托·蒂莫特奥·范多尔 (Augusto Timoteo Vandor, 1923年2月26日——1969年6月30日)，1941—1947年期间在阿根廷海军服役。1950年进厂做工。1954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55年被捕后，监禁半年。1968—1969年期间任冶金工会总书记，提出“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对政府持妥协立场。1969年被左翼庇隆派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问：军政府倒台后，国家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CONADEP）调查了“进程”。你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吗？

是的，我想是的。但话说回来，阿方辛¹总统的内政部长承诺过要成立全国委员会，专门调查颠覆分子犯下的失踪、酷讯、谋杀。内政部承诺过，但从未兑现诺言。

问：我没明白你的意思。你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吗？

是的。

问：但文件中说明，近九千人失踪、受刑、遇害。可许多受害者不是颠覆分子。

回到我之前说的，不少颠覆分子一边过日子，一边为战斗人员提供后勤支持……

¹ 劳尔·里卡多·阿方辛 (Raúl Ricardo Alfonsín, 1927 年 3 月 12 日——2009 年 3 月 31 日)，早年担任律师。1950 年加入激进公民联盟。1955 年被捕，后获释。

1958—1962 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议会议员。1963—1966 年、1973—1976 年任国会议员。1975 年参与创立常设人权大会。1976 年军政府上台后，免费为受迫害者辩护。1982 年反对马岛战争。1983—1989 年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家债务缠身，1989 年在总统选举中下台。1983—1991 年、1993—1995 年、1999—2001 年任激进公民联盟全国委员会主席。2009 年逝世。——中译者注

问：那孩子又怎么说呢？

一样的。我们得看颠覆分子的说法。蒙特内罗的最高领导人马里奥·菲尔梅尼奇指出：当一个人过起地下生活时，整个家庭都进入了地下，这样一来，孩子便会在完全革命的环境下成长起来。菲尔梅尼奇这个说法是有明确记载的。

问：我指的是在监狱出生的孩子。就是军方从母亲身边夺走的那些。

为了表述清楚，我必须复述一遍：这是战争，大规模战争。任何战争都有人领养孩子。颠覆分子的小孩，有些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接受了教育和食物，得到了养父母的爱。有时，他们得知自己是领养的，也不想回到真正的家庭。我理解那些祖父母，没有子孙辈陪在身边，心里不好受。说实话，生活即使没有我们，也会继续下去。

问：我们换个话题。一些大学和公共图书馆烧掉了大量的书，因为军方觉得它们是颠覆书籍。你认为这有必要吗？

没有这种事。另外，军政府跟苏联有贸易往来，阿根廷和苏联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当时手里有过，也读过左翼和右翼的书，可从来没有遇到麻烦。

问：可我们跟参与焚书、见过焚书的人谈过，这些书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是些大学图书馆里常见的人文科学的书。比方说，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让·皮亚杰¹，数学集合论。你相信这些吗？

不会发生这种事的。我有个朋友是精神病学家，我们可以去问他。我现在就能联系到他。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弗洛伊德、皮亚杰和数学理论被烧了。

问：还有一个关于军政府时期的问题。根据《永不再来》(Nunca Más) 和当时的其它历史记载，军队和警察参与了抢劫活动。你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吗？

这是可能的。我承认这一点。这是真的。这事儿发生过。当年，双方都表现出了人性中最美丽和最丑恶的一面。英雄主义有时会让人送命。而丑恶，比如说强暴和抢劫，这些人类的不幸呢，在任何战争中都时有发生。

问：回到你之前提的：你估计有一万名武装游击队员，还说有一万人遇害或受刑，而他们只占人口的万分之三。问题来了，如果颠覆分子只占了人口的万分之三，为什么国家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对付他们？

¹ 让·威廉·弗里茨·皮亚杰(Jean William Fritz Piaget, 1896年8月9日——1980年9月16日)，瑞士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中译者注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些游击队在台面上，另一些在地下。比方说，菲尔梅尼奇就说了，他们进行公开的军事行动时，要穿醒目的制服。但在秘密行动时，他们可不这么搞。有时，根据古巴的指示，他们穿上正规军的军服，给军队造成混乱。

这样的战术沿用至今。甚至在 1989 年，阿方辛执政时期，游击队袭击拉塔布拉达¹时，也用了这些战术。当时，人民革命军的残部都参与了行动。他们的首领戈里亚兰·梅洛²穿着军装袭击了拉塔布拉达。之后，他逃去了墨西哥，接受了两名记者的采访。采访录像在阿根廷的电视上公开播放。影像中，戈里亚兰解释了行动是如何进行的。之后，阿根廷最高法院联系国际刑警，寻找戈里亚兰和他的妻子：他妻子也参与袭击拉塔布拉达。墨西哥把他引渡回阿根

¹ “一切为了祖国运动”（Movimiento Todos por la Patria）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成员袭击了拉塔布拉达（La Tablada）的军事基地。显然因为他们希望发生另一场军事政变。期间，四十多人死亡，近百人受伤。一些被捕的叛乱分子在七十年代曾是人民革命军的成员或支持者。（人民革命军在 1975 年战败。）——原注

² 梅洛是一名佣兵，曾是人民革命军的成员。他吹嘘自己杀死了尼加拉瓜前总统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和图库曼省蔗糖业工人主席。——原注

恩里奎·阿罗尔多·戈里亚兰·梅洛（Enrique Haroldo Gorriarán Merlo，1941 年 10 月 18 日——2006 年 9 月 22 日），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966 年加入工人革命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 los Trabajadores，PRT）。1970—1978 年任工人革命党下属的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多次被捕并流亡国外。1976 年进入工人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同年流亡法国，参与解散工人革命党。1979 年赴尼加拉瓜，协助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政权，担任尼加拉瓜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领导。1980 年赴巴拉圭，暗杀了尼加拉瓜前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1986 年回国，创建了“一切为了祖国运动”（Movimiento Todos por la Patria），继续进行武装斗争，1989 年失败后流亡国外。1995 年被墨西哥政府逮捕，引渡回国，1996 年判处终身监禁，曾在监狱开展绝食斗争。2003 年特赦出狱。2006 年逝世。——中译者注

廷，回国以合法程序审判了他。

你问我，为什么要用强大的军队去对付一支小小的游击武装。这是因为，军队平日的训练不是打游击战的。真打起仗来，双方都会穿制服。但游击队可不会。要记住，许多军人没有在跟游击队打仗，而在继续日常勤务。我认为，只有一两成的军人参与了游击战。很多军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过非常规的战争训练。那是非常肮脏的战争。许多军方骨干在别的国家受过特别训练。我想是在美国的巴拿马，许多拉美的骨干都在那里受训。

我没有跟军队打过交道，也没有从军方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不管是工作还是私生活，什么交集也没有。1976年，军政府让我当省里的法官，我拒绝了，因为我更想当律师。我和军方没什么交集，也没拿过他们的好处。但我相信，阿根廷当年发生了一场文化和经济上的革命。六七十年代发生了一场战争，而战争的胜利者却坐上了被告席。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场颠倒的纽伦堡审判。

问：在“进程”中，法律废止了吗？

不。只有一些法律中止了。鼓吹颠覆的出版物都被取缔了。但正常工作、玩乐的人，什么麻烦也没有。国外还以为阿根廷到处是堑壕和街头枪战呢。不是这样的。

问：有人说，他们申请了人身保护令，但法官都不批准。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问：所以很多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你身为律师是怎么看的？

很多律师也会遇到人身保护令的问题。但我不处理这些事。

第二部分

历史起源



第三章

暴力的历史

阿根廷历届政府都以“维持秩序”的名义实行暴力。国家的精英们毫不留情地镇压工人和反对派，以此控制社会。教会集团也在积极压制反对势力。历史上的阿根廷是个毫无民主可言的、不堪忍受的、矛盾尖锐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必然不得片刻安宁。而在这段历史中，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意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阿根廷的历史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殖民与后殖民时期。这段时期建立了最初的国家制度与民族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第二段是自三十年代起，军人首次掌管国家权力后的时期。本章中，我们将简要考察阿根廷的重要历史事件、经济发展史、早期移民模式。接着，我们将分析胡安·庇隆执政前的军政府时期。

殖民历史与寡头统治

西班牙征服者在阿根廷留下的遗产，与他们在整个拉美留下的一样。土著遭到了残忍的屠杀。好几个世纪里，独裁者（caudillos）掌握着土地和港口，统治着这些国家。

而在 1850—1920 年间，这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与其它欧

洲国家的殖民地（比如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没有多大区别，但在土地所有权形式上，差别就大了。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有大量的家庭农场，大部分人口是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商品生产者。阿根廷则相反，寡头垄断了土地。少数有权有势的家族占有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内陆的大片肥沃土地、蔗糖园及北部的各种庄稼产区。

在图库曼省的蔗糖产区，寡头统治建立了前资本主义的劳动条件——说是农奴制也毫不为过——这样的条件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但在南部肥沃的农业土地上，出产的都是谷物和（用以羊毛贸易的）绵羊与肉牛，不需要大量受压迫的劳力。因此，在许多富裕的农业地区，总是一个大寡头拥有大片的庄园，加上寥寥无几的农民。蔗糖种植业所需的劳动形式，在这里无用武之地。庄园上的劳动力是牛仔（高乔人）。他们最早是奴隶，不久就成了靠工资维生的农业无产者。在阿根廷的大部分（而非全部）地区，高乔人能移居城市，当雇佣工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工会在城市中诞生，到世纪末已有了很好的组织。工人的劳动条件是残酷的、无法忍受的，但在十九世纪后期，各国在这方面都差不多。

在阿根廷定居者的历史上，寡头们早早分成了两类。一类寡头仍保持着乡村贵族的传统土地所有权形式，他们的财富来自土地的产出。而更大的一类寡头，就跟其它殖民地拥有土地与资本的同类一样，开始进军商业和金融业，最后进入第二产业。绵羊、小麦、肉牛生意，需要发展铁路、道路、港口、银行及下游制造业。尽管英国资本像在加拿大一样，迅速把持了阿根廷铁路业和银行业，可阿根廷地主包揽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等沿海城市的工业发展。地主寡头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商品出口贸易（主要是出口给英国）。但是阿根廷的第二产业，特别是出口贸易相关的产业，跟其它殖民地的增

长率差不多，甚至更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

1900 年以前，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与德国相当，高于大多数西欧与北欧国家¹。阿根廷在 1800—1913 年间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列²。1900—1914 年间，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3%。1914 年，阿根廷的人均产值与瑞士相当，高于瑞典和法国，是意大利的两倍、日本的五倍³。阿根廷和加拿大的发展水平相当。比起加拿大，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略低，但是两国自然资源差不多，而阿根廷的人口密度更低⁴。

从阿根廷的初期发展，直至一战爆发前，英国（其它欧洲国家的投资比英国的少些）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主要在铁路、公用事业、运输服务、电报、电话、航运、食品加工等领域。这种投资对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有了基础设施，阿根廷资本家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农产品。一战后，欧洲的投资减少，但美国公司的私人

¹ 迪亚兹·亚历杭德罗 (Díaz Alejandro)，《关于阿根廷经济史的论文》(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第 54—58 页。——原注

² 亚瑟·刘易斯 (Arthur Lewis)，《1800 至 1913 年的发展与波动》(Growth and Fluctuations, 1870-1913)，第 197 页。——原注

³ 魏斯曼 (Waismann)，《阿根廷发展的倒退》(Reversal of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第 6 页，表格 1.1。——原注

⁴ 威廉·史密斯 (William Smith)，《专制主义与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危机》(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Political Economy)，第 16 页。——原注

投资逐渐增加¹。

与其它地区一样，阿根廷的经济增长在 1914 年后放缓，但在战后仍处于高水平行列。1929 年，阿根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十八位。即使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阿根廷仍保持了相当可观的增长率²。到四十年代末，阿根廷经济开始下滑。从国家的初期发展到三十年代初，阿根廷都与其它拉美国家不同。虽说，直到 1933 年的《罗卡—朗西曼条约》(Roca-Runciman Treaty)，阿根廷的对外贸易都对英国有利，但把南美国家“落后”的说法套在那些年的阿根廷身上，是不合适的。但在三十年代之前，不对等的贸易条件也没有使阿根廷没落。因此，用“落后”解释国家恐怖主义的说法，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移民

有些学者认为，阿根廷和其它殖民地的主要区别是移民的来源。有两种说法：其一，阿根廷的定居者不识字，不是产业工人出身；其二，他们带有不利于民主制度的“拉丁气质”。

的确，十九世纪中，阿根廷最大的移民群体来自意大利，其次是西班牙，大多数是贫困的农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约有 86% 的移民来自南欧和中欧最贫穷的地区，也有少数来自北欧的技术工

¹ 保罗·刘易斯 (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 50—52 页。——原注

² 威廉·史密斯 (William Smith)，《专制主义与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危机》，第 17 页，表格 2.1 和 2.2。——原注

人（这些人成为了最初的商人）。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阿根廷大约有四百万定居者。但令人怀疑的是，上述事实是否能得出结论：这些移民不适合工业或民主的发展。阿根廷工业的确得到了发展，而且发展速度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快，后者的移民主要是北欧和西欧人，识字水平和工业技能还要高一些。

此外，虽然阿根廷具有“拉丁气质”，但在 1930 年之前，阿根廷经过了七十年的宪政。乌拉圭和智利都是拉丁裔国家，在七十年代前，也都是民主政体。因此，虽然十九世纪的土地所有权和移民模式是阿根廷历史的一部分，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它们（各自或相互）的作用，对七十年代所发生的事件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初和一战后，大量移民的涌入，加上工业的迅速现代化，产生了阿根廷无法消化的社会与民主问题。在 1900—1914 年的短时间内，约有三百五十万人移民到阿根廷，一半人定居了下来¹（另一半打季节工，收成季节结束后，就回了南欧）。阿根廷社会无法很快吸收他们。移民常常成为社会问题。

1912 年的选举改革采用了无记名投票、男性普选等等，更成熟的民主制基本要素，但阿根廷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入籍，无法投票。在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超过三分之二的城市资本家和商人保留了原籍，但没有参加阿根廷的政治生活²。对社会来说，与移民的来源或性格相比，政治生活缺少民众参与，可能问题更严重。

¹ 蒙克（Munck），法尔孔（Falcon），加利铁里（Galitelli），《阿根廷：从无政府主义到庇隆主义》（Argentina: From Anarchism to Peronism），第 43—44 页。
——原注

²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 9 页。
——原注

阶级分化：二十世纪早期

在 1919 年和 1921—22 年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与阿根廷拉开了差距。直到那时，无论是工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兴起，还是最大港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扩张，以及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各类社会进步，在这些国家都是类似的。但是，那些年里，阿根廷发生了几起血腥大屠杀，标志着经济精英和政府对付反对者的手段有所不同了。我们同阿根廷相比的国家，自然资源、殖民模式、早期发展史都差不多，它们在历史上当然也有一些流血的阶级冲突，但发生在阿根廷的两起事件的规模，却是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

第一件事发生在 1919 年 1 月的第二周，亦称“悲剧周”。军队血腥镇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起义群众。在这场造反中，军队打死了一百多名工人（带队用机枪扫射工人的正是年轻中尉胡安·多明戈·庇隆），老板雇的右翼私兵也打伤打死了不少人¹。

1921—22 年的巴塔哥尼亚叛乱中，士兵杀死了一千五百名反抗英国和阿根廷牧场主的工人，使得圣克鲁斯省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停滞了。恶劣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再加上失业的绝望，引发了动荡。军队保证“不追究”，却仍残杀了投降的工人。尸体埋在一个大坑里²。事件的指挥官埃克托·瓦雷拉上校³遭到复仇暗杀。报复的代

¹ 同上，第 24 页。——原注

² 巴耶尔 (Bayer)，《巴塔哥尼亚起义》(La Patagonia rebelde)。——原注

³ 埃克托·贝尼尼奥·巴雷拉 (Héctor Benigno Varela, 1875 年 1 月 27 日—1923 年

价是高昂的。这次起义使有产阶级和雇主相信：传统方式无法再束缚工人阶级了。结果军方借题发挥，工人遭受了变本加厉的镇压。直到本书所研究的时期，这些镇压都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正当化。

民主：二十世纪早期

在长期的寡头统治中，执政集团始终鼓励移民、公民教育、政教分离、自由市场的政策。直到 1912 年，当阿根廷的选举制度引入无记名投票和男性普选权等原则时，民主也没有对精英统治构成挑战，换句话说，精英没有受到民主制度的约束。

讽刺的是，虽然这些改革和其它工业化社会的一样，但实行改革却是为了遏制工人运动，避免寡头们不乐意看到的政治局面。这也使其它政党发展壮大，有了赢得选举的可能性。因此，激进公民联盟¹诞生。这个激进党在 1916 年选举中获胜。伊波利托·伊里戈延²主持的激进党是温和的，比往届政府更接近自由主义。保守党眼

1 月 27 日），阿根廷军人，1896 年入伍，曾参加 1905 年起义。1919 年 12 月血腥镇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冶金工人大罢工。1921 年 11 月在巴塔哥尼亚圣克鲁斯地区血腥镇压罢工。1923 年 1 月 27 日被一名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¹ 激进公民联盟 (La Unión Cívica Radical, UCR)，阿根廷中道政党，持激进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立场，1891 年成立。——中译者注

² 胡安·伊波利托·德尔·萨格拉多·科拉松·德·赫苏斯·伊里格延 (Juan Hipólito del Sagrado Corazón de Jesús Yrigoyen, 1852 年 7 月 12 日——1933 年 7 月 3 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69 年加入自治党 (El Partido Autonomista)。后参加了 1874 年革命。1877 年加入共和党 (Partido Republicano)。1878—1880 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众议院议员。1880—1882 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889 年参与创立公民联盟 (Unión Cívica)。1890 年、1893 年两次参加武装起义，均以

中的它们，比实际的它们还要更左一点。然而，伊里戈延政府在“悲剧周”未能及时镇压罢工者。反对派立即抓住这一点，指责政府软弱无能，放任工人运动。

国外事件也影响了阿根廷上层阶级对布宜诺斯艾利斯起义的看法。俄国革命、德国面临斯巴达克的革命威胁、智利的战斗性罢工，加剧了他们对更大暴力和失去生命与财产的恐惧。上层阶级认为国内的叛乱全是苏联干的，东欧的犹太移民都是颠覆分子。暴民和警察袭击犹太居民区，破坏犹太人的财产，把俄国移民关进监狱。

右翼运动崛起

经过民主改革，非寡头政党选举上台后，阿根廷出现了一些极右翼、民族主义、原教旨天主教的运动。1919年，极右翼民族主义组织阿根廷爱国同盟¹成立。同盟提倡更严厉地管控教师，教授更多的本国历史，防范移民的“外来”思想，维持社会现状。同盟更进一步反对工会后，得到了一部分军方、精英、非工会的城市工人的

失败告终。1891年参与创立激进公民联盟，1897—1931年任激进公民联盟全国委员会主席。1905年再次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乌拉圭。

1916—1922年、1928—1930年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实施外贸、土地、石油国有化，但未推行民主改革，血腥镇压工人运动。1930年9月6日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1931年被捕，1933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¹ 阿根廷爱国同盟(La Liga Patriótica Argentina)，阿根廷的一个极右翼政治组织，持右翼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立场，1918年12月成立。该组织成立之初参与镇压了1918年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冶金工人大罢工。此后迅速发展，积极帮助阿根廷政府镇压罢工，迫害工人运动。1930年参与了推翻伊里戈延总统的政变，但随即开始衰落。1969年正式解散。——中译者注

支持。同盟组织了社区联防队。1919年11月，它声称在整个阿根廷有了833个联防队组织，约两万名成员¹。这个组织成了伊里戈延政府的威胁。甚至激进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工会的声音。在二十年代初，同盟的成员积极参与反工会活动、破坏罢工、招募佣兵和罪犯煽动流血冲突。

1920—1928年间，同盟有69%的成员来自上层阶级；大约一半的领导人是地主，或者地主家庭出身；31%的成员在1916年前就在政府中任职；19%是能掌握最高当局动向的军官。同时，更多的非工会工人、技术人员、资产者、公司、政府雇员加入了联防队。同盟中还有一部分上层阶级的大学生，他们在天主教会里建立了组织，称为“社会天主教运动”。与工会的做法不同，社会天主教运动会募集资金，解决工人阶级的问题。按照他们的理论，这样做能够建立“社会和平”。这些学生在二十年代资助了一个中世纪天主教价值观的学会。他们和某些知识分子一样，迷上了法国作家夏尔·莫拉斯²的反革命思想³。

另一个极右团体“民族主义者”（Nacionalistas）成立于1920

¹ 多伊奇（Deutsch），《1916—30年激进主义下的右翼》，（The Right under Radicalism, 1916-1930），第40页。——原注

² 夏尔—玛丽—弗秋斯·莫拉斯（Charles-Marie-Photius Maurras, 1868年4月20日—1952年11月16日），法国作家、诗人。生于普罗旺斯的古老家族。自幼受家庭的保守主义与君主主义氛围熏陶。成年后积极投身保王派运动。1899年“法兰西行动”成立后不久即加入，很快成为该运动的主要理论家。1936年因向莱昂·布鲁姆发出死亡威胁，被判处监禁八个月。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支持维希政府。法国解放后被捕，判处终身监禁。1952年获准保外就医，同年死于医院。——中译者注

³ 多伊奇（Deutsch），《1916—30年激进主义下的右翼》，（The Right under Radicalism, 1916-1930），第42—50页。——原注

年，它同样迷恋莫拉斯在内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世俗的欧洲作家。除此之外，还有阿根廷诗人卢戈内斯¹。同盟成员中，流行着此人为独裁制度的诡辩。“民族主义者”的成员比同盟成员更年轻，拥有军方背景的人更少。桑德拉·麦吉·多伊奇²对三十年代前阿根廷各类组织的详细研究中发现，“民族主义者”在反对工会方面更加激进。他们渴望建立墨索里尼式的社团制度，反对“外国人”（尤其是犹太人）并支持军方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³。

右翼团体反对伊里戈延总统、反对马塞洛·德·阿尔韦亚尔⁴，又接着反对第二次上台的伊里戈延。1928年，反对派开始关注民主。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话可能格外耳熟。他们抱怨道，民主政体是行不通的，工会损害了穷人，穷人有权摆脱

¹ 雷奥波尔多·安东尼奥·卢戈内斯·阿圭罗 (Leopoldo Antonio Lugones Argüello, 1874年6月13日——1938年2月18日)，阿根廷作家、记者、教育家、翻译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年持社会主义立场。1897年开始出版小说。1899年加入共济会。1903年转向自由主义立场。1920年起转向民族主义立场，支持伊里戈延。1924年获国家文学奖。1928年创建阿根廷作家协会，任第一任主席，期间转向法西斯主义。1930年参加了推翻伊里戈延的政变。1938年因感情问题服毒自尽。——中译者注

² 桑德拉·麦吉·多伊奇 (Sandra McGee Deutsch, 1950—)，美国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³ 多伊奇 (Deutsch), 《1916—30年激进主义下的右翼》，(The Right under Radicalism, 1916-1930)，第47—58页。——原注

⁴ 马克西莫·马尔塞洛·托尔夸托·德·阿尔维亚尔·帕切科 (Máximo Marcelo Torcuato de Alvear Pacheco, 1868年10月4日——1942年3月23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90年加入公民联盟。1922年代表激进党赢得总统大选后，于1922—1928年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制定社会保障政策，实行有限的改良政策。1930年返回法国。1931年在伊里戈延倒台后回国，同年7月在试图推翻军政府失败后流亡国外。1932年回国，领导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1933年流亡葡萄牙，随后返回法国，不久回国。此后继续反对军政府。1942年去世。

——中译者注

工会的束缚，而伊里戈延握在手中的权力是“群众独裁”或者“大多数的压迫”。伊里戈延的“罪行”有：开放大学教育给更多的中产阶级，扩大了自由授课的范围。那时，伊里戈延已经上了年纪了。大萧条时期，参议院也不再支持他。国会无法解决政治和经济危机，而同盟在军队的协助下，得到了罢免政府的广泛支持。1930 年 9 月，军事政变推翻了伊里戈延。

军政府：1930—45 年

数十年间，阿根廷军队完成了现代化。到了 1930 年，军方拥有了庞大势力，陆军又是三军中最大的一支。然而，军队由于政治意见不和，不断发生分裂。就像社会一样，军队为国家的疾病配制解药时，也分为了温和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满足于有限的民主，但两派都对民主不怎么上心。天主教民族主义要求更加专制的政府（等庇隆上台后，双方的立场都改变了）。直到 1943 年，两大派别都在争夺政治权力。

1930 年，最高法院裁定，军队有权罢免民选总统。理由是：假如现存秩序打破，只能由军人出面，保卫生命、自由、财产。军方要进行“合法”政变，只需向法庭提供“下场”的理由和目的，宣誓遵守宪法和现有法律就够了。

这一年的军事政变后，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何塞·乌里布鲁¹将军

¹ 何塞·菲利克斯·贝尼托·乌里布鲁 (Jose Felix Benito Uriburu, 1868 年 7 月 20 日——1932 年 4 月 29 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85 年入伍。1890 年参加“公园革命”。1907 年任高级战争学校校长。1913—1914 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14 年

合法地建立了以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为原型的法西斯社团主义政权。这一届政府实行戒严、解散工会、驱逐未入籍的工会领袖、逮捕了疑似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工会领袖、逮捕了合法的社会党与激进党的领袖，还开除或流放了许多政客。当时的阿根廷也经历了大萧条，但受的冲击不如美国那么大。政治动荡成了经济问题。政府认为，问题出在阿根廷对外部市场原料的依赖。乌里布鲁的目标是建立“组合国家”。但没多久，一场宫廷政变把乌里布鲁赶下台，恢复了选举。随后两届阿古斯丁·胡斯托¹和罗贝托·奥尔蒂斯²的政府都是“暗箱选举”产生的。在军人独裁下，尤其是在奥尔蒂斯和他的继任者拉蒙·卡斯蒂略³（分别在1938年和1942年担任总

加入进步民主党（El Partido Demócrata Progresista, PDP）。1930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伊里格延政府，随后于1930—1932年担任临时政府总统。在任期间仿照墨索里尼推行“社团主义”，大肆迫害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激进公民联盟成员。1932年因病辞职，不久去世。——中译者注

¹ 阿古斯丁·佩德罗·胡斯托（Agustín Pedro Justo, 1876年2月26日——1943年1月11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87年入伍。1890年参加“公园革命”。1915—1922年任纳里昂国家军事大学校长。1922—1928年任民族战争部长。1927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30年支持乌里布鲁发动的政变。1932—1938年任总统，期间大力推行私有化，腐败盛行。1938年退休。二战期间公开反对轴心国，但同时与纳粹德国保持友好关系。1943年逝世。——中译者注

² 海梅·赫拉尔多·罗贝托·马塞利诺·玛丽亚·奥尔蒂斯（Jaime Gerardo Roberto Marcelino María Ortiz, 1886年9月24日——1942年7月15日），出身于西班牙移民家庭。1904年加入激进公民联盟，参加了1905年阿根廷革命。1920—1924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24年退出激进公民联盟，参加了激进个人主义公民联盟（Unión Cívica Radical Antipersonalista, UCRA）。1936—1937年任财政部长。1938—1942年任总统，在任期间继续推行私有化政策，但反对反犹太主义，在二战中保持中立。1942年6月27日因糖尿病导致的双目失明而辞职，7月15日去世。——中译者注

³ 拉蒙·安东尼奥·卡斯蒂略（Ramón Antonio Castillo, 1873年11月20日——1944年10月12日），早年曾担任法官。1931年加入国家民主党（Partido

统) 治下, 经济有所改善, 但这两届政府的支持率都非常低。

奥唐纳¹的现代化理论

军人独裁者推行进口替代政策²。吉列尔莫·奥唐纳视这项政策为拉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典型³。奥唐纳认为, 这些阶段包括: 减少对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 建立进口替代产业, 提高国内消费, 最终完成进口替代。顺利的话, 最初的阶段会导致国家机器膨胀。奥唐纳认为, 国内快速经济变化造成的紧张局势, 导致了政府官僚机构 (通常是军事官僚机构) 镇压的加剧, 而非政治民主的发展。

奥唐纳认为, 这一过程出现在拉美的现代化最迅速、最广泛的社会中, 也就是阿根廷和巴西, 因为它们相当富庶, 有中产阶级、组织有序的工人阶级、庞大的国内市场。因此, 两国用“进口替代”发展工业, 比贫穷的小地方前途更大。但他对进口替代完成后的情形不太乐观。下一章, 我们将来讨论胡安·庇隆第二任期的阿根廷

Demócrata Nacional, PDN)。1936 年任司法和公共教育部长。1936—1937 年任内政部长。1938—1942 年任副总统。1942—1943 年任总统, 在任期间延续前总统奥尔蒂斯的政策, 大力打击保守派。1943 年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下台。1944 年在穷困潦倒中病逝。——中译者注

¹ 吉列尔莫·阿尔维托·奥唐奈 (Guillermo Alberto O'Donnell, 1936 年 2 月 24 日——2011 年 11 月 29 日), 阿根廷政治学家。——中译者注

² 进口替代政策 (import-substitution) 是指一国采取各种措施, 限制某些外国工业品进口, 促进国内有关工业品的生产, 逐渐在国内市场上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 为本国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实现工业化。——中译者注

³ 奥唐纳 (O'Donnell), 《现代化和官僚权威主义: 南美政治研究》(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原注

经济是如何衰退的。

不平等的发展

军方采取了有利于制造业的经济政策，逐步排除了农业部门对经济的控制。但是，尽管经济在三十年代有所改善，工人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在这十年中，工人的人数增加了，财富却没有。到了1940年，阿根廷劳动人口接近一百万，而1944年的制造业工人人数是1930年的两倍。妇女逐渐占到劳动力的三分之一（直到第一任庇隆政府，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现阶段只有两成的产业工人加入工会，但是工人斗争激增，罢工愈发频繁。工会克服了内部政治分歧，在1930年建立了一个中央组织，即总工会。

到了1941—42年，为了对抗保守派与军方的联盟，激进党、社会党、共产党建立了人民阵线。左派刚刚起步，就在工业化的阿根廷异军突起。同时在外部舞台上，人民阵线在1936年的西班牙大选中获胜，西班牙随即爆发内战，此事加上工人阶级起义与政治变革的危险，引起了阿根廷军部的不安。此外，到了1942年，二战的天平倒向了盟军，这也在军队中造成了恐慌，因为阿根廷军队里不少人都支持轴心国。

面对这一局面，军队得出结论，除非先发制人采取行动，否则他们视为“颠覆分子”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将在阿根廷夺取政权。主要的反共组织是叫“统一军官小组”¹的军官团。小组的头目是胡

¹ 统一军官小组（El GOU, Grupo de Oficiales Unidos），阿根廷右翼民族主义准军

安·多明戈·庇隆上校，目标是让阿根廷军官做好与共党分子战斗的准备，在章程中写明了“人民阵线式的共产主义革命之威胁”。

政变中的政变：四十年代早期

1943年发生了两场政变，第一场是在6月4日，自由派的阿图罗·罗森¹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卡斯蒂略总统。第二场是两天后（6月6日），天主教民族主义的军人把相对温和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佩德罗·拉米雷斯²将军推上了总统之位。历史学家唐纳德·霍奇斯³提到这场“政变中的政变”时，说道：“统一军官小组成为了一小群中级军官谋取政府要职的工具。他们通过控制关键的军部，掌管了军队。这是天主教民族主义者的密谋组织。”⁴他还指出，这是军

事组织，1943年成立。这一组织企图结束“臭名昭著的十年”带来的恶劣影响，同时大力遏制工人运动。同年一举推翻卡斯蒂略政府，一直统治到1946年。1946年庇隆上台后逐步瓦解。——中译者注

¹ 阿尔图罗·弗兰克林·罗森(Arturo Franklin Rawson, 1885年6月4日——1952年10月8日)，1903年入伍。1943年加入统一军官小组，参与了推翻卡斯蒂略政府的军事政变，政变结束后于6月4—7日担任临时政府总统，随即被解除职务。1943—1945年任驻巴西大使。1952年去世。——中译者注

² 佩德罗·帕布洛·拉米雷斯(Pedro Pablo Ramírez, 1884年1月30日——1962年6月11日)，1913年入伍。1930年参与了推翻伊里格延政府的军事政变，政变后任驻意大利武官。1942—1943年任国防部长。1943年领导了推翻总统拉蒙·卡斯蒂略的军事政变，1943—1944年任临时政府总统，在任期间取缔一切政党，推行宗教教育。1944年受到美国压力，被迫与德国、日本断交，此举遭致内阁及军队的一致反对，被迫辞职并退休。——中译者注

³ 唐纳德·克拉克·霍奇斯(Donald Clark Hodes, 1923—2009)，美国哲学家，拉丁美洲革命运动专家。——中译者注

⁴ 霍奇斯(Hod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

队与农业出口寡头分道扬镳的转折点。对于军官小组的领导人胡安·庇隆而言，这也无疑是个转折点：庇隆抓住机会，一跃上位了。

拉米雷斯政府全面镇压了工人和它眼中的一切“颠覆分子”。政府枪毙了共产党报纸《时代》(La Hora)的编辑；逮捕了肉类工人工会的领袖，查封了工会；未经审判就关了肉类工人工会总书记何塞·皮特¹一年半；取缔了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家有关联的工人组织；解散了国会，罢免了所有当选的省级官员；禁止了政党，剥夺了新闻自由。

庇隆先后担任劳动与福利部长和军政部长，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政府的决策。但是，他也在劝说同僚和军方改变战术：减少直接的压迫，给予工人阶级更多的让步。他能看到，假如阿根廷的工业城市有越来越多的工人组织起来，势必获得政治影响力。庇隆不断与工会建立联系，代表工人发言，从而建立了以总工会为中心的基本盘。庇隆成功维持了军方的权力，但在工会得势后，庇隆就失去了寡头的支持。

军政府引导的现代化

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阿根廷军队已经成为具有自身利益

32 页。——原注

¹ 何塞·彼得 (Jose Peter, 1895 年 9 月 13 日——1970 年 9 月 4 日)，1927 年加入冰箱工会。1931 年创建肉类工业工人联合会。1937 年创建食品工人联合会。1939 年加入阿根廷工人总联合会，但在 1940 年退出了工人总联合会，参加了第二号总联合会 (CGT No2)。1943 年军政府上台后被捕。1945 年流亡乌拉圭。1946 年解散了肉类工业工人联合会，此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的独立势力。军方在 1927 年建立了自己的航空工业，随后建立了生产弹药、化学品、电子设备、生铁的产业。1943 年，名为“军事工业总局”（General Agency for Military Industry）的公司成立，负责经营管理这些产业。因此，军队发展出了独立的经济势力。

军队也不再受制于寡头。军方下令，由国家决定所有价格、工资、信贷、原料的分配。接着，政府勒令地主减少和冻结租金，把所有私人谷仓收归国有，结束了谷物商人的垄断。1943—1944 年，国家接管了私营和跨国企业。为了管理国有资产，政府雇员在 1940—1945 年间，从二十万增加到了超过三十万两千人。1942—1946 年间，军队占政府总预算的比例从 27.8% 上升到 50.7%。因此，政府赤字越来越大，只能好向国外借钱、发行更多货币¹。

最初，为国内市场生产商品的各部门，都对刺激个人消费和鼓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津津乐道。1935—1945 年间，本土制造商大大增加了国内市场的份额。小企业在军政府治下赚了钱。大体上讲，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是进口替代政策的受益者²。

但是，工业与金融精英和前寡头并不买账。在军队独立发展的同时，寡头也在转型。虽然他们拥有地产或者出生地主家庭，但已不再是地主贵族了。农产品出口使他们与外国资本建立关系，而关系的主导者是与外国垄断企业密不可分的金融精英（同一时期，加拿大金融精英也在朝同一方向发展。虽然加拿大和阿根廷与英国和

¹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 93—95 页。——原注

² 保罗·刘易斯（同上，第 95 页）说明，1939—45 年间，阿根廷本土制造商在纺织品、制纸、化学品、石油、金属制品、电气机械上的国内市场份额增加，其中一些增加了 30%。——原注

欧洲公司做了不少生意，但两国与美国垄断企业的往来越来越多)。

因此，军方及后来的庇隆政府，与精英的方向背道而驰。精英阶层的利益在于开放经济，军方则固步自封，让国家高度控制经济（应当指出，当时阿根廷的某些精英也支持进口替代政策）¹。唐纳德·霍奇斯在考察军方日益增长的经济与政治上的独立性时，说道：“军队成为了寡头的对手。它与寡头不同，建立在选拔与功绩，而非继承来的财富上。军队是阿根廷独立的传统捍卫者，而寡头依赖外国资本，两方早晚必有一战。因此，两方在政治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最多是一道反对两个拥有群众基础的平民政党。”²

美国的压力

在美国的压力下，阿根廷政府不得不与轴心国断交。军队十分不满，庇隆等人迫使拉米雷斯于 1944 年 2 月辞职。庇隆成为了新的军政部长和副总统。美国认为这些变化对自己不利，便向阿根廷政府施压，要求阿根廷对轴心国宣战，镇压国内的纳粹法西斯。阿根廷政府照办了，但（以新任驻阿根廷大使斯普鲁伊尔·布拉登³为

¹ 保罗·刘易斯（同上，第 97 页）引用了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亚列杭德罗·邦吉（Alejandro Bunge）的意见。——原注

²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 43 页。——原注

³ 斯普鲁伊尔·布拉登（Spruille Braden，1894 年 3 月 13 日——1978 年 1 月 10 日），美国外交官。1945 年 5 —9 月任驻阿根廷大使。1945—1947 年任副国务卿。1954 年参与策划了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的计划。1967—1973 年任纽约大都会俱乐部总裁。1978 年逝世。——中译者注

代表的)美国成为了支持民主改革与颠覆军政府的代言人。美国心照不宣地支持大学生和社会主义者反对军事政权的游行。政府对动乱做出回应，恢复了(1941年12月至1944年5月的)戒严。随后，军队中的一支自由派发动政变，逮捕了庇隆，逼庇隆在1945年10月辞职，但没能得手。

总工会的工人宣布于1945年10月18日总罢工，前一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工人聚集在五月广场，要求释放庇隆。政变的领导人不仅受工人的压力，也受到军中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和改革派的压力，只能下台。政变领导人所能做的，至多是要求在1946年进行大选。

虽然军方不情愿支持庇隆，但比起共产党与社会党的人民阵线，还是庇隆好一些，即使两党在民主联盟¹中，与激进党和保守派结了盟。军方意识到，就算要向工人让步，他们也可以通过支持庇隆，继续发挥影响力。于是，庇隆成为了军队的候选人。

¹ 民主联盟 (la Unión Democrática,UD)，阿根廷政治团体，1945年成立，试图在1946年总统选举中阻止庇隆上台，成员包括激进公民联盟、社会党、阿根廷共产党、进步民主党。持反庇隆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纳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共和主义立场。1946年庇隆赢得大选后解散。——中译者注

第四章

庇隆主义与军国主义

1946 年，庇隆以 52.4% 的得票率当选总统。庇隆派在国会、省立法机关、政府首脑等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担任总统期间，工会始终坚定地支持庇隆，但军队和教会没那么死心塌地。庇隆在第二任期给予工人新的权利时，军队在教会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

庇隆的政策

第一届总统任期内，庇隆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经济政策着眼于收入的再分配¹。庇隆让忠诚的支持者进入官僚机构，排挤了其它派别。他很快建立了三万人的情报部门，用于压制反对派，还仿照盖世太保的模样，都身穿棕色外套和华达呢雨衣。他还建立了一支数千人的军事冲锋队，即民族解放联盟（National Liberating Alliance）。庇隆把铁路收归国有，接管了包括港口和电话业在内的许多领域的外国公司。赎买这些产业的费用（加上扩大的用人成本）昂贵，但民众非常欢迎国有化。

¹ 关于这一时期的更多描述，见蒙克（Munck），法尔孔（Falcon），加利铁里（Galitelli），《阿根廷：从无政府主义到庇隆主义》（Argentina: From Anarchism to Peronism），第 127—146 页。——原注

司法系统的解体

庇隆拆解了司法系统，使在野的反对派政客无法产生任何影响。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他上任不到几周，庇隆派就弹劾了五名最高法官中的四名。到 1949 年底，超过七十名联邦法官换成了庇隆的支持者。他清洗了政府部门。他制订了针对性的法律，加重对诋毁当局者的处罚，还剥夺了被告申诉的权利。这项法律尤其适用于国会中非庇隆派的团体，他们会因“不尊重庇隆派”的言论而失去席位。国会议员们因“不当行为”被除名，甚至入狱。此外，他还颁布了一些法律，使反对党无法举行群众集会、无法接触大众媒体。

恐吓新闻界与反对派政党

1949 年 5 月生效的新宪法允许总统连任。不久后，国家查抄了报社，把新闻纸的采购收归国有。庇隆派控制了广播电台，以及除《国家报》(La Nacion) 外的所有报纸。1951 年 1 月，他们没收了《新闻报》(La Prensa)。庇隆还成立了调查“反阿根廷活动”、间谍活动、破坏活动，以及口袋罪“叛国活动”的委员会。公民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反对派领导人要么流放，要么坐牢，要么闭上嘴。保罗·刘易斯 (Paul Lewis) 描述了这段时期：

“反对派无法接触公众。它不能广播；政府取缔了它的

出版物，还警告印刷商，不准帮它宣传。地方官员常常担心‘扰乱秩序’，因此拒绝反对派公开集会；举行集会时，庇隆分子常来砸场子。反对派候选人遭到各种恐吓与迫害。在1951年的竞选活动中，激进党领袖巴尔宾刚出监狱，而保守党和社会党的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都在狱中或地下；此外，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出狱后，参加集会时，死在庇隆派暴徒的枪口下。竞选众议院的三十二名社会党候选人中，有二十三名正在狱中、躲藏在地下，或是等待审判。”¹

工会改革

庇隆大刀阔斧地改革工会，破天荒地承认了普通劳动者的权利。他还支持工会反对军方和保守党。他的第二任妻子艾娃·杜阿特·德·庇隆²史称“艾维塔”（Evita）。艾维塔一生中为穷人做了不少事。尽管人人都知道，她的慈善组织腐败又伪善，但当年，相当一部分阿根廷人视艾维塔为“圣人”，现在也是如此。艾维塔的追随者，人送外号“赤膊者”（descamisados），都是信徒般虔诚的

¹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215页。——原注

² 玛丽亚·艾娃·杜瓦尔特·德·庇隆（María Eva Duarte de Perón，1919年5月7日——1952年7月26日），原名艾娃·玛丽亚·杜瓦尔特（Eva María Duarte），庇隆的第一任妻子。出身于牧场主家庭。1935年开始在剧院演出。1938年加入阿根廷演员协会。1943年发起成立无线电人工会并当选为工会主席。1945年同庇隆结婚。1946年协助庇隆当选总统。1948—1952年任艾娃·庇隆基金会主席。1949年发起成立庇隆主义女性党（El Partido Peronista Femenino），担任党主席。1952年因子宫癌逝世，死后追封为“民族精神领袖”。——中译者注

庇隆主义者。庇隆夫妇能够召集成千上万的虔诚工人参加游行示威。当然，他们不断制定有关工资改革、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劳工参与决策的法律，受到了雇主与越来越多的上层中产和精英的强烈抵制与不满。

1943—1946 年间，从庇隆初次登场，到他的第一任期结束，工会会员人数在稳步增长。后四年里，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到了 1955 年，庇隆下台前，参加工会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工人总数的 42%¹。同时，参加工会的工人有 80% 属于总工会²。1942 年后，实际工资稳步增长。到了 1950 年，工资与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到约 46%³。工人得到了带薪年假，病假、解雇、工伤赔偿，以及在圣诞节得到第十三个月工资的权利。所有工人都享受到了养老金。这些改革是工人和私人资本的集体协议的结果，国家则作为“社会契约”的中介。

改革不是没有让工人付出代价：工会开始依赖庇隆的干预，无法发展出独立与民主的倾向。庇隆控制了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安插了自己人，撤换了不听话的工会领袖，镇压了罢工，取缔了不听从指示的工会。工会开除了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其实庇隆也向资本家吹嘘，他的改革把国家从共产主义中拯救了出来。

¹ 蒙克（Munck），法尔孔（Falcon），加利铁里（Galitelli），《阿根廷：从无政府主义到庇隆主义》（Argentina: From Anarchism to Peronism），第 170 页。——原注

² 派恩—柏林（Pion-Berlin），《国家恐怖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State Terror），第 65 页。——原注

³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rgentina），第 170 页。——原注

在庇隆的指导下，劳工与福利秘书处膨胀成了超过六千人的官僚机构，社会福利部门职员的薪水也水涨船高¹。

1951年11月，庇隆以60%的得票当选连任后²，承诺建立工团主义国家。这意味着，他要让工人代表参加（包括立法机关在内）政府机构。庇隆开始在人口稀少又偏远的查科省进行这项实验。他修改了宪法，从省里大约二十万的选民选出一半的立法机关，再从三万人的省工会中选出另一半。查科是唯一的“示范区”。历史学家唐纳德·霍奇斯指出：“虽然离‘工人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在全国实行它（宪法改革），那么工人将得到联邦政府50%的股份，正好对应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50%的比例。”³

1951年，为了应对一场毫无胜算的军事政变，庇隆宣布进入“国内战争状态”（宪法里可没有这一条），声称政府有权中止宪法自由。接下来的四年，阿根廷处于常态化戒严中，政府能够随意逮捕公民。期间，所有政治领袖、许多报纸编辑与公众人物都身陷囹圄。1952年，庇隆派最高会议指示全国的地方委员会制定反对派名单，还指示削弱“敌人”的士气。

庇隆的准军事组织“民族解放联盟”曾多次煽动暴乱。1953年4月，他们烧毁了赛马俱乐部，这是精英们的社交中心。他们还袭击了各大政党总部。1955年6月，他们为了回应海军的一场未遂政变，摧毁了国家大教堂和几座市中心的教会。平民也在交火中丧生。

¹ 派恩—柏林（Pion-Berlin），《国家恐怖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State Terror），第66—68页。——原注

² 根据阿根廷的政治制度，1951年大选的胜利者，到1952年才上台。——原注

³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69页。——原注

庇隆也在煽动暴力，在 1955 年 8 月的著名演讲中，他朝群众大喊：“在任何地方，任何妄图改变体制、反对当局、违反宪法或法律之人，都会死在任何阿根廷人手中。”他赌咒发誓说，每有一名庇隆派在内战中丧生，就要杀死五名“敌人”¹。

与天主教会的关系

庇隆执政的头几年，尤其艾维塔还在世时，与强大的天主教会势力（天主教实为国教²）交好。庇隆谨慎地遵守着教会的“社会通谕”。他在 1945 年的竞选演说中，以及与上层人士对话时，都提到结合工人的社会权利与天主教社会思想，以此为政策提供合法性。

1947 年，庇隆制定法律，规定公立学校必须进行宗教教育。庇隆把这项法律提交给众议院，以此建立统一的道德教育，在文化和精神上统一阿根廷人民。之后数年，他常引用教皇的通谕，使庇隆主义的政治利益合法化。他为自己的政治哲学起了“正义主义”的名字。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这一理论与天主教联系在一起，一旦确立了自己的根基后，就立刻盖过了教会。政治学家何塞·吉奥（Jose Ghio）认为，“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使用了二十多年的术语，成了政府宣传手段中，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部分。所以说，政府盗用了教会的理论，将之转化为了国家学说。”五十年代初，正义党的标志

¹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 216 页。——原注

² 吉奥（Ghio），《教会与政治：比较视角下的阿根廷教会》（Church and Politics: The Argentine Church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原注

在阿根廷随处可见，学校里也用“崇拜庇隆和艾娃·庇隆的教科书”¹教授学生。那时，正义党与教会的权威产生了冲突。庇隆采纳的教会的社会学说，参考的是天主教而非天主教会本身。

我们能够通过权力关系理解这场冲突，但不要忽略教会内部的分裂。六十年代后期，教会内部的分歧爆发，这也是七十年代的重要一幕。阿根廷的天主教会和世界各地的一样，都发生过内部争论。一些人视基督教为社会改革运动，而另一些人认为基督教只是与原罪、天堂、地狱有关的神学教义。庇隆强调教会的社会理论方面，把它套用到自己的“正义主义”理论上，实则是否定了教会本身及其等级制度。

庇隆与教会的公开决裂发生在 1954 年。当时，庇隆在捍卫基督的同时，贬低了教会。他在一段著名的演讲中说：“我从未与基督有过冲突。其实，我始终在努力捍卫基督的教义。千年来，教士们都在试图摧毁他的教义，但是未能成功。”²这段讲话和诸多“越界行为”演变成了重大冲突，信天主教的庇隆主义者发现自己夹在两个阵营之间。许多人选择了庇隆主义。从当年的一件事就能略见一斑：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天主教会遭到毁坏。但是，人民越是选择庇隆，教会也越是跟别人走得近。

此处需要简述一下庇隆的哲学思想。根据庇隆书中的观点，他把历史视为一系列大规模的周期性演进阶段，这些阶段伴随着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小规模震荡。革命标志着转折点，或者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最后一步。庇隆认为，在他执政时，阿根廷

¹ 同上，第 198 页。——原注

² 同上，第 207 页。——原注

正好处于转折的这一刻。但庇隆的解释有矛盾。他一会说“人民的时刻”¹已经到来，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一会又说国家需要压制民众的不满，否则民主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下面这段话中，庇隆“拥护”工人阶级：

“法国大革命结束了贵族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
俄国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政府，为无产阶级群众打开了道路。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²

但庇隆对工人阶级的“拥护”是有折扣的。庇隆的一些思想出自 1932 年出版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教义》(Doctrine of Fascism)。墨索里尼认为，自由主义（同义于个人主义）的世纪过去了，它将为法西斯主义（同义于集体主义和国家对个人的至上权力）取代。在奥斯卡·斯宾格勒³和阿诺德·汤因比⁴的影响下，

¹ 庇隆所说的“人民的时刻”指的是以人民的民主取代自由主义的民主，结束金钱的统治，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推翻帝国主义。此外，庇隆还说：“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让个人被资本剥削，共产主义是让个人被国家剥削……没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就没有存在的理由……没有原因，就不再有结果。”（庇隆，《第三位置的阿根廷》(La tercera posición argentina)，霍奇斯的《阿根廷的“肮脏战争”》第 49—50 页引用了这一段。）——原注

² 霍奇斯 (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 48 页。——原注

³ 奥斯瓦尔德·阿尔诺德·戈特菲尔德·斯宾格勒 (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 年 5 月 29 日——1936 年 5 月 8 日)，德国哲学家。1917 年出版代表作《西方的没落》。反对魏玛共和国。1922—1923 年间往来于多个右翼团体，企图武力推翻魏玛共和国，但未能如愿。1925 年起参加反犹太主义运动，但与纳粹党拉开距离。此后支持墨索里尼。1934 年“长刀之夜”后与纳粹党决裂。1936 年去世。——中译者注

⁴ 阿尔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 年 4 月 14 日——1975 年 10 月 22 日)，英国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庇隆认为阶级斗争和种族战争最终会摧毁西方文明。庇隆懂得巧立名目的重要性。虽然他的话里有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他的追随者也在使用“基督教民族社会主义”一词，他仍称自己的哲学为“正义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跟无神论联系在一起，而这在天主教势力强大的阿根廷是不可接受的。

霍奇斯认为，庇隆从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¹，这位西班牙长枪党与民族工团主义学说创始人的思想中学到很多，虽然庇隆本人没提到这一点²。庇隆还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里习得了战略。庇隆与他的“导师”不同，他想在政府中赋予工人真正的角色，以激起平民主义³。他的改革削弱了农业出口寡头的力量，把统治的能力赋予了工人阶级，同时在新的政府官僚机构中，为中产阶级经理人与专家提供了更多机会。

¹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萨恩斯·德·艾雷迪亚

（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 y Sáenz de Heredia，1903年4月24日——1936年11月20日），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律，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10月29日成立长枪党，同年当选众议员。1936年3月14日被捕，内战爆发后被处决。——中译者注

² 霍奇斯认为，正义主义民族运动的两项原则——全体阿根廷人的团结与社会正义原则——是根据西班牙长枪党的1934年纲领的第26条改编的。这种“长枪党主义”是民粹主义的，与弗朗哥将军的完全专制的法西斯主义不同，也与墨索里尼后来的法西斯主义不同。——原注

³ 通常译为民粹主义（populism）。这个翻译很不好，带有贬义，故意引导读者将它与纳粹等“混乱”元素联系在一起，暗示“底层人总是愚昧无知，容易受到煽动，因此必须乖乖服从统治阶级主流的正确领导，不得有任何自我主张”。这词翻成“平民主义”更合适。——中译者注

与军队的关系

起初，军队也不情愿支持庇隆。庇隆转向后，军官们愈发敌视他。庇隆撤换了异己的军官，大大削减了军事预算。同时，他不仅成功地把“庇隆主义”加入了普通学校，还加入了军事学校的课程。他用加薪和更好的晋升机会从下层招募士官，为工人阶级青年进入军事学院提供了奖学金。他任命的庇隆派要员在低级军官中鼓吹庇隆主义。庇隆派的军官受到青睐，反对派则遭到报复。但是，当艾维塔·庇隆成为 1951 年大选的副总统候选人时，连庇隆派的军队支持者也倒戈了。于是，庇隆中止了艾维塔的竞选活动（虽说庇隆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她得了癌症）。艾维塔死后，总工会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官俱乐部赠送了一幅巨大的艾维塔肖像。这可谈不上友好的表现。

之前，总工会一直在奋力争取工人民兵武装来“保卫革命”。艾维塔尝试过武装民兵，庇隆很可能提供了武器和反坦克枪。证据就是，工会在 1955 年 6 月破产的海军政变中保卫了政府¹。此事三个月之后，军方政变成功上位²。

¹ 戈德韦特（Goldwert），《1930 至 1966 的阿根廷的民主、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Democracy, Militarism, and Nationalism in Argentina, 1930-1966*），第 113 页，第 117—118 页，第 129 页。——原注

² 为何庇隆不在此时全面武装工人，而是向军方妥协，阿根廷历史学家们对此仍有争议。见戈德韦特（Goldwert），《1930 至 1966 年的阿根廷的民主、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Democracy, Militarism, and Nationalism in Argentina, 1930-1966*）。——原注

庇隆主义的遗产：总结

庇隆时代留下的遗产，是司法部门的解体与政治化、正当程序与法治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失、民众普遍蔑视民主和法律。大众媒体受到不断恐吓，变得软弱无力。政治党派四分五裂，陷入混乱。军队高度政治化，内斗激烈。但到了 1955 年，隶属于国家的中产阶级官僚机构已经建成了。集中在国家内部的庞大官僚工会势力强盛。工会与军方相互敌对，都准备抄起武器，夺取国家的控制权。

天主教会和庇隆派也处于敌对状态。教会的教义和庇隆的平民主义争夺着公众的支持。两者都是用说服大众的方法，但一种是通过讲坛，另一种则是通过政治化的学校制度和课程，还有各种公共机构和场所的教育。国家教育一整代年轻人崇拜庇隆主义。学校和公共集会把艾维塔·庇隆描述成了圣人。这些人与工会工人一起，从整整十八年的（准）军政府时期一直到庇隆回国，都坚持着对庇隆主义的信仰。

经济发展

我们在上一章中，介绍了吉列尔莫·奥唐奈对于进口替代政策的看法，提到当简单的消费品生产饱和后，政策都会遭遇瓶颈¹。奥唐奈说，经济停滞伴随着外汇短缺、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的频繁交

¹ 奥唐纳（O'Donnell），《现代化和官僚权威主义：南美政治研究》（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原注

替、幻灭的中产阶级的财富缩水，以及国家无法再满足技术官僚机构与活跃的“人民阶级”¹不断提高的期望。经济危机发生了。出路是没有的，因为人们的需求各不相容。过去的平民主义行不通了，体制无法再保持稳定。

庇隆是否因“进口替代政策”对经济危机负有责任，仍是有争议的。有人说，庇隆实施极端的民族主义政策，扼杀了出口产业。但一些学者认为，他没有连贯地推行民族主义的政策，甚至他的经济政策也不是民族主义的²。庇隆说要反对帝国主义，却鼓励了美国在石油与汽车行业的直接投资。他在 1953 年制定的法律中，给了国际资本特惠待遇。而当他在冷战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时，连国际事务中的“第三位置”也失去了。

另一种观点是，庇隆政府过多关注“再分配”，忽略了发展生产力，结果导致了生产上的许多消极因素。蛋糕分得越来越多，但蛋糕本身却越来越小。例如，曼努埃尔·莫拉·阿劳霍³认为，1945 年前，阿根廷经济是有生产能力的。但庇隆的组合国家实行强制分配，把经济从属于政治权力之下，导致了新公司的“增长率”放缓，而得到分配的团体迅速增多：“阿根廷的问题是，庇隆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庇隆使经济权力中立化，“目的是将所有权力集

¹ 这个说法常在阿根廷文学作品中用来指代下层中产和工人阶级。——原注

² 详见蒂特里亚 (di Telia) 和多恩布什 (Dornbusch)，《1946—83 年的阿根廷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gentina, 1946-83)，尤其是豪尔赫·福多尔 (Jorge Fodor) 和巴勃罗·赫尔丘诺夫 (Pablo Gerchunoff) 的论文。——原注

³ 曼努埃尔·莫拉·阿劳霍 (Manuel Mora y Araujo, 1937 年 9 月 30 日——2017 年 5 月 26 日)，阿根廷社会学家、政治分析家。——中译者注

中在国家上，再通过分配的斗争，确立这个国家的合法性。”¹

当然，在庇隆治下，官僚化的国家急剧膨胀，庞大官僚国家机器的雇员也大大增加。他们的要求，以及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的要求，本来还能够为不断发展的经济所适应，但到了五十年代中期，经济停滞了。不论什么经济模式都失去了活力。

军事统治

阿根廷从三十年代就建立了军事统治，虽然庇隆两次当选总统，另有两位合宪总统通过受限制的选举上台，但 1930—1973 年，军队基本上把持着国家政权。研究军方的历史学家阿兰·鲁基²指出：阿根廷军队间歇性地下场干预，导致政府更迭，相继把这些势力赶下台：中产阶级及其代表（1930 年）、农业出口寡头（1943 年）、工会和平民政党（1955 年）、工业部门（1962 年）、传统政党（1963 年）、再一次的工会和平民政党（1976 年）³。

这一点表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简单。军队各派一致反对工会，尤其是在庇隆倒台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军方总是捍卫寡头的利益，无论是金融寡头、工业寡头还是农业寡头。鲁基认为，军队从来不是中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或者跨国公司的党派。军队

¹ 莫拉·阿罗约 (Mora y Araujo)，《评论》(Comment)，第 26 页。——原注

² 阿兰·鲁基 (Alain Rouquie, 1939 年 2 月 11 日——)，法国外交官、学者。1999—2003 年任法国驻巴西大使。——中译者注

³ 鲁基 (Rouquie)，《拉丁美洲的军事与国家》(The Military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第 287 页。——原注

扮演着“社会趋势推动力”的角色。另一种观点是，军队阻止了其它利益集团掌控国家，把国家当成了自己的东西。

但考察了 1930 年以来军事统治的历史后，我们必须补充道，军队的内部利益并不是铁板一块。阿根廷的法西斯主义十分猖獗，在庇隆执政时期以及 1955 年政变后，更是变本加厉。庇隆的继任者爱德华多·洛纳尔迪¹将军上任不到两个月，又因另一场军事政变下台。这场政变与政变中的政变，就是军队内部分歧的重要征兆。洛纳尔迪得到了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和一些自由派的支持，但他要组建天主教民族主义的内阁时，自由派不答应了。这里的“自由”意味着自由市场，而非政治自由²。军队的自由派通常是反工人的，敌视工会的。他们对洛纳尔迪不满，就因为他在上任后没有立即镇压工人。

接着上台的是佩德罗·欧亨尼奥·阿兰布鲁将军。此人更受自由派的欢迎。阿兰布鲁干涉了总工会，取缔了正义党。阿根廷语境中的“干预”是指对政府部门、工会、大学等，统治者认为“不合规定”的公共组织进行强制托管。手段包括：强制组织的领导人辞职（有些则是逃亡），再用“可接受”的人取代他们，强制规定组织的安排或议程。阿兰布鲁不仅取缔了正义党，还禁止了“庇隆主

¹ 爱德华多·埃内斯托·洛纳尔迪 (Eduardo Ernesto Lonardi, 1896 年 9 月 15 日——1956 年 3 月 22 日), 1916 年入伍。1938 年任驻智利大使馆武官，因涉嫌间谍案被捕，被遣返回国。1943 年、1951 年两次参加未遂政变，1951 年被迫以少将军衔退役。1955 年 9 月 23 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庇隆政府，担任临时总统，11 月 13 日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下台，改任驻美国大使馆武官。1956 年去世。——中译者注

² 其实，我们所说的“自由派”与“自由主义者”，通常也是这一含义。——中译者注

义”这个词，禁止了庇隆这个人，禁止了有关庇隆及其政策的一切。1958年，阿兰布鲁下台后，这些政策保留了下来。从1958年2月至1973年，多数派的代表（庇隆派）没有参加任何一场选举，这加剧了民众对民主的蔑视。

同时，支持政变的激进党发生了内斗，分裂为了两派；阿图罗·弗隆迪齐¹领导的激进公民联盟强硬派²和里卡多·巴尔宾³领导的人民激进公民联盟⁴。弗隆迪齐在允许庇隆派候选人为他助选后，赢得了1958年的选举，但军方下场遏制了庇隆派的势头，导致弗

¹ 阿图罗·弗隆迪齐(Arturo Frondizi, 1908年10月28日——1995年4月18日)，1932年加入激进公民联盟，曾多次被捕。1936年起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1954—1957年任激进公民联盟全国委员会主席。1957年退出激进公民联盟，参加了不屈激进公民联盟(Unión Cívica Radical Intransigente, UCRI)，担任全国委员会主席至1963年。1958—1962年任总统，期间大力推行庇隆主义政策，镇压工人运动。1962年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下台，监禁了十八个月，1963年获释。1966年支持推翻伊里亚的军事政变。1973年支持庇隆竞选总统。1976年军政府上台后，在暗中予以支持，但反对军方的经济政策。1982年反对马岛战争。1989—1995年任总统荣誉顾问。1995年去世。——中译者注

² 激进公民联盟强硬派(La Unión Cívica Radical Intransigente, UCRI)，阿根廷改良主义政党，1957年成立，由左翼激进党人组成，持左翼庇隆主义立场。1972年解散，改组为不屈党(El Partido Intransigente, PI)。——中译者注

³ 里卡多·巴尔宾(Ricardo Balbín, 1904年7月29日——1981年9月9日)，1922年加入激进公民联盟。1927年起担任律师。1946—1949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49年被以“藐视总统”的名义褫夺议员资格。1950年在竞选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时再次被捕，拒绝庇隆的赦免，因“藐视法庭”被判处5年徒刑，1951年获释。1957年退出激进公民联盟，率领党内右翼组建了人民激进公民联盟。曾先后于1951年、1958年、1973年3月和9月参加总统选举。1972年返回激进公民联盟，1972—1981年任激进公民联盟全国委员会主席。1976年后对军政府持放任态度。1981年去世。——中译者注

⁴ 人民激进公民联盟(La Unión Cívica Radical del Pueblo, UCRP)，阿根廷中道政党，持激进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立场，1957年成立，由右翼激进党人组成。60年代一度为议会最大党。70年代走向衰落，1973年解散。——中译者注

隆迪齐输掉了 1962 年的选举。

红派与蓝派

1955 年政变后，军队中的两个支持政变的主要派系，一方称为红派（Colorados），是狂热的反庇隆主义者，倾向于军事统治，另一方称为蓝派（Azules），倾向于文官统治。从经济角度来讲，红派是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主张自由放任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马文·戈德韦特（Marvin Goldwert）描述他们的理想为“纯粹的反共”。他引用了一位阿根廷军方分析家的话，说红派希望通过军事独裁“整顿国家，打破庇隆主义，实现真正的民主”¹。蓝派主张军队去政治化，提高专业化程度，以捍卫军方的共同利益。表面上，他们都支持民主，但不止一位分析家认为，蓝派的民族主义、天主教、亲弗朗哥倾向更强烈。选民选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拥护法治，但在民主危机时，他们都摇身一变，成为了右翼军国主义者²。从经济角度来讲，蓝派比红派更希望促进工业发展。也许是蓝派军头在工业和银行中有股份的缘故。军方仍然持有军工厂的集体所有权，而军工厂已经成为了阿根廷工业的重要部分。

1955 年后的时期，军人集团的首要目标都是防止庇隆主义死灰

¹ 戈德韦特（Goldwert），《1930 至 1966 的阿根廷的民主、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Democracy, Militarism, and Nationalism in Argentina, 1930-1966），第 188—210 页。书中第 189 页的引文又摘自詹姆斯·罗维（James W. Rowe），《阿根廷：红与蓝与新年》（Argentina: Reds, Blues and the New Year），1962 年。——原注

² 斯普林格出版集团（Springer），第 150—152 页。——原注

复燃，但没有庇隆派的支持，军政府和弗隆迪齐都无法避免长期的政治动荡。即使正义党被取缔了，也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只要不让正义党参加选举，选举就注定是骗局。军队两派都同意推翻弗隆迪齐，但希望以相反的方式解决政变引起的政治危机。红派企图建立军事独裁，直接由军人掌权。但是蓝派依据宪法，任命了参议院临时议长何塞·玛利亚·圭多¹担任总统。

然而，圭多上台后，解散了国会，保留了对庇隆主义的禁令，宣布先前的选举结果无效，禁止了党派活动。这些反民主的措施并没有遏制局势进一步失控。1962年4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发生了军事冲突，在海军的支持下，这场冲突以红派的“胜利”告终。几个月内，红派控制了政府的主要部门。蓝派自然进行了报复。在这场冲突中，蓝派得到了陆军大多数将领加上空军的支持。这一回，昂加尼亞将军领导的蓝派取得了胜利。然后，蓝派向全国发布新闻公报，强调会遵守宪法。最后一段话值得注意：

“我们相信，军队不应执政，而应当服从民权。这不是说，军队不应对制度发挥影响。同时，军队的角色应当是沉默的、基本的。军队保证我们能享有前人的宪法条款，负有防止国内发生任何集权运动——无论来自政府内部，亦或来自反对派——的神圣职责。”²

¹ 何塞·玛利亚·圭多 (Jose Maria Guido, 1910年8月29日——1975年6月13日)，早年参加大学改革运动，支持伊里格延。40年代参加了激进公民联盟，在党内属于左翼。1957年加入不屈激进公民联盟。1958—1962年任参议院议员，担任临时议长。1962—1963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受军队严密控制，被迫废除选举，解散议会。1963年卸任总统后退休。——中译者注

² 戈德韦特 (Goldwert)，《1930至1966的阿根廷的民主、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公报承诺恢复选举，“保证人人参与国家生活”，但在 1962 年，任何军政府都不可能允许庇隆主义死灰复燃。政府想通过没有“继续醉心于庇隆的人”的正义党¹，把庇隆主义与正义主义分开，而红派还是不买账。摇摇欲坠的圭多政府对庇隆主义展现了强硬立场，逮捕了工会领袖在内的庇隆分子。这些手段没能安抚红派。最终，红派在海军和部分陆军的支持下，于 1962 年 4 月发动叛乱。叛乱持续了四天，双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爆发激战，最终叛军战败。

海军因参与叛乱，不得不裁减人员、削减预算。但这次失败的政变后，政府被迫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打击庇隆主义。政府借口庇隆主义构成独裁、威胁了阿根廷宪法，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剥夺了所有庇隆主义政党和候选人的法律权利。1963 年 7 月，阿图罗·伊里亚²以仅 25.1% 的得票率和大量弃票当选新任总统。

伊里亚一上台，就立即打压军中的红派势力。他提拔了蓝派担

（*Democracy, Militarism, and Nationalism in Argentina, 1930-1966*），第 192 页。
第 150 号新闻公报摘自詹姆斯·罗维（James W. Rowe），《阿根廷：红与蓝与新年》（*Argentina: Reds, Blues and the New Year*），第 9—10 页。——原注

¹ 国防部长的话发表于 1963 年 2 月 8 日。戈德韦特（Goldwert），《1930 至 1966 的阿根廷的民主、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Democracy, Militarism, and Nationalism in Argentina, 1930-1966*），第 193 页。

² 阿图罗·文贝托·伊里亚（Arturo Umberto Illia，1900 年 8 月 4 日——1983 年 1 月 18 日），1918 年参加大学改革运动，同年加入激进公民联盟。1923 年起成为执业医师。1936—1940 年任科尔多瓦省参议院议员。1940—1943 年任科尔多瓦省副省长。1948—1952 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57 年退出激进公民联盟，参加了人民激进公民联盟。1962 年任科尔多瓦省长。1963—1966 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开放党禁，恢复了正义党和阿根廷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提高最低工资，大举增加公共教育支出，促进工业化，但同时大力镇压工人运动。1966 年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下台，此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任空缺的要职，又允许庇隆派政党取得选举权。军方认为，他没有充分意识到古巴革命和共产主义颠覆的潜在威胁¹。到了 1965 年，军方再次发声，表达了对庇隆主义复兴的恐惧，同年 11 月，昂加尼亞将军辞去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这标志着军方不满伊里亚对待共产主义者和庇隆主义者的态度。总统对庇隆派的态度进一步软化，连军队内部也出现了对庇隆派让步的迹象。因此红方更加好斗，最终导致了 1966 年 6 月 2 日的军事政变。宪法的拥护者昂加尼亞将军成为了军政府的总统，这是阿根廷历史上的又一个讽刺。这一届政府得到三军支持，致力于消除庇隆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看到，昂加尼亞将军的榜样是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将军，他的理论则是参考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西班牙长枪党理论。

流亡中的庇隆

流亡中的庇隆始终在影响他的追随者。庇隆曾多次表示反对暴力：经历暴力革命的国家都经受了痛苦，假如他在 1955 年武装了工人，那么很多人会白白送死。但他失去权力和流亡国外的那些年里，却反悔当年没有反击军事政变，也不再崇尚温和与和平的手段。庇隆给友人和政治伙伴的信中——尤其给自己指定的发言人约翰·威廉·库克²的信中——提倡暴力革命。他告诉库克：“我们必须

¹ 霍奇斯 (Hodges) , 《阿根廷的“肮脏战争”》 (Argentina's "Dirty War") , 第 39 页。——原注

² 约翰·威廉·库克 (John William Cooke, 1919 年 11 月 14 日——1968 年 9 月 19

须建立……永久的起义状态。”¹自称“庇隆抵抗运动”的庇隆派听进了这话，他们在库克的领导下，在1955年政变和1958年2月的选举之间，引爆了近七千枚炸弹。十年后，庇隆的进一步煽动在青年当中点燃了熊熊烈火。

同时在1956年初，庇隆发布了《致领导者的指示》。这是库克等人制定的详细策略，意图是通过游击活动助长革命。它提供了一项破坏公共秩序和社会生产的计划，鼓动大规模破坏活动，以此瘫痪军政府。文中表示，革命游击队需要建立地下小组，打击特定的目标。文中说，必须要除掉“黑手”（指在政变前后，处决忠诚的庇隆主义者与普通公民的军方人士）。庇隆说，应当在秘密法庭上将人民之敌绳之以法，而这些敌人的头目，正是1955年9月发动军事政变的佩德罗·阿兰布鲁将军和伊萨克·罗哈斯²海军上将。蒙特内罗的成立离这项指示已经过去十四年了，但他们还是完全照着庇隆在1956年的指示行动。

这些指示发布的几个月后，军政府发动了血腥屠杀。庇隆派的将军们发动叛乱，最终失败。政府处决了忠于庇隆的军官，以及先

日），早年从事法律工作。1946—1952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持左翼庇隆主义立场。1955—1959年担任庇隆在阿根廷的代理人，领导庇隆主义抵抗运动。

1955—1957年期间入狱，1957年越狱，流亡智利。1960年赴古巴，参加了古巴革命。后回国，1968年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¹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71页。——原注

² 伊萨克·弗兰西斯科·德尔·安赫尔·罗哈斯（Isaac Francisco del Ángel Rojas，1906年12月3日——1993年4月13日），1924年入伍。1950—1951年期间先后担任驻巴西和乌拉圭武官。1953—1955年任海军学校校长。1955年参加了推翻庇隆政权的军事政变，1955—1958年任临时政府副总统兼海军司令。1958年被迫退休。——中译者注

前因起义反对政变关在狱中的工人。于是，庇隆下达了一份更加强硬的文件《致全体庇隆派的最高指示》，说别无选择：“为了彻底的社会革命而斗争，总要有牺牲的。我们必须通过积极战斗实现这一目标，直到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彻底消灭反动势力。”¹

这份文件中提到的策略，包括“公民抵制运动”，目的是使社会瘫痪，不成功的话，“就由我们的群众组织进行政治行动”。但到五十年代后期，潜在的革命力量耗尽，即使约翰·威廉·库克等人继续策划武装起义，在古巴训练追随者，庇隆也未能在六十年代煽动群众起义。但庇隆终究是碍了他的军人继任者的路。这十年间，军方势力与独裁政府竭力镇压庇隆主义和工会，报复庇隆的支持者。这段时期，经济持续下滑，社会仍然四分五裂。

1966 年政变

1966 年政变后，昂加尼亞将军上台。这是自 1955 年庇隆政府倒台以来的第三次军事政变，也是自 1930 年以来的第六次军事政变。在昂加尼亞的领导下，军队直接统治阿根廷，而不光是通过政变和临时总统干预国事了。多亏庇隆，军方推开了农业出口寡头，虽然军队和保守派同样畏惧共产主义，但军方有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确，在 1966—73 年间，军方较之金融精英起到了主导作用，因为金融业与外国公司都对军政府言听计从。军方能够行使权力，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持有全国主要工业公司的所有权。据丹尼

¹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 78—83 页。庇隆与库克通讯集（Peron-Cooke correspondencia）。——原注

尔·彭曼¹估计，军工厂的销售额在一些年里占GDP的2.5%，在某些年份甚至高达5%²。

金融界推翻军政府或者踢开军人、指派傀儡出任总统的可能性，以及金融界的政治代理人能够多大程度剥夺军方对本国工业的控制权，决定了军人集团相对金融巨头的政治独立性。无论如何，金融巨头无法建立纯粹的“金融政府”。军队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但军方依照自身利益逻辑，而非金融界的经济动力而行动。同样，克里格·瓦塞纳³和马丁内斯·德·奥斯——分别在昂加尼亞时期和1976年后主持经济——都没法把军工厂私有化。

昂加尼亞政府取缔了所有政党、罢免并取代了最高法院的成员、再次解散国会、派兵进驻大学。虽然军队不再受制于金融和工业阶层（前寡头），昂加尼亞还是让自由派民族主义者进入内阁，高度重视有利于农产品出口业等产业利益的经济政策，以此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昂加尼亞成功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使阿根廷比索成为了拉美最坚挺的货币。联邦赤字减少，外国投资增加。同时，昂加尼亞与美国军方发展了更加亲密的关系，重组了陆军的大部分组织，在意识形态层面强调国家安全和发展。

¹ 丹尼尔·布鲁斯·彭曼（Daniel Bruce Poneman，1956年3月12日——），早年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14—2019年任美国能源部副部长。——中译者注

² 彭曼（Poneman），《阿根廷：审判民主》（Argentina: Democracy on Trial），第101页。——原注

³ 阿达尔维尔特·克里格·巴塞纳（Adalbert Krieger Vasena，1920年2月11日——2000年6月15日），阿根廷经济学家。1957—1958年任经济部长，推动阿根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66—1969年再次担任经济部长。1969年因全国总罢工下台。1973—1978年任世界银行拉美地区执行副总裁。2000年逝世。——中译者注

军方放出了要摧毁左派的信号。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国家限制了工人工资，削减了社会福利。工人的生活水平全面下降。国家实行强制仲裁，在劳资争议中支持资方。工会与军方变为敌对关系，不过工会中的一些派别曾跟昂加尼亞走得很近。到了 1969 年，工会与军方水火不容。在科尔多瓦工人罢工后（见第五章），昂加尼亞就不再对工会留情面了。

与美国的关系

其实，自六十年代初，昂加尼亞的阿根廷军事政权就在寻求美国军方的支持，派遣人员参加镇压叛乱方面的指导与意识形态的课程。但是，正如阿根廷军方人士所说，美国把阿根廷军队当成了殖民地警察，只向阿根廷出售二流武器。阿根廷只能找法国买军备。1967 年，法国施耐德公司向阿根廷军方出售了坦克，得到在阿根廷生产武器的许可，打破了美国对阿根廷的武备垄断¹，还在当地建立了由军方控制的国家军备产业。十年后，卡特政府抗议阿根廷侵犯人权，减少了军事援助。阿根廷军事工业的独立便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军方干脆取消了与美国的协议。它已经不再需要美国的援助了。

马丽亚·德·洛斯·安赫莱斯·亚努齐

¹ 鲁基（Rouquie），《拉丁美洲的军事与国家》（The Military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第 145—146 页。——原注

以下是对一名罗萨里奥居民的采访，讲述了六十年代，那个工业城镇发生的暴力。

六十年代，我在罗萨里奥上高中。我们有三位总统，三位军人总统。大家认为，第一位总统昂加尼亞将军很特别。大家都觉得，你要是在社会上碰到麻烦，最好去找军人，因为军人都很机灵。军政府是集权的，但效率很高。人都需要效率，你要是独裁者的话，你的效率会很高，因为只需要你下决定就行。国会（总的来说，整个社会都是）接受了 1966 年的政变，默许军人执政到了 1969 年。

1969 年，我们在罗萨里奥发起了第一场大游行。当时非常暴力。你知道的，1968 年，法国发生了很多抗议，在阿根廷，乃至全世界引起了一连串响应。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此前，我没搞过什么政治，除非是把联合国赞助的青年协会也算在内。以前，我们在北方贫民区做过志愿者。我们开始思考社会问题。当然了，不想这种事的话，我们也不会做志愿者了。1969 年，我们搞了一次大游行，告诉警察：我们反对暴力。因为在科连特斯（Corrientes）城里，警察杀害了一些人。我们要声援那里的人。

高中毕业那年，我参加了游行。当时，我还是个小懵懂，什么都不开窍。我参与政党活动后，学到了一点技巧：假如你和外界没有保持“联系”，就不要去游行，否则没人知道你出事了。但我们没有与外界保持“联系”，就去参加了游行。“联系”的意思是，某人预先说好，呆在酒吧或者住所，游行过后，你就故意路过酒吧，不必跟他说话，让他看见你就行。假如那个联系人待在住所，你就给他打电话。当时吧，我们估计所有电话都受监听，所以你就闲扯点什么，让他知道你是安全的。

1969年的游行中，骑警打死了一位抗议者。骑警拿刀砍人脖子，不少人的脖子，甚至脑袋都挨刀了。游行后一天，我要上学校。学校附近就是军事基地，旁边还有总工会的大楼和省警察局。我说这些是因为，发生游行时，军人和警察就站在学校门口。有时候，他们会接管学校，用来存放武器。所以上学变得很麻烦，得提早过去。有些人把刀的图案醒目地画在了墙上。墙上还留有血迹。人头那么高的位置画了把刀，这就很有戏剧性。士兵和警察就在学校的街角。你不表明自己身份，他们就会朝你开枪。

城市封锁了，颁布了戒严令。大家很害怕，也对骑警的做法非常恼火。这些警察杀了人。据说，他们关在总部好多天，还打了药，所以啥都干得出。警察非常狂躁。公众的反应很激烈。人们说：“我们不要这样的警察”。这是罗萨里奥骚乱的一个插曲。

我们当时就在游行队伍里，但我们很冷静，因为游行是沉默的。突然一枚催泪弹落到大街中间，人们四散而逃。大家向圣·费街跑去。记得跑到一栋房子前面，有人抓住我的衣服，把我拉了进去。我不知道那人是谁，但他把好几个年轻人从街上拉下来了。他不把我拉下来，我很可能就进去了，或者让人弄死了。

还有些地方，人们给骑警气坏了，在两栋楼之间拖了绳子，用来绊马，还朝他们扔铺路石。一些人很火大，向警察倒热水。报纸和官媒呢，什么也没报道，只提到死掉一个人。其它一个字都没讲，但我们都看到了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同时，第一批城市游击队出现。我们听说了蒙特内罗。他们是右翼的天主教团体。还有人民革命军，这是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但不如别的团体流行。另外，大多数本地人——可以说整个社会——

都赞同这些游击队的做法。当蒙特内罗或者哪个组织击毙了军头，他们都很高兴。他们说，“好啊，这家伙很坏。他们干掉了他，可是做了件大好事。”中产阶级把杀人者视为英雄，但自己肯定不会做这些事的。直到最后都是这样。

我认为，许多人分不清这些组织。他们说：“蒙特内罗就是游击队吧”。你说：“他们干掉了军头”，一听这话，这些人会非常高兴。当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说。但在家里，他们会说，“好啊，太棒了，他们把桑切斯干掉了，棒极了，这人造孽太多。”他们觉得杀人就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1976年的军事政变后，他们还是这副样子。你知道的，“有人会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的确，这些组织，尤其是蒙特内罗，在民主化前都是受庇隆鼓动的。

1970年，我到罗萨里奥上大学，经历了一段非常暴力的时期。人们对政府非常不满。大学里有很多政治小组，当然这是不允许的。我们搞了不少游行。我们都知道，要是去参加游行，肯定要跟警察打一场。

第五章 工会运动

庇隆留给工会的遗产，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等级制权力机构。总工会就是这个权力机构的组织，谁控制了它，谁就控制了庇隆派工会。权力斗争导致了黑幕，发展为枪战。贿选司空见惯。考察后庇隆时代的工会时，丹尼尔·詹姆斯¹把 1970 年强大的五金人工会的选举描述为“一场有组织的黑帮、‘西部帮派’与政治手腕的结合”。

工会领袖都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们通过对基层会员的权力，掌握了他人的利益。不仅是权力，还有金钱。工会的资金有两成来自会员费。会员费在工资的一到五个百分点不等，从薪水中自动扣除，经劳动秘书处交给工会。只要分会乖乖听总工会和政府的话，它的领袖就不会在工会事务上受到严密监视。普通会员管不着会费的用途。工会经手的投资和税收的数目比会费更大，有时高达数百万比索²。因此，谁掌握了金钱，谁就能掌握巨大的权力。这也是阿根廷工会离不开暴力和腐败的原因。

商业雇员工会的老大阿曼多·马奇（Armando March）积攒下了巨额财富，住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豪宅，收集画作，养名犬。

¹ 丹尼尔·詹姆斯（Daniel James，1948 年 8 月 8 日——）英国历史学家，庇隆主义学者。——中译者注

²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 408—409 页。——原注

昂加尼亞政府发现他从工会的户头上挪用了三千万美元后，就把他扭送监狱。建筑工人工会的老大罗赫里奥·科里亚¹也发了大财。此人退休后，住进了巴拉圭的大农庄，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回国旅行时遭遇暗杀。何塞·阿隆索²也落得了同样的下场。工会会员大概很想知道，阿隆索那点工会薪水是怎么负担得起豪宅、仆人、豪华轿车、周末度假别墅等等的奢侈享受的³。他在 1970 年遇刺。前一年六月底，他在总工会中的死对头奥古斯多·范多尔遇刺身亡。

这些例子表明，工会头子有机会从组织中窃取大笔款项，但是要拿命为赌注。工会领袖都会在身边配保镖。这几桩暗杀全是左翼游击队干的。他们得当心游击队，包括公开广播对暗杀负责的蒙特内罗。游击队获得了“训练有素的强大战斗力”的名声，但这个名声过誉了，而维持这一神话是符合政府和军警集团利益的。同样，工会内斗也是暴力的，一个派别完全有可能暗杀敌对派别的领袖。

虽然工会拥有权力，但这权力受到总工会的约束。总工会从各行业、各地区的工会会员手上收取会费，对各项工作收取罚金和提

¹ 罗赫里奥·科里亚 (Rogelio Coria, 1929 年？月？日——1974 年 3 月 22 日)，阿根廷工会活动家。早年在面包店打工，后当砖瓦匠，参加了阿根廷建筑工人工会。1968—1974 年任建筑工人工会总书记，曾多次领导罢工。1972 年流亡巴拉圭。1973 年随庇隆回国。1974 年被蒙特内罗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² 何塞·阿隆索 (José Alonso, 1917 年 2 月 6 日——1970 年 8 月 27 日)，阿根廷工会活动家。1938 年参加工人运动。1943 年支持庇隆，在庇隆任上，为了反共而创建工会，担任工会领袖。1956 年被军政府逮捕，越狱后流亡委内瑞拉。

1957 年回国，因参加罢工入狱三个月。1960—1963 年任全国服装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1963—1965 年任工人总联合会总书记。1970 年被蒙特内罗刺杀身亡。
——中译者注

³ 保罗·刘易斯 (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 407—408 页。——原注

成。关键是，总工会与政府交往密切，通过高度集中于国家的工会组织，控制了工会工人。

总工会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工会要看政府脸色，因为庇隆的《劳动法》规定，政府能决定工会是否合法。政府还有权干预工会事务，当工会发起太多罢工或影响到政府时，政府也有权下场干预。六十年代里，政府的确援引过这些法律。有时，政府会暂时中止工会活动、干预工会事物或者任命代理人。政府也会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即便意识到普遍贪污、黑帮行为与腐败的存在，也会支持特定的领导人或工会。

政府插手工会事务，使工会看起来更像政治反对派了。工会领袖必须把握好分寸，如何既代表会员的要求，又能跟劳工部门打好交道。此外，庇隆派工会一直与流亡中的庇隆保持联系，而庇隆对工会抓得很紧。如果某工会试图争取更多独立性，或者支持不忠于庇隆的工会领袖，庇隆及其追随者就会出来收拾它¹。1965 年，总工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后，手握大权的工会领袖奥古斯多·范多尔试图建立“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范多尔位高权重，但是工会反对派建立的“六十二个支持庇隆组织”最终阻挠了他的野心。

工会领袖和基层会员都认为，工会不应当停留在对工资的讨价还价上，因为工会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部分。的确，庇隆掌权时（当他下台的时候，则是由他派来的使者）就在劝说工会领袖，工会会员是社会上最重要的部分，他们的需求应当是首要的。因此，工会采取的政治立场，必然影响 1955 年后的多届政府。

¹ 詹姆斯（James），《权力与政治》（Power and Politics），第 17 页。——原注

即便如此，尤其在六十年代，工会和会员们还是命运多舛。庇隆下台后，工人激烈反抗阿兰布鲁政府，使工会恢复了活力。工会支持庇隆，在1958年推了阿图罗·弗隆迪齐上台，也同样在1962年推了这届政府下台。但在后来，工会遭遇了大量挫折。研究阿根廷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丹尼尔·詹姆斯认为，到了六十年代初，工会会员的士气低落。不仅是政府和老板施压，工会领袖的腐败与欺骗行为，也叫工人不断退出工会¹。到了1966年，工会的基层工人已经与阿根廷当时的政治深深疏远了。

原因是传统经济部门衰落、失业率上升、普遍未充分就业。跟各国一样，技术取代了劳动力，导致阿根廷工人失业，但过剩劳动力又无法吸收。六七十年代里，大多数大型工会的会员人数都大幅减少了。1963年，强大的五金工工会有二十一万九千名会员，但在1970年只剩不到十二万六千名会员。公共雇员工会（Civil Servants' Union, UPCN）在1963年有十九万名会员，但在1970年只剩下五万人。建筑工人、木工、公交车与电车工人、食品加工工人、纺织工人、码头工人，这些行业的工会都失去了大量会员。一些产业勉强维持住了会员数，比如说有三万人的国家石油工人工会，而一些新兴产业的工会则增加了会员。一些城市（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话工人和市政工人的工会会员人数也都增加了²。

庇隆主义从来没有鼓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它一直都是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比起没有类似包袱的乌拉圭与智利，共

¹ 同上，第21—31页。——原注

²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413页，表格16.3，关于总工会的数据。——原注

产党在阿根廷取得的成果很少¹。但是庇隆主义也阻碍了经济自由化。跨国公司在资本密集的先进技术部门中崛起。它们希望有一支自由的（至少是较为自由的）劳动力大军，这些劳动力应分散在行会，而不是集中在庇隆的大工会中。它们希望扳倒总工会，让市场决定一切。新兴产业的工人拥有更熟练的技能，比别的工人收入更高。六十年代中期，在以汽车行业为主的新兴产业中，工人收入要比同业平均收入水平高 35%，比传统和能源行业的收入高 59%。到了 1970 年²，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工会运动进退两难：它想建设庇隆主义的产业工会运动，却始终绕不开“现代化”³。

1966 年政变后，范多尔受到了何塞·阿隆索的挑战。政府中的昂加尼亞派支持何塞·阿隆索，而商人们间接支持范多尔。不是因为商人喜欢范多尔，而是因为他跟国家走得没那么近。政变后，范多尔铤而走险，组织了一系列罢工和总罢工。昂加尼亞政府武力镇压了它们，取缔了多家工会，颁布了法律，允许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实行“劳动力军事化”。历史学家威廉·史密斯（William C. Smith）说：“这一信息很明确。如果工会和工人阶级想跟新政府打交道，就必须‘合作’，放弃激进的庇隆主义与好斗的工会战术。”史密斯认为，主张“人民与军队”结盟的流行口号，应该改成“资产阶级与反人民的军队”结盟⁴。

¹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专制主义与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危机》（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Political Economy），第 102—103 页。——原注

² 同上，第 106 页。——原注

³ 同上，第 110 页。——原注

⁴ 同上，第 114 页。至于口号，史密斯引用了巴尔维（Balve）等人的《街头斗争，

工会吃了败仗，不得不向政府妥协，但又不愿忍气吞声。工会中出现了两个“派别”：“合作派”与“范多尔派”。此时，范多尔派选择与国家谈判，静待更有利的形势。合作派乐意从属于国家，使工会与国家进一步融合。昂加尼娅的劳工部门抛弃了范多尔，与他的对手建立了合作关系。

总工会的分裂

虽然范多尔派与合作派的角力是工会舞台上的压轴戏，但还有好戏在幕后酝酿着。非庇隆主义的工会领袖，或者说自四十年代以来就反对庇隆工会的基层干部粉墨登场。有一支反对派叫“阶级主义”，更激进、更关心阶级政治，呼吁基层的自主性，反对范多尔、阿隆索等官僚。到了 1968 年，这个团体攒足实力向总工会的领导权发起挑战，结果产生了两个工会联合会（总工会）。范多尔、阿隆索及其追随者组成了“阿索帕多”（Azopardo，即总工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事处所在地）总工会，后起之秀们组成了“阿根廷人总工会”（CGT de los Argentinos），领导人是拉伊蒙多·昂加罗¹，

阶级斗争》（*Lucha de calles, lucha de clases*），第 173 页。——原注

¹ 拉伊蒙多·何塞·昂加罗（Raimundo José Ongaro，1925 年 2 月 13 日——2016 年 8 月 1 日），阿根廷工会活动家。1966—1975 年、1984—2016 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会总书记。1968—1974 年任阿根廷劳工总联合会总书记。1969 年因支持科尔多瓦起义被捕。1974 年获释。1975 年因支持左翼庇隆派而再次被捕，家人遭到“三 A 团”的残酷迫害。1984 年后继续参加工会运动。1989 年支持梅内姆竞选总统。2016 年逝世。——中译者注

还有阿古斯丁·托斯克¹及其忠诚的追随者。虽然阿根廷人总工会没有提出先锋队的策略，但在公开文件和讲话中，都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不过，它在行动上的革命性却不及它的言辞。

国家与工会官僚都要粉碎新生的工会联合会，但在 1968 年 6 月，阿根廷人总工会建立了广泛的公民抵抗阵线，包括了学生、第三世界神父运动的成员、小商人以及反对国家与工会官僚的各方势力。示威游行和大规模逮捕使这场运动扩展开来，来到了工人区。

1969 年科尔多瓦起义

1968 年 9 月，国家石油垄断企业的战斗性工人发起罢工，遭到武力镇压。政府解雇了工人，采取了许多强硬措施。其它行业的工人见状，发现与国家结盟就是自杀。此时，范多尔与“阿索帕多”总工会担心左派的势力盖过他们，也公开反对昂加尼亞。此时，范多尔得到了庇隆的支持。庇隆虽身处流亡，但影响力不容小觑²。

1969 年 5 月，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折。在内陆工业城市科尔多瓦，汽车制造等行业工厂的工人纷纷起来反抗政府。这

¹ 阿古斯丁·托斯克(Agustín Tosco, 1930 年 5 月 22 日——1975 年 11 月 5 日)，1950 年起参加工人运动，反对庇隆主义，倾向于马克思主义。1968—1970 年任科尔多瓦省电力与能源工人联合会总书记。1969 年因参加科尔多瓦起义被捕，判处 8 年徒刑，监禁十七个月后获释。1973 年庇隆再次上台后，被迫转入地下。1975 年因细菌性脑膜炎逝世。——中译者注

² 威廉·史密斯 (William Smith)，《专制主义与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危机》(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Political Economy)，第 115—125 页。——原注

场起义称为“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cordobazo)，与 1919 年“悲惨周”和 1921—1922 年的巴塔哥尼亚起义齐名。千万人卷入了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这场起义演变成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不出一周就席卷了整个科尔多瓦地区。当地人建起街垒，对抗警察，冲击了政府、银行、跨国公司。最终，大约五千名别动队和四千名当地警察出动¹，弹压了这场起义。起义在全国各地引起反响，迫使昂加尼亞一年后辞职。他的继任者罗贝托·莱文斯顿²将军在 1971 年 3 月经历了第二次科尔多瓦起义后，又被另一场军事政变赶下台。

六十年代后期的工人骚动是反对昂加尼亞政权的社会冲突的一环。到处都是学生们的示威游行、第三世界神父的活动、武装团体制造的爆炸和绑架。社会冲突愈演愈烈。1969 年 4 月，学生在省工业中心（科连特斯、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发起抗议活动，工人在科尔多瓦等地进行示威。而五月起义的成果，相比之下远远小于它的规模。

普遍的看法是，这场战斗之所以在科尔多瓦，而不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是因为科尔多瓦的工人阶级更强大，而资产阶级更弱小，又一盘散沙。省内的政治局势一团乱，腐败简直是家常便饭。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主要在汽车配套产业上，科尔多瓦迅速工业化。福特、雷诺、菲亚特都在科尔多瓦开设工厂，但总部设

¹ 同上，第 128—129 页。——原注

² 罗贝托·马尔塞洛·莱文斯顿 (Roberto Marcelo Levingston, 1920 年 1 月 10 日——2015 年 6 月 18 日)，1938 年入伍。1957—1960 年任高级战争学院教授，后晋升为准将。1969—1970 年任驻美国武官。1970 年昂加尼亞政府倒台后，于 1970—1971 年任临时政府总统。1971 年 3 月爆发全国大罢工，3 月 23 日迫于军方的压力辞职。2015 年逝世。——原注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六十年代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置办了越来越多的装配厂，科尔多瓦却止步不前。大多数产业工人都在大型工厂工作，大都是年轻人和工会会员，所以他们要比传统工业中心的工人更加团结，领导人也都是年轻人，更亲庇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传统的阿根廷工会有较强的等级制度，这里正好相反，科尔多瓦的工会鼓励有力的基层组织。他们认为在反抗资本的斗争中（而不是在国内的权力斗争中），基层已经成为了战斗的前线¹。

1969年，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后，阿根廷人总工会被迫转入地下。工会领袖遭到监禁。但这没能停止罢工。七十年代初期，罢工更频繁了，“阶级主义”很快在工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场起义后不久，“阿索帕多”总工会的领袖奥古斯托·范多尔遇刺，因为他试图反对庇隆插手工会事物。工会在回击军政府时，内部也为争夺工人运动的控制权，闹得不可开交。政变后，军事统治者换了人，但工会的内斗并没有结束。军头换人也无法缓解经济危机，阻止不了通货膨胀和外债激增。军方没能唤起经济奇迹，而军队跟工会的冲突，也无济于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和遏制飞涨的生活成本。

突然之间，新的游击队组织（蒙特内罗）宣布，他们绑架了阿兰布鲁将军。事件发生在1970年5月29日。不久后，蒙特内罗声明阿兰布鲁是人民之敌，处决了他。他们对这起事件负全部责任，还发布了新闻稿，为他的灵魂祈福。当时没有人质疑他们的声明。后来出现了两样说法。一个是幸存的蒙特内罗提出的，说阿兰布鲁其实死于心脏病；第二种说法是，绑架是昂加尼亚干的，目的是夺

¹ 关于胡安·卡洛斯·托雷（Juan Carlos Torre）的个人采访，见他的《1973—76年，政府中的工会》（Los sindicatos en el gobierno, 1973-76）与《庇隆主义工会的形成》（La formacion del sindicalisme peronista）。——原注

权。下一章，我们再来回顾这段有趣的插曲。

军事统治（暂时）告终

亚历杭德罗·拉努塞将军接过了权力，但无法压制对手。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在昂加尼亞治下壮大了，想要建立专制的法团主义社会。曾接受庇隆领导，试图与工人分享权力来取得社会和平的军方改革派的影响力减弱。蓝派想搞民主，但又要在政治选举中禁止庇隆主义。昂加尼亞派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掌权时，红派在政府中决定着经济议程，但政权易手后，他们也施展不开了。军队各派内斗的同时，拉努塞还得当心国内爆发起义。到处都是暴力。全国处在无政府状态和极其严厉的镇压下——两者合二为一，势必一发不可收拾——而军方连步调都不一致，无法再维持统治了。

工会和各路反对派大量使用庇隆主义的政治语言。因此，遭到取缔的庇隆主义政党就“神化”了。军方的唯一出路是让庇隆重返政治舞台，而允许庇隆参加选举，就是叫他重新掌权。军方不得已才搬出这根救命稻草。

1972年的大选禁止庇隆担任总统候选人，因为规则要求，候选人必须国内居住满五年。自1955年以来，庇隆一直在流亡，满足不了这一要求。拉努塞说服了同僚，修改了这条规则，允许庇隆派通过正义解放阵线¹参加选举。1972年11月，庇隆短暂回国，左思

¹ 正义解放阵线(El Frente Justicialista de Liberación,FREJULI)，阿根廷政治团体，1972年成立，旨在推动庇隆派取得政权。成员包括正义党、人民保守党(El Partido Conservador Popular,PCP)、统合发展运动(El Movimiento de Integración

右想，最后提名埃克托·坎波拉为正义解放阵线的总统候选人，叫所有人大吃一惊。没人喜欢坎波拉。大家都认为，庇隆这么做，是在诱使军方背弃“公开选举”的诺言。然而，军方没有改变决定：它已经无力统治国家了。庇隆派主导的正义解放阵线赢得了三月份的选举。1973年5月，坎波拉就任阿根廷总统。

对科尔多瓦当地人的采访

本章的自述始于六十年代中期与七十年代初期，直至“进程”的尾声。这些片段使我们了解到，从1966年军事政变到1976—1983年军事独裁结束的这段时期里，工业城市科尔多瓦经历了怎样的暴力。第一个片段中，一位工会活动家的妻子讲述了这位活动家的失踪，还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工会领袖之死。第二个片段中，一个坐牢多年的科尔多瓦年轻人讲述了回忆。与之相对的第三个片段中，一位工会领袖声称，在动荡岁月里，工会没有遭受重大损失。从反对派活动家到幸存的无名氏，形形色色的人都参与了科尔多瓦的工会运动。

y Desarrollo ,MID）、基督教人民党（El Partido Demócrata Cristiano ,PDC）、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Movimiento Social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伊里格延民族运动（Movimiento Nacional Yrigoyenista）、阿根廷全国大会党（Encuentro Nacional de los Argentinos）、国民革命运动（Movimiento de la Revolución Nacional）、基督教民主联盟（Unión Federal Democrática Cristiana）。组织多数持庇隆主义立场，少数派持社会主义、改良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天主教民主主义等立场。在1973年3月和9月的选举中，正义解放阵线大获全胜，庇隆重新担任总统。1976年庇隆夫人倒台后，正义解放阵线宣告解散。——中译者注

采访中的一些信息超出了本章的范围。必要时，我们会在方括号中给出简要注释，或者加入相关事件和特定人物的尾注。等到后面的章节，我们会进一步讲述它们。

达琳达·奥尔默斯·德·迪·托菲诺

1970 年，我三十岁。那会儿，我在科尔多瓦省的电力公司（科尔多瓦省能源公司）上班。公司现在还在老地方。我从 1958 年开始工作，那年我十八岁。三四年后，我成为了部门里的工会代表，干了很多年，但我没有进入工会的领导层。1964 年，我跟公司里的男同事结婚，他也是他那个部门的工会代表。今天，他是阿根廷三万名失踪者中的一员。

我们工会出了一个国际知名的领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的名字叫阿吉斯丁·托斯克。1975 年，他在地下生活中死去了。托斯克为人正直，品行无可挑剔，不愧为电力与能源工会最伟大的领导人。

1969 年 5 月 29 日，托斯克与我的丈夫参加了“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1969 年 5 月 30 日，宪兵队闯进了工会办公室，逮捕了托斯克与我丈夫，抓走了许多工会领袖。军方认为，科尔多瓦起义是他们搞的鬼。昂加尼亚独裁政权的军事法庭判他们有罪。

头两三天，我不知道丈夫的行踪。我上军队营房也没找到人。然后他出现在了军方的逮捕名单上。我母亲去找人，人又不在那儿了。军队已经判了他们有罪，先是把人带到拉潘帕，又转移到南边两千公里的罗森监狱。我丈夫判了四年，托斯克判了八年。

我们的分会是阿根廷电力与能源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后者又是

全国总工会的成员。虽然工会联合会和总工会与独裁统治并存，但我们的工会想要民主，是反对独裁的。六十年代末期，联合会开除了我们的工会。然后，我们与其它工会一起成立了一个叫“阿根廷人总工会”的联合会，领导人是拉伊蒙多·昂加罗。（电力与能源）联合会的人控制着（手下）所有工会的医疗和社会服务。哪个工会退出了联合会，就会失去联合会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但在科尔多瓦，我们的独立性很强。脱离联合会后，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社会服务，交给托斯克管理，还有自己的度假中心，也交给托斯克管理。托斯克还说服了同事，在山里买下我们的旅馆。我们还留着这家旅馆呢。他还在海边给工人们租了一块地方。

托斯克克服刑时，仍然是工会的领导人。后来，我们几个工会对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释放军事法庭逮捕的人。1969年12月，昂加尼亚总统下令释放军事法庭逮捕的囚犯。

1971年的第二次科尔瓦多起义后，托斯克再次被捕入狱。这回，他关了两年，我丈夫关了两个月。他们关在科尔多瓦。政府干预了工会，军方特派员进驻工会办公楼。工会的工作人员照常上班。但有些人离开了工会，组织了抵抗运动。虽然罢工和游行是非法的，但到处都在闹游行、闹罢工。当然，警方进行了镇压。1976年前，警方就逮捕和殴打人们，但没有后来军事统治时期那么下手狠毒。听话的工会安然无恙，但我们的总书记拉伊蒙多·昂加罗进去了。狱中的托斯克当选为工会领导人。他在1972年9月获释。1973年，民主重返阿根廷。庇隆派赢得了选举，坎波拉在1973年5月25日成为了总统。

但在下半年，庇隆回国时，埃塞萨机场的事件揭开了庇隆派内部的分歧。极右派在一边，最进步的庇隆主义者在另一边。两方发

生了冲突，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大多数工会活动家都是庇隆派，但我们的工会（以托斯克为总书记）立场是多元的。托斯克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别的某些小工会里也有马克思主义者。托斯克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他有自己的哲学和想法，也表达了自己的哲学和想法。左派都想拉拢他，让他当什么“代表”啊，“副主席”啊。但托斯克始终认为自己是工人，必须与工会站在一起。大家把自己的福祉托付给了他，而他也是以这样的身份死去的。

1974年2月，庇隆派里的进步派组成了科尔多瓦政府。科尔多瓦的副省长曾是反抗独裁的阿根廷人总工会的领导人。1974年2月28日，警方接管了政府，带走了省长和副省长阿蒂利奥·洛佩斯¹，拘禁了起来。警方解散了民选当局，身为总统的庇隆却在袖手旁观。庇隆没有问责，也没有拨乱反正，什么也没做。国民政府干预了科尔多瓦省。到了1974年9月，一个空军军官和一名警官前来接管我们的工会。右翼庇隆分子控制了工会。然后，进步的工会反对派、活动家、工会领袖开始遭到迫害。尤其是我们的工会和雷诺工厂的运输工人工会（Sindicatos de Mecanicos y Afines del Transporte, SMATA），大家遭到了镇压，警察接管了工会，逮捕了工人。那时，不少同事过起了地下生活。我丈夫虽然还在上班，但不回家睡觉了。右翼在房子里放了炸弹，还炸毁了城市里唯一一家报纸《内部之声》（La Voz del Interior）的大楼。

¹ 伊波利托·阿蒂利奥·洛佩斯（Hipólito Atilio López，1929年8月9日——1974年9月16日），早年参与工人运动，支持庇隆主义。1955年在庇隆下台后，曾短暂入狱。1956—1974年任科尔多瓦省运输工人工会总书记。1957—1974年任科尔多瓦省工人总联合会总书记，使运输工人工会成为科尔多瓦省最具战斗力的工会。1973—1974年任科尔多瓦省副省长，1974年3月2日在军事政变中下台，9月16日遭到“三A团”绑架后遇害。——中译者注

奥古斯丁·托斯克没有去上班。他给解雇了。他已经转入地下，因为他们正在搜寻他。1975—76年，爆破和枪击事件仍在继续。他们也开始杀人。1975年9月，阿蒂利奥·洛佩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害。这一年，三A团还杀死了工会律师阿尔弗雷多·卡吕谢（Alfredo Caruchet）博士，当时他老先生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哎，整个1975年糟透了。虽然大家都很害怕，但还是建立了抵抗组织。我们有了地下组织，还有一份工人通讯。

1975年11月，阿古斯丁·托斯克去世了。我丈夫一直与他保持联系，所以我知道他病了。会员把他藏起来，帮助他。他去世的时候，当局允许人们前来参加追悼会。他们当托斯克是敌人，但也知道，他是个重要人物。这是科尔多瓦工人历史性的追悼会。我们知道会遇到危险，但说不准仪式上会发生什么。我们从追悼会前往墓园，来了两千人左右。其它工会的人在墓园门口致悼词。但枪手已经埋伏在了教堂和墓园里面，他们突然开枪了。这些枪手可能是警察或情报部门的人。你能想象，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到处跑。没人给棺材下葬。有些人被捕，但没有人被打死。他们是想威慑我们，不是杀死我们。最终，包括我丈夫在内，几个人扛着棺材，跑到坟墓旁边，头顶着子弹给托斯克下了葬。

1976年1月，伊莎贝尔还在执政，三A团就在科尔多瓦搞“失踪”了。最开始失踪的是年轻的两姐妹，两个积极的学生，年纪都非常轻。她们是在夜里被带走的。到1976年3月24日政变之前，绑架和失踪愈演愈烈。政变前，三A团就当街杀人，把尸体留在街上。突然之间，他们开始把人“带走”。大家都一头雾水。电力与能源工会的阿尔贝托·卡法拉蒂（Alberto Cafaratti）失踪了。他们在白天，当着众人的面带走了他。我提到的两姐妹是在晚上被带走

的。而我们的同事，他是在下班后，众目睽睽之下，在街上被带走的。全是穿便服的人干的，他们是科尔多瓦一个准军事组织的成员。希望我们的同事是坐牢了，而不是“失踪”了。1974年入狱的工会会员，当时还关在监狱里。奥古斯丁·托斯克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又有一位同事失踪。1976年1月，科尔多瓦发生了多起绑架事件后，我们才意识到，发生的事不同寻常。我们觉得，同事们可能已经遇害了，但也不知道人在哪里。接着，三月份发生了政变。

我曾天真地认为，只要政变了，“绑架”就会结束，生活就能继续下去了。丈夫告诉我：“别骗自己了。绑架是警察和军方合伙干的。”1976年7月，更多同事失踪。某些同事给狱中同事的家庭募集了钱。埃尔南·比维斯（Hernan Vives）这么做了，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就把他绑架了。1976年3月至11月那段时间，我丈夫不回家睡觉，但是照常上班。

我当时怀着最小的孩子（现在二十一岁了），怀孕之后很不便，只能睡在床上。我觉得政变后，员工和公司、老板、医生的关系大变样了。医师之前告诉我，我必须好好休息，否则可能会流产。政变后，我又上了医院，我对医生（公司的人）说：“这是证明，我必须在家里休息。”他对我说，“规矩变了。军队的救护车会上你家，把你载去军医院。到了地方，他们会决定你需不需要休息。”我本应该这么回他，“好吧，如果是这样，我就回去上班了。”但是我告诉他，“来我家就来我家吧。”他们没有来。但是公司医生不时会上我家，看我是不是待在床上。因为我是受迫害的工会领袖的妻子。

八月份，我的孩子出生了。然后我回去工作。按照工会合同，刚分娩的母亲可以提早一个小时下班。十一月的一天，我提早下班。我丈夫正常下班，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绑架。当时，一个同事想跟

我丈夫说话，跟在后面，听到绑架者说了些什么。这些人自称联邦警察，出示了证件。他们穿着便服。目击者记下了车牌号。第二天，我在电脑机房工作的时候，拜托了市政厅的熟人，查查车牌号的主人。电脑上显示，这个车牌号是我同事熟人的，但跟他完全没关系。警察只是套用了这个车牌号。他们换了假车牌，然后绑架了我丈夫。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控制了一切。

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在找人。到了 1979 年，一些同事联系了我。他们从 1974 年开始就关在牢里，后来才放出来，条件是离开阿根廷。他们告诉我，一个拉佩拉（La Perla）集中营的狱友对他们说，我的丈夫在 1977 年 2 月左右就遇害了。

我给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写了信，交给了一个出国旅行的人。我还写信给国外工会。我想提一句托马斯·迪·托菲诺¹案，西班牙法官准备对这项反人类罪行采取行动，因为托马斯·迪·托菲诺的母亲是西班牙人。此外，还有幸存者的证词（也表明），他们看见了我的丈夫在拉佩拉（La Perla）集中营里。

麦克·恩里奎

跟你讲讲科尔多瓦起义吧。1969 年，我十二三岁，在工人区（也

¹ 托马斯·迪·托菲诺 (Tomas Di Toffino, 1939 年 4 月 10 日——1976 年 11 月 30 日？)，阿根廷工会活动家。1953 年进入科尔多瓦省能源公司工作，积极参加科尔多瓦省电力与能源工人联合会的工作。1969 年因参加科尔多瓦起义而入狱。1972 年积极参与“庇隆主义革命派”的活动，因此 1974 年后受到“三 A 团”迫害。1976 年 11 月 30 日在下班途中遭到绑架，随即失踪。——中译者注

就是北部的“红区”）参加了那次起义，那一片住了很多工厂工人，尤其是铁路工人。科尔多瓦起义是学生和工人反对军事独裁的伟大运动。工人不仅要争工会的合法地位，也是为了争民主。当然了，当时的工会主要领袖也是起义的带头人。

这不是群众孤立自发的行为，而是群众在工会领导下进行的有组织的行动。在这些工会领袖中，有运输工人工会的阿蒂利奥·洛佩斯，他在 1973 年成为科尔多瓦副省长，在 1975 年遭到三 A 团谋杀；电力与能源工会的阿古斯丁·托斯克，他是个杰出的左翼人物；这类人物还有不少。科尔多瓦起义期间，死去的第一位工人就来自运输工人工会。

“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给本市的工人运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起义挫败了军人政权。一年后，发生了第二轮罢工，我们称它为“第二次科尔多瓦起义”（viborazo）。那又是一次大规模示威。连锁超市给洗劫一空。最重要的是，这些行动要求恢复民主。此地的工人运动对全国上下的工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最初阶段（1955 年政变后），工会高层对军人独裁做出了妥协。两次起义之后，我们夺过了工会运动的领导权。

科尔多瓦学生运动也在背后助力。学生甚至跟工人一起参加集会。他们的口号是“工人和学生共同斗争”。学生们也是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的主要参与者。科尔多瓦这座城市拥有重要的大学和悠久文化传统。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学生与工人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五月风暴和“嬉皮”运动对学生影响很大。学生留长发、不用肥皂洗澡，以示反抗制度。我们的起义也受到了切·格瓦拉和他在玻利维亚之死的影响。

当时有两个总工会，两帮工人：阿根廷人总工会和阿索帕多总工会。还有一些独立工会，跟主流工会差不多，区别只在于战斗性。阿根廷人总工会更有战斗性。但当工人采取行动时，所有工会一齐行动。没有人掉队。

你想知道我怎么参与的吗？当时我还是中学生，庇隆的归来使我深受感动。那时，我完全认同庇隆主义。对我们来说，庇隆归来，就是庇隆主义抵抗运动的胜利，是一场被禁止多年的运动的胜利，是庇隆主义青年运动提出的口号“为庇隆归来而战”的胜利。

庇隆原定于 1973 年 6 月归国那天，各派的追随者都前往埃塞萨机场迎接他。庇隆的飞机抵达之前，右翼分子突然向庇隆主义青年团和游击武装组织开火，打死很多人。这是杀戮与绑架的开端。在这场冲突中，某些工会，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与右翼结盟了。同时，年轻人开始质疑工会官僚的态度。年轻人曾经把庇隆主义视为左翼的民族革命运动。

庇隆归国后，进步的、接近人民的庇隆派与民族主义的右翼庇隆派，为夺取国家权力，陷入了争斗。庇隆派在自相残杀。寡头、右翼势力、阿根廷大资产阶级挑拨了庇隆派内斗。他们害怕庇隆和最进步的庇隆派联手，建立更进步的社会主义政府。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巴拿马的“学校”，右派与军队情报部门勾结在一起。他们都担心庇隆与进步派结盟，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好吧，1974 年，我在当公务员，还加入了科尔多瓦省公共雇员工会。我没有担任工会要职，但 1976 年 4 月政变期间，我在戒严中被捕，获刑六年。罪名是，我是庇隆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没有因为工会活动，而是因为政治活动被捕。跟庇隆主义青年组织走近

的人，全都遭到逮捕、谋杀、失踪。只要你参与政治，那你就进去吧。这些是在 1973 年恢复民主制度、正义党重新合法化的同时进行的。所以说，（我们的）成员身份是公开的，没有人隐藏身份。我的岳父当时在正义党内，担任科尔多瓦市议员，也关进了大牢。

镇压的逻辑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人失踪了，那些人却好好的？我仍然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军警抓走了我。我关在科尔多瓦第一监狱。我们的三十六名同志在这所监狱遇害。一些人是因戒严被捕的，另一些人则是出于别的原因。后来听说，外面每有一名警察或军官遇袭，就要处决三到五名囚犯。他们把两三个狱友带到军官办公室，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们，叫他们转告犯人。军官甚至隐晦地告诉他们，要拿谁先开刀。有时，他们干脆说要干掉谁。那是真的变态。不知道生杀大权是拿什么判断的。

我记得有个狱友，是工会的伙计。有一天，狱方在监狱露台上搜身，那天早上特别冷，我们赤条条地挨棍子打。那个狱友给打翻在地。接着，就因为他站不起来，军官掏出武器，朝他头上开了枪。还有一回，他们把一个囚犯带出监狱，执行了“飞行法则”。就是说，他们声称，犯人在企图逃跑时中枪毙命。还有一位狱友让他们拉出去，殴打了一个晚上，活活打死了。你不参加政治，也会遇到这种事。谁会遭殃呢？他们说了算。

诺贝尔

1970 年，我三十岁，已经是这个工会的领导人了。这个国家还在盼着庇隆将军回归。他带来了社会正义，为工人而工作。他制定

了法律，给予了我们胜利。庇隆给了我们选举权、退休金、教育、住房、上大学的机会，所以人们一直在等他回来。我们拼尽全力要让他回来，工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力量，即使我们不得不跟各种军人执政者打交道。

问：庇隆回国以前，工会和游击队组织有关系吗？

工会和游击队没有关系。游击队屡次与工会火并，还袭击工会领袖。游击队想搞颠覆，尝试在一些地方尝试建立革命政权，但他们只是少数，阿根廷社会的大多数不听他们的。当时，有许多工会领导人遇害。游击队或准军事人员杀害了何塞·伊格纳西奥·鲁奇、何塞·阿隆索在内的许多人。他们杀死了我们的一些领导人。我们的领导人到埃塞萨去迎接庇隆，欢迎庇隆将军的归来。一百万人在埃塞萨等待庇隆归来。这一刻，我们苦等了好多年。而一群人冲进来大开杀戒。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团体都加入了冲突。

庇隆重新掌权时，国际资本希望他的政府倒台，通过阻碍消费，给他制造了财政困难。游击队还占领了一些地方。庇隆始终反对暴力。他总是说，两个极端是不好的；然而国际上的游击队一直在妨碍各国的民主。他们不允许像庇隆这样的拉美领导人为“共同防御”而统一拉美。庇隆说过，在五月广场上，当他与一些受游击队——这些组织向往国际左翼，但是敬畏我们的总统——影响的年轻人交流时，觉得是在侮辱自己，因为他们想要政治变革。他们只是一小撮与广大人民背离的年轻人。

庇隆去世后，这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军队也制造

了分歧和冲突。1976年政变之前，阿根廷经历了极端的社会动荡，毫无人身安全可言，因为炸弹就放在电影院里和大型广场上。我们认为，颠覆和反颠覆的两方都干过这种事。在这个国家，三A团是非常危险的。要是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就会报复工会领袖、活动家或学生。那个年代，你不得不经历许多痛苦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发生政变。我们想要民主，想要民选政府。我们的工会为“换总统”的事交涉过，但不想要军事政变。政变后，工会活动瘫痪了。军方接管了工会。工会领导人锒铛入狱，或者干脆人间蒸发。在科尔多瓦，我们有六名同事在政变后被立刻逮捕了，几个月都杳无音讯。军方为了对付工人和工会领袖，宣布军事戒严，逮捕了他们。

我的工会没有受到干预。因为我们的工人采取了和平的倾向。这不是天天抗议，跟体制斗的工会。我们对极端派别敬而远之。这可能就是（还有上帝的旨意）他们没有动我们的原因。那六名被捕的同事都有政治背景，所以才摊上事了。其中一人是国会代表，一人是省体育部长兼庇隆派工会领袖。还好，我们发现这些同事还活着，军队也没有接管我们。同样，我们的工会领导人也没有像别人一样遭到解雇，流落街头。

虽然我们没有受到干预，但还是失去了自由。他们削减了工会方方面面的权力，工会领导人也失去了民主选举赋予的一切权利。军方控制了所有工会，逃过一劫的同事继续着工会的日常工作。大家都害怕逮捕和绑架。游击队和军队都威胁我们：游击队以为我们是庇隆主义者，军队以为我们就是庇隆分子。极端派别的工会领导人有时会铲除异己。大部分工会的日子都不好过。最具战斗性的工会，比如庇隆派的五金工人工会，就有领导人遇难。

我认为，军队犯了错误。军队不由分说，报复了无力自卫的无辜者。但我们的工会与（游击队或工会里的）极端分子无关。我们认为，唯一改变现状的方法就是回到民主制度下。

第六章 一场短暂的革命

革命运动在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初兴起，很快遍及全国。理想主义的中产阶级青年学生建立了各类小组。天主教学生加入了庇隆派和蒙特内罗，而另一些人，包括坚信社会主义的天主教徒，则是加入了左翼组织。表面上看，这些组织有共同的目标和相似的组织形式。他们都想推翻军政府，建立新社会，建立大体上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他们关心穷人、工人、边缘群体。他们自认为，应该带领这些人，帮助和指导他们发动革命、当家作主。

这些组织通常是集权和等级制的。成员都是活动家——或者照它们自己的说法：“积极分子”——甚至是文学和理论的研究者。他们推动彼此采取更暴力的行动来反抗当局。无论什么目标的组织都拿切·格瓦拉当偶像（照雷吉斯·德布雷¹的说法，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因为格瓦拉写的作品很少，又早早在 1967 年去世）。在七十年代早期的短暂时期内，他们都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

他们的差别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这些小型左翼组织都受马克思

¹ 茹勒·雷吉斯·德布雷 (Jules Régis Debray, 1940 年 9 月 2 日——)，法国作家、哲学家。早年曾加入法国共产主义学生联盟。1965 年跟随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1967 年被俘，遭受残酷虐待后，判处 30 年监禁。1973 年在萨特、阿连德、聂鲁达等人的斡旋下获释回国。1979 年赴尼加拉瓜，参加了推翻索摩查政权的起义。1981 年、1988 年两次支持密特朗参加总统选举。1982—1992 年任太平洋共同体秘书长。2002—2004 年任欧洲宗教研究所所长。2009 年支持成立新反资本主义党。2010 年支持左翼阵线。——中译者注

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他们的领导人都是专门的革命者，早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就去了古巴，学习古巴革命者的理论和战术。相比之下，虽然庇隆主义者有时自称“社会主义者”，甚至一些最年轻的追随者也相信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所知甚少。更糟的是，有些人了解社会主义，但很晚才意识到，自己参加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不管是支持庇隆还是反对庇隆，这些组织都受到庇隆主义与胡安·庇隆重返阿根廷政治舞台的影响。

六十年代学生的经历

正如我们的受访者以及整个历史时期所展示的那样，阿根廷的社会背景是暴力的。极端的暴力事件成为了学生参加地下游击组织的重要路标。这些路标还包括：警察突袭夜间俱乐部；官方取缔文学和讽刺刊物；学校惩戒穿短裙的女孩，限制学生参与政治；政府在六十年代初干涉了八所国立大学。最终约有三千名教学与研究人员移民。1966年7月29日，对当时的学生来说，最苦涩的记忆便是“长棍之夜”。那晚，联邦骑警出动，持警棍袭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学生。根据罗萨里奥居民，马丽亚·德·洛斯·安赫莱斯·亚努齐的说法（见上文第四章），类似的事情到处上演。六十年代中期，形势有利于庇隆主义的发展。六十多年代初，许多大学敌视庇隆主义，但到了1966年，政变后，军政府对大学出手，唯一能够自卫的似乎只有庇隆派的团体。在附录中，我们给出了各个组织的名录，进行了简要介绍。以下我们将关注最主要组织的活动。

1968—1973 年的革命组织

工人革命党 / 人民革命军与革命武装力量

六十年代后期组建的几个左翼小团体中，马里奥·罗贝托·桑图乔¹领导的工人革命党—人民革命军最为活跃。工人革命党与人民革命军同时诞生，持有反庇隆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后来转向格瓦拉主义。工人革命党是指挥中心，人民革命军是军事部队。它的临时盟友是革命武装力量，后者与蒙特内罗合并之前，常与人民革命军联手开展绑架和抢劫行动。但是革命武装力量和工人革命党与人民革命军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人民革命军定义阿根廷为国际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形态，认为庇隆主义是在工人中间发展阶级意识的障碍。而革命武装力量的立场是：没有追随者的革命先锋党毫无用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阿根廷工人的历史经验的一部分，因此永远不会成为革命的意识形态；庇隆主义是工人的意识形态，通过庇隆主义可以树立工人的革命意识。两个组织在七十年代初，围绕这两种观念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但当它们的成员都积极投

¹ 马里奥·罗贝托·桑图乔 (Mario Roberto Santucho, 1936 年 8 月 12 日——1976 年 7 月 19 日)，早年就读于图库曼国立大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61 年参与创立印第安美洲人民革命阵线 (Frente Revolucionario Indoamericanista Popular, FRIP)。1963 年起与纳维尔·莫雷诺建立联系，逐渐倒向于托洛茨基主义。1965 年创建工人革命党，1965—1971 年、1972—1976 年任工人革命党总书记。1970 年创建人民革命军，1970—1976 年任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71 年被捕，狱中积极联络阿根廷共产党、蒙特内罗等左翼游击队力量。1972 年越狱逃走。1973 年积极参与游击战争，对抗右翼庇隆派。1976 年遭到阿根廷陆军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入“武斗”之后，就无暇顾及论战了。

1972年4月10日，两个组织联手刺杀了罗萨里奥第二军司令胡安·卡洛斯·桑切斯将军。同一天，人民革命军杀死了关押十九天的菲亚特阿根廷分公司经理。

1972年特雷利乌惨案

1972年8月，人民革命军和革命武装力量的战斗人员，还有蒙特内罗的政治犯，准备逃离巴塔哥尼亚特雷利乌（Trelew）的罗森监狱。他们与外界失去联络，只有六人逃到特雷利乌机场，上了准备好的飞机。十九名游击队员迟到，被迫投降后遭处决。包括十一名人民革命军成员在内，共有十六人死亡。路易斯·马蒂尼¹作为人民革命军的当事人，称特雷利乌事件为“肮脏战争”的开始²。

¹ 路易斯·马蒂尼（Luis Mattini，1941年2月2日—），原名胡安·克雷默（Juan Kremer），出身于木匠家庭。1959年起接触马克思主义，受到一个前斯巴达克派德国移民的政治影响。1961—1962年期间在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锅炉工会工作。1969年加入工人革命党。1970年加入人民革命军，与政府军作战。1973年赴古巴，试图获得古巴援助未果。1973—1979年任工人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1979年任工人革命党—人民革命军总书记，期间把工人革命党改造为拥护苏联的政治团体，本人在国外继续指挥武装活动，曾流亡意大利、苏联、朝鲜等国；1979年解除职务后，赴墨西哥从事宣传工作。1981年被墨西哥政府驱逐出境，流亡瑞典，随即脱离工人革命党。1986年回国，曾与阿根廷共产党有联络，但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² 马蒂尼（Mattini），《从图库曼到拉塔布拉达的人民革命军—工人革命党们》（Hombres y mujeres PRT-ERP de Tucuman a la Tablada），第158页。——原注

特雷利乌后的绑架与杀戮

选举日期定下后，人民革命军游击队拒绝放下武器，理由是：军方无论如何都会背叛，而庇隆主义者的胜利并不是人民的胜利。他们在 1973 年开展了诸多暴力活动。当年一百七十起针对商界高层的绑架案，大部分是人民革命军所为。1973 年 6 月，他们炸伤了阿根廷福特公司的两名高管，迫使福特公司支付一百万美元的保护费，为穷人购买医疗设备。庇隆主义青年团中，有一派反对这种“慈善”行为，表示人民的新政府可以保障医院¹。而在人民革命军的队伍里，也有人反对在民选政府下继续使用暴力。

从人民革命军中分离出来（8 月 22 日）一个团体，宣布支持庇隆主义青年团，指责老同志是“宗派主义”。工人们也没有准备好支持人民革命军游击队。1973 年 6 月，当一支突击队进入工厂时，工人对庇隆和坎波拉的欢呼声，盖过了讲话者的声音²。到了 1973 年 7 月，坎波拉看到工人和青年支持自己后，进行了全国广播，呼吁结束暴力和无政府状态。人民革命军受到了孤立。

庇隆主义青年团与蒙特内罗

庇隆主义青年团由一些早期的组织演变而来的。其中一个叫“塔夸拉”（Tacuara）的天主教组织，面向学生群体，持强烈的反

¹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1973 年 6 月 1 日，第 170 页。——原注

²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1973 年 6 月 8 日，第 180 页。——原注

犹和反共立场。这些组织使用制服和仪式（包括秘密的入会仪式）吸引年轻人参与。六十年代早期，塔夸拉分裂成了意识形态各异的团体，其中的“塔夸拉民族革命运动”曾在1963年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抢劫银行。不久后，警方摧毁了这个组织¹。另一个团体到工人和穷人中间做社会工作，为许多年轻人提供了中转站。后来，他们都成为了庇隆主义者和蒙特内罗。

最初，庇隆主义青年团是为了反对昂加尼娅政府而成立的。它以高中和大学为中心，迅速扩张，在全国的工作单位建立了支部。1970年后，这个组织成了蒙特内罗的青年组织，负责思想工作。

蒙特内罗则是天主教青年的武装组织。三位创始人：费尔南多·阿瓦尔·麦地纳²、卡洛斯·古斯塔沃·拉姆斯³、马里奥·菲尔梅尼奇都参加过早期的各类青年组织。他们得出结论：阿根廷社会是无法通过和平手段改变的。加入他们的人有：何塞·萨维诺·纳瓦罗⁴，曾在科尔多瓦领导自己的武装团体，又是这些人中唯一跟工

¹ 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第51页。讽刺的是，这次抢劫发生在银行职员的工会诊所，目的是给诊所员工发工资。——原注

² 费尔南多·路易斯·阿瓦尔·麦地纳（Fernando Luis Abal Medina，1947年？月？日——1970年9月7日），出身于天主教民族主义家庭。1964年起参加解放神学运动。1969年加入蒙特内罗。1970年5月29日参与绑架并杀害了前总统阿兰布鲁，9月7日在与警方枪战中壮烈牺牲。——中译者注

³ 卡洛斯·古斯塔沃·拉姆斯（Carlos Gustavo Ramus，1947年11月5日——1970年9月7日），早年参加极右翼活动。1969年以后立场急剧左倾，创建蒙特内罗。1970年5月29日参与绑架并杀害了前总统阿兰布鲁，9月7日在与警方枪战中壮烈牺牲。——中译者注

⁴ 何塞·萨维诺·纳瓦罗（Jose Sabino Navarro，1942年12月11日——1971年？月？日），早年持庇隆主义立场，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70年任蒙特内罗领导人，1971年7月前往声援菲亚特工人罢工的途中遭遇警方截击，经历一周战斗

人阶级有联系的人。此人终生都是庇隆主义者；埃米利奥·安赫尔·马萨¹，此人领导科尔多瓦的一个组织，曾袭击多家银行，为运动筹集资金；艾丝特·诺玛·阿洛斯蒂多²，此人是唯一具有传统左翼背景的蒙特内罗创始成员。她在 1967 年脱离共产党，次年与麦地那一同前往古巴学习游击战术。1970 年 5 月，蒙特内罗只有十二人。这么一个小团体居然绑架与谋杀了阿兰布鲁将军。在新闻公告中，蒙特内罗自称是阿根廷的、是庇隆主义的，“准备用手中的枪，为庇隆与他的人民夺取政权而战”，致力于“基督教与民族意志的正义主义”³。

蒙特内罗（Montonero）这个名字，源于边远地区的大草原上游荡的高乔人。传说中，高乔人一出生就在保家卫国。另一个版本是，他们是大庄园主的斥候。这个名字象征着民族主义，明确表明蒙特内罗都是反帝国主义者与“纯正”的阿根廷人。除了象征意义外，这个名字还颇具浪漫气质，其它革命组织的缩写都没有这种感觉。此外，这个组织还搬出了艾维塔·庇隆的浪漫故事。艾维塔声

后身负重伤，弹尽粮绝，遂开枪自杀。——中译者注

¹ 埃米利奥·安赫尔·马萨（Emilio Angel Maza，1943 年？月？日——1970 年 7 月 8 日），1958 年参加学生运动，受到天主教会改革派的影响。1961 年参加“统合主义”（integralismo）运动。1969 年加入蒙特内罗。1970 年 7 月 1 日在与警方的战斗中身负重伤，7 月 8 日逝世。——中译者注

² 艾丝特·诺玛·阿洛斯蒂多（Esther Norma Arrostito，1940 年 1 月 17 日——1978 年 1 月 15 日），1964 年加入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1965 年转向左翼庇隆派，参加庇隆主义革命派的活动。1969 年加入蒙特内罗，积极参加武装斗争。1970 年受到军政府通缉，1973 年获庇隆大赦，在大学任教，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秘书处长，与蒙特内罗仍保持联系。1976 年被绑架，在狱中遭受折磨，1978 年就义。——中译者注

³ 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第 90—91 页。——原注

称“庇隆主义是革命的，否则什么都不是”，呼吁把反对寡头的革命变成蒙特内罗的传统。蒙特内罗的报纸也叫《蒙特内罗艾维塔》。

费尔南多·阿瓦尔·麦地那与卡洛斯·吉斯塔沃·拉姆斯在1970年9月死于埋伏（表面原因是他们杀死了阿兰布鲁将军）。纳瓦罗在1971年7月的枪战中遇害。此后，马里奥·爱德华多·菲尔梅尼奇扛起了运动的大旗。

后民主时期的激进党政治家吉多·迪·特拉¹这样描述蒙特内罗：

“他们搞了一种极为浪漫的庇隆主义，理想化了它的过去，连旧时代的人都不禁产生了怀疑。他们极力反对工会，认为工会是官僚机构，是对基层‘真正愿望’的扭曲。他们渴望人民与领袖之间的自发交流，甚至否定了政党的形式，而去支持模糊的运动理念：没有官僚主义、没有从属关系和选举，领导人只是自然而然地从运动中产生。”²

这个描述很真实，但它忽略了在这些青年伪造的乌托邦背后，是极端暴力的社会背景，以及这样一个事实：自这些庇隆主义游击队成立以来，直到1974年，它们都能获得大量民众的支持。七十年代初期，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加入游行，以示威的方式声援游击队。这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处于极端暴力的镇压与反动下，又没有一个集团能够进行统治，蒙特内罗就抓住了公众的幻想与愤怒。

¹ 吉多·何塞·马里奥·迪·特拉（Guido José Mario Di Tella，1931年6月12日——2001年12月31日），阿根廷经济学家。1954年加入基督教民主党。1955年加入正义党。1972年跟随庇隆回国。1976年政变中被捕，获释后流亡英国。1983年回国。2001年逝世。——中译者注

² 狄特里亚（Di Telia），《庇隆治下的阿根廷》（Argentina under Peron），第46页。——原注

蒙特内罗来自中产阶级，而非支持庇隆的工人阶级。传记作者理查德·吉莱斯皮（Richard Gillespie）认为，对于许多人来说，庇隆主义运动是青年对父辈政治立场的否定。父辈记得真正的老庇隆，而下一代热衷于宣扬革命和暴力的新庇隆¹。现在的庇隆公开站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古巴革命、格瓦拉思想、毛泽东的战略一边。他自称是反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领袖，下的指示也越来越敌视资本主义。他把录像带交给年轻追随者，敦促他们发动革命，采取必要的暴力行动夺取政权。但同时，他还给工会支持者下达右倾的指示，而年轻的庇隆主义者们，很久之后才能得知这一点。

蒙特内罗与第三世界神父运动

那个动荡年代，天主教会内部也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主持的梵蒂冈改变了教会对待穷人的立场，甚至暗示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些可取之处。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会议甚至说，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同于彻底的基督教生活。1967年，教皇保罗六世发表声明，抨击了追求利润的动机、不平等、种族主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问题，这份声明对阿根廷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思想迅速传播开来。在教皇的加持下，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于1967年²诞生。“第三世界主教”发表了一份文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它批评了马克思主义和武装革命，但是区分了

¹ 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原注

² 第二次梵蒂冈大会，《进步平民主义》（Populorum progressio），1967年。——原注

“压迫者的不公正暴力”和“受压迫者的公正暴力”。1968年，在拉美教区主教在麦德林（哥伦比亚）的会议上，这份文件得到了许多神父的支持。正如在采访中表明的那样，蒙特内罗与第三世界神父运动受麦德林会议的影响很大。两个团体最终走到了一起。从一开始，它们就做出了与麦德林会议相反的解释。遇害的哥伦比亚神父卡米洛·托雷斯¹的追随者，胡安·加西亚·埃洛里奥²表示“革命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所有想让人类获得真正‘大爱’的基督徒的义务”³。

卡洛斯·穆希卡神父⁴表达了另一种看法：“我准备赴死，但我不准备杀人。”⁵理查德·吉莱斯皮认为，穆希卡年轻时就接受了庇

¹ 霍尔赫·卡米洛·托雷斯·莱斯特雷波 (Jorge Camilo Torres Restrepo, 1929年2月3日——1966年2月15日)，哥伦比亚神父。1965年创立人民统一战线 (Frente Unido del Pueblo)，发起了解放神学运动。1964年加入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1966年在与政府军作战中壮烈牺牲。——中译者注

² 胡安·加西亚·艾洛里奥 (Juan Garcia Elorrio, 1938年6月1日——1970年1月26日)，1961年起研究神学，倾向于天主教改革派。1965年参加解放神学运动。1966年起出版《基督教与革命》杂志，支持庇隆主义革命派，积极参加农村游击活动。1970年因车祸身亡。——中译者注

³ 吉莱斯皮 (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引文摘自加西亚·埃洛里奥 (Garcia Elorrio)，《基督教与革命》(Cristianismo y Revolucion)，1966年9月，第23页。——原注

⁴ 卡洛斯·弗朗西斯科·塞尔吉奥·穆希卡·埃查古埃 (Carlos Francisco Sergio Mugica Echagüe, 1930年10月7日——1974年11月5日)，阿根廷神父，出身于政治世家。1955年欢迎推翻庇隆的政变，但1956年转向庇隆主义。1958年担任神父。1964年发起解放神学运动，支持庇隆主义。1969年积极参加反对军政府的活动。1973年公开反对蒙特内罗。1974年遭到“三A团”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⁵ 吉莱斯皮 (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此处出自马里奥·爱德华多·菲尔梅尼奇 (Mario Eduardo Firmenich) 的《我们的政治分歧》(Nuestras diferencias politicas)，《庇隆主义者》(El peonista)，1974年5月21日，第4

隆主义，为教会在 1955 年推翻庇隆感到遗憾。神父觉得，如此一来，许多阿根廷工人把教会，跟寡头政权和后来的军政府看作了同一个东西。吉莱斯皮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加入‘人民阵营’时，对庇隆主义采取了过分幼稚的态度。”第三世界神父运动成立前，穆希卡在天主教学生青年组织里担任“精神导师”，遇到了还是学生的阿瓦尔·麦地那、拉姆斯、菲尔梅尼奇。他把男孩们带到贫民窟去，与穷人一起工作，宣讲社会福音。照菲尔梅尼奇的说法，是神父带他们走上了这条道路。

最终，这三位学生为了摆脱充满压迫的世界，开始了武装斗争。1967 年，他们与卡米洛·托雷斯指挥部的胡安·加西亚·埃洛里奥建立了联系。这个组织正致力于庇隆主义、社会主义、武装斗争。埃洛里奥于 1966 年发表了影响力不小的《基督教与革命》。这本书让许多支持第三世界神父运动的阿根廷神父与主教变得更加激进了。书中颂扬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战士，为年轻的激进分子创造了一种文化，使他们把暴力活动中的死亡作为“嘉奖”。穆希卡于 1974 年 5 月遇害，想必是三 A 团动手的。

其它方面

1970 年阿兰布鲁将军的处决

如上一章所述，这桩冒险的主角可能不止年轻的革命者。庇隆

派自然痛恨阿兰布鲁将军，庇隆本人也在煽风点火，但昂加尼娅将军一伙人也有处理阿兰布鲁的理由，因为阿兰布鲁密谋赶昂加尼娅下台。有一种说法：蒙特内罗与昂加尼娅达成了某种交易，才宣称阿兰布鲁的绑架与暗杀是自己所为。这个说法是阿兰布鲁的一位友人提出的，他有线报称，政府为这场谋杀，向第三方支付了款项¹，但第三方有一人背叛了政府，把这件事透露给了警方。告密者在几个月后离奇死亡，所以证人没了。证据还有：相关人员说，阿兰布鲁没有受到胁迫，是自愿跟熟人出门的，而且“绑架者”的年龄比蒙特内罗分子更大（例如，警方在事后打死的阿瓦尔·麦地那只有二十岁）。还有一种说法是，情报部门绑架了阿兰布鲁，又把人交给了这个后来自称“蒙特内罗”的团伙²。理查德·吉莱斯皮在1982年调查了蒙特内罗，认为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因为证据间接无力，也不符合蒙特内罗的政治性质。

日后菲尔梅尼奇作为双面间谍的证据

十年后，曾在《每日新闻》、《华盛顿邮报》等报纸担任记者的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en）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了马里奥·菲尔梅尼奇与军队情报部门之间有合作关系。根据安德森的说法，菲尔梅尼奇在1973年（也许早在1970年就开始了）担任军队情报部

¹ 费尔南德斯·阿尔巴利诺（Fernandez Alvarino），《阿根廷Z世代：世纪大案》（*Z argentina, el crimen del siglo*）。——原注

² 可参考《门德斯·阿兰布鲁：不完美犯罪》（Mendez Aramburo: *El crimen imperfecto*）。——原注

门的线人。安德森的消息渠道是一位退休的美国外交官，后者当时能直接接触阿根廷军队的高层。这位外交官根据菲尔梅尼奇的“中间人”阿尔贝托·比亚尔¹提供的情报，写了一份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报告。阿尔贝托·比亚尔显然不相信蒙特内罗的说法，对阿兰布鲁的绑架案展开了独立调查。马丁·安德森采访了一位退休警官，此人是比亚尔的知己，透露了比亚尔的调查结果。安德森说，美方认为菲尔梅尼奇肯定是卧底。他指出，麦地那和拉姆斯在一年内都死于警方伏击，其他领导人也接连遇害或失踪，而菲尔梅尼奇却奇迹般地死里逃生²。

关于此事的争论，对我们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至关重要。假如菲尔梅尼奇（根据我们采访的军方人员的说法，可能还有其他人）是情报部门的线人（正如安德森所言）或者与军队合作，那么蒙特内罗就是“作为敌人”而建立的，军方利用它为镇压“左翼”提供口实。七十年代初，蒙特内罗的成员大多是受乌托邦吸引的年轻庇隆主义者。

蒙特内罗对阿兰布鲁之死的声明有不少矛盾，所以七十年代就发生了这场争论，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怀疑影响了青年团与蒙特内罗基层的忠诚。他们的整个结构是建立在“单元”形式上的，成员不知道谁参与了武装行动。在自己的小组以外，组织成员之间的

¹ 阿尔贝托·比亚尔（Alberto Villar, 1917年8月12日——1974年11月1日），阿根廷警察，曾在法国接受培训，回国后担任警察首长，领导警方在全国各地镇压游击队。1973年退休，经营一家私人保安公司。1974年1月奉召返回警队，领导“三A团”的活动，同年11月1日被工人革命党——人民革命军炸死。
——中译者注

²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65—67页，第107页，第117—118页，第319页。——原注

交流非常有限（后面几章对游击队战士的采访中，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

阿兰布鲁谋杀案的几个月后，最初的游击队领导人没几个逃脱警方的伏击。幸存下来的人得到了群众中的庇隆派和包括卡洛斯·穆希卡神父在内（他主持了阿瓦尔·麦地那与拉姆斯的葬礼）的第三世界神父的庇护。群众对他们的同情叫当局吃了一惊。与当局的期望相反，游击队刺杀阿兰布鲁等人，居然激起了群众的赞扬，而不是谴责。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小组也加入了蒙特内罗，包括革命武装力量、庇隆武装力量、“赤膊者”。1973年大选前，以蒙特内罗为首的庇隆派革命团体主要通过银行抢劫和袭击军营获得枪支和资金。他们还在外国高管的家里和警察局里安放炸弹，绑架过几位商界高层和军队情报人员。

革命者与总工会

不管蒙特内罗领导人的真相是什么，绝大多数年轻革命者都渴望革命、实现平等、让人民当家作主。他们想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工人阶级只是抽象概念。他们不属于工人阶级，却渴望带领工人阶级进行美好的革命。他们相信，假如能提供“先锋队”，工人自然会成为革命者。但与自诩的“先锋队”不同，工人有家庭要养，有工作要守护。想采取激进行动的工人选择建立另一种工会组织。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就是工人不满的表达。但总体上，工人还没有准备好在工厂或社会层面进行不断革命。蒙特内罗解释说，这是工人受到工会官僚威吓的结果。

除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之外，工会与游击队互不相容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两方都希望庇隆回国，但都相信庇隆站在自己这一边，也都想夺取政府权力（这个政府肯定比它年迈的领袖活得更久）。但不是所有工会都听总工会的。正如上一章，我们对科尔多瓦当地人的采访表明，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并不是工人起义的结束。电力与能源工会的领袖阿古斯丁·托斯克公开反对总工会的庇隆派领导人，鼓动在工会组织中进行革命性的变革¹。

右翼庇隆青年

工会对庇隆主义青年团的反感，催生了庇隆主义工会青年团（Juventud Sindical Peronista, JSP）。总工会纠集了这帮年轻人与同龄的革命青年打架叫骂。他们也加入了右翼的大学青年组织（大学民族主义中心²）与庇隆在五十年代组织的准军事组织（民族解放联盟）。从极左到极右的各个组织都包含在了庇隆主义运动中。

第二次的到来

作为庇隆的替身，埃克托·坎波拉赢得了 1973 年的大选。军

¹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1973 年 7 月 13 日，第 221—222 页。——原注

² 大学民族主义中心 (La Concentración Nacional Universitaria, CNU)，阿根廷极右翼恐怖组织，1971 年成立，持右翼庇隆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立场。1973 年起联合“三 A 团”、警察和军方一同实施了超过五十起谋杀案，大肆迫害左翼庇隆派。1976 年政变后解散。——中译者注

方势力四分五裂，名声扫地，不得不退出舞台。工会会员和游击队完全有理由放下武器，坐下来商谈：如何和平过渡到民主。但敌人不可能这么做。敌人会为争夺继承权挑起战斗。显然，年迈的庇隆跟不上七十年代了。他的追随者都明白，庇隆去世前倚重哪一派，哪一派就赢得了未来。

庇隆自己的做法也加剧了权力斗争。1972年10月，他任命胡安·马努埃尔·阿瓦尔·麦地那¹（费尔南多的兄弟，但不是蒙特内罗）担任党的总书记。经过协商，庇隆派达成协议，党内选举产生的职务，三分之一给到底隆主义青年团（蒙特内罗）。这就是说，蒙特内罗在庇隆党内的势力，已经与政治和工会机关旗鼓相当。

埃塞萨的杀戮

庇隆原定于1973年6月2日返回阿根廷，在埃塞萨机场举行大型集会。集会的主要策划者是庇隆的前军事情报安全负责人豪尔赫·奥辛德²及当时的秘书何塞·洛佩斯·雷加。他们组织了三千多人的私人卫队为集会提供安全保障。右翼的大学民族主义中心和民

¹ 胡安·曼努埃尔·阿瓦尔·麦地那 (Juan Manuel Abal Medina, 1945年3月1日——)，早年即参与民族主义运动，但未加入蒙特内罗。1972—1974年任正义党总书记，为庇隆的代理人。1974年遭到“三A团”刺杀未遂，被解除正义党总书记一职，随即与庇隆决裂。1976年政变后躲入墨西哥驻阿根廷大使馆避难。1982年获准流亡墨西哥，定居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² 霍尔赫·曼努埃尔·奥辛德 (Jorge Manuel Osinde, 1912—1986)，1954—1955年任阿根廷陆军情报处负责人。1955年被捕。1958年流亡国外。1973—1974年任体育部副部长。1974—1976年任驻巴拉圭大使。1976年政变后退出政坛。——中译者注

族解放联盟占据了站台，手上还有机关枪。他们显然是要包抄游击队和青年团的侧翼。午后，庇隆即将到达时，蒙特内罗和庇隆武装力量的成员走向站台，遭遇了机枪扫射。随后的两个小时里，埃塞萨机场变成了战场。约有二十人丧生，四百人受伤。庇隆的座机改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西的空军基地降落。

过渡时期的总统坎波拉

坎波拉政府是庇隆的主意。它的任命遵循了老庇隆“平衡党内外左右两翼”的做法¹。坎波拉政府最初的一项行动就是赦免政治犯。畅销报纸《军号》(Clarin)认为，大赦“是消除冲突的恶性循环的起点”²，左翼和知识分子也都拍手叫好。蒙特内罗宣布暂时中止暴力活动，条件是政府要制定革命的纲领。1973年5月，庇隆回国前不久，蒙特内罗当选了六名省长和两名内阁部长(外交部与内政部)，表明他们在庇隆党内拥有相当的权力。然而，后半年，马里奥·菲尔梅尼奇与“赤膊者”对话时说，蒙特内罗不会放弃武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说：“我们能做到这一步，是因为我们有枪、用枪。假如放下了枪，我们就会失去政治地位。在战争中，既有‘战’也有‘和’，我们刚刚经历的就是‘战’，在下一‘战’之前，我们还有几个月的‘和’。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准备。”³

¹ 见波纳索(Bonasso)，《不是总统的总统》(El Presidente que no fue)，讲述的是坎波拉时期。——原注

² 《军号》(Clarin)，1973年5月12日。——原注

³ 这段话发表于1973年9月11日。出自狄特里亚(Di Telia)，《庇隆治下的阿

坎波拉上任后不久，引入了“社会契约”，试图再分配收入，以换取工会复工。庇隆一直在背后指点坎波拉。此时，庇隆需要工会的支持，便向总工会的总书记何塞·鲁奇求助。比起工会左翼，工会右翼更欢迎这项协议，因为右翼想遏制通货膨胀。蒙特内罗和人民革命军表示谴责，指责鲁奇是“人民公敌”。没多久，庇隆当选总统两天后，鲁奇遇刺身亡。

庇隆在 1973 年 7 月 12 日推开了坎波拉。根据临时法律，众议院议长劳尔·拉斯蒂里¹（庇隆秘书何塞·洛佩斯·雷加的女婿）接替总统。新的选举定于九月，庇隆获准参选。庇隆选择了第三任妻子伊莎贝尔为竞选伙伴。他是在巴拿马遇见夜总会舞者伊莎贝尔的（真名是玛利亚·埃斯特拉·马丁内斯）。拉斯蒂里是夜总会经理。

庇隆再任总统

庇隆再次担任总统，一上台就罢免了坎波拉政府任命的大部分人，还有他不信任的官僚。坎波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放上了左翼校长，庇隆用右翼取而代之。庇隆反对左翼的青年团，反对容忍

根廷》（Argentina under Peron），第 55 页。——原注

¹ 劳尔·阿尔贝托·拉斯蒂里（Raúl Alberto Lastiri，1915 年 9 月 11 日——1978 年 12 月 11 日），早年在石油公司工作，后在广播部门任职。1955 年 5—9 月任驻智利大使馆秘书，同年 9 月在庇隆被推翻后回国，拘留了一个月。60 年代秘密恢复与正义党的联系，担任伊莎贝尔·庇隆的私人秘书。1973 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73—1975 年任众议院议长。1973 年 7 月 13 日至 10 月 12 日任临时总统。1976 年在伊莎贝尔·庇隆政权倒台后被捕，1978 年因淋巴瘤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左翼活动的军官，反对左翼团体的支持者。他不再需要左翼团体了，所以没有挽留它们，也没有如他们所想，扮演“革命领袖”。接下来的数月，庇隆驱逐了同情左翼的省领导人，到了 1974 年 2 月，庇隆准备抛弃蒙特内罗及其支持者。惩戒“政治犯罪”的法律通过之后，蒙特内罗的八名代表辞职。他们发表了如下声明：

“庇隆将军常说，自上而下的暴力制造了自下而上的暴力，剥削与从属的关系引起了激烈的反抗活动。当然，由于人民政府的存在，从上而来的暴力是不存在的，因此也不应当有从下而来的暴力。但事实不仅如此，因为人民政府存在内部矛盾。旧政权的官员留下来了，还与庇隆组织中的反动势力结盟了。”¹

1974 年 3 月，警方下场干涉，最后一位左翼省长：科尔多瓦的奥布雷贡·卡诺²下台了。庇隆政府没有触动另一半官员。右翼掌握了政权。

庇隆归国后，重新采用了 1945—1955 年的社团主义政策，包括坎波拉提出的“社会契约”。政府提出协议：保持工资与物价两年不变。协议的范围会逐步扩展到投资、利率、贸易、生产。同时，政府颁布了新的法律，着手重建组合国家（或者说工团主义的国

¹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1974 年 2 月 1 日，第 39 页。——原注

² 里卡多·阿尔曼多·奥布雷贡·卡诺 (Ricardo Armando Obregón Cano, 1917 年 4 月 4 日——2016 年 6 月 19 日)，早年即加入正义党。1951—1954 年任科尔多瓦省参议院议员。1954—1955 年任科尔多瓦省教育、宗教、司法部长。1955 年庇隆下台后被捕，1956 年获释。1973—1974 年任科尔多瓦省省长。1974 年被警方强行解职，流亡墨西哥，在墨西哥参加“真正庇隆主义者党”。1984 年回国，试图领导庇隆主义蒙特内罗运动未果。2016 年去世。——中译者注

家)。几项法律赋予了工会官员一系列特权，包括免于起诉的权利。因此，庇隆的官僚机构对工会运动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大。工会很快开始铲除异己。一些非庇隆派的工会领导人被捕，另一些人则躲藏起来，包括科尔多瓦电力与能源工会的阿古斯丁·何塞·托斯克。政府取缔了非庇隆派工会(例如教师联合会)，搜查了工会办公室。

不出一年的时间，“社会契约”就废除了。它似乎在1973年起了一段时间的作用，但由于油价下跌、世界市场上的进口产品价格提高，以及工人与工商业资本的冲突，它没能发挥作用。1974年3月，罢工卷土重来，工人在工会选举中没有一边倒支持忠诚的庇隆派。工人运动的内部争斗激烈而广泛，压根不受“上边”的控制¹。

同时，工会领袖频频遭到绑架和暗杀。运输工人工会的总书记 在1973年5月遇刺。如上所述，何塞·鲁奇在9月遇刺。大量的工会领袖、高管和老板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人们都认为，这些都是(自称)蒙特内罗、人民革命军的各种小团体干的，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绑架和暗杀是庇隆的顾问(特别是何塞·洛佩斯·雷加)教唆的。

绑架高管显然是游击队干的，一般是为了获取赎金。游击队的目标包括柯达(Kodak)、韦斯特利(Vestey)、波士顿第一国家银行、凡士通(Firestone)、埃索(Esso)，游击队绑架这些公司的高管换取赎金。已知资方支付了一百万美元以上的赎金。赎金资助了革命

¹ 赫林(Jelin)，《1973—76年阿根廷的劳资冲突》(Conflictos laborales en la Argentina, 1973-76)，第29—30页；托雷(Torre)，《1973—76年，政府中的工会》(Los sindicatos en el gobierno, 1973-76)，第87—88页；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427页。——原注

者。有时游击队会撕票，可能是因为绑架者无能，或是“人民法庭”判他们有罪。环境不利于进一步的投资，阿根廷的公司正在大量外流。

第三部分

暴力的加剧



第七章 肮脏战争

胡安·庇隆政府主导的肮脏战争始于 1973 年。它是无法无天的隐秘战争，是暴力的变本加厉。六十年代末以来，阿根廷充斥着暴力，而肮脏战争是暴力的进一步加剧。同时，国家一手组织的右翼恐怖团体也参与其中。

“肮脏战争”一词是军队为打击游击队而创造出来的。受军方或准军事团体损害的人从不承认它，因为官方没有宣布过任何战争，“肮脏战争”只是对“左翼”的阴险恐怖活动¹。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在书中使用了这个词。因为这段时期想必发生了内战。不同派别的恐怖分子相互交火，牵连了无关人员。但这不是势均力敌和明确“站队”的战争。相反，它是有大量武装团体参与的庞大国内冲突。国家显然也参与了恐怖活动，动用了警察、军队、准军事组织杀死潜在的敌人。

各方面的冲突使我们难以理解这一时期：工会官僚内部，即庇隆派与反对派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年轻的游击队及其支持者与工会领袖也在争斗；还有庇隆主义运动中的各派领导人之间的大量内斗。从极左到极右，各方势力都陷入了不断的战斗，而不参与战

¹ 德高望重的人权活动家兼议员阿尔弗雷多·布拉沃（Alfredo Bravo）反对使用“国家恐怖主义”一词，因为没有宣布过什么战争。此外，他认为恐怖主义还没到“国家”的程度，因为（庇隆的）国家否认了准军事团体有官方背景，但军政府就不一样了。他在 1996 年 12 月 29 日的采访中表达了这些观点。——原注

斗的温和派也有许多伤亡。暗杀可能是右翼恐怖分子、庇隆派或游击队所为，也可能是某个团体借用另一个团体的名义借刀杀人。国家指使了一些暗杀，把罪名扣在游击队头上，游击队有时也欣然接受了，因为这能显得他们是无所畏惧的战士。

暗杀队与新闻界的缄默

总工会官员一般都是蒙特内罗暗杀的（人民革命军不太会做这种事），而针对左翼的暗杀，只能是右翼暗杀队干的。假如没有庇隆的指示，这样的右翼暗杀组织不可能存在。庇隆曾经用过刺客，现在为什么不行呢？庇隆从马德里的来信中，用过“黑手”(gorilla)一词，蒙特内罗用这词称呼右翼暗杀队。媒体想问个究竟，但庇隆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当时，左翼的《世界报》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问庇隆是否打算调查法西斯暗杀组织，这位记者和报纸都吃了大亏。她因“无礼”被捕，几个月后遭到绑架，挨了毒打¹。新闻发布会的几天后，这家报纸给查封了。理由是，它非法刊登了人民革命军的发言稿，上面说人民革命军已经收到了人质的赎金。官方声称这家报纸“与非法组织的行动有明显联系”。

¹ 以下出自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434页；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第14—16页，第35页，第42—44页，第46页，第49页，第53—53页，第78页；埃斯科尔维（Aizcorbe），《阿根廷：庇隆神话》（Argentina, the Peronist Myth），第286页；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第156页。——原注

后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在社论中表示，它也受到了政府的压力，因为它发表了人民革命军的谈判记录，还对绑架案（雇主支付了1420万美元后，游击队释放了埃克森美孚子公司的高管）做了评论。一个月后，法院以“违宪”为由，驳回了政府查封《世界报》的决定。但没等他们松一口气，报社就受到了炸弹袭击。

武装人员不仅袭击了左翼媒体，也突袭了科尔多瓦的报纸《内部之声》。据信是警察干的，这家报纸报道了警察干的一桩谋杀案，因此遭到报复。国有广播电台解雇了疑似同情左派的记者。罗萨里奥省的省会受到炸弹威胁。这种事在1973—74年日复一日地上演。庇隆派的左右翼都放过炸弹，威胁过媒体¹。阿根廷新闻业联合会（Argentine Press Federation）关于袭击事件发表声明，“我们对左翼和右翼，对警察越权、缺乏法律保障、新闻的自我审查、记者身处险境，诸如此类的情况提出批评”²。可暴力事件没有减少的迹象。

庇隆的临终声明

庇隆去世的前两个月，为了远离蒙特内罗与青年团，他选择在五月广场举行群众集会。1974年的劳动节举行了盛大的节日庆典。那天，工会率先进入广场，紧接着是高举旗帜的蒙特内罗与青年团。二十多万人的游行队伍中，年轻人高喊着反对伊莎贝尔·庇隆和洛

¹ 详见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原注

² 同上，见1974年3月11日后，第45页。

佩斯·雷加的口号¹。庇隆恼火了，斥责了他的年轻追随者，称他们为“没胡子的”和“蠢货”（这个词比英语中的“蠢货”更重一些），告诉他们“要长大”。政府的新闻机构（Telam）称，这是庇隆对革命分子的“除籍”。庇隆对听众说，政府正从外部殖民势力，以及“比起外部敌人更危险的狡猾内奸”手中拯救阿根廷²。

然后，工会工人站在了以前的盟友对面。整个集会的气氛紧张起来。蒙特内罗显然没料到庇隆会做出如此反应，悻悻退场了。一些当事人说，他们是仓惶逃出来的。但另一些人说，他们是有尊严地离开的。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工会工人、庇隆、游击战士之间，结束了休战。1974年5月，蒙特内罗转入地下（尽管马里奥·菲尔梅尼奇刚开过新闻发布会，宣布次年九月再进入地下的决定）³。

庇隆以前依靠的是工会领袖的一贯支持，为此冒过不少风险。但此时的工人运动已经成为了独立的力量，不能算是庇隆主义的支持者了。七十七岁的庇隆在1974年7月去世后，伊莎贝尔·庇隆把工会列为了主要敌人。

伊莎贝尔与洛佩斯·雷加

胡安·庇隆死后，暴力加剧。伊莎贝尔·庇隆就任总统。她上

¹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1974年5月10日，第142页。——原注

² 狄特里亚（Di Telia），《庇隆治下的阿根廷》（Argentina under Peron）。——原注

³ 见游击队的分析，巴塞特（Baschett）等人，《1973至1976年文件》（Documentos 1973-1976），第630—686页。——原注

任后，面临着军事政变的威胁，也得不到民众支持，只能靠武力来维持统治。内战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不管是支持庇隆还是反对庇隆的派别，都在街头造成了普遍混乱。为了镇压游击队，伊莎贝尔宣布“戒严”，但还没有取缔蒙特内罗，也没有对工会雇用的“保镖”采取法律措施。另一方面，她指示军警清洗这个到处是颠覆分子的国家，她指的“颠覆分子”不仅是游击队，还包括了学生、左翼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工会领袖、记者、自由派律师、政府（与它的刺客）眼中的一切敌人。为三 A 团的受害者家庭辩护的律师也成为了国家镇压的对象。

三 A 团（阿根廷反共联盟）

三 A 团（阿根廷反共联盟）是伊莎贝尔政府的社会福利部门成立（或批准成立）的秘密组织。它是结构松散的右翼组织，成员有警察和军人。三 A 团的行动目标是包括左翼领袖在内的一切疑似为颠覆活动提供支持的人。

三 A 团的领导人何塞·洛佩斯·雷加是深受庇隆信赖的顾问。在五十年代，洛佩斯·雷加是警察下士（corporal），自荐为伊莎贝尔的精神顾问。庇隆从马德里流亡回国时，此人已经从胡安·多明戈与伊莎贝尔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人送外号“巫师”（the Sorcerer）。胡安·庇隆弥留的最后数月，身为总统私人秘书的洛佩斯·雷加已经纠集了三 A 团。在伊莎贝尔政府下，他控制着国家机关，压制了左右两方的政敌。由于三 A 团秘密行动和组织松散的特点，我们很难证实它的存在。有许多组织（成员有军警）都以三 A

团的名义，独立于社会福利部门开展活动。当然了，社会福利部门也不承认它们的活动买了账。

三 A 团暗杀队有一些特征：他们开没有牌照的福特猎鹰（Falcon）；他们杀了人后，总是把尸体留在沟里、路边或烧毁的车里；他们还吹嘘自己的行为。警察接到报案都不管，政府也放任三 A 团的活动。正如奥斯瓦多·巴耶尔¹在下文所说，三 A 团无法无天，会公然宣布要谋杀知名人物，假如在二十四小时内不离开阿根廷，就处决他们。

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汉森²研究三 A 团时认为，庇隆与三 A 团策划的第一场杀戮，就在 1973 年庇隆回国时，原定抵达的埃塞萨机场³。后来在洛佩斯·雷加的主持下，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智利流亡者卡洛斯·普拉茨将军⁴，以及许多前政府官员与工会领

¹ 奥斯瓦多·霍尔赫·巴耶尔（Osvaldo Jorge Bayer，1927 年 2 月 18 日——2018 年 12 月 24 日），阿根廷作家、记者、历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1956 年毕业于汉堡大学。1959—1962 年任新闻协会主席。。1973 年庇隆再次上台后，遭到迫害，1975 年被迫流亡联邦德国，1983 年回国，从事剧本创作，2018 年逝世。——中译者注

² 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汉森（Ignacio Gonzalez Janzen，1945—），阿根廷记者。早年持庇隆主义立场，参加了蒙特内罗，因此被捕，后流亡智利，支持阿连德政府。阿连德政府被颠覆后回国，不久流亡墨西哥和尼加拉瓜，参加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工作。此后回国定居。——中译者注

³ 冈萨雷斯·汉森（Gonzalez Janzen），《三 A 团》（La Triple A），第 107—116 页。——原注

⁴ 卡洛斯·普拉茨·冈萨雷斯（Carlos Prats González，1915 年 2 月 2 日——1974 年 9 月 30 日），1931 年参加智利陆军。1970—1973 年任智利军队总司令。1972—1973 年兼任内政部长。1973 年 8 月 9—23 日兼任国防部长，支持阿连德改革，后被迫辞职。皮诺切特夺权后流亡阿根廷。此处说他是三 A 团的受害者，但他是 1974 年 9 月 30 日在美国和皮诺切特的指令下被中央情报局特工暗杀身亡的。——中译者注

袖都死在了三 A 团手中。有些人收到三 A 团的“匿名”警告后，立马跑路了。

在科尔多瓦，九月接任省长职务的劳尔·拉卡万内¹将军下达了“歼灭”游击队的指令。就算是一直反对游击队、支持镇压的社会民主党²，此时也发表声明，说它十分担忧“警察借与游击队作战的口实，对科尔多瓦人民肆意妄为”³。

镇压左翼的同时，伊莎贝尔政府的部长们也在跟工会领袖内斗。洛伦佐·米盖尔⁴（五金工人工会的总书记和二十六个庇隆派组织的领导人）把经济部长何塞·贝尔·赫尔瓦尔德⁵（他是胡安·庇

¹ 劳尔·奥斯卡·拉卡万内（Raúl Oscar Lacabanne，1914年7月25日——1985年3月7日），早年加入阿根廷空军，晋升为准将。1954—1955年任军事航空学院院长。1955年9月对推翻庇隆政权的军事政变采取了武装抵抗，在政变成功后被捕。1974—1975年任科尔多瓦省省长，大力支持“三A团”系统性地迫害左翼工人。1985年去世。——中译者注

² 社会民主党（El Partido Socialista Democrático, PSD），阿根廷左翼政党，持反庇隆主义立场，1959年由原社会党内左派组成。2002年并入社会党。——中译者注

³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1975年1月17日，第18页。——原注

⁴ 洛伦佐·米格尔（Lorenzo Miguel，1927年3月27日——2002年12月29日），阿根廷工会活动家。1941年进厂做工。1951年参加工会活动。1954—1956年任五金工会卢加诺分会总书记。1956年因参加罢工被军政府解雇。1958—1959年任五金工会司库，1959年被时任总统弗隆迪齐下令逮捕，后获释。1969—2002年任五金工会总书记。1973年庇隆上台后，在工会内部属于“真正庇隆主义”派。1976年在伊莎贝尔·庇隆政权倒台后被捕，1980年获释后继续与军政府对抗。1983年民主化后，在总统选举中支持正义党候选人。1989年支持梅内姆竞选总统。2002年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⁵ 何塞·贝尔·赫尔瓦尔德（Jose Ber Gelbard，1917年4月14日——1977年10月4日），出身于波兰犹太人家庭。30年代移民阿根廷。早年曾参加阿根廷共产党，一度负责掌管党内的财政事务，后创立了总经济联合会（Confederación General Económica, CGE），吸引中小商人和农业生产者加入，与阿图罗·弗隆迪

隆任命的)赶下了台,而前者是洛佩斯·雷加的盟友。赫尔瓦尔德下台没多久,洛佩斯·雷加又与米盖尔争了起来,最后米盖尔也下台了¹。接下的数月,洛佩斯·雷加削弱了其他工会领袖的势力,借着戒严,把许多人投入了监狱。

奥斯卡·巴耶尔

我们在 1974 年拍的电影拿了柏林银熊奖。这部电影叫《巴塔哥尼亚起义》²。我写了四卷书,在 1972 年出版,之后这部讲起义的电影就拍出来了。这部电影让军方很不安。所以在伊莎贝尔·庇隆时代,我上了三 A 团的名单,只得流亡出国。

你想知道自己在不在名单上?很简单。你吃早饭的时候,读读早报,准能读到上面的名单,每份报纸上都有。比方说,洛佩斯·雷加的三 A 团会给报社打电话,“拉巴斯咖啡馆的洗手间有新的死亡名单。”然后,记者们都会赶到拉巴斯咖啡馆的洗手间去,第二天,把它当非常重要的新闻发表出来。

你有二十四小时离开国家。你要是不走,就必死无疑。刚开始,上名单的人不肯离开,压根不当回事。比方说,希尔维奥·弗隆迪

齐、拉努塞等人交好,在庇隆的第一个总统任期负责执行商业政策,后脱离阿根廷共产党。1973—1974 年任经济部长,主张劳资和谐。1976 年在军政府上台后被剥夺国籍,流亡美国。1977 年死于华盛顿。1987 年恢复阿根廷国籍。——中译者注

¹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 1975 年 1 月 31 日, 第 33—34 页。——原注

² 《巴塔哥尼亚起义》(The Patagonian Rebellion)指的是 1921—22 年的那场起义。巴耶尔是影片的历史指导。——原注

齐¹教授不肯离开国家。第二天，他们就去找他，把人关在家里，弄死了。通往埃塞萨机场的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上面打了 110 枪。这是很典型的。尸体一般都丢在去往埃塞萨的路上。这就是恐怖。他们想要制造恐怖，叫人们（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离开这个国家。

我在《观点报》上读到了我的名字。那一天，我把全家人送去了德国，但自己留了下来。这对我很不公平：我刚刚才实现梦想，写了一套历史书，还拍成了电影。突然一下子要我流亡，岂不是要我从头开始？我在 1974 年 10 月上了名单，一直待到了 1975 年 2 月。可以说，我“非法”待了四个月。我躲藏起来了。我跟一些朋友，还有一个西班牙无政府老头住在一起。这老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有个大果园。我没法工作，也不能上银行取钱。钱贬值得越来越快。最后我只好离开阿根廷。1975 年 2 月，我去了德国。

1976 年初，伊莎贝尔·庇隆竞选时，我觉得是时候回去了。1976 年 2 月，我独自一人回国。四周后，魏地拉²发动政变。边境布下了

¹ 希尔维奥·弗隆迪齐 (Silvio Frondizi, 1907 年 1 月 19 日——1974 年 9 月 27 日)，阿图罗·弗隆迪齐的弟弟。50 年代起从事政治活动。1955 年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运动“革命左派普拉西斯运动” (Praxis y Movimiento de Izquierda Revolucionaria, MIR-Praxis)。1959 年支持古巴革命，赴古巴访问，采访了格瓦拉。1965 年加入工人革命党，作为律师积极为政治犯辩护。1972 年创建反帝反独裁阵线 (formación del Frente Antiimperialista y Anti dictatorial, FAA) 担任主席，试图团结马克思主义者和庇隆主义革命派。1974 年遭到“三 A 团”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² 霍尔赫·拉法埃尔·魏地拉 (Jorge Rafael Videla, 1925 年 8 月 2 日——2013 年 5 月 17 日)，1942 年入伍。1973—1975 年任陆军总参谋长。1975 年 7—8 月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75—1978 年任陆军总司令。1976 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伊莎贝尔·庇隆政权，1976—1981 年任临时总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文化专制，推行宗教教育，经济上全面私有化。1981 年因内部矛盾被军方解职。1985 年判处终身监禁，永久开除军籍。1990 年特赦出狱。1998 年因在执政

天罗地网，插翅难逃。这段日子太糟糕了。1976年6月，我到了德国大使馆避难。大使馆的人把我带出国。他们对我很不错。但他们只带走了我一个。只有两个国家（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为身处险境的人们提供庇护。

然后，我在德国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直到1983年10月才回国。那时，我有很多朋友遇害了。官方烧掉了我的书。独裁政权蠢的不行，还在新闻公告里，说什么烧毁书籍是为了上帝、祖国、家庭。他们说这话时，还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图书馆都关门了，特别是大学和某些学院的图书馆。但“阿根廷学术界”的沉默还有别的原因：他们都支持独裁统治，因为他们非常痛恨庇隆主义。

卡特莉娜

1975年，他们杀死希尔维奥·弗隆迪齐后，我们才醒悟过来。当时，军人还没有掌权。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人甄别出来的。许多人受到了威胁，有人是接到了电话，有人是家里挨了炸弹。走运的离开了国家，不然就失踪了。

后来，大家意识到了情况不对，但很多军方特务已经渗透了大学的“校友”组织。在诸如蒙特内罗和人民革命军这些活动家的武装团体中，里面有些人是跟他们想杀死的人一样有罪的罪犯。这太糟糕了。但我们还一无所知。对“变革”的渴望蒙蔽了我们。当年

期间杀害一名德国公民被捕，软禁家中。2008年再次被捕。2010年撤销特赦令后，再次判处终身监禁。2012年加刑50年徒刑。2013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发生了大规模的文化运动，那是阿根廷文化的复兴。电影导演、雕塑家、画家、作家，人人都想要变革。

丹特

庇隆死后（即 1974 年 7 月 1 日起）就开始发生大事，但对我来说，一切都从我的哥哥在 1975 年 5 月遇害开始。当时，我哥二十三岁，我十八岁。他参加了左翼政党，加入了工人革命党，但他不属于武斗派，而是属于反对武装斗争的“红派”，在巴黎的国际组织旗下。他当时在印刷厂工作。那是家小厂，有三四个工人，只为工人革命党印刷读物。武装人员袭击了那里。这些人应该是联邦警察。我觉得他们走了合法程序：警局有这件事的记录。但你搞“武装斗争”还是写这方面的书，他们才不会区分呢。我哥额头中枪，根本就是谋害。在这次袭击中，除了我哥，还死了一个。

维罗妮卡

我在七十年代的经历，在那代人里算典型了吧。早年，我是工业城市罗萨里奥的一个大学政治小组的一员。就算是讨论学习，我们也三句不离政治。我们热衷于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工人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法国和伯克利的学生也影响了我们。对我这样信天主教的来说，第三世界神父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本人也是通过天主教团体，才加入政治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此外，庇隆主义

也（对我们）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我们重建了庇隆主义。因为我们太年轻，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庇隆政府。我们一度相信，庇隆为工人提供了更好的社会条件与尊严。因此，有一部分天主教士和宗教思想是支持庇隆主义的。年轻时，我是庇隆主义者。上大学后，我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团。

我们还很年轻。死了许多人。刚开始我们觉得，想要推翻军政府的话，暴力是必须的。因此，蒙特内罗杀死阿兰布鲁将军的时候，我们没有太意外。我们认为，人民必须清算阿兰布鲁那帮军头。

庇隆归国后，庇隆主义运动的左右两派发生了冲突。他们斥责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我们指责庇隆派的右翼团体和工会官僚是法西斯分子。我们认为庇隆站在左边，但他身边都是法西斯。1974年5月，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的大会上，我们在庇隆主义青年团和蒙特内罗的队列里，两手空空。接着，我们察觉到，枪手占领了四周的建筑。右翼工会的人占领了广场正前方，手持链条和钢棍。局势一触即发。庇隆还没有出现在总统府的阳台上。庇隆现身了，说：“最愚蠢的那些家伙在叫喊……”这说的是我们。这时，工会的伙计抄起了铁链和棍棒，我们都逃走了。我当时很害怕，以为他们会把我们都杀了。

之后的几年，我们一直惶惶不安。我记得一晚，我要去见个朋友。她以前是庇隆主义青年运动的积极分子。我到她家时，家里没人。我看到不远处有辆车，车里有人。那是一辆绿色的猎鹰，是军队和警察开的型号。我很慌张，就逃跑了。没有人跟着我。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总是担心过去的事把我们拖下水。到了晚上，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也会用沉重的家具抵住门，防止武装人员闯入。

人称“三A团”的右翼准军事部队开始散发名单。谁不离开这个国家就会死。我丈夫是精神病学家，他开始惶恐不安。我们无法从流言中得出真相。有些精神病学家也在名单上面。我们搬到一间公寓，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过起了地下生活。我们烧了很多书，把剩下的书都埋了。我们是在厨房的水槽中烧的。因为我们担心，他们——刚开始是武装团伙，政变后就是军队——会在晚上闯进家门。我肯定，对于我那一代人来说，那些年非常艰苦。后来，我们也没能回到原来的生活。它仍然阴魂不散。

罗密欧

1973年，我进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哲学与文学学院，当时我十七岁。我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内的小镇。那是在革命年代，学校里有强烈的政治气氛。开学前，我得上大学完成入学手续，参加入学考试，所以说，我第一次到校，是在1972年11月。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有一场集会。讲台上又有两名人民革命军的成员。他们吹嘘烧了前任院长的房子，展示了周末烧房子的证据。当时有三个人：一个讲话者，还有两个武装的护卫。他们说，这位院长有罪，因为他告发了几个学生。这令我印象深刻。但我不得不说，就算在只有两万居民的我老家，这也是很普遍的风气。

我在次年三月入学。可以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上课的内容也跟学术不沾边：我们上课讲埃内斯托·格瓦拉和毛泽东。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我才十七岁，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而且正在改变世界。我有个“同志”，他是第三世界运动的天主教神父。我

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格瓦拉主义者的会议，但最后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团。整个 1973 年，我都以同情者身份参加会议，没有投入太多活动。但 1974 年开始，我变得积极起来。首先，这意味着在大学里“搞政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管理委员会由学生和教师组成。在大学选举中，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提案。我们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我们和院长建立了亲密的联系。这位院长跟蒙特内罗走得很近。我们的任务是在大学环境中实践我们的政治思想。我们也把自己看作政治军事组织的一份子。

我们青年团里有个标志——塔夸拉棒，就是一根长矛。“塔夸拉矛”是上个世纪的蒙特内罗使用的东西。这根长矛与机关枪交叉着。这个标志就是“庇隆归来”（Perón Vuelve）中的“V”。这是蒙特内罗的标志，下面有一句：“要么庇隆，要么死亡”。

我家里人都反对庇隆。而我是这么想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庇隆主义能够帮助平民百姓。我们成天谈论国家大事。在我印象里，我跟镇上的人关系是这样的：我完全没法跟他们谈列宁或托洛茨基，因为他们的政治水平太低。可你不管在哪儿，都可以跟人谈庇隆主义，都能争取实现另一种庇隆主义。

所以说，我们也读左翼理论，但是读得非常肤浅。我读了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列宁的《怎么办》。庇隆左派写了很多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左派。在阿根廷，后者指的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他们（庇隆左派）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了解阿根廷的普通百姓。我觉得，我们当中也没多少人了解。我相信社会变革和正义的抽象概念。我相信人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读埃内斯

托·卡尔德纳尔¹关于古巴的通俗著作，要比我读马克思或列宁的书更好理解。我和同志们是原教旨主义者，大家都是这样。我们都是为了“爱与正义”。归属感难能可贵，我们感觉自己正在创造阿根廷的历史。

1974年，我们不再参与大学政治活动，以便转向一般性的政治宣传。1974年后，局势对于蒙特内罗的活动非常危险。我们庇隆主义青年团大学分部（JUP）的另一位哲学与文学学院的同志在张贴蒙特内罗的布告时，给三A团打死了。早在1974年末，在墙上涂标语就成了很危险的工作。这项工作要和团队里的前辈一起做，他们会拿武器保护涂鸦的人。涂一面墙需要十个人，要观察到每个街角。1974—75年，蒙特内罗转入地下后，行动就更加危险了。当时，我们这些团体暴露在外，情况非常复杂。

我参加了法学院的活动，院里的蒙特内罗宣布转入地下。当晚，我们离开法学院时，一些汽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虽然没有标记，但我们认出是警车。我们朝它们发出嘘声。当时学校已经处在暴力的氛围下。一个人拿枪从车上下来。没有人中枪。我猜他往天上放枪。我们吓坏了，都跑了起来。

奥斯卡·伊万尼谢维奇²部长主持的教育部干预了我们学校。他

¹ 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马丁内斯（Ernesto Cardenal Martínez，1925年1月20日——2020年3月1日），尼加拉瓜诗人、作家、翻译家、雕塑家和神学家。1954年参加了反对索摩查政权的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1959年成为神父。1965年回国，参加解放神学运动。70年代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合作，反对索摩查政权。尼加拉瓜革命胜利后，1979—1987年任文化部长。1984年被剥夺教籍。1994年因反对奥尔特加而脱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2006年支持桑地诺革新运动。2019年恢复教籍。2020年逝世。——中译者注

² 奥斯卡·伊万尼谢维奇（Oscar Ivánissevich，1895年8月5日——1976年6月5

是右翼庇隆分子。于是我们非法占领了教学楼。学生武装起来，保卫大楼。教学楼前不断有车经过。它们都是经过伪装的警车，车上的人全副武装，威胁着我们。

为了让你明白那个时代的风气，再告诉你一件事吧。大学青年团的积极分子支持哲学与文学学院的院长阿德里亚纳·普伊格罗斯¹。有一天，我们坐在海报桌旁，一个男人径直走过来，问院长的办公室在哪里。我就带他去见院长。他离开时，告诉我，他是从科尔多瓦来的律师，专门为政治犯辩护。第二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三A团杀死了这位律师。可能就在我们离开大楼那会儿，发生了命案。

当时的生活非常紧张。回过头来看，想不到我儿子都十七岁大了。我们在这个岁数卷入了一些事件，本来都要没命了。其实，我也是因为一场意外才活下来的。我有条腿必须动手术。我退出了活动。我试着与朋友保持联系，但暴力活动非常激烈，我们失联了。我的骨头动了手术，得回老家，休养两三个月。我回来后，给朋友们，还有哲学与文学学院的大学青年团成员打电话。电话另一头战栗不安。有人死了。我打给一位女性朋友。她丈夫是组织里的一员，在海军受过军事训练，是个神枪手。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他们得四处奔波，不停换地方。他们一直在逃亡。由于她丈夫的活动，他们甚至还要把屋子让给组织里一位受伤的成员避难。他

日），阿根廷外科医生，足球运动员。1907年起参与足球运动。1917年退役，转而担任执业医师。1946—1948年任驻美国大使。1946—1949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校长。1949—1950年、1974—1975年任教育部长。1976年逝世。——中译者注

¹ 阿德里亚纳·比克多利亚·普伊格罗斯（Adriana Victoria Puiggrós，1941年9月12日——），阿根廷教育家。1974年起在大学任教。2011—2013年任伟大阵线（El Frente Grande）主席。2019—2020年任教育部副部长。——中译者注

们还说得在家里搭“野战医院”。他们有一个很小的女儿。当时他们非常害怕。似乎这种险情还要继续下去。接着我问：“我能做些什么？”朋友们告诉我，我必须做些事情，但一定要格外小心。他们叫我和打入监狱的一个团队建立联系。

最后，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和他们失去了联系。我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一天，我很害怕。我想跟他们谈谈，但给家里打电话，联系不上人。我就打到另一个人的单位，他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我吓得挂了电话，立马回了老家。如果我担起更多责任，那会更危险。但我幸免于难了……

至于这一切为何发生，我做过很多探讨。我没有非常深刻的答案，但我相信，即使在我那个小镇上，大家都感到社会变革是可能的。我们这一代人都相信，我们能建立社会主义的政府。这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在军队里有一部分庇隆主义左翼的同情者，运动中有天主教会的神父。还有同情我们理想的中小企业家。所以，我们相信改变是可以实现的。

人民革命军 图库曼与蒙特钦戈洛

庇隆上台后，人民革命军也继续跟军队及其密探作战。但在1975年下半年，人民革命军在袭击军火库时屡屡受挫。1975年，他们进入图库曼作战，付出了惨重代价¹。图库曼是阿根廷最落后贫

¹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435页。——原注

穷的省份。长期以来，图库曼的经济基础都是大型甘蔗种植园，仍然保持着封建的组织形式，把工人当作农奴对待，让他们生活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蔗糖业在六十年代经历了严重的低迷，各种经济多样化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失业与贫困非常普遍。根据格瓦拉关于农村游击战的教导，人民革命军尝试在 1975 年“拿下”图库曼。

关于游击队在图库曼的兵力，众说纷纭。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en）估计他们人数不超过一百四十人，又缺少训练和装备¹。军方声称至少有六百人，我们采访的一位军官坚持认为有两千人。当然，提高数字是为了给“战争”造势，加尔铁里²将军还声称游击队是“对国家的严重威胁”。安德森坚持认为，军方早已渗透了游击队，高层掌握了游击队的真实人数。而人民革命军和蒙特内罗一样，都在宣传中夸大了自己的实力。

1975 年 2 月 5 日，伊莎贝尔·庇隆签署了一项秘密法令，即“独立行动”³，授权军队采取一切行动歼灭图库曼省的颠覆分子。陆军

¹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 125—126 页。——原注

² 莱奥波尔多·弗尔图纳托·加尔铁里·卡斯特利（Leopoldo Fortunato Galtieri Castelli，1926 年 7 月 15 日——2003 年 1 月 12 日），1943 年入伍。1975—1976 年任陆军工程兵团司令，1976 年参加了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1976—1979 年任罗萨里奥第二军团司令。1979—1982 年任陆军总司令。1981—1982 年接替魏地拉出任临时总统，延续了魏地拉的政策。1982 年 4 月 2 日发动马岛战争，企图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被英军击溃，6 月 17 日引咎辞职。1986 年被捕，判处 12 年徒刑。1990 年特赦出狱。2002 年再次被捕。2003 年死于家中。——中译者注

³ 独立行动（El Operativo Independencia），指阿根廷陆军和空军按照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的“歼灭命令”（Decretos de aniquilamiento）所采取的行动，目的是在图库曼省压制或歼灭颠覆活动，对把“游击中心”定在图库曼山区的人民革命军、蒙特内罗、各政党、工会、学生与宗教团体，以及一般民众活动进行镇压。期

总参谋长豪尔赫·魏地拉将军不仅派出了军队，还派出军队的宣传专家告知民众，这条法令是宪制政府制订的¹。在装甲车和武装直升机的协助下，一千五百名军人与同数目的警察部署在了图库曼省。国家控制了新闻，当地陷入了孤立，公众无法得知双方实力上的差距。宣传口却说这是平等的战争。

图库曼军队的指挥官比拉斯²将军指示了“虚假宣传”，他说一旦军队迫使游击队在市区交战，就能够“避免执法部队在 1975 年受到任何损失，以代价最小的手段作战”³。根据军队情报部门后来的统计结果，包括后勤人员、传话者、同情者在内，游击队活动的整个十八个月里，人数只有二百二十六人。假如比拉斯的夸夸其谈是真的，那么在图库曼发生的一切肯定不是战争，最多是打垮了一群根本不知道何谓游击战的青年。

军队在图库曼学到了重要的经验，在当地进行了实验，后来运用到了“进程”中。比拉斯认为，“视道德与荣誉为军事生涯重中之重的军事学院的教义与常规战争的法律……不再适用。”⁴后来，

间，军队在图库曼省实施了戒严，进行了一系列血腥战斗，制造了大量的失踪，建立了秘密集中营。——中译者注

¹ 安德森 (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 130 页。——原注

² 阿克德尔·爱德瓜多·比拉斯(Acdel Edgardo Vilas，1925 年 6 月 20 日——2010 年 7 月 23 日)，1943 年入伍。1975 年任第五旅旅长兼独立行动指挥，大肆镇压人民革命军等游击队。1976 年 2—12 月任第五集团军副司令兼参谋长，1976 年 12 月退役。1988 年被捕。1989 年获特赦出狱。2004 年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2010 年去世——中译者注

³ 安德森 (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 131—132 页，第 135 页编号 27，摘自《公报》(La Gaceta) 中阿克德尔·比拉斯 (Acdel Vilas) 写的一篇小册子，现归安德森所有。——原注

⁴ 同上，第 134 页，编号 37。——原注

军人穿着便服，开着无牌照的汽车，用非法手段抓捕疑似的游击队。军队抓走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关在小学校舍。严刑拷打算是家常便饭。这也许是军队开设的第一家集中营，虽然其它的监狱——比如拉佩拉和罗森监狱（根据幸存者的说法）——在 1976 年政变之前，就已经很像集中营了。

蒙特钦戈洛

人民革命军的绝唱在 1975 年圣诞节前夕。当时，约有一百五十名人民革命军战士试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几英里的工业小镇蒙特钦戈洛（Monte Chingolo）夺取军火库。一名内部的卧底把消息泄露给了情报部门，军队迅速包围了游击队。击败游击队后，军方又进行了老一套的宣传。按照魏地拉将军的说法，人民革命军有八十人伤亡，但宣传部门又把人数“增加”到了两百多。人民革命军承认有四十五人伤亡。比起夸张的说法，美国军方 1976 年 1 月 31 日正式报告中的评价更值得关注。报告指出，人民革命军“组织与作战方面的重大缺陷表明，他们缺乏军事能力”¹。尽管如此，军队还是为了与已经战败的敌人作战，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

萨内塔

¹ 同上，第 163 页，引用了《军号》（Clarín）的一篇报告，1976 年 1 月 31 日。——原注

1970年，我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我还是人民革命军的积极分子。我加入了人民革命军的“融工”计划，在工厂里工作。我们首先要使工人政治化，然后取得政治权力。工厂里的工会是五金工人工会。人民革命军是武装组织，而我们的政治组织，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组织是工人革命党。这些组织我都参加了。一开始，我加入了格瓦拉青年团，在团里加入了工人革命党，又加入了人民革命军。我中学就参加活动了。

我们相信我们能夺取政权。我们渴望这个国家大变样。他们给我们读了很多材料。我们也经常进行政治讨论。我在武装团体中，进行了锻炼和生存训练……就是军事训练，我也说不清。我当时很年轻，1970年才十九岁。他们教我怎么用步枪，怎么用手榴弹。我是在阿根廷学的。我不是什么响当当的游击队员，只是普通士兵。

我和别人一样，来自阿根廷的资产阶级家庭。它不是最低层的社会阶级，而是指导革命的受过教育的阶层。1976年，我去了图库曼，那是在1975年12月到1976年3月。当时，我参与了武装行动，袭击银行与外国公司，筹集资金。我们认为，应该让有钱人、掌权者，承担革命的费用。你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我们当时做的事。我不记得细节了——嗯，我们没有杀人。我们是战士，我们的任务是为战争“筹钱”。我们做了很多讨论。我们参与所有这些行动之后，也在不断地进行政治讨论。

另外，其它游击组织说我们很“纯”。因为我们有强烈的信念与坚定的思想。这个“纯”打着引号，因为我们在某些地方犯了错误。我们需要反思，做自我批评。否则就太过自负了，那可不行。有些人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可我不这么认为。

我们会抢劫。行动中可能造成伤亡，但没必要这么做。我们袭击过工厂、本土或跨国公司，什么都有。这是为了弄资金或武器。武器是从海外，从法国或美国买的，但我没法告诉你更多信息，因为说实话，我本人从来没指挥过什么。我倒是嫁给了一位指挥员。

我在战斗的尾声去了图库曼。那是在政变发生前，魏地拉控制着军队。当地在交战，死了不少人。那是最血腥、最残忍的时期。我丈夫也死在了那里。1976年3月18日，他在图库曼的一场战斗中阵亡。那段时期非常混乱。当时，我们的领导者告诉我们，这就是“最后一战”了。我在1975年12月动身前往图库曼时，仍然坚信这是值得的。但政变后不久，我在1976年3月30日离开了这个国家。我的家人和朋友在大赦国际的帮助下，把我弄了出来。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出国，从巴西辗转到了墨西哥。

我必须要去图库曼，因为到了1975年，武装团体基本上都被摧毁了。所以说，这是一场拼死的行动。我们联合了各个武装团体——人民革命军与蒙特内罗——搞了几次行动。蒙特内罗一个领导人都不剩了。非常艰难。我也讲不清楚。那是个非常混乱的时期，我们也太年轻了。我认为1975年去图库曼是自杀之旅。一些人指责我们有“彼得潘”情节：表现得像孩子，想永远当孩子。说实话，我们为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尽量不带“傲慢”¹地看待过去，但我们曾相信，由于这个国家的现状，我们必须战斗。我们的错误是对敌人估计不足。我们从

¹ “傲慢”一词是一本阿根廷的畅销书在标题中对蒙特内罗的形容，这本书叫《蒙特内罗：武装的傲慢》(Montoneros: La soberbia armada)，巴勃罗·朱萨尼 (Pablo Giussani)。——原注

没想过，他们会做到那种程度，堪比种族灭绝。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这一点。有些同志跟我说过，“你都怀孕了，要是他们把你关进监狱，会怎么样？他们会抓住你的头发，扇你耳光……”现在，听说有五百个孩子失踪了，军队抢走了他们。你大概能体会到我们当时有多单纯。我不对我们做过的事感到后悔，但我不会再使用这些方法了。所以说，今天的我走上了另外的道路。但在我们的对话中，我不会逃避那个时代真正的样子。

塔尼亞

我加入了一个号召武装斗争的左翼组织，也就是工人革命党。我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时，只有十九、二十岁。我从没参加过武装行动，只加入了学生知识分子小组，为这些行动提供支持，负责宣传工作。我们非常关心第三世界和那里的运动。我们认为，社会分为两大阵营，而统治者是很强大的，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推翻压迫者。

那时，我的丈夫是个更好理论的积极分子，也比我更积极。有一回，经过贝尔格拉诺（Belgrano）居民区时——也就是富人居住区——我很天真地说，“当革命来临时，我们要摧毁这些房子，住在这里的人要换个法子生活了。”我的意思是，在人们生活的地方，个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总和构成了整个社会。然后他回答我，“不行，革命需要这些房子。”意思是，城市中的所有东西都要保持原样。革命会带来思想和经济上的变化，改变掌权者，但不会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那时，我对革命的想法，就是要创造，或是通过斗争创造新的社会。不光是改变掌权者，还要（说起来，非常的理想主义）

建立平等的社会。

我的同志们认为，革命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不是彻底改变社会。革命领袖占领了富人的房子，就好像是拿回自己的东西，像是报复一样。富人要去死，或者离开国家。要么财产充公后，派去做苦工。他的想法是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由工人阶级领导。这是乌托邦。在过渡阶段里，资产阶级的组织会继续存在，只是掌权者换人了：无产阶级将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将掌握在无产者的手中，而且是在先锋队的手中。我们满怀热情，对此进行了非常乌托邦的讨论。

政变前，三 A 团杀死了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熟知的人与崇拜的教授。我丈夫的妹夫关到了 1980 或 1981 年。他很幸运，因为他们闯进家门抓人时，他用的是假名。家里也没搜出多少东西。他们不知道他是游击队。他们判他有罪，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只是因为在家里发现了书和小册子。他用的是假身份证件，但最后暴露了。他母亲去看望他，不小心用了他的真名。但他是因为别的原因坐牢的，所以刑期没有延长。军事政变后，监狱里情况更糟了，法律程序都不走了。他只是政治犯，仅此而已。没有别的罪证。假如不是政变的话，他早出狱了，然后很可能就失踪了。所以他非常幸运。

新闻审查

庇隆严厉压制了新闻界。伊莎贝尔政府颁布的新《治安法》更是加剧了言论管控。若是报纸、广播、电视台以任何形式冒犯了政府，或是未经政府同意，报道了暗杀和监禁事件，就要成为炸弹的

目标或者关门大吉。在伊莎贝尔就职典礼后的几天内，反庇隆的保守派报纸《新闻报》（庇隆在第一次任期内曾接管这家报纸）在多个省的办公室遭遇枪击¹。几周后，蒙特内罗报纸的编辑米盖尔·波纳索²的家遭到炸弹袭击³。许多新闻工作者失去工作、关入大牢，或者遭到不明人士暗杀⁴。1974年9月颁布的新《治安法》有一条规定，“发布或公开”游击队等非法组织行动的作者、出版商、电视台导演均会“判处有期徒刑二至五年”⁵。

自从《治安法》颁布后，暴力进一步加剧。新闻记者和摄像师受到殴打，一些人遭到谋杀，死者包括1975年5月为《观点报》写稿的商业记者。当年，《观点报》、《新闻报》、《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一起，不顾审查制度，依然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

城市地下战斗

1975年年中，三A团赢得了城市的地下战斗。至于蒙特内罗

¹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见1974年7月6日后，第59页。——原注

² 米格尔·路易斯·波纳索（Miguel Luis Bonasso, 1940年5月17日——），阿根廷记者。1969年加入蒙特内罗。1972—1973年任正义解放阵线发言人。2003年加入民主革命党（Partido de la Revolución Democrática, PRD）。2003—2011年任众议院议员。2011年退休。——中译者注

³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见1974年8月23日后，第60页。——原注

⁴ 详见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原注

⁵ 同上，见1974年9月30日后，第63页。——原注

游击队及报纸称为“颠覆分子”的各种游击队，他们的伤亡要比三 A 团和已知的右翼团体的伤亡增长快得多。1974 年和 1975 年初，在游击队与三 A 团或军警的直接冲突中，当局估计有 137 名游击队死亡，另有 109 名军警死亡。根据 1975 年 9 月 12 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1974 年 7 月 1 日至 1975 年 9 月 12 日间，“左翼”损失了 248 人，另有 131 人（主要是“左翼”）死于枪战；同一时期，“右翼分子”损失了 41 人，警察 75 人，军人 34 人（三者共计 150 人），还有商人 19 人；此外，有 35 人无法确定政治倾向，另有 122 具尸体无法查明身份。根据《新闻报》的说法，从 1973 年 5 月到 1976 年 3 月，官方估计共有 1358 人死于恐怖袭击，其中 677 人为平民，445 人为“颠覆分子”，其余是军事人员和警察。

蒙特内罗是尚有军事能力的唯一革命组织，其它组织的残部都加入了它。1975 年间，三 A 团和军方重创了蒙特内罗。1975 年 12 月，陆军司令提到“恐怖组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¹。

到了 1976 年，游击队彻底放弃了有组织的持续战斗，顶多搞几次零星的袭击。1976 年军事政变后，豪尔赫·魏地拉总统（见第九章）声称已经摧毁了九成的颠覆团体。即便如此，他继续穷追猛打²。1977 年，游击队承认损失了两千人，从此一蹶不振³。

¹ 福隆塔里尼（Frontalini）和卡亚蒂（Caiati），《肮脏战争的神话》（El mito de la guerra sucia），第 66 页。——原注

² 见派恩—柏林（Pion-Berlin），《国家恐怖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State Terror），第 5 页，引自重印的《28 号审判日记》（El diario del juicio no28），1985 年 12 月，第 529—532 页——原注

³ 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第 38 页。——原注

经济衰退

经济并不是在伊莎贝尔·庇隆治下突然恶化的。过去的二十年里，军政府始终苦于经济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把它归咎于进口替代政策；军政府时期就开始实行这项政策，1946—1955年间，胡安·庇隆政府也在全力推行它。关于经济衰退的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对于长期的经济下滑趋势（从五十年代末至整个六十年代）还没有人进行过探讨。到了七十年代初，阿根廷国外投资已经开始减少。甚至在六十年代，汽车行业就大大减少了投资。庇隆在1974年7月去世，伊莎贝尔接手了这个烂摊子之后，经济就开始快速下滑。

1976年政变的前两周，庇隆政府的经济部长就要求实行一百八十天的紧急状态，描述局势为阿根廷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说，人均生产总值下降了；出口减少，国际收支赤字上升了；上一年度几乎没有一分钱的国外投资；同期的生活成本上涨了335%；恶性通货膨胀爆发，比索大幅贬值；普遍失业。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严格管控工资和物价¹。此事一经宣布，便在全国各地引发了罢工和暴力事件。

工会成为了反对伊莎贝尔·庇隆和她的社会福利部长何塞·洛佩斯·雷加的中心。1975年7月，总工会在五月广场举行了一场群众示威，接着是全国罢工。它与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事件一样，都是总工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引起的，这些斗争又与洛佩斯·雷加试图控制工会的阴谋纠缠在一起。政府大肆搜捕当事人，根据戒严法，逮

¹ 经济部长埃米利奥·蒙德利（Emilio Mondelli）向全国的讲话，1976年3月6日，全文见当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原注

捕是不需要法院的命令和监督的。最终，工会斗得洛佩斯·雷加下了台¹。但那时，整个社会都不再支持政府了，总统成了光杆司令。工会得到了真空中的权力，但也为时不长。政变到来了。

¹ 1975年7月，洛佩斯·雷加开始流亡后，政府指控他卷款潜逃。之后几个月里，报纸上有的说他已经死了，有的说他病倒了，还有的说他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生活。——原注

第八章 非法监禁

长期以来，国家都拥有无需提出具体指控，也无需经过司法程序，就能长期关押公民的权力。一项长期有效的法律允许政府在“戒严”下（例如伊莎贝尔·庇隆和她几位前任宣布的戒严），能够无视法律规定的人身保护权。这项程序称为“国家执行权力”（PEN）。囚犯本应享有“选择权”，能在流亡和监狱之间进行选择，但很多人表示，他们根本选不了。宪法禁止虐待囚犯，但每个依据“国家执行权力”逮捕的人都自称受过（身心上的）折磨。判决没有给定期限，这些折磨不知道何时结束，自己又何时能重获（如果有的话）自由。有些人在监狱里待了八九年，许多人死于受伤、酷刑、精神错乱或绝望。即使亲属能够找到囚犯所在的监狱，也不知道囚犯何时会转移，而他们又总是挪地方。

监禁的罪名千奇百怪。正如一位父亲（下述受访者）所说，一个既不是游击队战士也不是工会会员的年轻人，不过是在征兵时犹豫了片刻，就要坐几年牢。一些游击队成员关了进去，但庇隆派组织中的无关者也入狱了。大量囚犯是工会领袖或工会的重要成员。伊莎贝尔·庇隆时期，反对派工会入狱的人要比传统工会更多。但政变后，差别消失了。那时，各派的工会活动家和打成“颠覆分子”的人一样，纷纷进了监狱，但更多的人“失踪”了。

后来，那些在政变之前就坐牢的人，要比政变发生时是自由身的人，更有机会幸存下来。前提是他们能承受住不断的虐待。

阿尔贝托·皮奇尼尼

1976 年，我三十四岁，已经进了监狱。我从十九岁起，就在当五金工人。我二十多岁时，昂加尼亞独裁时期，在五金工人工会里活动。在圣塔菲(Santa Fe)省的孔斯蒂图西翁镇(Villa Constitucion)，我们加入了人称“战斗性工会”的工会运动，领导人有奥古斯丁·托斯克、雷内·萨拉曼卡¹、拉伊蒙多·昂加罗。他们反抗独裁，为民主而斗争，同时也反对当时的工会官僚。奥古斯多·范多尔是庇隆官僚工会的头子。洛伦佐·米盖尔是五金工会的全国总书记。而庇隆党有强大的（工会）影响力。但不是所有的庇隆派都一样。有些人在争取民主，但庇隆工会大都是官僚的，而不是民主的。坎波拉下台后，右翼势力掌权。庇隆死后，官方工会和三 A 团开始迫害我们工会。

1974 年底，我们赢得了孔斯蒂图西翁镇的工会选举。这是总工会内部的选举，一共有七千名工人投票。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五金工会和总工会的领导人。工会只有一个中心，就是总工会，但我们在里面的反对派。当我们在 1974 年赢得选举时，其它工会就指责

¹ 雷内·萨拉曼卡 (Rene Salamanca, 1940—1976)，早年当五金工人。1963 年加入五金工会 (La Unión Obrera Metalúrgica, UOM)，持庇隆主义立场，不久相继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列毛主义。1968 年加入革命共产党

(El Partido Comunista Revolucionario, PCR)。1972—1976 年任运输工会总书记，积极领导工会运动。1974 年支持伊莎贝尔·庇隆上台，不久后被迫转入地下。1976 年 3 月 24 日政变后被捕，关押在拉佩拉 (La Perla) 秘密监狱，随后神秘失踪。大多数人认为他在受刑后遇害了。——中译者注

我们和游击队组织有关系。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反对的是总工会的经济政策。我们也反对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的政策，但我们和游击队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政府借口我们在孔斯蒂图西翁镇和整个地区策划阴谋，企图颠覆针对伊莎贝尔·庇隆政府，便在巴拉纳（Parana）河沿岸的工业带，即圣塔菲省内，从坎帕纳斯到圣洛伦佐之间约三百公里的地区，组织了镇压行动。军警和右翼庇隆派民团一起参与了镇压，大概有五六百人。镇压的中心是在孔斯蒂图西翁镇。我是工会的总书记，代表着工会里的七千名工人。他们逮捕了所有工会领导人、厂内委员会和代表，总共三百人。作为回应，工人发起了罢工，让这片地区的冶金业瘫痪了两个月。

后来，三A团杀死了我们的一些同事。我们受到镇压和迫害。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杀死了二十五、六名我们的同事。他们都是团伙行动的。一开始，他们像警察一样，在白天行动。他们会带走工人。第二天，大家找到人的时候，人都死了。后来他们晚上出没，一两天后才能找到死者。所以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匪帮上门时，工人就用武器捍卫自己，这就导致了绑架。那些都是非法活动。但在伊莎贝尔·庇隆时期，这片地区遭受了最严厉的镇压。镇压从1975年3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政变后的一年。在那个阶段，脏活都是三A团干的，他们基本上都是警察。后来我们知道，军方早就完全掌握了暗杀活动的情报。起初，军队只是参与右翼组织的活动，到了1976年，他们就公开掌权了。

1975年3月20日，我进了监狱，在里面待了五年半。他们来到我家，指控我策划阴谋，企图颠覆伊莎贝尔·庇隆政府。他们依据“国家执行权力”把我和同事关进监狱，所以这是合法程序，但

从未进行过审判，也从未把案件交给法官。坐牢的第一年，直到宪制政府倒台，我关在南方的罗森监狱。条件很不好受，但他们还是遵守着一些规定。1976年政变后，他们就开始搞灭绝、酷刑、殴打。

政变之前，他们没用电击枪折磨过我们。他们打我。某些日子里，他们只留给我很少的食物，把我关在小囚室里，也就是“惩罚”犯人的地牢。囚室里没有床和衣服，只有一点点吃的。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他们把囚犯关在小囚室里，关在惩罚用的地牢里，再把衣服拿走，不给人吃东西。犯人会在地牢里待十天、十五天甚至三十天，然后就病倒了。这一切都是折磨。它不会杀死我们，但让我们变得虚弱。有时，他们会问一些问题，目的是在心理上恐吓我们。许多同伴生了病，有些人自杀了，还有人在不断的迫害下，终于精神崩溃。这里没有任何规矩，谁床铺得不好，也要受到惩罚。我们始终生活在高压下。同样，他们也用禁止家人探望来惩罚我们。本来每四十五天里，有五天能有一小时的探亲时间。来南方可不容易，所以（犯人的）家人往往每年只来一次。他们选择在那一天惩罚我们，这样一来，我们就见不到家人了。于是两年过去了，我们也没见到家人一眼。我坐牢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我有两个儿子，入狱前一年，我和妻子离婚了。我的新任妻子是厂里的代表，与我一起进了监狱。她关了四个月，在伊莎贝尔·庇隆执政时放出来了。1977年，军警特宪杀害了她。将近一年后，我才得知此事。但我想，哪里不对头，因为她可能去看了我妹妹。后来，妹妹就不再给我秘密传信了，因为狱方把信件都查出来了。所以我就想，妻子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才得到准信。孩子们与我的前妻在一起。我已经四年没有见到他们了。

我一共关了五年半，然后是六到八个月的家内软禁。我必须待

在孔斯蒂图西翁镇，不能参加任何工会或政治活动，未经警察允许不得离开城市。1980年，他们放了我，因为国际上有个争取释放工会囚犯的大型援助项目。1980年6月，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OIT）要求释放所有的工会囚犯，在日内瓦国际的压力以及许多意大利工会（我是意大利来的），还有许多西班牙、法国、挪威、加拿大工会的要求下，他们释放了所有的工会囚犯。

弗朗西斯科·古铁雷斯

从1975年末一直到1982年，我在监狱里待了七年零四个月。然后，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拘禁在自己家中。我曾是基尔梅斯（Quilmes，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工厂的五金工会领导人。我的许多朋友在军政府时期都在监狱里。工厂的六百名工人中，有七十名进了监狱。除了依据“国家执行权力”逮捕的人以外，他们还无缘无故带走了二十名同事。另外还有四人失踪。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政府动用《反颠覆活动法》对付工会运动、工人组织、群众组织，特别是武装组织。他们没有放我离开国内，因为担心我进行反阿根廷活动，也就是工会层面上的产业游击战。1975年，他们逮捕了最有战斗性的工会活动家，也就是他们眼里的左翼分子，包括庇隆主义者。但是从1976年开始，他们无差别地逮捕工人。

我上班的公司有美国资本的背景。工会领导人全都被捕后，厂里又解雇了许多人。他们取消了工人的社会福利，降低了工资。他们还提高了产量，减少了工休时间。他们有一套对付工会的镇压制度。军队会到厂里盘查每个人。他们会翻出工人的私人物品，逐一

检查。他们会检查储物柜中的衣物，翻找非法物品、武器什么的。谁表示抗议或者不想接受检查，就坐牢去吧。

所有囚犯都吃了电击枪的苦头。他们经常折磨我们，有时是想套出情报，有时则是毫无缘由的。他们总问，谁是“带头”的。比如说，如果有同事要求涨工资，或者想在厂里换岗，或者要求改善条件……他们也会带走别人，问这事是谁提出来的，谁带的头？或者，假如有人跟厂外的政治组织有联系，那么都有谁？许多时候，他们还会上工会会员的家，把东西都抢走。他们带走了电视机、戒指、手表、耳环，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我同事和他们家人可以告诉你，有时候，带小孩的女人会把钱和珠宝放在婴儿的尿布里，以防被抢走。他们每周会上我同事的家，把所有东西都抢走，借口是他们在找游击队和颠覆分子，工厂里的某某是游击队，就把人带走了，还抢了他的所有东西。

他们还打了一些同事的妻子。他们打孩子，说是在找他们的父亲，打孩子是为了让孩子说出父亲的下落。我厂里的同事，一些工人，躲去了北方的米西奥内斯（Misiones），因为军方正在找他们。宪制政府时期，他们就成了“颠覆分子”。许多人去了北方或其它省份，军警也去那里寻找他们。这种情况持续了七年左右。那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斗争。

从 1976 年开始，一切形式的工会活动都禁止了。因此，如果你和公司里的十个人聚在一起，讨论某样工作条件，他们就说这是工会活动，就有足够的理由逮捕你了。在我的公司里，1976 年底左右，下午轮班的工人在更衣室里换衣服。一些年轻人正在聊天、开玩笑。然后，工厂的管理来到更衣室，要求工人加班。一些人开始

讨论要不要留下加班，说如果给加班费就留下吧。接着一位二十二岁左右的工人决定走人，因为他不想加班。三言两语中，有人提到了军政府的电视广告。广告中说，员工应该工作、守纪律、遵守法律、尊重政府和军队。这是好工人。还有个懒家伙，他不喜欢工作，也不尊重国家。一个叫胡安，另一个叫佩德罗。政府一直说，我们都要像胡安那样努力工作。所以，这个不想加班的年轻人对另一个人说，“你是胡安，因为你留下来干活，我是佩德罗，因为我不想加班。”那天半夜，一队军人上他们家，把两人都绑架了。其中一人至今下落不明，另一个人在集中营关了六个月后，放出来了。他没有做任何事，但受了酷讯，最后蒙着眼睛在另一个城市释放了。

我要跟你讲讲哈拉米略（Jaramillo）的故事。他是我的同事。当时，他大概四十岁，是个聪明能干的工人，他在军政府时期担任过工会代表。在工厂外面，他还兼职当音乐老师。他是智利人。阿根廷和智利有边界问题。有些工人——我想他们是军人假扮的工人——找了他的麻烦，让他离开工厂，叫他必须辞职，因为他是颠覆分子。此外，还因为他是智利人。但哈拉米略不想离开。他不想辞职，因为他没有参与过任何颠覆活动。而且他有五个孩子，一个身患残疾，所以他需要钱。

一天，公司经理打电话对他说，“你必须离开，要不然他们会来绑架你，你要失踪了。”第二天，他找经理结钱走人，经理说，“好的，中午过来领取你的薪水。写份辞职报告。”中午，他交完报告后，来到工厂。他们给了他一张支票，要在银行兑现。他走出银行时，遭到了绑架。钱也被人拿走了。他再也没有出现过，钱也下落不明。公司经理和军队有联系。三年后，人们在墓地的一个普通坟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这些事情真没法讲。哈拉米略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很早就一起共事。到今天，这些不公正的事都叫我非常生气。我曾是工会活动者。我从未否认过这一点。我一生都在搞政治。之前的军政府时期，我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团，为庇隆归来而战。所以……好吧，我在监狱里待了七年，因为我的活动。因为我是政治犯，是工会活动者。但哈拉米略不是。

就算我是工会活动者，他们也没有理由折磨我，或是把我关进监狱。我没有犯罪。但在当时的阿根廷，当工会领导人就是在犯罪。军方不允许工人讲话。许多公司高管拍手叫好，因为他们想要压得工人阶级抬不起头。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的工人运动如此强大。为民主斗争付出最多的是工人。所以说，大多数的失踪者和死者都是年轻工人。

厂里的工人建立了生活的社区。每当工人拿到工资，军队就会闯进我们的社区，进入人家打劫。最后，人们再也受不了了，妇女儿童上了军事基地，叫他们不要再来抢东西。许多人不得不卖掉房子，但没人想在1976—77年接盘，因为谁都知道军队会来抢劫。

军方会把犯人分类。我们在工会里做过什么职务，是不是庇隆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独立分子、蒙特内罗、人民革命军战士什么的，都要登记下来。他们会把工会领导人和左翼游击队组织的成员带到一个叫“死亡间”的特别室。他们当我们的面，在那儿杀死了十一名囚犯。他们用了“飞行法则”。警卫说要把犯人带去另一个监狱，路上就射杀了他们，然后声称，他们是在企图逃跑时中枪身亡的。

他们会把我们关在地牢里，地方很小，不给衣服、光线、食物。

后来，他们让我们在凌晨三点洗冷水澡，拿橡皮棍打我们，打到晕过去。他们经常找茬把人带到地牢去。他们经常殴打我，打得我全身发黑。这七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不想套取情报，只是为了折磨而折磨。他们说，我们有罪，我们是社会不接纳的恐怖分子。

我们当中有些人在某些监狱人员的配合下，找到了向司法系统申诉的方法。这些监狱与我们合作，换取我们的情报。1977年，我们四位同事遇害后，监狱里来了几个法官。我们提出上诉。法官找了我，因为我也提了上诉。然后我们告诉了法官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求落实《日内瓦公约》关于囚犯的规定。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法官……他们离开后，军人带我去了地牢，问我都对法官胡说了什么。

胡安·胡斯托与胡安·吉列尔莫

胡安·胡斯托：1971年，我二十三岁，刚从拉普拉塔国立大学数学系毕业。我在1969年开始做助教，毕业后在学院里留任。我成为了学院工会的积极分子。1974年9月发生了大事。庇隆死后大约三十天，教育部长换了人，伊万尼谢维奇当上了教育部长。五十年代，伊万尼谢维奇就是庇隆政府的教育部门首脑。现在，历史学家证明了他是个纳粹法西斯分子。庇隆在非常广泛的庇隆主义运动中，把新纳粹或法西斯分子纳入了教育体系里。好吧，大多数大学都换了校长。从那时起，意识形态迫害就开始了。本来我每年签一次合同，然后他们什么也不说，就不给我签合同。学校开除了我。

第二年，也就是1975年，我去了科尔多瓦南部的里奥夸尔托（Rio Cuarto），竞聘国立大学的教职。我凭借学历获得了助理教授

的职位。我和妻子带着一岁的孩子搬去了那里。我在那所大学工作到 1976 年 2 月 2 日。

一天，我回到家，警察也在。我的家人都在场。他们有逮捕令，因为多年前，他们指控我是游击队的思想组织者。他们是联邦警察，这也是合法逮捕。他们依据“国家执行权力”逮捕了我。我先是关在里奥夸尔托，又转移到了科尔多瓦市。接着，我到塞拉奇卡 (Sierra Chica) 监狱待了两年，又到罗森监狱待了四五年。最后的几个月里，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德沃托 (Devoto) 监狱。直到 1983 年 12 月，我才放出来。

这项惩罚非常残酷。比方说，被捕的第一天，我就受了五天的酷刑。我对法官也是这么说的。我的手刚受过电刑，连字都签不了，可是那里的医生却说我完全健康。他们会问：“谁是你的同志，谁是你的朋友？他们把武器藏在哪里？”我无可奉告，但他们不信。他们还会问：“你为什么读这些书？”所以，他们的出发点始终都是“你是不肯坦白的游击队”。

1976—1980 年很不好过。他们允许 (美洲国家组织的) 人权委员会探视监狱后，情况才慢慢好起来。他们整天盯着你。这取决于你呆的监狱。比方说，在塞拉奇卡监狱，我们每天关在单间牢房里二十三个小时。另外一小时，他们把我们带到院子里散步。你在院子里不能踢足球，不能做任何运动。你们必须三人一组，不停走路。在罗森监狱里，我们成天待在一个房间，有个狱警听我们讲话。他们一直在监视你，给你施加很大的压力。监狱的管理是高度军事化的。他们总要找茬，把我们关进惩戒室里。他们不允许读自由派作者写的书，更不要提左派的了。在家人探视期间，你不能触碰，也无法拥抱你的家人。

政变发生前一个月，我就入狱了，已经落到了司法系统的手上。所以我没有失踪。但有些人关在监狱里，也逃不了“失踪”的命运。我认为，关于这一点，应该让我的朋友胡安·吉列尔莫也谈谈。因为我们的经历差不多。

胡安·吉列尔莫：七十年代，我住在科连特斯省。1975年，我二十五岁，我在查科省的安赫拉（Angela）被捕。我出身在庇隆派家庭，父亲一直是庇隆派活动家。他是铁路工人，一直参与所谓的庇隆主义抵抗运动。我十五岁时，父亲把我介绍给了一些庇隆主义青年团的年轻人。它不是后来和蒙特内罗有关系的那个青年团，而是更早的某个组织。我参加了本地的青年运动的所有活动。那是当时阿根廷的政治生活。

1969年，我高中毕业，开始在科连特斯学习法律。我二十岁结婚了，有了一个儿子，所以我只好放弃学业。当时，我是科连特斯的庇隆主义青年团的领导者。1973年恢复民主后，坎波拉当上总统。庇隆派在科连特斯取得了胜利，而我成为了省政府的青年代表。这样过了一年，到了1974年，这场巨大运动中的矛盾加剧了。庇隆之死，加快了胡安·胡斯托告诉你的事情。伊莎贝尔·庇隆宣布戒严，下令逮捕各派政治领袖，尤其是庇隆左派。因此，在1975年4月，我被逮捕时，就在这么个过程中。

是的，胡安·胡斯托说的没错，当时很多人已经失踪了、受刑了，公开的政治暗杀不少。那么政变后，又有什么不同呢？国家制定了“人口失踪”计划，他们有专门的镇压策略。对独裁当局来说，一切只是开始。当时发生的一切，只是后续计划的序幕。到了1975年，白色恐怖才真正开始。对囚犯来说，政变当局显然有一套明确

的方针，旨在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毁革命者、打垮革命者。

1975年，我第一次入狱时，受到了酷刑。后来审讯的性质变了。在监狱里，政治犯受到了“有方法的”电击、殴打和各种羞辱。而我呢，是在查科省跟朋友一起被捕的，其中有代表查科农民的农业协会总书记。我们受了一个半月的酷刑。然后，我们就“失踪”了，人间蒸发了。谁都知道我们被捕了，但家人问我们的消息时，警察说，“不，他们不在这里。”

当时是这样的。我住在科里连特，而不是查科，我的兄弟是工人领袖，他参加了庇隆主义青年协会，他们正在寻找他。我帮他逃走了。他们毁了他的房子、抢了他的东西，还威胁他的女儿和老婆，连这样都找不到他，他们就上我家，但我为了避风头，跑去了查科。他们在安赫拉镇抓住了我。我想在那儿等风头过去，然后再回科连特斯。我是在一家酒吧……一家餐厅里落难的。他们跟着我到了那儿，然后等着抓我。

他们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城市，又从那里，把我带去了查科的省会雷西斯坦西亚（Resistencia），到了那儿，所有人都受到了最残忍的酷刑。这都是非法的。这里没有律师，没有法律。顺便提一句，查科当地有个臭名昭著的拷问者、警察长官兼特务头子。他的姓是托马斯，人送外号“爱尔兰人”，因为他的红头发看起来像爱尔兰人。一群警察跟在他屁股后头。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我们受了沉重的酷刑。此后的牢狱岁月里，我们受着漫长的折磨：孤立和单间牢房，与家人分离，殴打与恐惧。

胡安·胡斯托：比方说，他们会把二十多人从监狱带去科尔多

瓦集中营，说是魏地拉将军访问科尔多瓦。他们会说，要是魏地拉将军身上发生了什么，就把我们全杀了。因此，我们生活在恐惧中，还感觉监狱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胡安·吉列尔莫：我们坐牢的七八年都是这样。我们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你觉得，只要你被捕了，很好，一切都结束了，只要安分关几天，就万事大吉了。不！那还要更糟。犯人一直受着精神上的折磨。

我要说的是，很少有人知道（坐牢的折磨），因为我想（虽然我不清楚细节，可能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大家都心照不宣，不让国人知道这些。他们隐瞒了（我也觉得不应该把事儿传开）许多朋友的自杀。他们再也受不了了，上吊了，割腕自杀了。在罗森监狱里，我有个朋友，他们把他带出房间审讯。他跟军人待上四五个小时后，回来了，看上去十分疲惫。他的精神崩溃了，当晚就自杀了。

我在拉普拉塔监狱还有个朋友，他弟弟隔着玻璃探访他。监狱看守突然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缩短了探访时间，说：“探访结束了，你兄弟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得说，多年的牢狱生涯中，他还深爱着他那个十四、十五岁的弟弟。他们把人带到洞里去，不是回到单间牢房，而是到“洞”里去。他很绝望，担心弟弟会发生什么事。他发疯了。过了十天，他们把人送回牢房后，他自杀了。

不知道我们是怎么保持理智的。所以说，我们那一代人里，现在还活跃着的，只剩下很少的、非常少的人。这是很好理解的。许多出狱的人病倒了。我想，如果你明白我意思的话，是因为他们的

良知和信念扭曲了。

胡安·胡斯托：监狱想毁掉囚犯。但是，我们组织了起来，营造了一种氛围，建立了必要的人际交往，帮助我们抵抗下去。这就是大家能熬过来的原因。团结、理解、情感需求，以及我们的共同抵抗，这些使我们摆脱了疯狂。我相信，他们从来没能摧毁过这些。我们成功地架起了一堵墙、一堵看不见的墙，在我们和狱卒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

至于我们的家人……好吧，我母亲今天还没恢复过来。当时，她的精神越来越沮丧，其它毛病也严重了。情况很糟，因为我父母都很穷，没法来看望我。而且无论如何……好吧，我父亲理解不了（这些事），他从不相信军队和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是暴行的始作俑者。他不能理解我的情况。他不能相信压迫者的所作所为，也从不相信警察动了酷刑。

我妻子和我同时被捕。她把儿子交给了友人照顾。她在监狱里待了六年，度过了艰难的时光。最后的一个月里，她差点丧命。出去后，我们就分手了。我们没法在一起，因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已经毁了她。我们孩子现在二十三岁了，没什么好说的，朋友的祖母抚养了他。我们很感激她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了他。

胡安·吉列尔莫：啊，我的故事就很难说了。我父母一直在和其他家庭合作，尽力帮助囚犯。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我所有的朋友而言，他们都是最棒的父母和朋友。美洲国家组织的代表团到这儿的那天，我父亲中风了。父亲想找他们谈谈，但在这次访问中，

他中风了。不过他现在康复了。父亲一直都在我身边，给我力量，两年前他刚去世。

之前说过，我结婚了，我入狱时有两个孩子。男孩四岁，女孩两岁。我被捕后的 1976 年年中，我的妻子也被捕了，因为她与被捕者的家人合作。我们陷入了孤立，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军人夺权后，他们就把监狱隔离了，不允许任何人探访，也不允许通信。我们只有从新来的犯人那里，才能得到外面的消息。好吧，在她被捕大约两个月后，一些新来的犯人告诉我，军人杀死了我的妻子。我悲痛极了。我得打听个清楚。第二天，其他犯人告诉我，她没有死，而是跟压迫者合作了。监狱里的八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当时是 1978 年。出于对孩子们的尊重，我不想公开太多细节。我说了这些，是为了让你更全面了解我们曾经历的事……嗯，有首歌里唱道，“历史是在温火中铸成的”，而人们知道风是老师。现在我在当老师，我对未来是乐观的。有朝一日，我们将建立清廉的、没有腐败的阿根廷政府，关心教育、修复体制，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

何塞·费德里科·维斯特坎普夫妇

维斯特坎普先生：我们受到了镇压的直接影响。我们儿子因为政治原因，被“国家执行权力”抓走了。那是在 1975 年，他二十三岁。他在监狱里待了七年半。他没上过法庭，只是戴上了颠覆分子的帽子。这是一项口袋罪。当时，他在读经济学，上大一。当然，他和许多的年轻人一样，在大学和什么地方参加了示威。阿根廷乱了好多年了。

我立即请求了人身保护令，试着把我儿子弄出国。宪法规定，未经审判就依据“国家执行权力”把人带走时，应该放人，或者允许他出国。不管怎样，还是要上法庭的。但两三个月过去了，他们没有这么做。那是庇隆夫人执政的宪制时期，但军队已经控制了政府。甚至当时负责这些事的内政部长，我去见他的时候，他也亲口对我说，“我无能为力，我现在只能听军队的了。”然后他辞职了，因为他也受不了了。

我尽快去看儿子。他消失了两天半。最后，我们在一所监狱里找到了儿子。这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警察监狱。他受到了虐待，脸还肿着……我妻子看到他的样子后吓坏了。

早些时候，儿子告诉我，“爸，我不去服兵役，因为我知道，很多跟我一样的男生都在军营里被绑架了，我不想碰到这种事。”我们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并不相信。我们跟儿子说，“不，这不会是真的。”于是，我试着找一些军人问问。我通过亲戚，见到了一位上校。我见了上校，对他说，“我儿子说，他不想服兵役。他觉得，他会和其他人一样遭到绑架。”上校说，“不，不，这不可能，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让那孩子来见我。”

那次见面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桌上有个盒子，看起来是本书，其实是个盒子。我就问他，“那本书是什么？”他说，“啊，如果有应征兵来见我，我有时会到对门的办公室，打开盒子，取出里面的枪，”他说，这是因为他害怕一些士兵。

我跟儿子说，上校向我保证过，他不会出什么事的，他应该去服兵役。他就去了。可是我们还是很担心，我们叫他一有什么事，立刻告诉我们。报道那天，他没回来。我们接到一个电话说，他那

天报道后，在街上被绑架了。我们现在知道，他在兵营附近等公车时，就发现有人跟踪。不知道跟踪者是乘车还是徒步，搞不清楚。他赶紧跑向公车，但跟踪者也加快速度。上车前，他们拦下了公车，抓走了他。他们叫他“颠覆分子”、“刺客”什么的。

维斯特坎普夫人：人们聚在圣塔菲大街。警察见状赶人，大喊：“不，他是个颠覆分子，颠覆分子，把他带走。”然后打了他一顿，把他带走了。

维斯特坎普先生：所以我们马上要求人身保护令。

维斯特坎普夫人：是的。我丈夫有个亲戚，当时在政府里当记者。他告诉我们，三天后就会知道我儿子去了哪里。我们同时得到了法官的消息，说我们儿子被逮捕了。

维斯特坎普先生：这可能是因为他不想参军，但我们说服了他，还得到了军方的保证。还可能是因为，我儿子在三个月前拘留了三四天。我记得，他被捕的时候，我们正打算去美国。学院里的教授让我儿子和另一名同学帮忙搬家。到地方，警察把所有人都抓走了，说他们参与非法结社。

维斯特坎普夫人：他们说，因为教授是左派，就和许多教授一样。当时，我们提出人身保护令。教授的律师让我们别担心，我儿子肯定马上出来。所以我们并不担心，按计划去了加利福尼亚。我

们回来时，法官赦免了他们，他也放出来了。也许他已经被盯上了。

维斯特坎普先生：我立即打电话给上校，要求他给出解释，因为他向我保证……然后他说，“你儿子在军营里很好，但我怕你儿子的一些朋友打死我。”

维斯特坎普夫人：通过我丈夫的叔叔，我们找到了儿子关押的地方，于是立即赶过去，给他带了些吃的。到地方时，我们说，我们知道他在这里，他们不能阻止我们进去。他们允许我们透过窗户看看古斯塔沃。我吓坏了，问他：“古斯塔沃，你怎么了？”他的眼睛肿成黑色的了，但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他没有镜子。

后来，他们把他带到了德沃托监狱。根据宪法第二十三条，戒严时，他们可以监禁公民，把人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除非他决定出国。他到了德沃托，我们获准见他之后，他马上告诉我们，他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他们把他扔到一个许多人来回经过的地方，蒙住了他的眼睛，还给他戴上手铐。每个经过的人都会朝他撒尿，朝他吐口水，踢他。

维斯特坎普先生：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刚刚提出了人身保护令。我们能这么做，因为他是依据“国家执行权力”批捕的。但我们得到了法官的判决——我不记得是在 1975 年底还是在 1976 年初了——允许他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就等他出国。但是……很快发生了军事政变，军方撤了那名法官，换了一位法官上去。拖了一阵子，儿子仍然没有放出来。他们没有让他出国。和我谈话的内政部长不再

是部长了，部长也换人了。

维斯特坎普夫人：新的法官说，虽然裁决下来了，但无法执行，因为他要行使“国家执行权力”第二十三条。又过了七年半。“国家执行权力”还是不让我儿子出国。囚犯不能去乌拉圭、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他们不能去那些国家。于是“政治犯”孩子的父母开始向当局情愿，因为他们说，犯人出国需要当局的批准。因此，我们找上了各国大使馆。我们联系上的国家有荷兰、比利时、瑞典。许多国家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于是“政治犯”的父母开始解释，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描述了子女受到了何种待遇，以及为什么要让他们离开国家。这是军方犯下的大错误，因为大使馆把这些事告知了他们的政府。即便如此，每当我们以为清除了一个障碍，就会出现另一个障碍。我们的上诉总是缺些什么……

维斯特坎普先生：1975年12月，我们在家里成立了“被关押与失踪者亲属组织”。当月晚些时候，我们成立了常设人权大会¹。我们的组织不大，只有十到十五人。那是在政变前不久。那会儿，军队已经在管事了。伊莎贝尔是个傀儡……

我们的常设人权大会开始秘密活动，最初在律师事务所，后来在教堂里。律师告诉我们，“行吧，今天可以来，但以后别再来了。”所以我们去了教堂。我们去了好多回，然后神父对我们说，“请不要再来了。”我们只能秘密会面了。这个团体里的父母在寻找子女

¹ 常设人权大会（La Asamblea Permanente por los Derechos Humanos, APDH），阿根廷非政府组织，1975年成立。——中译者注

时，都在监狱碰过面，或是在争取释放孩子时，在政府见过面。在这些会面期间，我们发现有人失踪了。我们以前不知道这回事。我们在报纸上读过，比方说，有人在街上被枪杀或者处决，不是吗？……我们相信报纸上写的。然后我们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切都是假象。其实人都失踪了。他们搞处决、失踪，要么把人带去海军工程学校集中营受审。

维斯特坎普夫人：他们把囚犯从一个监狱带到另一个监狱，路上还用了所谓的“飞行法则”。他们说这些犯人想要逃跑，然后射杀他们。他们转移犯人时，也没有告诉我们。父母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去看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又去了哪里。

维斯特坎普先生：我们的儿子又去了阿苏尔（Azul）的塞拉奇卡监狱，还有拉普拉塔、罗森、德沃托镇的其它监狱。最后，他到了罗森监狱。

维斯特坎普夫人：犯人转移时，都要蒙住眼睛。下巴后，犯人都要绑在一起，强制跑步。奔跑的时候，两边的宪兵手持钢棍抽打他们。而后犯人要赤身裸体，露天洗干净，再进牢房。十五天后，他们允许我们探望儿子。

维斯特坎普先生：我们尽量（向亲属）提供帮助。我们给囚犯亲属提供了全方位的协助。比方说，我们组织了许多囚犯的父母兄弟来看他们。所以我们要弄一些钱。我们管瑞典要钱。瑞典把钱给

了这些家庭。我们属于大赦国际，所以也管它要钱。大赦国际有时会寄来一些钱，帮助亲属前往监狱，或者帮助有急需的人购置衣食。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维斯特坎普夫人：跟你讲讲吧，当我们第一次在塞拉奇卡看见古斯塔沃的时候，亲属们来看望子女，排了一长条队。

维斯特坎普先生：那里有辆坦克朝着我们，那可是坦克。他们还用机关枪威吓大伙。

维斯特坎普夫人：是的，太可怕了。亲属们一个接一个进去。他们必须出示证件，满足一系列要求，才能进去。有些人来自很远的地方，两千公里远的北方。他们是非常卑微、非常非常贫穷的人，为了看看孩子，把家底都砸上了。有人带着生病的婴儿，有人没钱住旅店。还有些人进不去，因为他们没有证明。他们都花光了积蓄和借来的钱，只能无功而返。

一条长队慢慢前进。我们在队伍最后，跟一个朋友一起排队。朋友的儿子也在里面。然后叫到了我们，他们说，“你们不能进去。”一开始不放我们进去。然后我们朋友（曾经是准将）说，“我要和监狱的长官谈谈，为什么维斯特坎普先生和我不能进去。”过了一个多小时，警卫回来了，说：“好，准将可以进去，但你不行。”准将说：“我不是作为军人来到这里的。维斯特坎普先生不进的话，我也不进去。”警卫又去请示了，这才放我们进去。

我们在教堂见面。我们在一边，囚犯在另一边。两边都隔着祈

祷椅。我们能碰到囚犯，握住他们的手。我们问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眼睛黑了。我们说，警卫本来不让我们进来，他们说，“因为我们身上有伤，他们想让我们签署声明，说这些伤是事故搞的，但我们不签。”他们还说，“警卫喜欢找茬。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这样用铅笔。明天，他们会为此惩罚我们，叫我们用另一种方式使用。一切都是把我们带去惩戒室的借口。”这与获取情报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遭到了殴打。真是毫无人性。

维斯特坎普先生：……直到 1982 年，马岛战争后，他们才放我们儿子出来。

第九章 “进程”

1976 年的军事政变并不是意外。当时的政府已经瘫痪。政变前一周，报纸（已变得更加大胆）报道了四十起凶杀案，就法律与秩序的缺失写了社论。《国家报》为新成立的“联邦党”¹印刷了巨幅广告，直言政府“已经死了”，死于“自身的错误”。报上还说：“每一天，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见到游击活动，但拿枪的游击队并不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唯一敌人。阻碍‘进程’的也不是坐办公室的人。现在的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游击队。滥用制度的政府将成为人民肩膀上真正的苏联。”²

政变前不久，军方认为总司令“同情”政府，把总司令换了。新的司令是豪尔赫·拉法尔·魏地拉将军。军队不加掩饰地执掌大权，要求总统“休假”。当她拒绝休假超过五周，政府与军队的关系陷入僵局时，1976 年 3 月 24 日的军事政变打破了局面。

¹ 联邦党（Partido Federal），阿根廷中右翼政党，1973 年 12 月 8 日成立，企图继承 1966—1972 年期间的阿根廷军政府的政治遗产。1974—1976 年积极反对伊莎贝尔·庇隆政权的政策，但未参加 1976 年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1986 年支持阿方辛的社会政策。2005 年以后逐渐倒向庇隆主义。——中译者注

² 《生产是自由》，《国家报》（La Nacion），1976 年 3 月 22 日。——原注
“真正的苏联”指全面压迫社会的政府。

人民对政变的支持

最近，历史修正主义派审查了纳粹的活动。他们不愿承认种族灭绝是党卫军的疯狂暴行或海因里希·希姆莱及其同僚的发明。丹尼尔·戈德哈根¹辩称，种族灭绝代表了大多数德国人民的意愿，也是数百年来激烈的反犹主义的高潮²。他的观点引起的争论未决（特别是德国的反犹情绪是否比欧洲其它地区要强，以及一些证据的真实性方面的问题），而他坚持认为，没有民众的允许是不会发生这样的社会灾难的。

允许不一定意味着同谋。它可以是接受和服从，而不必积极参与。在阿根廷，大部分人都是“允许”，一些人则是同谋。阿根廷没有德国那么长久的种族仇恨。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充当了思想上的同谋。阿根廷人经历了庇隆时期的暴力冲突和七十年代初的混乱。这些年的事件留下了沉重的伤痛，人们渴求和平与秩序。军事政变承诺结束暴力和混乱，正是这一承诺——而不是别的——最早使人们接受了军事统治。

军方承诺了法律和秩序，回到“家庭观念”，重建“基督教道德和价值观”。民众欢迎这些承诺，就连日后的严厉批评家——还有不久后不得不流亡海外，或者后面几年，胆战心惊地过着地下生活的人——都为军事政变拍手叫好。阿根廷人民习惯了军政府，希

¹ 丹尼尔·约纳·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1959年6月30日——），美国犹太裔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中译者注

² 戈德哈根（Goldhagen），《希特勒的自愿行凶者》（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原注

望回到熟悉的模式下。尽管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反对这一模式，但他们的长辈、工会中的许多人、教会高层以及工商业部门更想要军事统治和稳定，而不是七十年代初的混乱生活。

一些人（尤其是富人）积极响应政变是出于强烈的反庇隆情绪。正如历史学家和电影制片人奥斯卡·巴耶尔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所说，许多知识分子痛恨庇隆主义，宁可承受国家的压迫，也要摆脱这一阿根廷的顽疾。他们认为，只要军队镇压庇隆派，自己就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虽然蒙特内罗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又缺少工人阶级和穷人的支持，他们的领导人在军方重新上台时，也曾为之欢欣鼓舞。他们认为，现在既然确定了真正的敌人，那么民众将会在斗争中跟随他们。

除了公开支持政变的人之外，还有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只是保持沉默，低下头，目光呆滞地说他们别无选择。对于一些人来说，政治事件是无视他们的意志进行的。他们继续过日子，仿佛与世无争。他们也许认为，要活命必须得关掉眼睛、耳朵、智慧，要把同情心保持得“非常低”。这不是他们的战斗，他们也不想卷进去。许多中产家庭的父母否认了十几岁的孩子失踪的消息。他们说：“这是左翼分子的宣传”。即使他们的孩子受到酷刑，他们也无法想象“当局”能够肆意妄为。一些家庭与遭绑架的孩子断绝了关系，另一些人则是（正如我们一位受“国家执行权力”逮捕的受访者所说）拒绝相信自己的孩子遭受酷刑的证据。要他们承认自己信任的军队在搞国家恐怖主义，对他们来说，过于沉重了。

根据一份委内瑞拉在 1976 年 4 月 5 日的报告，阿根廷富人为政变拍手叫好。在一场富农、中年商人、艺术家、公众人物和“闲散人士”的晚宴上，《(委内瑞拉) 日报》引述了一位与会者的话：

“我所有的朋友都在讲同样的事。我们衷心希望这届政府取得成功。”这不是无意义的闲聊。1974—1982 年间，阿根廷富人把高达八百二十五亿美元的巨款转移到了国外银行，逃了阿根廷的税¹。根据庇隆政府的数据，个人所得税的未缴税率在 1973—1975 年高达 70%。逃税是七十年代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恐怖主义组织

政变后，阿根廷公民开始遭受严刑拷打、残忍杀害、系统性“失踪”。“进程”早已计划好，刑室也准备就绪。施刑人员受过了业务培训，在政变后的几分钟里，便展开了工作。总司令魏地拉将军是七个孩子的父亲，据说还是个虔诚的教徒。军政府的其他成员是陆军总司令罗贝托·比奥拉²中将，代表海军的海军上将埃米利奥·马塞拉³，代表空军的奥兰多·阿戈斯蒂¹准将。三军看起来和平共处。

¹ 约翰·格兰迪（John Grundy），《阿根廷，不要为了大银行哭泣》，见《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加拿大多伦多），1987 年 3 月 7 日。——原注

² 罗贝托·爱德华多·比奥拉·普雷韦迪尼（Roberto Eduardo Viola Prevedini，1924 年 10 月 13 日——1994 年 9 月 30 日），1942 年入伍。1973—1975 年任陆军参谋长。1975 年 5—8 月任第二军团司令。1975—1978 年任陆军总参谋长。1976 年参与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1978—1979 年任陆军总司令。1981 年 3—11 月任临时总统，在任期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人运动高涨，11 月被迫辞职。1982 年马岛战争战败后，参与了推翻加尔铁里的政变。1983 年被捕。1985 年判处 17 年徒刑。1990 年特赦出狱。1994 年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³ 埃米利奥·爱德华多·马塞拉（Emilio Eduardo Massera，1925 年 10 月 19 日——2010 年 11 月 8 日），1942 年入伍。1973—1978 年任海军司令。1974 年晋升为海军上将。1976 年参与了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1978 年退役。1985 年被捕，判处终身监禁。1990 年特赦出狱。1998 年再次被捕。2002 年因脑血管瘤破

正如当时报纸所说，军政府似乎是由“认真对待自身公民身份的职业官僚”组成的。

之前的政变中，陆军都是主角，其它部队支持陆军，或是密谋造它的反。但是，这次的执政需要各方势力积极参与。马赛拉海军上将明确表示，海军的支持取决于地位上的平等，即海军要有政府三分之一的职务。国家划分成了治安区（按照军区划分），各治安区又划分为单元，负责各自辖区内的安全。这非但没有消除军队的派阀之争，反而加剧了它们。从一开始，司令们就相互敌视，拥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魏地拉当上总统后，陆军很快控制了战略要地和大多数的公职。人们认为三位军政府成员是“自由派”，但读者读完这段历史就会明白，这个词意味着支持军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此外，它还意味着对庇隆主义的强烈仇恨。

在镇压中最积极的是第三军司令卢西亚诺·梅南德斯²。梅内德斯是公认的法西斯分子。此人负责一大片地区，包括十个省、科尔

裂导致痴呆症，丧失行为能力，免于入狱。2010年去世。——中译者注

¹ 奥兰多·拉蒙·阿戈斯蒂（Orlando Ramón Agosti，1924年8月22日——1997年10月6日），1944年入伍。1951年参与了推翻庇隆政权的政变，政变失败后，流亡乌拉圭。1955年回国。1975—1979年任空军司令，假装拥护庇隆主义，但私下反对庇隆，主张与美国合作，1976年参与了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但未积极参与军政府的镇压活动。1979年退役。1983年判处四年半，后减为三年零九个月。1989年获释。1997年去世。——中译者注

² 卢西亚诺·本哈明·梅南德斯（Luciano Benjamín Menéndez，1927年6月19日——2018年2月27日），早年入伍。1975年9月19—20日任科尔多瓦省总督。1976年政变后持强硬立场，主张实行军政府永久独裁。1979年企图推翻魏地拉政权，政变失败后监禁三个月。2009年、2010年、2014年、2016年四次判处终身监禁。2018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多瓦市，以及科尔多瓦郊区臭名昭著的拉佩拉集中营。其他军头基本都是法西斯分子，包括第一军司令卡洛斯·苏亚雷斯·马松¹将军、海军中将鲁本·查莫罗²（海军工程学院的负责人，后来学校改建为集中营）、内政部长阿尔瓦诺·阿尔金德古伊³将军、拉普拉塔警察局长拉蒙·坎普斯⁴上校（此人因积极参与镇压和谋杀臭名昭著）。

尽管阿根廷在历史上一直跟邻国纠纷不断，但智利情报部门（DINA）在1975年启动了一项支持阿根廷军政府的计划。按照“秃

¹ 卡洛斯·吉列尔莫·苏亚雷斯·马松（Carlos Guillermo Suárez Mason，1924年1月2日——2005年6月21日），1944年入伍。1951年发动政变，企图推翻庇隆，政变失败后流亡乌拉圭。1955年回国。此后曾担任驻厄瓜多尔武官。1975—1979年任第一军团司令，积极参与“肮脏战争”。1979年主持阿根廷青年足球俱乐部，参与了将迭戈·马拉多纳运作到博卡青年、马德里竞技、巴塞罗那等足球俱乐部的转会。1979—1982年任陆军总参谋长。1982—1983年任财政部长。1983年民主化后流亡美国。90年代中期被引渡回国，但因年龄问题软禁家中，但在1998年因私自在阿根廷青年人足球俱乐部的体育场举办八十大寿而被逮捕。2003年判处三年半监禁，2005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² 鲁本·哈辛托·查莫罗（Rubén Jacinto Chamorro，1926年6月7日——1986年6月2日），阿根廷海军上将，绰号“海豚”（Delfín），1975—1979年任海军工程学院院长，在学院内设立秘密监狱，大肆镇压反对派。1979—1981年任驻南非大使馆海军武官。1984年被捕。1986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³ 阿尔瓦诺·爱德华多·阿尔金德古伊（Albano Eduardo Harguindeguy，1927年2月11日——2012年10月29日），1945年入伍。1972—1974年任第一装甲旅旅长。1974—1975年任第一军团总参谋长。1975—1976年任警队司令，1976年参与了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1976—1981年任内政部长，残酷镇压反对派。1983年被捕。1990年特赦。2004年软禁在家，2006年撤销特赦令。2012年死于家中。——中译者注

⁴ 拉蒙·胡安·阿尔维托·坎普斯（Ramón Juan Alberto Camps，1927年1月25日——1994年8月22日），阿根廷陆军准将。1976—1977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长。1977—1979年任阿根廷警察首长，设立了多个秘密监狱，大肆使用酷刑，发起反犹运动，对希特勒抱有好感。1984年被捕，1986年判处25年监禁，1990年特赦出狱。1994年病死。——中译者注

鹰计划”（Operation Condor），六个拉美国家允许彼此的暗杀队在各自领土上自由行动。因此，军方在整片南美大陆上，都可以随意逮捕或谋杀任何试图逃离阿根廷魔掌的人。其它国家的军警提供了合作与支持。

军政府制定了缜密的镇压计划，建立了三百四十个拘留所和集中营。一些用来关押转移的被捕者，不少是样样俱全的审讯中心，能关几百人，有时关押数千人。人们关在里面受尽折磨，最终死去。如此庞大的组织需要详细的计划和人员培训。驻巴拿马的美国军队和驻阿根廷的法国军官负责培训¹，之后三 A 团和警方接手了培训工作。七十年代初，阿根廷陆军约有八万人，海军约有两万人，空军则在一万五到两万人之间²。这些数字还没算上没有正式参加镇压活动的应征兵。另一方面，军队得到了各省市大量警力的支持，总人数可能达到了二十万。不属于军队的警察也接受军方指挥。除人员外，军队还有坦克（主要是法国生产的）和从美国和法国得到的各种武器，对于国内镇压已经绰绰有余了。

系统性的国家恐怖主义

从政变之夜到 1978 年 6 月世界杯前夕，镇压都是残酷无情的。

¹ 见郎古特（Langguth），《隐藏的恐怖》（Hidden Terrors），第 124—142 页；阿吉（Agee），《公司里：中情局日记》（Inside the Company: CIA Diary），第 632 页；杜瓦尔（Duvall）和斯托尔（Stohl），《恐怖统治》（Governance by Terror），第 246 页。——原注

² 数据出自各种渠道，包括采访，但没有“官方”给出的数字。——原注

决赛有国际观众，所以军政府要粉饰太平，减少街头的恐怖活动。此后绑架事件减少了，但谋杀仍未停止。等 1979 年之后才慢慢发生了变化。

军方的目标是消灭国内的颠覆活动，但在军政府统治下，“颠覆活动”的含义多多。显然，它包括反对军事统治的武装斗争和激进活动。广义上，它意味着任何与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事物。但我们稍后看到，它的实际含义远不止此。

军政府对“恐怖分子”的定义

魏地拉将军把恐怖分子定义为“不仅拥有枪支或炸弹，而且鼓吹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不相容思想的人”¹。政变发生前，魏地拉在蒙得维的亚的拉美军队会议上说：“为了保证国家安全，阿根廷必须要杀死很多人。”²1977 年 4 月的新闻发布会上，罗贝托·比奥拉将军把恐怖主义定义为“任何企图改变或破坏人民道德准则与生活方式，目的是夺取权力或施行基于不同人类价值观的新生活方式的，隐蔽或公开、隐秘或暴力的行为”³。

这样的说法重复了许多次，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

¹ 《军号》(Clarin)，1977 年 12 月 13 日，同样见福隆塔里尼 (Frontalini) 和卡亚蒂 (Caiati)，《肮脏战争的神话》(El mito de la guerra sucia)，第 24 页。这是军政府成员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演讲的合集。——原注

² 霍奇斯 (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 192—193 页。——原注

³ 福隆塔里尼 (Frontalini) 和卡亚蒂 (Caiati)，《肮脏战争的神话》(El mito de la guerra sucia)，第 75 页。我在书里用了霍奇斯 (Hodges) 的译本。——原注

消灭国内的特定人物，而且要摧毁任何冒犯，或与将军们的想法相左的思想、书籍、组织。大学和工会就是这些异端思想的主要来源。

将军们坚定地认为，有颠覆思想的人根本不能算做人，无论如何都不是真正的阿根廷人。魏地拉总统说：“我想澄清一点：镇压不是针对阿根廷公民的，而是针对少数分子，他们不能算作是阿根廷人。”¹克里斯蒂诺·尼古莱德斯²将军说：“在我看来，战斗和搞颠覆活动的都是无可救药的坏分子。”³然而右翼恐怖分子不在其中，因为在军方看来，他们代表左翼颠覆分子“疾病”的“抗体”⁴。在如此宽泛的定义和认知下，不难想象，军方眼里的唯一办法就是清洗。伊维里科·圣让⁵将军说：“首先，我们先杀光所有的颠覆分子；

¹ 《新闻报》(La Prensa)，1977年12月18日，同样见福隆塔里尼(Frontalini)和卡亚蒂(Caiati)，《肮脏战争的神话》(El mito de la guerra sucia)，第22页。
——原注

² 克里斯蒂诺·尼古莱德斯(Cristino Nicolaides，1925年1月2日——2011年1月22日)，1970—1975年任战勤学校(Escuela de Servicio de Combate)主任。1975—1979年任第七旅旅长。1980—1981年任第三集团军司令。1981—1982年任第一集团军司令。1982年接替在马岛战争中战败的加尔铁里出任陆军总司令。1983年把军政府权力移交给阿方辛政府。2007年判处25年徒刑。2011年去世。——中译者注

³ 《道理报》(La Razon)，1976年6月12日，同样见福隆塔里尼(Frontalini)和卡亚蒂(Caiati)，《肮脏战争的神话》(El mito de la guerra sucia)，第22页。
——原注

⁴ 比如海军少将塞萨尔·古泽蒂(Cesar A. Guzzetti)也表达了这种看法，《观点报》(La Opinion)，1976年10月3日，同样见福隆塔里尼(Frontalini)和卡亚蒂(Caiati)，《肮脏战争的神话》(El mito de la guerra sucia)，第21页。
——原注

⁵ 伊维里科·曼努埃尔·圣让(Ibérico Manuel Saint-Jean，1922年9月17日——2012年10月5日)，1943年入伍，曾任驻巴西大使馆武官，1973年退役。1976年参加了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1976—1981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总督，设立了多个秘密监狱，大肆镇压反对派。2012年被捕，同年死于家中。——

然后，我们杀死他们的合作者；接着，是他们的同情者；再接着……是那些政治冷淡者；最后，我们要杀死胆小鬼。”¹

失踪者

向武装的游击队公开宣战，是一回事；而用思想俘获人民，是另一回事了。恐怖主义是精心选用的方法，而不是偶一为之。那些被绑架的人不经起诉，不会留有证据，也不会有任何审判宣布他们犯了什么罪，或者是否有罪。家人从未得知他们受到监禁的理由或关押的地点，连监狱也没有得到公开承认。他们的刑期各不相同，但是殊途同归，难逃一死。他们称为“失踪者”，但他们的消失并非自愿。因此，那个年代的幸存者提到绑架时，用了及物动词：“军方使他们失踪了。”这些人可不是自己失踪的。

这些失踪案不论是对于受害者，还是对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残酷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国家执行权力”的监禁。失踪和逮捕、审判、监禁的区别很大。在法治社会中，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的，当局判谁犯有颠覆或危害国家罪，会逮捕或监禁他。指控可能是公正的，也可能是不公正的，审判可能是公开或秘密的、公正或不公正的，但逮捕和审判至少是公开承认的事实。被捕者的家人和朋友都知道这件事。相反，“失踪”就相当于人间蒸发了。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家人和朋友找不到关押的地方，甚至没法知道他是关着，还

—中译者注

¹ 《卫士》(Guardian)，1977年5月6日，引用在了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第250页。——原注

是已经死了。雅各布·提莫曼¹的书的标题,《没有名字的囚徒》(Prisoner without a Name)、《没有号码的牢房》(Cell without a Number)很好地表达了那种感觉。对于失踪者与认识他们的人来说,他们的身份被抹去了。对于失踪者的家人来说,这是永远无法得知真相的痛苦:没有尸体,没有证据,只有他最后一次活着出现在人们(不包括拷问者在内)眼中的记忆。

大多数失踪者从未重见天日。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主要来自他们逃出生天的狱友。犯人们只要能够交流,就会交换名字,打听来人是谁,还有没有逃出去的机会。

国家失踪者调查委员会

马岛战争惨败后不久,军政府倒台,民选政府任命了“国家失踪者调查委员会”(CONADEP)调查侵犯人权的罪行。委员会听取了集中营幸存者,以及目击军警搞绑架、谋杀、强奸、抢劫等暴行的证人证词。总共有八千九百六十起绑架、酷刑、强奸、谋杀,《永不再来》中都作了报告。幸存者们成为了1984年审判军政府成员的主要证人。

逃脱了死亡,未必能逃过社会偏见。他们重新露面后,熟人往

¹ 雅各布·提默曼(Jacobo Timerman, 1923年1月6日——1999年11月11日),阿根廷记者。出身于乌克兰犹太人家庭,1928年流亡阿根廷。1962年主办新闻杂志,为推翻伊利亚政权摇唇鼓舌。1977年遭到军政府绑架,在狱中遭受酷刑,1980年获释后,流亡以色列和美国。1984年回国。1999年逝世。——中译者注

往不敢接近或者不信任他们。人们怀疑，他们为了活命，做过很糟糕的事。这种怀疑非常普遍，乃至一些证人要到 1984—1985 年审判军队时，才敢说出自己的故事。有些人甚至向最亲密的友人隐瞒了这段故事。因此，他们失踪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肉体上，第二次是在个人经历与记忆上。

逮捕与受刑的典型经历

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凌晨时分，突然传来响声——砸门声，有时还有警笛声——吵醒了屋里人，然后几道手电筒的光束照过来，军队或警方的人命令住户开门。五六个人（一般不穿制服）进入屋内洗劫。一两个人把住户绑起来，在捆绑的时候，往往要拳脚相加。他们说谁犯了什么罪，再绑走几个人。如果住户不是目标，他们会说，找到人之后，再放走在场者。屋里人可能要一直待到失踪者出现为止，不管要等几个小时还是几天。不然，他们会至少带走一人，上另一个地方找人。有时，他们当场杀人，把尸体丢到沟里。

报纸往往把这些尸体说成是“英勇的军警在枪战中击毙的恐怖分子的尸体”。报纸上每天都有大量类似报道——还有所谓“战斗”和发现藏匿武器的精彩照片——但他们大都是从家里、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工作单位里遭到绑架的人。受害者要蒙住眼睛、戴上手铐，通常倒在汽车座椅下面（凶手喜欢开绿色的福特猎鹰）。到达牢房之前，暴徒一直用脚踢他们，一到地方就立即上刑。

酷刑包括电击生殖器、乳头、牙根、耳朵，按节奏击打臀部和后背，尤其是抓捕过程中打断骨头的地方。许多人埋在地下的“坑”

里。他们赤身裸体埋下去，好几天只留个头在地上。人挖出来时，浑身都是昆虫咬的伤痕、蠕虫、感染的伤口和自己的排泄物。他们强迫犯人站立数小时，或者面朝墙壁吊起来，双臂张开扣住、两腿吊起来。在这些极为痛苦的姿势下，犯人会受到殴打或者反复电击。殴打总是伴着侮辱与威胁。犯人强忍着痛苦，赤身裸体，蒙住双眼，连日活在自己屎尿里，不断受到辱骂，逐渐失去了全部人格。

女性通常会遭到强奸，反复强奸变成残废。他们经常告诉囚犯：你的爱人也关进来了，或者你的配偶、孩子、家人死了。有时候，他们会把囚犯带去和快要死掉的，或者受尽折磨与强奸的爱人见面。许多人说，拷问者反复讯问自己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东西，甚至听不懂问的是什么。他们成了恐怖分子，但他们并不是。他们也不知道审讯逼问的信息。

那些恐怖组织的成员也受到了同样的酷刑。他们很可能招供了，因为蒙特内罗（仅存的革命团体）在政变后的很短时间里就垮了。受刑的还有几千名年轻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团，在道义上支持蒙特内罗。这些年轻的成员从未进行过地下活动，也没有受过使用武器的训练。他们的罪过就是涂鸦、散发小册子、谈论禁止的话题。

失踪者还有另一类人，他们只是碍了军队和警察的眼，特别是给生活在工人区或城市贫民窟的穷人提供帮助，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这就是第三世界神父们（一般都在天主教会的底层），以及追随神父的年轻人所犯下的罪过。这些青年相信，第三世界神父在贫民窟的工作就是上帝的基督徒的工作。

其他人的罪过则是他们的职业或好奇心。他们是记者、社会学

家、教师、艺术家、律师。他们不必真的做过什么，或是说过什么“冒犯”的话。他们的罪过，可能仅仅是他们读书、与读书人交朋友，要么观看戏剧、参加有思想交流的活动。如果有想法和军方的想法不一样，那么这个想法就有问题。军事政变后，军队烧毁了所有的公共和私人图书馆。当然，那些说过什么的人（比如讨论让·皮亚杰或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论）以及做过实事的人（比如为穷人提供辩护），军方极有可能当他们有罪。

委员会报告中的数字

大约三万名死者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失踪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描述与确认的八千九百六十起案件中，81%的受害者年龄在十六岁至三十岁之间。这项调查的许多受访者都说“它杀死了一代人”，许多幸存者都相信，他们这一代是镇压的目标。男性比女性失踪的概率更大：委员会报告表明 70%的失踪者是男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它的主要目标是年轻男性。

按照职业来划分（先把独居或跟父母同居的婴儿与小孩放在一边），30.2%的失踪者是蓝领工人（根据阿根廷的标准）、21%是学生，还有 37.3%是白领工人、教授、教师、记者或艺术家。个体经营者占 5.0%，家庭主妇占 3.8%。应征士兵和治安部队成员为 2.5%，宗教界人士为 0.3%。这些数据表明，社会的诸多部门都受到了影响。

估计有三万人死亡与失踪，这只是个粗略的猜测。这个数字基于官方委员会在调查中完全确定和无法完全确定的人数，法国《世界报》（Le Monde）和大赦国际等外部来源提供的信息，以及各个

专门协会提出的详细数据。最后，调查恐怖时期的坟墓数量和集体坟墓也能得出一些信息。1976—1979 年担任陆军总司令，后来担任总统的罗贝托·比奥拉将军在 1981 年承认说，有七千到一万人死亡或失踪¹。

审讯室中的新生儿

女性在失踪者中占 30%，而有 3% 的女性在绑架期间怀孕。怀孕妇女的命运一直是引人落泪的话题。她们都是在骇人听闻的环境中，活着生下孩子的。许多情况下，审问者会带走她们的孩子，交给军人和他们的朋友。电影《官方说法》(The Official Story) 的故事里，一位养母发现孩子是军人丈夫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一个祖母的组织（即五月广场的祖母，稍后我们会在本章介绍）通过先进的 DNA 检测技术和有力的法律顾问，追查到了许多儿童。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阿根廷人权组织说服了政府，在大赦军政府成员时，不会赦免绑架婴儿的罪行。在 1998 年底和 1999 年，军政府成员受到绑架婴儿在内的指控。由于年龄原因，他们仅仅是软禁在家，但指控没有撤销。

对报复的恐惧

¹ 大赦国际，《政府的政治谋杀》(Political Killings by Governments)，1983 年年报。——原注

委员会表示，有非常多的家庭不愿在 1984 年出庭作证，因为他们不相信任何政府程序，担心受到报复。当时，人们发现了一些乱坟岗，把尸体都挖掘出来了。法医和医务人员进行了基因检测等调查。后十年里，这些调查进行得愈发频繁¹。人们还逐渐发现了其它处置尸体的方法，尤其是下药后，把人和尸体一起从飞机上丢到大西洋里。

自 1984 年以来，更多信息公之于众，包括在墓地里埋尸体的细节。从 1976 年 3 月至 1978 年年中（此后杀戮逐渐减少），坟墓的数量急剧增加。飞行员阿道夫·弗朗西斯科·希林戈²参加过把昏迷的乘客丢入海里的行动。1995 年，他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经历³。老同事对他大加挞伐。1997 年 9 月，一伙人抓走他，拿刀子划烂了他的脸，毁了他的容。

假如在九十年代后期回头看这些数字，那么估计出来的总数很可能更大。但是军方的支持者认为，委员会的方法是错误的，失踪人数甚至不到九千人。可正如一些人权组织的人告诉我们的那样，即使是一次失踪、一场酷刑、一次秘密谋杀，也已经不少了。当然，有多少人失踪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数字本身并不是给“进程”下论

¹ 电影《阿韦亚内达》(Avellaneda) 以半纪实的形式，讲述了这些人类学家的工作。——原注

² 阿道夫·弗朗西斯科·希林戈 (Adolfo Francisco Scilingo, 1946 年 7 月 28 日——)，阿根廷海军军官。1995 年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了自己在军政府时期犯下的恐怖主义罪行。2005 年，西班牙政府逮捕此人，判处 640 年徒刑，2007 年改判 1084 年徒刑。——中译者注

³ 正如奥拉西奥·维比茨基 (Horacio Verbitsky) 所说，阿道夫·弗朗西斯科·希林戈 (Adolfo Francisco Scilingo) 在《飞行》(El Vuelo) 中描述了此事。——原注

断的关键信息。

委员会的证词

《绝不再来》讲述的数千个案例中，以下证言非常典型：

1976年3月24日凌晨12时30分，我们在科尔多瓦省里维拉·因达尔特镇（Rivera Indarte）的家中。一伙穿制服拿步枪的人闯入我家，自称是军人，身后跟着几个穿便服的年轻人。他们拿我们当射击的靶子，还抢走书、艺术品、酒瓶等等。穿制服的把东西都搬到了外面。他们没有对话，只用手势交流。他们在房子里翻箱倒柜两个小时。突袭前，周围的街道都停电了。他们绑架了我丈夫（曾是工会干部）、儿子大卫还有我。第二天，我放出来了。我儿子关在拉里维拉（La Ribela）集中营，没多久也出来了。我们的房子全毁了。人们发现了我丈夫的遗体，喉咙上有七处枪伤（档案编号3860：阿尔贝托·圣地亚哥·布尼齐昂（Alberto Santiago Burnichon））¹

1976年4月2日凌晨4点，几名穿便服的男人闯进我家。他们全副武装，自称是海军和联邦警察。带头的自称马约加（Mayorga）探长。他们带走了我六十五岁的父亲。第二天，我哥哥米盖尔向圣伊西德罗（San Isidro）法院要求人身保护令。同一天晚上九点，他们回到我家，罩住我母亲的头，把人带走了。他们带她到某个陌生

¹ 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CONADEP），《永不再来》（Nunca Mas）英文版，第12页。——原注

的地方，连续五天施暴审讯。抓走我母亲后，武装人员还待在我家。4月23日，我哥哥米盖尔一进家门就遭到了绑架。在此期间（4月21日的4小时，还有22日起的36小时里），虽然我四肢瘫痪，但没有任何人帮助我。我只能保持一个姿势，不能吃东西，不能得到照顾。他们一直在逼我给妹妹玛利亚·德尔·卡门打电话。电话掉在了地上，他们就拿来了我家的另一个电话。他们最后离开时，还开走了我的福特猎鹰。他们蒙住了母亲的眼睛，在离家两个街区的地方放了人。我父亲和哥哥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听说，我的妹妹玛利亚·德尔·卡门、她的丈夫豪尔赫·里扎索（Jorge Lizaso），还有她丈夫的兄弟米盖尔·弗朗西斯科·里扎索（Miguel Francisco Lizaso）都被绑架了，公寓也遭到洗劫。他们都在失踪者名单上。

（档案编号3081：洛克·努涅斯（Roque Nuñez））¹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中，感觉有点不对劲：里面有人粗暴地朝内拉。我往前跌倒了。

我往后跳，想要逃跑，结果两腿各中一枪，走不动道。我还在挣扎，奋力抵抗了几分钟后，戴上了手铐。他们还套住我的头。同时，我拼尽全力大喊：有人绑架。我乞求邻居转告我的家人，试图阻止他们把我带走。

最后，我眼睛蒙上了，一点力气也没了。带头的对我说，他们已经抓住了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她们都“失踪”了。

他们得把我拖出去，因为腿上的伤，我走不动道……（他们）把我扔到了车里，可能是一辆福特猎鹰，然后开走了。他们以同样

¹ 同上，第16页。——原注

的方式把我拖下车……把我扔到桌上，手脚绑在四个桌角上。

接着，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此人自称“上校”。他告诉我，他们知道我没有参与恐怖活动或游击队，但还是要折磨我，因为我反对当局，“不懂在阿根廷没有任何反对国家改造进程的余地”。他又说：“你要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穷人不会再有什么好心人来管了！”……几天来，他们电击了我的牙根、乳头、生殖器、腹部、耳朵……

然后，他们有节奏有规律地打我的后背、大腿背部、小腿、脚掌……两种酷刑换着来，一连搞了好多天。有时，他们两样同时做……在两次施刑之间，我的手挂在固定在牢房墙上的钩子上……

有一次，我面朝下坐在酷刑椅上，他们提起我的头，取下面罩，给我看了一块沾满鲜血的破布。他们问我能不能认出它，不等我答复——我没法回答，因为我的视力受到严重影响，根本看不清东西——他们说这是我妻子的裤子，一句话也没解释，借此折磨我……然后再蒙住我的眼睛，继续殴打……

一天，他们把我放在酷刑椅上，面朝下，和平时一样把我绑起来，不作声地从脚底剥下我的皮肤。虽然我蒙住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但我想他们是用剃须刀或手术刀做的。我能感受到，他们扒开了皮肤，似乎是拿钳子撕开伤口两侧的皮肤。我昏了过去……感觉我在死亡边缘徘徊。我没在受刑时——要么醒着，要么昏过去了一一产生了已经死去的幻觉……我无法思考。我拼命想主意，说服自己还没有死，还没有疯掉。同时，我真希望他们能快点杀死我……

还有一样恐怖手段：他们随时会把我带到“手术室”。在那儿，他们把我绑起来，对我的睾丸用刑。我不知道他们是用手还是用机

器做的。我从未经历如此的痛苦。那就像他们把我体内的所有东西，从喉咙和脑门往外拉。就好像我的喉咙、脑袋、胃、睾丸是一根尼龙绳连在一起的，他们把绳子拽紧，就搅碎了我体内的一切。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他们能把我里面的东西全部扯出来，掏空我。然后我昏过去了……（档案编号 7397：诺尔贝托·里维斯基〔Norberto Liwsky〕博士）¹

莫妮卡·米尼奥内的故事

1976 年 5 月，政变后不久，穿便衣和军裤的五名武装人员闯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门家中，绑架了家里的二十四岁女儿莫妮卡·米尼奥内。父母当时还相信当局。士兵说问完话就放人，他们相信了。后来无数煎熬的日子里，他们到处搜寻，找了所有能找的人，追查了一切可能的线索。但他们再也没能见到莫妮卡。她的事情在阿根廷广为人知，成为了国际社会签名声援失踪案的契机。

她的父亲埃米利奥·米尼奥内²是律师、天主教大学的校长、忠诚的庇隆主义者和天主教徒，日后成为了阿根廷失踪者亲属与人权组织的领导人。虽然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成了严厉的教会

¹ 同上，第 21—26 页。——原注

² 埃米利奥·费尔明·米尼奥内（Emilio Fermín Mignone，1922 年 7 月 23 日——1998 年 12 月 21 日），阿根廷作家、教育家、法学家。早年加入天主教行动。1948—1952 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教育局长。1955 年流亡美国。1966—1970 年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加入了正义党。1973 年起在大学任教。1976 年政变后辞职。1981 年被捕，在国际压力下获释。此后继续参与人权运动。1998 年逝世。
——中译者注

批评家。他指责主教们不仅背叛了人民，还与军队勾结，狼狈为奸。他后来发表文章，激烈控诉了教会领袖和各界精英。他说：“大多数阿根廷人感到混乱和不安，但消息灵通的社会人士——军官、高级官员、外交官，以及政治、社会、金融、商业、工会领袖，最后是新闻工作者和主教——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许多人还为军队的做法辩护，表示欢迎，甚至还提供了合作。”¹

他推测，莫妮卡的“罪过”不过是在贫困地区和几个神父与六位年轻人（他们也在同一时间失踪）当家庭志愿护工。她是专业的教育心理学者，为当地的医院和大学工作。

每周，她都会与神父和别的学生一起去贫民区，改善穷人的境况。她从来没有时间或机会参与军事行动。夫妻俩经常跟她一起去贫民区帮忙。也许她太热心了，而军方并不喜欢这样。他们说：“你只是在物质上帮助穷人。这是唯物主义的。你应该在精神上帮助他们。”他们说，那是对福音的唯物主义解释。

自从五月那个不祥的早晨以来，我们拼命向各种当局上诉，找莫妮卡的线索。她的朋友在同一天失去自由，这些家庭也是如此。我不知道那五个带走莫妮卡的人的名字。我现在才知道，他们把她带去了海军工程学校（海军设立的集中营）。他们自称是陆军，但其实是海军。他们说只带她离开一小会儿，却永远把她带走了。²

¹ 米尼奥内（Mignone），《真相的见证者》（Witness to the Truth），第2页。——原注

² 个人访谈，1997年1月18日，MPM。——原注

反对派神父的故事

虽然有少数天主教神父在 1968—1974 年间活跃于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但当时的暗杀与镇压使他们保持了沉默），教会当局并没有对颠覆分子表现出任何同情，即便是对莫妮卡·米尼奥内那样，只想要改善贫民窟的医疗保障和福利的人也是如此。政变前，巴拉纳省的大主教阿道夫·托托洛¹为军政府成员赐福。图库曼省的随军神父比克托里奥·博纳明²在军政府实施镇压前，就提到要进行肮脏战争。他说，这是“上帝必定关心的战争，我们定会得到神助”³。成千上万失去亲人、生活在恐惧下的教徒恳请教会帮忙寻找失踪的亲人，可教会没有采取行动，也没有发表公开声明提供慰藉。

在教会中，不服从纪律的人没有好下场。1976 年 7 月 4 日，在贝尔格拉诺富裕的圣帕特里西奥教区，三名帕罗廷修会（Pallotine）神父和两名修士遇害。有人用他们的血写下了“毒害我们青年的纯洁思想的下场”和“婊子养的神父”。其中一名修士遭到强奸。他们每周都会提供令中产阶级教民（包括军人、法官、商人）不快的

¹ 阿道夫·塞尔万多·托托洛(Adolfo Servando Tortolo, 1911 年 7 月 9 日——1986 年 4 月 1 日)，1934 年成为神父。1962—1983 年任巴拉纳大主教。1975—1982 年任阿根廷军队神父，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支持军政府独裁统治，与魏地拉建立了良好关系。1982 年因病辞职。1986 年去世。——中译者注

² 比克托里奥·曼努埃尔·波纳明(Victorio Manuel Bonamín, 1909 年 10 月 19 日——1991 年 11 月 11 日)，1935 年成为神父。1960 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副主教。1960—1982 年任阿根廷军队神父，两次担任阿根廷圣公会主席。属于极端保守派，为镇压游击队辩护，支持军方动用酷刑。1991 年去世。——中译者注

³ 不同主流报纸都有报道，同样见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 185 页。——原注

消息，要求他们为穷人考虑，因此遇害。人们起初认为这起谋杀是准军事团体干的，但 1984 年委员会的调查证词表明，这起谋杀是海军集中营的负责人鲁本·查莫罗中将授意的。他们在杀死神父们的同时¹，还杀了三位法国修女（她们与五月广场的母亲组织最初的领导人绑架案有关，见下文讨论）以及与马赛拉海军上将有过节的阿根廷外交官艾蕾娜·霍尔姆贝格²。

教会中还有一起谋杀案，受害者是拉里奥哈的恩里奎·安赫雷希³主教，他曾奋力改善省内贫苦农民的生活。富有地主责难他，他的同事也受到无故的骚扰和监禁。政变前不久，主教在空军基地前发起群众示威，抗议军队管制。军方极为不满，波纳明主教只得公开道歉。1976 年 7 月，军方谋杀了两名教区神父。8 月，安赫雷希与助手在从空军基地开车回拉里奥哈的途中，遭到蓄意谋杀。有人把他们的车逼出大路，导致主教死亡。事故发生后，他整理的早期失踪者谋杀案的相关文件都消失了。直到 1984 年，证人才敢向委员会作证。

¹ 米利亚姆·列文·德·加西亚 (Miriam Lewin de Garcia) 的证词，见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 (CONADEP)，《永不再来》(Nunca Mas)，第 2365 号档案。——原注

² 艾蕾娜·安赫丽卡·多萝蕾丝·霍尔姆贝格·拉努塞 (Elena Angélica Dolores Holmberg Lanusse, 1931 年 5 月 24 日——1978 年？)，阿根廷外交官，曾任驻法国大使馆随员。1976 年军政府上台后，在法国发表反对意见。1978 年召回国，12 月 20 日准备与法国记者会面时，遭到“3.3 工作组”(El Grupo de Tareas 3.3, GT 3.3) 绑架，旋即失踪。1979 年 1 月 11 日发现尸体。大多数人认为埃米利奥·马塞拉将军下令杀害了她。——中译者注

³ 恩里克·安赫尔·安赫雷希 (Enrique Ángel Angelelli, 1923 年 7 月 18 日——1976 年 8 月 4 日)，1947 年成为神父。1961—1968 年任科尔多瓦副主教。1968—1976 年任拉里奥哈大主教，积极支持工人运动。1976 年 3 月 24 日军政府上台后，入狱了一段时间。8 月 4 日在科尔多瓦被军政府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铅笔之夜

1976年9月16日拉普拉塔的夜晚，人称“铅笔之夜”。当时，军人强制把十个孩子（十四到十八岁之间）从家中带走，因为他们参加过一个活动，专为学生提供车费补贴。根据《永不再来》的证词，“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决定惩治所有参加校外活动的学生，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教室里搞颠覆活动’。”¹这些学生中有六名受尽折磨后遇害²。其中一位，巴勃罗·迪亚斯（Pablo Diaz）在监狱待了四年才重见天日。他是调查委员会的主要证人。

雅各布·提莫曼的故事

1977年4月，《观点报》的编辑雅各布·提莫曼在家中遭到绑架。拉蒙·坎普斯将军亲自审问了他，对他上了刑。军队绑架他的理由是，提莫曼和疑似为蒙特内罗周转资金（马里奥·菲尔梅尼奇日后证实了这一点）的阿根廷银行家大卫·格莱维尔³有联系¹。格

¹ 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CONADEP），《永不再来》（Nunca Mas）英文版，第319—319页。——原注

² 这些事件在赛奥内（Seoane）和鲁伊斯·努涅斯（Ruiz Nunez）的著作《铅笔之夜》（La noche de los lapices）和1986年埃克托·奥利维拉（Hector Olivera）拍的电影，英文名也叫《铅笔之夜》（The Night of the Pencils）中有描述。赛奥内和鲁伊斯·努涅斯漏了一起案件，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CONADEP）的报告收录了这起案件：维克多·特莱韦诺（Victor Trevino），档案编号4018.——原注

³ 大卫·格莱维尔·基特纳赫特（David Graiver Gitnacht，1941年1月？日——

莱维尔就在自己手上最大的两家金融控股公司倒闭前不久，在 1976 年死于空难。格莱维尔持有提莫曼报纸的 45% 股份²。就在提莫曼绑架案前不久，《观点报》印刷厂负责人兼知名记者埃德加尔多·萨洪（Edgardo Sajón）也遭到了绑架。《拉丁美洲政治报告》猜测，军方也怀疑萨洪与格莱维尔有联系，绑架后杀了他³。

提莫曼和格莱维尔都是犹太人，而坎普斯将军则是公认的反犹分子。坎普斯认为，提莫曼代表国际犹太势力的阴谋。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DAIA）公布了这起事件，提莫曼在国际上出了名。吉米·卡特亲自干预了此事。提莫曼遭到绑架一年后，关在家里软禁。一年半后，政府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把他驱逐出境。毫无疑问，他的审讯者和施刑者都是反犹分子，但他之所以遭到绑架，究竟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还是因为他与格莱维尔的关系，或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不该发表的消息，至今尚未查清：这比一名普通的报纸编辑遭遇绑架的故事还要重要。对此，阿根廷新闻秘书处公开表示，逮捕提莫曼不是侵犯言论自由，也与他的犹太人身份无关，仅仅是因为他和格莱维尔之间的关系⁴。

1976 年 8 月 6 日），阿根廷银行家，曾于 1971—1973 年任社会福利部副部长，与蒙特内罗关系密切。1976 年 8 月 6 日在墨西哥因飞机失事身亡。——中译者注

¹ 豪尔赫·阿西斯（Jorge Asis）的专访，《自由杂志》（Revista libre），1984 年 3 月 13 日，第 1—4 页，又见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 91 页。——原注

²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 258—259 页。更多详情见格拉维尔（Graiver）事件，《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1977 年 7 月 29 日，第 15 页。——原注

³ 《拉丁美洲政治报告》（Latin America Political Report），1977 年 4 月 22 日。——原注

⁴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 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到了 1977 年，许多出版商、编辑、记者都遭受了酷刑。但报纸编辑们对提莫曼被捕的消息做出了不同的反映。《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的詹姆斯·尼尔森（James Neilson）是为数不多的强烈要求释放提莫曼的编辑¹，但他后来写道：“提莫曼……帮助阿根廷成为了一个成千上万的人会‘失踪’，主流报纸的所有者锒铛入狱、遭受酷刑的社会。他难道不是‘强硬派’眼中‘进程’的最佳宣传者吗……说白了，这就是他下狱之后扮演的角色。”²当然，官方除了指控提莫曼与大卫·格莱维尔有联系，还指控他同情游击队。但这也许是出于他对政变前的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的强烈反感。

提莫曼本人在《没有名字的囚徒，没有号码的牢房》里辩称，他和自家报纸是温和的，反对军队和游击队的极端主义，也是“唯一一家关心失踪者的报纸”³。他认为，军中的极端派绑架了自己。他指出，权力的分配产生了广大的利益集团，领袖们可能认识到绑架雅各布·提莫曼这一行为的愚蠢，但其它派别——各种极端分子、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或者单纯看不惯《观点报》的派别——不听上级指示采取了行动。他一度失去自由，却仍在书中为魏地拉和比奥拉辩护，指责少数派和极端分子的过激行为。他认为，这些极端分子比起反共分子，更像是反犹主义者。他说这些人其实是新纳粹分子。他为了捍卫自己的主张，声称作案者只是军中的一派，而将军们的

Argentina, 1973-1978），见 1977 年 4 月，第 144—145 页。——原注

¹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 285 页。——原注

² 尼尔森（Neilson），《雅各布·提莫曼的教训》（The Education of Jacobo Timerman）。——原注

³ 提莫曼（Timerman），《没有名字的囚徒，没有号码的牢房》（Prisoner without a Name, Cell without a Number），第 42 页。——原注

确为了释放他忙里忙外，但他出狱后，还得软禁在家，最后流亡海外。这和阿根廷的其它事情一样，没有什么是非黑即白的。

人权活动出现

政变发生前，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个人权组织：阿根廷人权联盟（Liga Argentina por los Derechos del Hombre），这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政变后，它的领导人下狱受刑。但政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阿根廷比以往何时都强烈要求保护人权。到了 1977 年，被监禁与失踪孩子的父母开始秘密会面，制定和平抗议的计划。在这些会面中诞生了许多组织，例如五月广场的母亲（Madres）和因政见被捕者与失踪者亲属会¹。

母亲们在总统府对面的五月广场聚会。1977 年初，她们从一群担惊受怕又顽强的妇女小会成为了反对军事独裁的强大力量。每周四，妇女们在广场碰面，绕着广场游行，手持写有失踪亲人名字的标语。她们拿白色尿布当作围巾，绣上失踪亲属的名字。组织的第一位领导人阿苏塞纳·比拉弗洛尔·德·德·文琴蒂²于 1977 年 12

¹ 因政见被捕者与失踪者亲属会（Familiares de Desaparecidos y Detenidos por Razones Políticos），即亲属组织（Familiares）——中译者注

² 阿苏塞纳·比拉弗洛尔·德·德·文琴蒂（Azucena Villaflor de De Vincenti，1924 年 4 月 7 日——1977 年 12 月？日），阿根廷社会活动家。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丈夫是工会会员。1976 年 11 月 30 日，她的一个儿子被军政府绑架，遍寻无果。1977 年发起成立失踪亲属组织“五月广场的母亲”（Las Madres de Plaza de Mayo），多次举行游行示威，12 月 10 日（国际人权日）当晚被海军工程学院特务绑架，遭受酷刑后遇害。——中译者注

月失踪。当时，她和一位法国修女在家中遭到绑架。此前，还有九位组织中的妇女遭到绑架（最终，共有十四名妇女失踪）。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多·阿斯蒂斯¹当内鬼出卖了她们。一群男人从母亲聚会的教堂，把人强行带走了²。

尤其是在1978年世界杯期间，母亲们每周四在五月广场游行，吸引了许多外国记者。虽然足球比赛分散了本地人的注意，外国观众却得知了大量有关失踪的消息，看到了电视中戴着白色尿布的女性的画面。此后，整个军政府时期内骚扰不断——例如官方不时粗暴地把她们从广场上赶走、逮捕了六十八名游行者（1981年）以及人身威胁——但这些母亲在国外电视上太出名了，军政府不能让她们“失踪”。她们名气很大，不用主动筹款也能获得资金，足以维持长期活动的场所，用来制定策略和接待访客。组织的新领导人是艾薇·帕斯托尔·德·波纳菲尼³。她的三个孩子都失踪了。1980

¹ 阿尔弗雷多·伊格纳西奥·阿斯蒂斯（Alfredo Ignacio Astiz，1951年11月8日——），1970年入伍。1976年政变后在海军工程学校任职，曾打入多个反对派组织进行破坏活动，亲手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反对派。1982年参加了马岛战争，在战斗中被英军俘虏，后被遣返回国。1998年被开除出海军。2003年被捕。2014、2017年两次判处终身监禁。——中译者注

² 关于这些事件与母亲们的组织，见五月广场母亲协会（Asociacion Madres de la Plaza de Mayo），《五月广场母亲的历史》（Historia de la Madres de la Plaza de Mayo）；贝奈特（Bennett）和辛普森（Simpson），《失踪者与五月广场的母亲》（The Disappeared and the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布瓦德（Bouvard），《革命母性：五月广场的母亲》（Revolutionizing Motherhood: The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原注

³ 艾薇·帕斯托尔·德·波纳菲尼（Hebe Pastor de Bonafini，1928年12月4日——），早年育有三个儿女。1976年军政府上台后，两个儿子均在被绑架后失踪。1979年担任“五月广场的母亲”协会主席，积极营救军政府绑架的人员。1991年因在电视节目中辱骂时任总统梅内姆，受到“侮辱罪”的起诉，判处罚款4500比索。1996年在反对《高等教育法》改革游行中遭警察殴打。2000年公开

年，失踪人数减少，军政府提出国内和解时，母亲们分裂为了两派。一派仍由德·波纳菲尼领导，另一派则称为创始者阵线¹。后者表示，她们已经接受了孩子已死的事实。但德·波纳菲尼那一派坚决反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接受这种说法。她们的立场是：政府夺走了她们的孩子，但又不敢承认罪行。

如上所述，“祖母”成立于1977年。这个组织还有别的使命：找到在监狱中生下，由军人家庭或朋友收养的孙辈。对她们的采访中，一位受访者谈到她们的女儿遇害之前，生孩子时的非人状况：“因此，我们为子孙寻求真相和正义。我们永远不会说他们死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国家应该告诉我们，他们在哪，谁说他们有罪，又发生了什么。国家有义务告诉我们答案。”

祖母们讲述了她们是如何到各地的产房，寻找怀孕的女儿的：“我们完全迷失了方向，我们没有经历过孩子的失踪。我们算出生日期差不多了，就上医院去，但仍然一无所获。最后，我们去找法官。我们就在这些地方相识了，大家一起找人。”

最初，她们找到了一百八十名在监狱出生的婴儿。到了1990年，这个组织已经找到了二百十五名失踪的孩子。她们需要方法证明孩子是她们的孙子，便获得了欧洲和美国的基因鉴定专家的帮助。通过基因鉴定，她们在十九年里找回了五十七个孩子。虽然基因技术在近几年得到了发展，这项工作还是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

声援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2001年公开支持“9·11”恐怖袭击。2008年反对农业罢工。后来经常因“煽动暴乱”和“扰乱公共秩序”被起诉。——中译者注

¹ “五月广场的母亲”创始者阵线（Las Madres de Plaza de Mayo Línea Fundadora），阿根廷非政府组织，旨在营救被绑架者，反对阿方辛政府的政策，1986年成立。——中译者注

她们现在寻找的是成年人。她们会区分收养孩子的好心人，与非常清楚孩子是在监狱出生的“抢孩子”的人。而找回的孩子都得知了自己的身世。由于她们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时间的流逝以及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了懂事的成年人，“失踪者的孩子们”成立了新的组织，称为“孩子”。

第八章里，维斯特坎普夫妇在接受采访时，说明了亲属组织的由来。这个组织仍在积极活动着，帮助失踪者的亲属、为失踪者的孩子（“孩子”组织）提供聚会场所，同时整理西班牙、意大利等非阿根廷公民的失踪者的详细档案。这些档案转交给欧洲各国政府，希望能够借此控告军政府成员，查出行凶者。1997年，当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有人闯入亲属组织的办公室，盗走了一些档案。这些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它们提醒着每个人，就算政变过去了二十多年，参与镇压的人仍有许多逍遥法外、习性难改。

除了这些亲属组织以外，大量团体都在向政府施压，要求完善公民权利的立法。这些组织机构包括常设人权集会和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它们提供调查服务、维护有关七十年代独裁统治的大量剪报和图书馆、为受侵犯的人权提供法律援助、为了人权问题游说。

经济管控

军政府并不打算独力重振阿根廷经济。它任命何塞·马丁内斯·德·奥斯为经济部长；此人是阿根廷最富有的地主与工业巨头家族的继承人，作为经济学家小有名气。他的政策当时叫做“货币主义”，许多受访者则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这些政策是消除各国的

一切贸易壁垒的国际运动的先声。然而马丁内斯·德·奥斯并没有始终如一地采用自由市场政策。为了避免严重失业或同等严重的通货膨胀，他有时不得不倚向国家干预。

虽时有偏差，他的政策方向仍是削减实际工资，把全国的实际工资降低到比前五年的平均水平低 40% 的程度。正如威廉·史密斯所说，这意味着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的大量收入转移，以及减少大众消费品的需求。史密斯说：“这些目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工人阶级、工会、政党的‘结构上必要的’高度镇压。”¹与吉列尔莫·奥唐奈一样，史密斯认为 1976 年和十年前一样，军方的目的一直都是重建经济，但不再需要特定的现代化过程作为基础。

史密斯看出，重建过程必然受到底层阶级的反抗，这些阶级被排除在权力之外，“首当其冲承受了（旨在控制通货膨胀并增加收入与储蓄的）政策的恶果”。但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消灭这些阶级及其抵抗并不是军政府的首要任务。此外，资本也可能反对这些制度。因为这一过程包含由国家领导的资本“自上而下的重组”：“国家作为政治斗争和阶级冲突的主体、客体、决定性因素的性质，使国家必然在自身主导的任何重建计划中，发挥核心作用。”²抵抗可能来自别处，史密斯说：“国家机器内部及资本各派系的斗争，不逊于国家面对的‘来自下面的威胁’。”³

最后，军方与文职技术精英也不愿回到真正的私营经济或民选

¹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专制主义与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危机》（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Political Economy），第 235 页。
——原注

² 同上，第 5 页。——原注

³ 同上。无标页。——原注

政府，因为他们在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中，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因此，即使在军队官僚内部，军政府的新政策也不应解释为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的集体决策。的确，当我们研究新自由主义部长们干预下的经济发展时，发现经济无法得到长期改善。失败可能是由于政策内在的特点，也可能是由于各阶层的不断抵抗。

马丁内斯·德·奥斯取消了农产品和畜牧产品的出口税，使出口农产品的资产阶级获益。他大幅降低了进口关税，减少了对国内产业和在阿根廷本土缺乏竞争优势的产业的保护。此外，他改革了金融部门、放开了外汇市场、提高了国有产业的价格，以便提高效益，刺激国有企业对利润的追求。由于政策涉及的许多企业效益低下，军方又控制着许多产业，私有化受阻。最后，他削减了社会福利方面的公共开支，大幅削减了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投入。

其实马丁内斯·德·奥斯推行的政策快把阿根廷搞破产了。第一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扶持下，阿根廷的外贸平衡稍有改善，但通货膨胀仍在继续，实际工资的降低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第二年进行了重大的“金融改革”，刺激了通货膨胀，抑制了产业投资。按照史密斯的说法，到了 1978 年初，官方抛弃了正统的货币主义政策和“老”芝加哥学派的教条。为了压低通货膨胀，出台了新的政策，包括限制新的外资流入。这些政策都失败了，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即减少了收入转移，这是有利于农业出口资产阶级大庄园的。

最终在 1978 年 12 月，马丁内斯·德·奥斯尝试了另一项对工业不利的反通胀政策，人称为“甜头”(sweet money)，因为进口货物的价格可能会远低于当地产品的价格。因此，阿根廷上层阶级只要带一点阿根廷比索去迈阿密度假，就能带着不用交税的电子产品

回国。进口总额增加，国内企业失去竞争能力。到了 1980 年，国有企业和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外国公司都陷入了困境，破产了不少。1980 年 4 月至 1981 年 3 月之间，有七十二家金融机构倒闭。一家主要工业集团和阿根廷最大的农业出口商破产，留下大约十亿美元的债务。近 15% 的城市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阿根廷的经济危机比起军事政变前更加凶险。

按照三军在 1976 年政变之前达成的协议，魏地拉将军和马塞拉海军上将于 1981 年下台。罗贝托·比奥拉将军继任了魏地拉的职务，阿曼多·兰布鲁基尼¹海军少将继任了马塞拉的职务。比奥拉立即解雇了马丁内斯·德·奥斯，任命了以洛伦佐·西戈²为首的新经济团队。比索贬值，关税进一步降低。但经济危机还要一直持续到 1981 年。

1981 年 12 月，莱奥波尔多·福尔图纳托·加尔铁里将军把比奥拉赶下台。加尔铁里代表的是天主教民族主义者，这一派比“自由派”更为专制强硬。他的经济“最高部长”罗贝托·阿莱曼³也和马丁内斯与西戈一样，无力回天。1981 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国民生产

¹ 阿曼多·兰布鲁基尼 (Armando Lambruschini, 1924 年 6 月 15 日——2004 年 8 月 15 日)，1942 年入伍。1975—1978 年任海军总参谋长。1978—1981 年任海军司令。1985 年被捕，判处 8 年徒刑。1990 年特赦出狱。1997 年起软禁在家。2004 年死于家中。——中译者注

² 洛伦佐·胡安·西戈 (Lorenzo Juan Sigaut, 1933 年 6 月 6 日——)，阿根廷经济学家。1981 年 4—12 月任经济部长，期间货币大幅贬值，经济严重衰退。加尔铁里上台后被解职。——中译者注

³ 罗贝托·特奥多罗·阿莱曼 (Roberto Teodoro Alemán, 1922 年 12 月 22 日——2020 年 3 月 27 日)，阿根廷作家、律师与新闻工作者。1961—1962 年、1981—1982 年任经济部长。1962—1964 年任驻美国大使。1982 年马岛战争战败后辞职。2020 年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总产值下降了 11.4%，工业产值下降了 23%，而实际工资降低了 20%。同时，阿莱曼提倡“里根经济政策”，包括废除保护本土产业或工人的各类措施，以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¹。此后，将军们和三军的内斗，以及军中各派的内斗演变成了公开冲突。

马岛冒险

1982 年 4 月 2 日，阿根廷入侵了受英国保护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又称福克兰群岛）。加尔铁里的这次军事冒险，不仅是转移人们对于经济危机的注意、国际上对于失踪问题的谴责、军队内部矛盾的冒险之举，它还把阿根廷推到了濒临破产、无力支付外债的边缘。与他的期望相反，美国支持了英国，英国也带来了欧洲共同体的制裁。威廉·史密斯说：“即使阿根廷能够避免战败，也无法回到正常的经济决策中。大多数人厌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军方各势力也不买它的账。”²

加尔铁里和他的部长们下台，其他将军无法对继任者达成一致。海军和空军退出军政府。1982 年 7 月，军队的“自由派”任命了雷纳尔多·比尼奥内³将军担任总统。然而，军政府已经不复存在，

¹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专制主义与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危机》（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Political Economy），第 244—245 页。——原注

² 同上，第 246 页。——原注

³ 雷纳尔多·贝尼托·安东尼奥·比尼奥内（Reynaldo Benito Antonio Bignone，1928 年 1 月 21 日——2018 年 3 月 7 日），1950 年入伍。1975 年任阿根廷陆军参谋长。1975—1976 年任国家军事学院院长，1976 年参加了推翻伊莎贝尔·庇

加尔铁里在谈判中让步，接受了 1983 年 10 月的民主选举。

隆的政变。1981 年退役。1982—1983 年任临时总统，为军政府最后一任首脑。1983 年宣布大赦，恢复选举制度，当年下台。1989 年被捕，1990 年特赦出狱。1999 年再次被捕，后续多年反复判刑，2018 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第十章 革命者与动摇者

那是政治思想发酵的年代。当时的年轻人自觉有义务投身救国事业。对于投身事业的人（也对并未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那是相当危险的时代。本章介绍了当时的年轻革命者，讲述了他们为信念付出的代价。

这些并不是英雄故事。大多数的英雄都没有活下来。而且大多数平凡的幸存者都开始怀疑，年轻时献身的事业是否是崇高的。正如我们的受访者所说：“讲述我们的故事，说出真相。我们不是无辜的，我们确实犯了错。但我们是在和真正邪恶的敌人抗争。”大多数幸存者都不愿相信领导人是内奸，但也不再相信领袖告诉他们的一切。在这些事件的很久之后，一件谎言尤其令人反感：幸存的领导人过分低估了军方杀死的蒙特内罗人数。这个谎言让幸存的领导人逃避了责任，因为他们自己转入地下、逃亡欧洲，却把成千上万的年轻生命置于危险之下。如果死去的同伴这样轻易抹去了，那么他们的斗争又是为了什么？

克里斯蒂娜

六十年代末，我十八岁左右，开始理解世界的政治局势。“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是对当时军事独裁的反抗，它是独裁者与劳动人民、工人、学生，也就是科尔多瓦省所有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当

时，我们年轻女性开始对世界有了不同的看法。那年头，男女生分校上学，我们受的教育很传统。“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在政治上唤醒了整整一代人。我们想要改变世界。切·格瓦拉的故事和他的斗争，给阿根廷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格瓦拉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我想要当芭蕾舞者，我也在戏剧学院学习戏剧，但高中毕业之后，我立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动中。

我来自庇隆派家庭，当年的庇隆主义抵抗运动很强大。在庇隆主义的旗帜后面，是群众运动。他们要求庇隆回来，希望阿根廷军事独裁在 1973 年的选举中失败。我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团，开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工作。我们参与了许多工作：卫生、扫盲、房屋维护。这一切都带有政治目的：把贫民窟的人带入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我本人并没有参与武装行动，但我算是积极分子。

庇隆回国那天，我非常高兴。那一天，我也遇到了未来的丈夫，我俩不久结了婚。他没有参加过武装行动，只是搞政治的蒙特内罗。庇隆有个“改造国家”的计划，他要彻底改变社会结构。因此，许多不是庇隆主义者的人寄希望于庇隆的回归。但到了第二年，1974 年 5 月 24 日，庇隆在五月广场发表演说，叫蒙特内罗解散。我们非常难过。我们不得不脱离庇隆党、脱离一切活动。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再继续事业了。

不久后，我生下了大儿子。我丈夫继续和蒙特内罗共事，但他的工作是保密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他身边。军事政变发生在 1976 年 3 月。1977 年 2 月，我丈夫失踪了。

他失踪的前一年，形势非常艰难。每天都有同志遭到绑架。我们没有完全转入地下，但得一直换地方，因为我们被绑架或监禁的

同志，可能在酷刑下把我们招出来。我怀着孕，又带着两岁的儿子，经常只能睡在大街上。有时，朋友会告诉我，某人遇害了。有时，我们整夜都坐在巴士上奔波，到达站头后，又搭上另一辆巴士。有时，我们不得不找朋友、熟人、亲戚、邻居，拜托收留我们睡一晚。我怀着孕，还常常要带着孩子，整天待在动物园里，直到关门，然后有人会带我去某个地方睡觉。这段时间非常恐怖、非常糟糕。后来，在2月20日（星期天），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

下一个星期六，他们带走了我丈夫。他和蒙特内罗的同志们会面的时候，他们在街上抓住了他。之后，他们闯进了我住的房子。我刚给婴儿喂好母乳。我穿好裙子，把婴儿放在床上，那一刻，他们突然闯进来。他们踢我，分娩的伤口都裂开了。然后，他们把刚出生的婴儿放在地板上，抓住脚，头朝地面，把枪放在婴儿嘴里。他们一顿打砸，翻箱倒柜。他们自称是联邦安全部门派来的。然后他们把我也放在地上。谢天谢地，大儿子不在这里，而是与我母亲在一起。

我始终忘不了这一天。我切身体会到了恐惧。其余的一切，战斗和痛苦，全是疯狂的。我呢，在多年的精神分析治疗后，才能开口讲述那一天的故事。真可怕、真吓人。完全是恐惧、暴力、挑衅。

他们离开后，过两个小时，母亲来了，因为邻居给她打了电话。我没有衣服穿。他们撕破了我的睡衣，上面沾满了血，因为生孩子的伤口都裂开了。母亲不知道发生了啥。房子给翻了个底朝天，啥都打坏了，婴儿也裸着，因为他们把尿布也取了下来，看里面有没有东西。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花了许多年，才能够开口讲述这些事。

我一出门，就赶忙寻找丈夫。因为他们自称联邦安全部门的人。那晚，我找上门，告诉他们，那些人把我的伤口都弄开了，我都没法正常走路。他们说找不到我丈夫，那里也没有什么囚犯。后来我们发现，那个地方确实有囚犯，那是个秘密据点，他们在那对人们用刑，绑来的人都关在那里。

官方没有告诉我任何有关我丈夫的消息。许多年后，一些熟人从集中营里逃出生天，另一些人也从流放中回国。从他们手上，我了解到丈夫可能去了哪里。到了 1984 年，我联系上了一些人，证实了我丈夫曾经在海军学校集中营。我丈夫死后，他们还关在那儿。后来，就在 1996 年，我遇到了丈夫的同志：一位同他一起落网，又幸存下来的蒙特内罗成员。他说我丈夫死在了海军学校。他在遭受酷刑后，忍受了两三天的痛苦才死去。我没有找到任何正式的消息。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他还告诉我，当时他们没有把尸体扔进海里。死在海军学校的人都会在校舍后面火化。

寻找丈夫时，我去了教会的每间办公室。我去了自由大楼 (Edificio Libertad)，这地方是海军学校的监狱。格拉西里 (Graceli) 主教在那里。大楼的入口处，海军人员要求我们出示证件。他们把我们的来访记在一份清单上。然后，我们见到了神父，他桌上也有一份清单。他问了一些信息，对我说，“我到处都找不到你丈夫。告诉我一个他朋友的名字。”他一直要求我们提供信息，因为他在为海军做事。那时我的丈夫已经死了。

米盖尔

很难讲述我的个人经历，因为 1976 年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三年前，我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卷入这种事情。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自己，这些事确实发生了。我当时二十二岁，正在司法系统当差，准备在法律界大展身手。我的生活本来在正确的轨道上。我很满足，想着再过几年，兴许能当上法官。1975 年，我结婚了，一切都很美满。但短短一年后，我就无家可归，没有事业，没有工作，过起了地下生活。

我以前参加的政治活动是受许多限制的。你知道的，1972—1974 年，这里社会动荡，独裁制度限制了人权。就是说，年轻人不准留长发、不准听摇滚乐、不准在街上亲吻。文化组织、政治协会、工会的活动受到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和同龄人青春期在政治上的激进。我曾是法学院学生中心的成员，但我在 1973 年退出了，因为我不是活动家，也不想成为政治活动家。

民主政府上台后不久，又开始镇压人民。极右分子逐步控制了民主政府。庇隆去世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所有公共活动都带有暴力的痕迹。1975 年，在国家机器的支持下，法西斯分子每二十小时就谋杀一个人。许多受害者都是年轻人：学生、工人或者当地的政治领袖。全是我们朋友和熟人。因此，我们意识到，国家已经完全放弃了保护公民的职责。国家想让我们死。我们没有要求过警察保护，因为干这些勾当的就是警察。

谁反对政府，就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可不会区分你是批评，还是有什么政治立场。大部分民主政党和议会中的合法反对派也受着威胁。不断加剧的暴力，使我们无法想象任何不带有暴力的政治行动。人们为了生存才使用暴力。1976 年政变后，暴力变本加厉。国家摘下了合法性的面孔。法西斯组织摇身一变，成为了军队和政府。

国家实行了恐怖制度，开设集中营、绑架手无寸铁的公民，以及系统性的酷刑、凶杀、失踪。

好吧，1976年3月的政变期间，我正在法院工作，处理经济犯罪。同时，我也在司法系统雇员的工会工作。这是阿根廷第一个司法系统雇员的组织。工会刚成立时，离政变不到一个月，工会的领导人遭到了绑架和谋杀。因此，政变发生后，我一个月没来上班，观望会发生什么。等我回去上班时，发现联邦监狱的武装人员包围了法院，把守着入口。所有雇员必须出示证件，有些雇员甚至在法官的抗议下遭到绑架。

我回去工作后不久，有两个监狱的人来法院找我。他们是来逮捕我的。幸运的是，前台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虽然我就在隔壁房间里）。这个体制享有豁免权，它能在法院里逮捕雇员，还让人“失踪”。

我立刻找了法官。法官说帮不了我，连送我出门都不行。他给了我一张卡片，上面写了一个号码，能在紧急情况下与他联系，然后叫我赶紧走。这说明什么？法官无法阻止法院的员工被绑架。我在法院也不安全。他只能劝我藏到别的地方，再冒险给我一张卡片。假如我落到他们手里，大概会拿它当“通行证”。当然了，可能也没啥用。

我觉得，法官本可以抗议“非法逮捕”，但他什么也没做。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有许多集中营在运作了，法官原本是能够揭穿这一切的。有个集中营离法院三十条街都不到。每位法官都能指出，那儿的人遭到了酷刑和谋杀。但事实相反，法官们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当失踪者的父母要求人身保护令，寻求帮助时，法官就说不

知道失踪者在哪里。

我们的活动没有多激进，但我在司法系统里是出名的工会积极分子。我其实就是要加薪。五年后，我将成为司法系统的官员，再过一些年，我将成为法律专家。假如没有政变的话，我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我结婚时，买了一套房。出于安全考虑，我没有让朋友来我家，也没把电话号码给他们。我得强调一点，我没有过地下生活：我有工作和家庭，只是个普通学生。那时，已经没有人交换电话号码和上门做客了。是的，我一直呆在家里，直到我的一位同事被抓。然后我和当时二十一岁的妻子离开了家。

我不怎么向往地下生活，也不是革命家。可我的朋友接连遭遇谋杀和失踪，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只想弄明白该怎么做。父母想帮我出国。我们不想出国。最后，我决定加入蒙特内罗。有些事情必须完成，我觉得该做点什么。因此，我参加了诸如偷窃文件、偷取车辆、送人出国的活动。在那个阶段，蒙特内罗正在帮助许多人离开国家。为此，他们需要车辆和金钱。到处都是无政府状态，个人能做的事情很少。

好几个月过去了，一年快要过去了。我们的生活天昏地暗，到处是死亡和流血。而我惊讶地发现，我没有在为推翻独裁而战。我只是在尝试挽救一些人的生命，这让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父辈与我们断绝了关系。我很久都没有见到妻子。失去了家和工作之后，我越来越依赖蒙特内罗。但组织受到了严厉的镇压，基本上散了。领导人也都出国了。过段时间，我们干脆在当小偷，抢劫加油站或者便利店。我们和蒙特内罗的联络越来越少。我们的任务是活下来。我们不断寻找被捕者的线索。消息是靠不住的。我们的联络人失踪了。于是，我们发了疯地想法子联系组织。

无奈之下，我们劫持公共汽车，向去上班的人说明，我们正生活在独裁统治下，人们遭到绑架，他们也可能随时被解雇……但他们已经知道了一切。他们看我们拿枪，就把我们当恐怖分子，只想让我们离开。他们是对的。看出来了吧，当时的局面有多疯狂。

我最开始认为，帮助两三个人逃出阿根廷就差不多了。但后来，我投入进去，甚至想不到要做点别的。离开国家（对我而言）意味着个人的毁灭，意味着接受了军人掌权。也许我到国外去，对恢复民主的事业更有帮助，因为比起游击队的地下工作，我更擅长需要沟通技巧的工作。我一直都反对暴力，直到我不得不与暴力抗争。

关于阿根廷发生的暴力事件，众说纷纭。它与特定的文化背景有关：社会冲突必须用武力解决。法律无法达成共识。统治阶级把意志强加于他人，当被压迫阶级讨要自己的权利时，受到的镇压就更甚了。阿根廷人不认为国家需要守法。在内心深处，他们觉得制定法律的就是国家。如果国家违反过一次法律，就能再次违反法律。但国家还是权威。

我认为这些想法，是从西班牙的反宗教改革开始的。在阿根廷和拉美其它地区的殖民地时期，反宗教改革达到了高潮。在西班牙，反宗教改革本身就是国教。西班牙的宗教战争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是反对基督徒的，而是针对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西班牙人在发现美洲的同时，就把犹太人和摩尔人赶出了国家。为了在广大的美洲传播基督教，西班牙人就认为，殖民是上帝让全世界信仰基督教的神圣法则。国家和上帝的权威一起放在高高的宝座上，而国家的法律和上帝之爱，是作为天赋赐予下人的。当西班牙人碰到土著时，不会说，“我要来征服你。”他会说，“我要来打救你。”如果土著不要打救，就去死吧。这就是镇压的历史根源。

还有更多的现代因素。1955年以来，在以共产主义为敌人的冷战背景下，军方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军队会压迫自己的人民。然后是1976年的政变。政变代表的是农业资本。地主和金融家需要控制国家。为此，他们需要整顿阿根廷社会，这样一来，才能让人们接受更低的收入。

独裁时期的经济部长是旧寡头的代表马丁内斯·德·奥斯。政变前的几个月，他投靠了即将掌权的人——魏地拉和比奥拉将军——以支持政变换取了经济的控制权。马丁内斯·德·奥斯代表了阿根廷最强大的经济部门的利益。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经济力量的集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与外国资本的结盟。

军队的道德在血腥灭绝中瓦解了。军官丧失了道德准则。许多参与镇压的人抢劫了被绑架者的财产，鼓足了自己的钱包。军方听到了他们愿意相信的话，也就是民族主义的语言。我想说，虽然政变表面上出于意识形态，但它同时服务于重建经济的目的。这意味着，他们要做的工作特别肮脏、不道德，连执行任务的人都深陷危机。他们只有通过权力和金钱的诱惑才能克服危机。自军事独裁以来，搞私有化的人也是如此。国家恐怖主义下正在发生什么，法官和司法部门都一清二楚。阿根廷发生了与纳粹德国一样的事情。

好吧，继续我自己的故事。到了1978年底，我的生活经历了严重的危机。二十五岁的我无家可归，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未来，是个货真价实的朋克，而我妻子怀孕了。这是当头一棒。面对这种情况，我本可以抛妻弃子，但我决定试着重新开始。我现在觉得是儿子让我得到重生，让我开始考虑未来。我肯定，假如我回去地下活动，早就死了。我找了个地方住，又找了份工作。那时起，我做过很多工作……我在超市里堆罐子，在五金工厂打工。最后，

到了 1983 年，我用实名找到了工作。我回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我也曾与人权组织合作，几年后，我恢复了学业与合法工作。是的，我错过了赚大钱的机会，但只付出了很小的代价。我没有进监狱，没有受刑。我还活着。一天，我牵着两个儿子的手，送孩子上学。我在校门口与他们告别时，情不自禁地哭了。我还活着，我的儿子们是安全的！

格拉谢拉

我从 1968 年开始积极参加政治。当时，我拿奖学金在欧洲读书。我结婚了，有一个孩子。五月风暴和德国的事件影响了我们。1969 年我回国时，发现朋友都参与了政治活动。我们讨论切·格瓦拉和古巴局势，整个拉美都是这样。所以我参加了这场运动。

在我的小组里，有许多天主教积极分子，还有第三世界神父。我和丈夫开始与他们共事。一位重要的主教为我们主持了婚礼。蒙特内罗在科尔多瓦成立的一年零八个月后，我加入了这个组织。蒙特内罗是一个集团，我们小组在里面有自己的组织与领导关系。那时，我怀了第二个孩子，我是组织里唯一有孩子的女人，所以我比较特别。小组里没别人生过孩子。其他人都比我们年轻，都没结婚，所以孩子还小的时候，如果我和同志们做一样的事，他们就说：“你带着两个孩子能做什么？”确实很难，但我对他们说，“我是女人，但我想和你们做一样的事，而且生孩子很正常。你们一直在谈论工人，可工人也有孩子，他们不是独身的学生，所以你们也要让带孩子的女人参加活动。”此外，我也是社会工作者，我曾在贫民窟工

作过。我了解劳动人民，了解穷人。这些年轻人并不了解他们。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了解，因为他们都独身。运动中也有一些工人，但大多数成员都来自中产阶级。

我们在科尔多瓦的目标是搞钱，但当地并不富有。我不记得做过绑架或暴力活动。我们经常讨论政治局势，认为拯救国家的唯一办法就是游击战。我们抢来汽车和钱。我们讨论暴力的各个阶段。我们认为抢东西和杀人是完全不同的。最初是钱、车子这类东西。后来，我们开始考虑人民的正义。我们想进行审判，把人绑来判决。也许杀死某些人也是正当的。

阿兰布鲁将军死时，庇隆派非常高兴。我和穷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受到了。穷人对阿兰布鲁治下的压迫记忆犹新。穷人很高兴。那时，我还没有在蒙特内罗里担任职务。我们听说了两起暗杀，大家都非常高兴。一起是何塞·鲁奇（总工会总书记，死于1973年9月），另一起就是阿兰布鲁。说实话，我们对鲁奇的死，比阿兰布鲁的死更高兴。接着是绑架索要赎金的邦吉公司兄弟（Bunge Born brothers）案。鲁奇死时，我们开了一瓶香槟。我丈夫说，“哪个疯子干掉了鲁奇？”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自豪。”是的，当初就是这样。有人认为，就该这样清洗工会运动。现在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是最初的问题：我们不理解我国的工会运动代表着什么。这是典型的阶级错误，典型的学生错误。我们没能理解工会的力量。

每个阶段都会产生分歧，就有人退出组织。他们说，“我同意这一点，但我不认同杀死这个人。”然后就离开了。到1976年为止，退出组织都很容易。没有人会来杀你。但你会失去所有的朋友。你会从附近搬走，因为你不想见到老面孔。对成员来说，加入组织就

像一场婚姻。我们在一起分享重要的事。

问：照你的看法，组织里有民主决议吗？

好吧，我希望组织更民主一些，但也不能说他们骗我。后来，我们离开这个国家时，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没想过这一点。我们在六十年代非常封闭。我们可以提出异议，但非常封闭。我们没有多少钱，实在很穷。是的，组织里有上下级关系，首先是军事决策者，然后是党和军队。这是典型的革命组织。

阿兰布鲁对我们的组织没啥影响。没有人因为阿兰布鲁遇到麻烦，但许多人因为鲁奇遇到了问题。鲁奇是庇隆工会中的大人物。没有人会提阿兰布鲁，他只是个将军。许多人认为，杀死鲁奇就相当于攻击庇隆。这是荒谬的。但许多人因此离开了。

阿兰布鲁死后，我在政府机关工作：我不参与秘密行动。我当时在贫困地区工作，工作虽然是政治性的，但是完全公开的。蒙特内罗没有告诉我关于军事行动的事，这是为了保护我，避免把我牵涉进来。我记得科尔多瓦的美国领事与克莱斯勒公司经理的绑架案，但我没有参与过这些行动。不过我知道是谁做的，也知道当时的细节。

1974年，科尔多瓦发生政变，推翻了省长。这位省长和其它四五个省的省长一样，是公开的庇隆派。本地的大多数人都 是庇隆派。幕后黑手是警察局长。政变后，我们有一百多人，就因为是庇隆派，所以不得不离职或者入狱。我们发表声明，全体辞职。警察那天来到我家，但我不在。他们就抢走了所有的东西。

我们离开了这座城市，我和孩子、丈夫搬去了远方。两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朋友说，“他们在找你，你还剩十分钟。”我们举家开车走了。军方占领了房子。那时我们失去了一切。我们逃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有家人在那里。我向家人寻求帮助。我们完全处于地下状态。我和家人呆了一个月，但这非常危险。然后我们离开了，家人也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组织尽力帮助我们。我曾在组织的出版社、文库等地工作，一直到1977年。

那时，我的两个孩子分别是七岁和九岁。情况非常艰难。他们已经懂事了，非常警惕警察。他们会告诉我们：“当心，妈妈，警察离我们只有两条街”等等，他们比你想象的更懂事。我们带着孩子和家什搬了四十五次。1976年，我怀孕了，这一年又生下了孩子。我用另一个名字上了公立医院。同志们觉得我完全疯了。

直到出国，我都一直随身带着氰化物。从军方开始搞绑架时，我就带着它们了。刚开始，我们不理解“失踪”。我们觉得，你会进监狱，但不会失踪。天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此，我们在监狱和警察局里寻找失踪者。我们终于得知发生了什么后，就开始携带药丸。我们有充足的补给；组织的后勤部门非常厉害。我们还有医生。

有一回，我带着情报站在街上，旁边就是警察局。同志在街的另一边等我。警察朝我走来。每一秒我都在考虑是不是要吞下药丸。我假装在等公交，没法转头跑路。我决定，他们要是绑架我，我就把药丸吞下去，但也许他们只是在吓唬我。我很害怕，一时半会手足无措。他们没有绑架我，所以我活了下来。

当时，1976—77年，我只想着活下来。回首往事，那段日子不过是为了活命，仅此而已。但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

一直在奔波。我刚开始和小组里的十个人一起共事。我离开阿根廷时，只剩我一个活着了。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些事情。那会儿，我以为只有我的小组运气这么差。我当时很盲目，我们大家都很盲目。后来，我意识到，大多数失踪都发生在那一年。当时，我只觉得我们的小组运气不好。在求生的过程中，我完全失去了对整个局势的洞察力。那时，我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同志。

我对事物的看法已经不同了。我无法思考明天该做什么、我该如何活下来。我想的只是，明天早上八点要和谁碰面。如果八点零五，人还没到，我就当他失踪了。我会立即联络其他同志：“阿尔贝托失踪了，你们要尽可能地活下来。”我们想的只有如何活下来，没法再考虑别的东西了。我只能想一些小事情，比如：这些人需要十本手册，那些人需要十份文件，我怎么给他们弄到这些？我们曾经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有整体的把握，到后来，满脑子只有一些琐事。太蠢了，全是白费力气。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些。

（组织的）领导人都离开了国家，大都在 1976 年走了。他们回来过一阵，又离开了。他们有假护照。等我们出国后，没有人能再逃出来了。我们用假护照从乌拉圭和巴西离开，但在我们这一批之后，就没有人能出来了。边境封锁了。有些人在机场遭到绑架。

多洛雷斯

1972 年，当军队在特雷利乌搞屠杀时，我十七岁。当年当活动家是很常见的。我们都相信，阿根廷正在经历与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和 1959 年古巴革命同样的过程。切·格瓦拉的角色给了我们

归属感。对我们青年来说，切是阿根廷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感觉自己也是阿根廷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年轻人不可能不成为活动家，这就像是宿命。1973年，当我进入大学时，我一生都在军人的掌控下，所以我感到我们这一代人正处在历史的关键一刻。另外，我们认为自己丢开了阿根廷的书，因为我们在读马克思、弗洛伊德、列维·施特劳斯¹。我还加入了青年团外围的文学活动小组。

1974年，政府开始镇压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不是1976年，而是从1974年开始，伊莎贝尔·庇隆政府就在镇压学校。1974年9月到1975年年中，他们关闭了大学，甚至毁了我们上课的教学楼。我们继续读我们的书，有了所谓的“地下大学”。有些小组在教堂和学生家里学习。当镇压开始后，问题很严重。因为这么做的话，大家都相互认识。假如他们逮到我们，上了刑，很可能逼问出别人。镇压开始后，我们义无反顾地投身抵抗运动，所以我加入了蒙特内罗。我知道这是个军事组织。

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因为加入蒙特内罗，就意味着必须工作和服从命令、与家人保持特殊的关系、加入非常封闭的安全网络。1975年复学后，我负责和学生交谈，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因此，我没有让别人知道我是蒙特内罗。所以，我当时有两个身份：学生和武装游击队组织的秘密成员。但我现在意识到，蒙特内罗给我们的武装，只能让我们白白送死，因为我根本没开过枪。就是这样，假如他们抓住我，就能杀了我。有人教我怎么用枪，但你想象一下：一个带枪的女孩在街上涂鸦，旁边有两名伙伴。过会儿开来一辆车，

¹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年11月28日——2009年10月30日），法国人类学家、人种学家。——中译者注

车上跳下三四个军人。你想象一下，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我认为，我们毁在了内部，毁在军事化上。不仅是组织，活动也在不断军事化。我在蒙特内罗的最后两年里，成天做着安全预防措施。当时，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这并不是阶级斗争。但我不能脱离组织，因为对我来说，在外面比在里面更危险。

我们有军事计划。人民革命军也有，但它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左派。1975年，他们大多数人都死了。我们崇拜他们，但我们觉得反对庇隆主义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要改变阿根廷，就必须通过庇隆主义。庇隆主义是建立社会变革的唯一可行力量。但至少，人民革命军有个阶级斗争的革命纲领，而我们没有。我记得读到过一份从我们组织高层得到的材料，然后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是学生，在智力上非常活跃，所以我们意识到了，这份计划其实不是左翼的。它是左翼术语和右翼实践的结合。

社会成了军营，教会也一样。我们大多数领导人都上过阿根廷的军校。他们来自社会的极右阵营，也就是保守的一方，当他们转向左翼时，我们以为他们变了。当他们撕票了阿兰布鲁将军时，我们就当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他们抓住阿兰布鲁，就要杀了他，因为他在独裁时期杀了庇隆主义者。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有一种宿命感。我们无法看到另一种生存方式。

镇压开始后，我们只能留在组织里。说实话，我没见过谁脱离组织后，还活下来了。脱离组织，等于在一周之内落网。我们有安全网络，可以知道谁被抓了，谁还没有被抓，谁对警察交代了。所有被抓的人都交代了。我有几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试图在1976年初离开组织。接下去的两年，军方把他们全杀死了。

问：蒙特内罗会杀死试图脱离组织的自己人吗？

我不知道蒙特内罗有没有杀自己人。我只知道他们抛弃了自己人，但不知道有没有杀过自己人。

成为“积极分子”就意味着你要去工作，用大部分收入供养一个蒙特内罗的战士。我们干得很卖力，比方说，开车把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参与引人注目的公开活动（我们知道这非常危险，也没什么效果）。我们在中午的集市上，给不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的人发传单（我们就为了一张传单暴露自己），上面写着“我们蒙特内罗会为了国家而死”。我们知道，这没什么用，很冒险，也算不上什么社会活动。同时，我们认为，拒绝这么做或者脱离组织都非常危险。我幸存了下来，因为我还留在组织里。我每天给联络人打三次电话，他会告诉我谁被抓了，谁还是自由身。所以我知道危险离我多近。

军方很了解我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因为他们拷问过许许多多了解我们一切的人。他们知道我住在哪里，我妹妹又住在哪里。我只是碰巧才逃过一劫。他们手上有大量的情报，但他们配合不好，有些单位没那么高的警惕性。他们三次追捕我，每次都差一点。抓我的组织不一样，他们的策略和战术不一样，处理情报的方式也不一样。一个逃出生天的女人告诉我，她在关押的集中营里看到一块黑板。我们所有人的名字和信息（包括工作和住址）都在上面。他们对人动刑，只为核实黑板上的信息。

一个离开组织的人的父母，把孩子回家的事透露给了某人。他

们很快把她抓了起来，然后她供出了一些名字，整个组织就完蛋了。

1977年，我们得知组织的领导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他们说，他们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他们正处在极端危险中，出国是符合组织利益的。就像越南人民必须进入丛林一样，他们必须出走巴黎。你能想象吗！他们用了丛林和越南的比喻，就好像他们躲在丛林里。我的朋友们留在国内，替这些在欧洲的人工作，他们也“处在极端危险中”。我们还留在国内。他们说，组织在与欧洲各国政府商量，力求解决问题。

后来，最糟糕的日子过去了，我们重新开始过上了现实生活，我能去欧洲了。那是1980年。我得知（马里奥）菲尔梅尼奇在巴黎和马赛拉（军政府成员，海军上将埃米利奥·马赛拉）见了面。他们用了非常诡辩的说法为此辩护。我们知道这是一派胡言。据说，菲尔梅尼奇和马赛拉谈论（大卫）格莱维尔的钱。你知道格莱维尔的钱吗？格莱维尔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七十年代初的金融界要人，据说蒙特内罗把邦吉公司绑架案的钱交给了他，但他在七十年代中期遇到空难，死在了墨西哥。没有人知道钱在哪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有人说，菲尔梅尼奇用这钱收买了一些人。

问：你相信马里奥·菲尔梅尼奇吗？

不，我不相信菲尔梅尼奇。问题是，我们知道组织是专制的，但也愿意为运动做任何事情。这就是矛盾所在。这也是我离开大学，成为活动家的原因。我认为，这个计划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什么都行。即使后来我不再相信领袖，我还是相信组织。而你必须

考虑这个阿根廷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问题出在与我们打交道的人身上，而不是整个计划上。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格莱维尔的钱。不，不，我非常确定菲尔梅尼奇不是内鬼，不然的话，我们早像人民革命军那样完蛋了。他们（人民革命军）在 1975 年“消失”了。当时，他们试图占领一个军营，因为队伍里有军队的特务，他们就全完蛋了。所以我想，菲尔梅尼奇这个人非常专断，很自我为是，可能脑子有问题，但他要是被收买了，我们不会活到 1980 年。你要意识到，杀人是阿根廷政治的家常便饭。

我当时不知道菲尔梅尼奇正在和马赛拉对话，但我知道他在巴黎商量我们的存活问题。我记得，我曾和一位朋友说过——对的，形势很艰难，我们不能在大街上进行讨论——我记得，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但我们能讨论的，只有我们的朋友、身边死去的伙伴。我们没法考虑活人，只能考虑死人。他告诉我：“计划是错的”。这句话我毕生难忘。

但同时，我认为唯一能活下来的方法，就是成为局势的一部分。我每天打三通电话，以便掌握我在城市里的活动范围。城市里的某些地方，我们是不能去的。我已经两年没见老朋友了。我见不了妹妹，也只在暗处见过一次父亲。我认为，这也许是我幸存下来的原因，因为我固执地遵守保密原则。

是的，我可以肯定菲尔梅尼奇不是军方的人，也没有被军方收买。一个原因是，蒙特内罗在 1977 年重组了，制定了“返回行动”。我知道一个操办这项计划的人，他 1978—79 年还在巴西。所以，菲尔梅尼奇不可能被军队收买。他准备回国，重振蒙特内罗的组织。

但当时，像我一样留在国内的人都在努力适应环境。

1974 年，我和第一任丈夫到工人区做社会工作。1977 年，我们故地重游。一个人也没了，全死了，房子也炸平了。我们躲在那里，但什么都没了。我们的朋友被抓走了，他们的父母还留在那儿。我们看到计划是错误的：这里的人都死了，一定有什么出了问题。

那是在 1977 年底。我和组织里的某个高层——也许是个重要人物——见了面。那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我记得，我们在泥泞中行走。那是个女人，我没看到她的脸——她戴着墨镜、帽子，脸上蒙着围巾——所以讲不出她的样子。她告诉我，她要摆脱这个“困境”，所以我们留在了荒郊野外。他们确实摆脱了困境。

现在，我认为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在另一个省的朋友遭殃了，就因为他们的组织没有“摆脱困境”。他们明白，继续活动非常危险，但退出组织可能更危险。我们留在了荒郊野外，做什么都行，但他们说：“你们什么都能做，但不能和我们联络，我们也不会跟你们联络。请不要和任何人联络。”我们没有得到联络用的号码。之前，这个号码对我们来说，就像躲藏和工作的地方一样重要。

我们躲在这个工人区里，接下来的两年，我们试着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法拜访家人，非常孤独。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躲躲藏藏，两年过去了。后来，我非常谨慎地看望了父母。不久后，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了住处。回去之后，1980 年，我要求拿回护照，因为我要去欧洲看望朋友。当时，军方知道我的一切。我确定，他们仍掌握我的一切。他们仍控制着一切，但没有再来管我。

在历史的这一刻，两代人之间，母亲和孩子之间，有了一道鸿沟。很明显，她们在五月广场举行大游行时，这些母亲所说的，与

她们过去二十年里对我们说的，是同样的东西。儿女们想听的，是与从父母口中说出不同的东西。此时，我们才意识到，整整一代人始终被迫沉默。就是我这一代。我们没有创造出必要的物质条件来谈论现实发生的事，像我跟你谈起的这些事。我不能跟朋友谈这些事。我不能公开跟你讲这些事。我不能说：“我们是战士，我们有武装，我们不是牺牲品。”因为如果我这么说，就是在说我的同伴，我的同志丧命，是因为他们有武装，然后有些人就能说，这是公平的战争。这可不是公平的战争。

我不能说，我们是专制组织的成员，除非有什么办法审判我们的领袖。但是，对这种局面负有最大责任的领导人们，现在正与政府、大学、公共机构合作，他们在过去十年里一直这么做，他们改写了这段历史，不准我们反驳。照我看，保持沉默是荒诞的义务。

他们有些人认为我们没有错，我们是对的，而我们只是彻底疯狂的镇压的受害者。我同意这是疯狂的镇压，但我不能说这与我们的活动无关。如果我不讲出这一点，就是对下一代（包括我的学生们，他们现在跟我们当时一样大）的不公平。但首先，我得知道如何创造条件，使我们能批判自己的处境。

是的，我很想向你讲述这个故事。这是实话。我们并不是牺牲品。我们确实参加了战斗，我们也相信武装斗争与社会活动是通向更美好世界之路。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的领导人是腐败的、独断专行的，为权力蒙蔽了双眼。在最后的两年里，我们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安全，在一场我们无法理解却必须要战斗的战争中苟且偷生。那就是我在后面几年的任务。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听年轻人来讲了。

他们比我们更真诚，也更直接。有时候，他们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他们知道我们经历过斗争，但不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何等专制。因为我们没有谈论过它，所以在理解上，有一道鸿沟。在母亲（五月广场的母亲）和孩子之间，还有被迫沉默的一代，那就是我这一代，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现在）四十到四十五岁。一些朋友告诉我，要是回到从前，他们会像过去那样，再来一遍。但我肯定不会。当军人满街走，我要如何开口？母亲们好像不受时间的影响。每个人都停留在原地，我们都无法再前进一步。

1992年，大学里开了一场会，一些（我们）组织的领导人也来了。我去旁听了会议，一位领导人说，蒙特内罗有五千人失踪。那是不正确的。如果他们连自己组织里的失踪者都不承认，那我们就不会有公道。他们错了，失踪者还有很多。他们有责任承认我们的人数，宣布我们的朋友与我们的挚爱失踪了。对于这种领导人……要把他们也（和军政府一起）放在公堂上审判。这就是问题所在。历史已经翻篇了。经过了十年的审判，我们生活在了民主下，可以走向新的历史阶段了。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怎样才能说出真相。我们又如何创造条件，使之成为可能？

朋友告诉我，有人说阿兰布鲁不是被杀死的，而是死于心脏病。这太可怕了，因为他的死就是整个计划的开始。所以，他们说出这种话，就是在否定这些年里死去的人，是否定死亡，否定他们身负的责任。我们一直在否定历史。大学里有很多这样的前领导人（有几个至今还在教育部里）。我们（这一代）有很多很多人，至少和失踪者一样多。我们是整整一代人。当然，全世界都有当时的幸存者。我们到处都有朋友，我们交谈，否认，极力忘记。

萨比诺与里卡多

萨比诺：那些与庇隆主义，与庇隆左派、总工会、半“社会基督徒”半左翼分子，还有与后来的蒙特内罗有关系的人，都带上了神圣的含义。但我们不信这套，因为阿兰布鲁死时，他们最后留下了一句“愿上帝怜悯他的灵魂”。这是蒙特内罗的第一份新闻公告，是关于阿兰布鲁之死的。它说上帝应该宽恕阿兰布鲁。“我们杀了他，愿上帝原谅他。”这是天主教文化。我们反对教权主义，不信仰基督教。我们同情与我们观点一致的第三世界神父。我们和第三世界神父是一起的，但我们不是教徒。

我们认为，昂加尼亚的独裁很糟糕。在七十年代初，售货亭卖一份叫《基督教与革命》的杂志。每次我们去买这本杂志，感觉就像在抢银行。这份杂志发表了当时所有游击队组织的消息、探讨、争论，还有全部炸弹案的时间表。那是在 1970—71 年。

里卡多：1972 年，科斯塔·加夫拉斯¹的电影《戒严令》上映。这部片子讲图帕马罗²在乌拉圭绑架 CIA 官员丹尼尔·米特里奥内³

¹ 科斯塔—加夫拉斯 (Costa-Gavras, 1933 年 2 月 17 日——)，原名康斯坦丁诺斯·加夫拉斯 (Konstantinos Gavras)，法国希腊裔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1970 年凭电影《焦点新闻》(“Z”) 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和最佳外语片奖。1983 年凭电影《失踪》获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中译者注

² 图帕马罗 (Tupamaros)，全名图帕马罗民族解放运动 (Movimien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Tupamaros, MLN-T)，是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期间乌拉圭的一支左翼游击队。早年从事政治绑架活动，70 年代初开展游击活动。1972 年被乌拉圭军队击溃后瓦解，主要领导人基本被捕。1984 年获大赦。——中译者注

³ 丹尼尔·安东尼·米特里奥内 (Daniel Anthony Mitrione, 1920 年 8 月 4 日

的故事。我去看了那部电影。走进电影院之前，我是个白痴。离开电影院时，我变成了革命者。之前有一次，我们偷偷看一部阿根廷电影的时候，警察突然闯进来抓人。那部电影是索拉纳斯¹的《烽火的时刻》。索拉纳斯就是那个拍了《探戈，加德尔的放逐》的导演。

萨比诺：对的，《烽火的时刻》完全是部地下电影。我们做了拷贝，因为警察一来，肯定会把电影带走。当时没有录像，没有卫星电视。我十六岁的时候，用假身份证上电影院，里面放法国和意大利电影。我们看了《阿尔及尔战争》，还有戈达尔²的电影。我们想上电影院，聚在咖啡馆里与人讨论，搞搞革命。那段时期非常令人振奋。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些事不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比方说，在波哥大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后来的蒙特内罗这类组织也不是头一回出现的。哥伦比亚的 4·19 运动³（M-19）与它很类似。

——1970 年 8 月 10 日），出身于意大利移民家庭。1945 年成为巡警。1956—1960 年任里士满警察局长。1960—1967 年在巴西担任警务顾问。1969—1970 年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首席公共安全顾问。1970 年 7 月 31 日被左翼游击队“图帕马罗”绑架，8 月 10 日处死。——中译者注

¹ 费尔南多·艾塞基耶尔·索拉纳斯（Fernando Ezequiel Solanas，1936 年 2 月 16 日——2020 年 11 月 6 日），阿根廷电影导演、编剧。1962 年从事电影工作。1971 年公开支持庇隆。1976 年伊莎贝尔·庇隆倒台后，躲过了军政府抓捕，流亡西班牙和法国。80 年代曾在威尼斯电影节、哈瓦那电影节与戛纳电影节获奖。1991 年公开抨击梅内姆的政策，遭遇刺杀，身中六弹，但幸免于难。2007 年参加总统大选，但以失败告终。2020 年 11 月 6 日因感染新冠病毒在法国逝世。——中译者注

² 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1930 年 12 月 3 日——），法国瑞士裔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电影评论家、电影理论家，曾多次在奥斯卡奖、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中译者注

³ 4·19 运动（El Movimiento 19 de abril），哥伦比亚游击队，持左翼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玻利瓦尔主义立场，1974 年成立。早年被誉为“罗宾汉”，积极开

我们很崇拜图帕马罗，但不太了解 4·19 运动。

至于蒙特内罗，它们有一个谜团，我们可以讨论上一整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情报部门放出来的风声。这些武装团体之间有冲突。我不是说，蒙特内罗是军方特务建立的组织。它的建立者是去古巴的青年。当然了，那年头没有去古巴旅游的。他们到古巴去接受了军事训练。他们是基督徒。1968—69 年，他们才二十多岁，有的还要年轻。1968 年以前，蒙特内罗还不存在。只有庇隆主义武装力量。在阿兰布鲁撕票之后，蒙特内罗突然出现了，就像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当时，反对制度的人还是少数。这里有共产党，但它是可耻的斯大林党。比方说，在切死后，他们还举行野餐庆祝。他们是和平主义者。我们瞧不起他们，拿他们来逗乐。

里卡多：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很荒唐。他们在墙上涂鸦：“无产阶级起来反对背叛者”……胡安·加西亚·埃洛里奥编写过《革命左派的日记》。这人的生活很阔绰。他是基督徒，但不是庇隆主义者。他属于反对庇隆的宗教人士。1971 年，有人开车撞死了他，现在还搞不清是不是暗杀。人们一直怀疑他是遇刺的。官方查禁了这本日记。

萨比诺：庇隆武装力量、革命武装力量、格瓦拉主义者最终都加入了蒙特内罗，但人民革命军和“赤膊者”除外。我个人非常讨厌蒙特内罗的宗教味，我加入了庇隆武装力量和“赤膊者”，这俩

展游击活动。1984 年受围剿后遭到沉重打击，此后转向政治绑架行动。1990 年与政府军谈判后宣布解散。——中译者注

都是高中生的团体。庇隆武装力量分成了两派：左派和庇隆派。我们不想去蒙特内罗，但最后还是加入了。蒙特内罗的名字最好听，这是优势。后来坎波拉赢了选举，庇隆任命罗多夫·加林贝蒂¹主持庇隆主义青年团，但他不知道加林贝蒂和蒙特内罗之间的协议。好吧，这促成了所有无政府小组——相当于摇滚团体——与加林贝蒂和庇隆主义青年团的统一。因此，蒙特内罗成为了领导组织，与庇隆主义青年团联合了。

我们对“民主”这个词不屑一顾，对我们来说，民主就是在禁止自由选举的十八年间，学校教我们的东西。我们觉得民主是统治阶级的把戏。无论如何，它只不过是希腊人的民主。这儿有两百个享受民主的希腊人，还有一万个和民主没有一点关系，没有一丁点权利的人。

我们当时还小。我十四岁就参加政治了。当时，科尔多瓦发生了一场起义。当蒙特内罗杀死阿兰布鲁时，政府已经行将就木。政府倒台后，许多银行遭到抢劫。这些革命组织——庇隆武装力量、革命武装力量、“赤膊者”、人民革命军——需要搞钱，他们简直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我知道是他们抢了银行，因为不仅报纸上有讲，他们自己也在谈论。

有时候，我们在晚上放炸弹，然后呆在咖啡馆里，等睡醒后，

¹ 鲁道夫·加林贝蒂（Rodolfo Galimberti，1947年5月7日——2002年2月12日），出身于右翼天主教家庭。1961年加入极右翼组织塔夸拉民族主义运动（El Movimiento Nacionalista Tacuara），后来创立了阿根廷青年促进全国解放组织（Juventud Argentina para la Emancipación Nacional，JAEN）。1973年担任庇隆主义青年团领导人，参加了蒙特内罗。1976年军政府上台后，相继流亡巴西、墨西哥、法国，在法国与蒙特内罗决裂。此后曾赴黎巴嫩，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活动。1989年回国，担任国家情报局顾问。2002年去世。——中译者注

看看报纸上有没有相关的新闻。正因为这一点，一些成员最终进入了新闻界！报纸上说，我们有老练的组织。这是谎言。他们说我们收了莫斯科的钱，说得像真的一样。此外，我们帮助过 1969—71 年罢工的工会，尤其是三个帮我们印刷的工会。我们合作密切。

蒙特内罗成立之初，使用了庇隆武装力量的标志：八角联邦星。甚至蒙特内罗这个词，也是后者曾用过的。庇隆武装力量有一支队伍就叫“10月17日蒙特内罗”。历史上的蒙特内罗是十九世纪国内一支抵抗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剥削的武装。到了 1972 年，其它组织都加入了蒙特内罗，它还打算吸收其它庇隆派。当时，我是“赤膊者”的成员，这个小团体更加民主，大约两百号人。到了 1972 年，组织人数激增。大多数成员只是高中生。组织里可能有一百到一百二十名积极分子。所有左翼小组开始与蒙特内罗合并。

那时，我在军队里服兵役。我尽力掩盖自己和革命组织的关系。我很幸运，因为十个月过去了，他们啥也没发现。他们察觉的时候，我假装过自杀。过了一阵子，我发现三 A 团想要杀我。四个军官说他们要来杀我。他们发现我是蒙特内罗。我装疯，摆出娘娘腔模样。我播放摇滚乐，佯装是一个精神错乱者而不是游击队员。我就是这样逃离军营，结束兵役的。

同时，我警告同志们，三 A 团要杀他们。当时有几个迹象。首先，他们给我的军事训练是特别的。他们说：“我们不会教你如何使用炸弹或火炮，因为你会用这些对付我们。”第二年，在我后面入伍的新兵，待遇就不一样了。他们让一些人穿成士兵的样子，拍黑白照。另一些人则穿便服，拍彩照。他们已经在调查我们了。1975 年，我离开了蒙特内罗，到了一个更左的组织。到 1975—76 年为止，你都可以随时离开。其实他们更希望你离开。我伤心地离开了。

我十六岁就离家，一个人过日子。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青年团和蒙特内罗。他们把我视为叛徒和自由派（“自由派”是句骂人话）。还说我是个人主义者。

1976年1月，我和许多仍把我当朋友，并且爱我的人——都是我儿时的伙伴——一起度假。我尝试说服那些要服兵役的，叫他们别去，因为三A团会杀死他们。我告诉他们，军方已经开始调查了，正在戒备中。他们已经调查了我父母的房子和我的祖孙三代。他们在为政变做准备。我没能说服朋友。两个我最想要说服的人，在当兵时遇害了。我没能说服他们逃跑，离开国家，逃出军队。军队无法无天，想杀谁就杀谁。

我在1975年加入的“工人之声”（见附录）是共产主义组织。它比蒙特内罗更小，参加的暴力活动也更少。我加入的时候，它与蒙特内罗不同：它想要阻止政变。蒙特内罗可不想，觉得可以跟以往的军事政变一样，把军政府再赶下台。他们认为，政变会产生对他们有利的影响：矛盾加剧会使人民激进化。但是我刚从军队里出来。我觉得他们疯了，军队会整死他们的。我极力告诉他们，不要跟军队对抗，不然肯定会失败，力量太悬殊了。但蒙特内罗的大部分人都欣喜若狂。他们讨厌军队，还说发生政变的话，就跟军队打一仗。他们失去了理智。他们有两百人装备凑合，就这么点了。其他人只有小口径的手枪。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1973年何塞·鲁奇死后，他们就疯了。在蒙特内罗的会议上，他们不再谈论政治。他们谈的是后勤、子弹、刺杀。他们的领导人都非常无知。组织里也有不无知的人，但他们不是领导人。

许多领导人死了。活着的人就是灾星。马里奥·菲尔梅尼奇、费尔南多·巴卡·纳尔瓦哈¹(如今在某个市当工业部长)、罗贝托·西里洛·佩尔迪亚²(他曾是军事活动负责人，人送外号“失败者”)。这几个人离开了一线。他们还活着，这三个王八羔子都不是好东西。菲尔梅尼奇讲的话比他这个人还要混账。别的好人都死了。

巴卡·纳尔瓦哈是弗隆迪齐政府部长的儿子。军事学院开除了他，因为他是民族主义者。他本人并不是胆小鬼。二十岁时，他就在铁路上放炸弹，把证件掉在了那里，于是成为了逃犯。1970年到1973年，他东躲西藏，偶尔抢抢银行。1973年，庇隆主义胜利了，大家都聚在五月广场。坎波拉释放了囚犯。突然，巴卡·纳尔瓦哈这家伙在五万人面前用麦克风讲话。他在想什么？那五万人聚在这里，是因为他抢了银行，因为他很勇敢吗？那是在发疯。人们聚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是庇隆派。经过十八年的禁令，庇隆主义再次赢得了胜利。人民把巴卡·纳尔瓦哈当成了庇隆的战士。掌声不是给他本人的。但他觉得群众会跟随他，而他会成为蒙特内罗的领袖。他脑子不太灵光。

我们那个高中生组织里，就我跟我兄弟活下来了。其他人都死

¹ 费尔南多·巴卡·纳尔瓦哈(Fernando Vaca Narvaja, 1948年1月7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69年参加蒙特内罗。1972年蒙特内罗被镇压后流亡智利，在阿连德被推翻后流亡墨西哥。1989年获赦回国。2003年遭短暂监禁。——中译者注

² 罗维尔托·西里洛·佩尔迪亚(Roberto Cirilo Perdia, 1941年7月9日——)，阿根廷律师。1970年参加蒙特内罗，为蒙特内罗的第三号领导人。1976年军政府上台后流亡西班牙。1979年在马德里参与策划了蒙特内罗“反攻”的计划，导致许多蒙特内罗成员在回国后迅速遇害。1983年回国，因阿方辛政府企图审判蒙特内罗，被迫转入地下。1989年被梅内姆赦免。——中译者注

了，要么出国了。活着并不是什么功绩，只是死得晚几天。我兄弟在监狱里呆了八年。我之所以能在 1976 年底还活着，是因为我离开了阿根廷，到西班牙待了八年。他们袭击芙末沙军营的时候，我彻底脱离了蒙特内罗。我觉得他们已经疯了。芙末沙和巴拉圭接壤。游击队在那里没有政治支持，而他们袭击了军营，劫持了一架飞机。他们穿着带红星的蓝色制服、抢来的李维斯牛仔裤、登山靴、蒙特内罗的衬衫，还拿着重武器！大概死了二十人。这太疯狂了。想象一下，士兵会怎么想！士兵都是半文盲。我能想象到，他们看到这些穿着蓝色制服的人，肯定以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好莱坞电影。最糟的是，蒙特内罗还相信，那些士兵会加入他们。蒙特内罗没有嗑药，而是疯了。蒙特内罗让我的朋友死在了芙末沙。我觉得这些人完全疯了。我喝了个酩酊大醉，然后就离开了。

第十一章 图库曼省

图库曼省是个贫穷落后的沿海省份，值得一提的产业只有蔗糖业，就连这一行也在衰败。在肮脏战争中，这个省的恶名不是因为当地居民做过什么，而是由于革命者的到来，他们相信这个半热带山区满足发起革命的条件¹。图库曼省很快成为了国家恐怖主义的试验场，后来军方又把当地的经验运用到了全国。

革命者们很快一败涂地，但一小部分的反对派、学生领袖、新闻记者、庇隆派也卷入了风暴之中。1974—1975年实施“独立行动”的安东尼奥·多明戈·布西²将军，在当地建立了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军工厂”。图库曼省还有许多集中营。军队绑架到那里的人九死一生。我们采访了受害者的亲人，还有图库曼的省会圣米盖尔的

¹ 关于游击队如何看待图库曼事件，可见马蒂尼（Mattini），《从图库曼到拉塔布拉达的人民革命军—工人革命党们》（*Hombres y mujeres PRT-ERP de Tucuman a la Tablada*）。——原注

² 安东尼奥·多明戈·布西（Antonio Domingo Bussi，1926年1月17日——2011年11月24日），1944年入伍。1975—1976年任拉普拉塔第十机械化旅旅长，在图库曼省血腥镇压反对派活动。1976—1977年任图库曼省临时总督，推行强硬的镇压政策，1982年以少将军衔退役。1987年加入图库曼省的右翼政党“省自卫团—白旗”（Defensa Provincial - Bandera Blanca）。1988年在图库曼省创立共和力量（Fuerza Republicana），鼓吹新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1988—2003年任共和力量主席。1995—1999年任图库曼省省长，在任期间大肆贪污。1999年会见梅内姆。因支持率大幅降低，被迫放弃连任。同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但被众议院褫夺了就职资格。2003年当选为圣米格尔·德·图库曼市长，但未能就职，当选三个月后即被捕。2008年判处终身监禁。2011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他们的潜在支持者。我们注意到，这些采访正是在这个布西将军当选为图库曼省长期间进行的。

内利·德·比安奇（里佐）与里佐先生

内利：我在 1923 年出生，一辈子都生活在图库曼的小镇上。事件发生之前，我对政治一无所知。有人告诉我“去给这个投票”，我就去投了。我完全不了解国内正在发生什么。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啥都不知道。只有老板、大地主、有权有势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然，军事政变是有原因的，并非偶然。

庇隆在七十年代返回阿根廷时，左翼组织开始兴起。我们的儿子 1973 年上了本地的大学。大约 1974 年，他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团。什么东西都从大学里冒出来了。他是读生物化学的，对学院行政有意见。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但他当时没有积极搞政治。1974 年，他加入了人民革命军的政治部门。人民革命军在图库曼只有一支一百八十人的小型游击队，加上武装和政治部门，总共就这么点。当时庇隆还在掌权。

1975 年出现了大麻烦。伊莎贝尔·庇隆总统来了图库曼，下达了歼灭游击队的明确指示。他们使用了“歼灭”这个词，意思就是动用军队。总统不是说“扑灭”。她说，应该（以某种我不理解的方式）歼灭，让他们缴械什么的。我认为，她的意思不是杀死他们。我相信……我情愿相信这一点。

我儿子 1975 年还在这里读书。他没有跟游击队进山。学生们想让大学变得更好，那就是他们的斗争，那就是他们反抗的原因，

因为他们想让大学变好。比方说，他们想让国家在大学里开个食堂。有许多年轻人不属于任何政党，也不是共产党。虽然他从不跟我讲他的政治活动，我还是不认为我儿子参加过什么武装行动。我猜，他是在保护我。到了 1975 年，他对我说，“妈，有机会我就结婚，因为他们要杀我。”他结婚了，政变不久后就失踪了。

1976 年 4 月 15 日凌晨 2 点 15 分，他们弄醒了我们——拿枪顶着我和丈夫的头。他们把我丈夫拖下床，强迫脸朝地面，趴在地上。他们粗暴地踢他。十个全副武装的人闯了进来。这帮懦夫，他们伪装起来了，所以我们认不出来。我儿子当时不在家。

里佐先生：他们自称是警察。但除了一个人，我们认得出是警察之外，全部都是军人，后来那个警察被自己人打死了。我认为他们都是军人，因为他们都有南方口音，听上去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我们说的“南方”是指科尔多瓦以南的地方。他们制服我们后，开始在房子里翻箱倒柜，抢劫一空。他们拿走了内利的戒指和女儿的项链。我当时在大学里当电工，他们从我的工具箱里，拿走了钳子、手电什么的。他们摸走我身上的工资，把支票顺走。后来他们兑走了这张支票。

内利：是的，支票兑走了。他们把东西全拿走了。他们把冰箱搬空，吃掉了冰箱里的所有东西。

里佐先生：他们蒙上了我的眼睛，把我的双手绑在背后，带出屋子。我没法走路，因为他们打伤了我。他们把我脸朝下，放在地

板上，在我脖子上缠安全带，踩在身上，想让我们说出儿子的下落。

内利：之前，他们还叫醒了我十一岁的女儿，拿枪顶着她的头。

里佐先生：之后，他们把我放到车上，车里还坐着另一个蒙住眼睛的人。他是我儿子一个学院的学生，他们是朋友。我认出他来了，因为他有呼吸上的毛病，我能听见他在喘气。司机对图库曼不熟，旁边那人叫我带路，去我儿子和他妻子住的地方。我了解这座城市。每天，我都会经过那块地方，所以我数着经过的街道。然后，我们到了儿子丈母娘家里。我呆在车里，他们进屋抓人。儿子上了另一辆车，然后一起开走了。感觉一共有三辆车。

内利：第二天，早上很早，因为我没有睡，手上也没有电话，我去了儿子丈母娘家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到了那儿，他们告诉我，他们所有人——这一家人很多——都躺在地板上。家里的母亲是残疾人，不能动弹，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很恶劣地对待她，殴打了她，强迫脸贴到地上。算上我儿子，屋里有八个人。他妻子已经怀了五个月的身孕。他们把塑料袋套在她头上，然后把人丢在那里。房间里有电话，但他们切断了电话线。

里佐先生：他们带走了无线电、录音机……

内利：他们把能拿的都拿了。他们把东西都抢走了、吃掉了。床罩、毯子，什么都拿走了。

里佐先生：他们带走我儿子后，把我带去了离这里十五公里的巴蒂耶霍（Patillejo）。到地方，一个南方口音的人问，“我们拿这个老家伙怎么办？”然后他打开门，把我丢了出去。当时车还在开，我双手绑在背后，脸蒙住了，所以啥也看不见。我就记得这些。

内利当时很糟，她吓坏了。过几天，我想投诉警察，但警察劝我不要这么做。他们说，我这么做，什么也得不到，还会把工作和一切都丢掉。受理投诉的人把我的文件丢掉了。我们没有主意，不知道能做什么。我们没有律师，也没有人想掺和这件事。那天晚上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做事情，因为我走路非常不便。我将近一个月没法回去工作。我们还有另一个问题：内利的情况一直很糟。我们让她吃了镇定剂。

内利：我吃药吃了一年。就算是这样，醒来时，我还是去了警备司令部。我要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在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填了起诉书。我去了，但我的情况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后来，当他们看到我非常糟糕，无法走路，无法进食、睡觉，啥也没法干的时候，就让我去看精神病医生。那时，我已经向第五军区司令部提出了指控。

这起行动是布西将军干的。安东尼奥·多明戈·布西是我们遭遇的罪魁祸首。他搞了图库曼省的三十三所集中营，特别是“军工厂”那个。这些营地在政变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失踪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也说明了图库曼的事件¹。

¹ 图库曼，《省报》（La Provincia），《两院调查委员会关于图库曼省侵犯人权事

我康复后，开始联系别的被绑架孩子的母亲。我们是母亲的组织，大约有十五人，我们的孩子是同学，所以我们见了面。孩子们都是4月15日那晚的行动中带走的。他们带走了罗梅罗家的孩子（两兄弟），带走了叫麦地那的男孩，也带走了我的孩子和其他人。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失踪了。我们只知道他们遭到了绑架。

我们十五个人一起去了主教办公室，搞得他们很烦，就把我们送去了圣心教堂，让我们在那里聚会，不要在主教办公室烦他们了。后来，我们天天都上那儿。否则天主教会就会反对我们，站到军队那边去。我是天主教徒，从小就受洗了。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见了教皇使团的皮奥·拉尼¹。他也是政权的帮凶。除了很少的人之外，整个天主教会都是帮凶。对的，有海梅·德·内瓦雷斯²主教和拉罗·阿马特·佩雷斯³神父这样的例外。他们一位在拉里奥哈被阿尔金德吉伊暗杀，另一位在帕塔哥尼亚遇害。还有一个8月4日遇害的安赫

件的报告》（Informe de la comision bicameral investigadora de las violaciones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 provincia de Tucumán），1974—1983。之前，当地居民也编写了一份简短的名单，列出了失踪者的身份（Nomina de 409 personas detenidas desaparecidas de la provincia de Tucumán (Argentina), denunciadas por sus familiares, n.d.）。——原注

¹ 皮奥·拉尼（Pio Laghi，1922年5月21日——2009年1月10日），梵蒂冈外交官。1946年成为神父。1952年在梵蒂冈教廷工作。1974—1980年任驻阿根廷大使，支持军政府，但反对设立秘密监狱，1980年被驱逐出境。2009年逝世。
——中译者注

² 海梅·弗兰西斯科·德·内瓦雷斯（Jaime Francisco de Nevares，1915年1月29日——1995年5月19日），出身于上流家庭，1951年成为神父。1961—1991年任内乌肯教区主教。1969年起积极支持工人运动。1976—1983年积极参与人权运动，创建了常设人权大会和普世人权大会。1983—1984年任全国失踪问题委员会委员。1995年去世。
——中译者注

³ 拉罗·阿马特·佩雷斯（Lalo Amate Perez），生平不详。
——中译者注

雷希。我们一直在向教会寻求帮助，他们都拒绝了。他们不想惹上麻烦，最多是接待我们，给我们孩子念主祷文。这就是全部了——他们只给孩子祈祷。我们理解不了教会的做法。

我们去找过省长布西。他从来没有胆量接待母亲，从来没有。政府里一切照旧。我们上政府站好几个小时，谁也不搭理我们，我们只好回家。在这一整年里，自从我康复后，就去各个地方：我去了主教办公室，去了教堂——从教堂再去主教办公室，又从主教办公室回到教堂——就这样到了 1978 年。那一年，我们派了二十个代表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了那儿，我们了解到还有其他母亲——五月广场的母亲，于是就加入了她们。我们上门找了各家人权组织、正义与和平服务处 (SERPAJ)、我们现在所属的人权常设集会，还有各个非天主教教会的神父¹。他们倾听了我们，敞开大门，给了精神上的支持。这些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他们的为人与帮助都令我印象深刻。

1981 年 9 月，“母亲”组织在图库曼正式成立。此前四五年母亲主持我们的小组，她们是共产党。她们有些消息没有转告我们。图库曼省有大约四百名母亲在寻找失去的孩子。我们是羊群。最初决定成立独立的组织，与五月广场的母亲合作的，就是我和我朋友。我俩都是母亲。接着，其他母亲也从别的组织来加入我们……

我相信一切都是因为政治，因为人民的不满情绪在增长，政府需要制止它。当宪制政府倒台时，他们为消灭那些为人民而战的人，进行了“猎巫”。布西一开始就参与其中。他发起了“独立行动”。经过精心策划后，“猎巫”开始了，人们开始失踪。1973 年或 1974

¹ 如系新教教会，中文里称为“牧师”。亦可统称为“教士”。

年就开始了，我不太确定。在独裁之前，1973年，就有失踪案了。布西将军早就参与了。他老早准备好了关押的营地。最可怕的营地是“军工厂”，去到那儿的无一幸免。那是个大型屠宰场，里面分成十个区，每个区里挖了六个坑，每个坑六米深。每十到十五天，他们在人手臂上绑红丝带，把人带到洞口处死。囚犯跪在洞口，布西朝他们开枪。他们会把可以烧的东西扔进坑里，把囚犯（有时活着）扔进去。官员们都参与了这场屠杀。杀多少人，只看布西的心情。

我从一个囚犯（他从那个地方幸存下来）那里听说，我儿子就在这里，后来《十二页报》(Página12)上也有说。我知道儿子在那里，因为十多年后，一个当时关在那里的年轻人对我说，他和所有的生物化学系的小组成员都关在那里。他见过我儿子的朋友。

现在布西又当回了省长。这个人满口扯谎，没有遵守他的承诺。这里那么苦，穷人又那么多，但非常穷的人投票支持他。（投票的）他们不是法西斯分子，但他们做错了。我只觉得，我的孩子不值得为此而死，不值得为了这种人而死。

玛尔塔·奥菲利亚·瓦洛伊

1976年，我正在读书，在中学里兼职教书。我完成了在图库曼大学的哲学与文学系的学业。我根本没有参与过政治。但我姐姐的政治活动影响了全家的生活。她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运动，一开始是在大学里，后来到外边活动。现在她和丈夫都失踪了。我们家不知道她参与青年团活动的细节，只知道她念中学时，就是积极分子

了。之后，她搬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姐姐在 1977 年 5 月失踪。当时她二十七岁。

他们留下了一个婴儿，只有一岁零三个月大。在我姐姐失踪的两个月后，我们终于把孩子找了回来。当过兵的叔叔告诉我，孩子在他那里，但他从未告诉我们，孩子是怎么到他家的。所以我们把孩子接回来，现在也和我一起住。直到叔叔联系，我们才知道姐姐不见了。我认为她逃走了，把婴儿留给了叔叔。叔叔告诉我们，婴儿留在了公寓门口，随身还有一些衣物和一张便条，上面叫他照顾好孩子，因为姐姐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又告诉我们，是姐姐自己丢下孩子的。我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很久以后，到了 1984 年，我们和曾在集中营里的人谈了话，才得知婴儿是和父母一起被绑架的。先是我姐姐，然后是她的丈夫和孩子。她在孩子面前受到拷打，他们就是在孩子面前对她用刑的。

我们是从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那里听说的。姐姐的案子成为了审判军方指挥官的证据。她遭到绑架的事实成了证据，但孩子受到虐待的细节没有出现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能用孩子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孩子到这里时，才一年零三个月大，他不能躺在床上，见不得任何穿制服的人。施刑者是穿制服的。所以他见到护士、医生、担架，就会变得神经质。

我以前当老师，但一直打零工维生，生活很忙，没什么前途。当局拒绝承认我的学历。这是教育部长定的规矩。我想，有亲属失踪的人都这样：我们被打入了另册。我们在社会上也受到歧视。有很多人，甚至以前的朋友，再也没来看我们，也不再和我们说话。一些邻居也歧视我们。我们在人权组织的帮助下，认识了许多有亲属失踪的人。

我们的邻居听说了姐姐的事，因为她和丈夫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报纸上有新闻说有左翼武装分子在逃，其中就有她和丈夫的名字。他们知道我侄子就是我姐姐的儿子。我们掩盖不了孩子的来历。此外，我们也不想把他藏起来。有很多人，很多我们认识的人，都掩盖了家人失踪的事实。他们害怕受到排挤，所以否认了事实，也没有去寻找失踪的亲人。他们不是怕在亲人身上发生什么事，而是害怕排挤，或者不能升官。比如，我有个想当法官的律师朋友，她明白，如果她有个失踪的兄弟，那她就当不上法官了，因此否认了这回事。他们从没有去寻找过他，就当兄弟已经死了。

当布西将军赢得图库曼的选举时，人权人士遭了很多罪。有位五月广场的母亲死于中风。她得知布西赢了选举，还当上省长，就中风了，一直昏迷到去世。深受独裁统治之苦的人，承受了许多道义上的痛苦，因为布西是镇压图库曼的元凶。我的两个孩子和侄子承受了许多痛苦。他们在经历危机。许多家庭都是如此。这是悲剧！就像哀悼，可怕的哀悼。自从布西掌权以来，什么都没有变好。

至于人们为什么投票给他，三言两语无法解释。可能是其它党派执政表现太糟糕了，人们要惩罚它们。行政部门缺乏组织，而布西似乎是“秩序”的保证。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图库曼的社会具有非常独裁专制的文化。世界上最保守的教会就在图库曼。这里的天主教会全是纳粹。还有一种说法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说，人们会投票给自己的……出于病态，他们在寻求自己的压迫者。

图库曼大约有四百多人失踪，还有像我姐姐一样，在图库曼外面失踪的。还有一些没有人认领的失踪者。然而，就算那么多家庭受到影响，社会仍把失踪者的亲属视为左翼分子、恐怖分子或恐怖分子的亲戚。许多人为镇压辩护，他们仍然认为失踪者的死亡与受

刑，是因为犯了什么事，就应该受到惩罚，认为他们是社会的祸害。

图库曼的天主教大学始终受到保护。甚至天主教大学还为镇压提供合作。他们列了一份左倾分子的名单。我们后来才得知这一点。天主教大学非常非常反动，此外，它还充当镇压的先锋。学校领导承认手上有名单，甚至威胁一些人说，“我们要把你放在名单上。”指挥这一切的是多名我会的教长，这人和军队走得非常近。在六七十年代的镇压中，他掌管着秩序和天主教会，民主化后，他离开了图库曼。他最近回来访问，看望了好友布西将军。他离开后，人们发现了军队和图库曼天主教大学之间的秘密协议，上面让天主教大学接管图库曼国立大学的事务。后来，这人离开了图库曼，去了阿根廷的另一个地方。

这些协议已经发表在了报纸上。民主化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发现后谴责了它。左翼学生的名单也公开了，上面的许多学生都失踪了。我们还在图库曼国立大学的档案室里，发现了名单。当时，国立大学的校长是军方任命的，所以两所大学的政策相同。他是极端天主教分子。协议表明了两所大学都有收集情报的任务。校长在大学里搞了情报部门，无疑在监视学生的活动。许多军官成了大学的行政人员和教师。他们没有隐藏身份，也顺便监视着工会。在这些学生名单中，还记录了每个人的政治倾向和人际工作关系。

国立大学内部建立了一套情报部门，带头的是校长。此外，学校公开任命了一些特务，负责监视学生、获取情报，乃至渗透自己人。我的意思是，他们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他们丝毫没有掩饰。虽然他们没有把“我是情报机关的”挂在嘴上，但他们毫不掩饰身份。总之，当时有许多军官在大学里当行政人员。

政变之前，1974 年，但尤其是 1975 年，不仅是学生，工会会员也受到迫害。1976 年，蔗糖工人领袖安蒂利奥·桑迪杨¹遇刺（也可能是人民革命军打死了他）。同样，教师工会的创建人与总书记伊萨罗·阿兰西维亚²也在政变当晚遇害。他死在自己家里。他们还杀死了他的兄弟（只是偶然在场）。是布西将军指示军警干的。

当时大家都很害怕。我不知道敌人是谁：敌人在暗处。身边同事可能就是揭发检举你的人。我姐姐失踪后，感觉谁有亲属失踪，就被打入了另册。你会遭到排挤。至少到 1978 年，我们才了解事情的全貌。一直以来，我们认为犯人不过是从一个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从没想过集中营和审讯有那么恐怖。1979 年美洲国家组织来的时候，我们才得知酷刑这回事。我们怀疑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直到那时，才意识到它全部的恐怖之处。我们相信这些人还活着，直到 1980 年左右，我们还对此抱有一线希望。

里卡多·富马洛神父

大约在 1970 年，制糖产业陷入危机。总的来说，图库曼制糖厂的设备都过时了。当地保留了在提炼厂附近住人的古老传统。当

¹ 阿蒂利奥·桑迪杨 (Atilio Santillan, 1935 年？月？日——1976 年 3 月 22 日)，阿根廷工会活动家。60 年代初开始担任图库曼制糖业工会总书记，激烈反对军政府，持右翼庇隆主义立场。1976 年遭到人民革命军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² 伊萨罗·阿兰西维亚 (Isauro Arancibia, 1926 年 3 月 25 日——1976 年 3 月 24 日)，阿根廷教师和工会活动家，曾参与工人革命党的活动。1973 年创建阿根廷教育工作者联合会，担任副总书记。1976 年 3 月 24 日军事政变爆发时，遭到警方杀害。——中译者注

提炼厂陷入危机时，所有人都失去了工作……这个小省份有着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高失业率、亚热带丛林以及横穿丛林的两条大路。颠覆分子认为这里是建立根据地的要地。他们觉得自己能影响人民。他们来自科尔多瓦、圣塔菲、布宜诺斯艾利斯、拉普拉塔，基本都是大学生……还有些智利人、玻利维亚人……我不记得有古巴人。没有古巴人吧。差不多就这些人。

图库曼的农村居民不支持他们。在古旧的阿根廷，图库曼省的宗教民俗与天主教文化更为浓厚。甘蔗田和提炼厂的工人不支持游击队。支持游击队的都是大学里来的。这是意识形态（问题），对吧？在图库曼市，大学成了颠覆思想的中心。教会里也有人和大学里的颠覆分子有联系。但这些人没有钻进丛林。他们从城市里来。

政府机关、甘蔗种植园主、提炼厂、蔗糖工人工会之间，进行了复杂的谈判。颠覆分子的存在，在城市和乡村中引起了不安。当时的军政府，也就是拉努塞将军的政府，无法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重新举行选举，民主政府成立后，各个政治党派都无法提供领导。我只能说，它们都是二流的领导角色。

有些人原本可以提供更好的领导，可以出更大的力，但他们不愿意。许多人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顾虑游击队活动，宁愿袖手旁观，也不肯亲自出面，力挽狂澜。和提炼厂老板有关系的人都远离了这里。大学领导层是左翼。比起经济权力，工会领袖更想要政治权力。教会发生了分裂，因为教会内部有一些非常左的神父。而图库曼的普通人都蒙在鼓里。

当时，我在大学里工作。我试着保持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避免卷进政治。那段时间，国立大学成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力量的中心，

而不是学术中心。天主教大学受政治影响较小，没有烧书，也没有为了政治原因解雇谁。这所大学属于“多名我会”，神父们都献身教会。

需要区分意识形态上的贫困和真正的贫穷。教会把自己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是犯了错误。七十年代的局势非常复杂困难。颠覆分子在这里挑起了内战。我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留在国内教导人们，重建和平。许多高谈阔论的人不在国内，而在巴黎、马德里等地。他们把武器带给年轻人，然后离开国家，再作为“人权的救星”回国。那些留下来，重建生活的人，往往受到了叛徒般的对待。

卡特领导的美国提倡人权，自诩为“裁决者”。美国不管自己国内，却插手别的国家的人权。美国采取了两项重要行动，导致了苏联解体。卡特一方面在军备工业上削弱苏联，另一方面关注人权，削弱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力量。我的意思是，卡特总统把人权作为美国内外政策的优先事项，以此削弱敌人。

我想说，杀人是不应该的。军队犯下大错。首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列宁主义的分析，从马列主义武装斗争的角度看待颠覆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眼下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列宁主义的，而是葛兰西主义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通过文化上的改革夺取政治权力。因此，他们选择了错误的策略，把原本的文化斗争变成了武装斗争。我认为，军队拿文化斗争没什么好办法。我们年轻的国家没有认识到危机。这场危机的出现，是因为人们从未感到自己融入国家的政治体制，这就导致了重大的制度危机。

阿根廷的大学和教会都没取得政治权力。我要说，这就是庇隆主义的目的。它作为人民运动兴起，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伟大价值，

因此具有力量。庇隆主义理论虽好，执行得却很差，所以没有成功。然而，这股精神使它保留了下来。这在阿根廷是很难理解的。政治家就不理解。军人更是一窍不通，他们自以为是庇隆主义之外的另一条出路，其实并不是。

问：在我们看来，似乎问题是（国家）无法应对多元化、无法容忍异己。

好吧，我认为“多元化”是个当代词。阿根廷一直都是开放的国家。我的祖父母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英国人、阿根廷人！1825年，有位英国人来阿根廷旅行，出版了一本关于他对阿根廷印象的书，书里讲了件轶事：尽管多年前，英国入侵了阿根廷，但他还是能在阿根廷自由活动。这样的开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问：是的，（你说的是）国家之间的开放，但我指的是思想上。

你瞧，是这样的，我们用“多元化”一词表示个人权利的减少，我是说，国家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减少。但是除了多元化，也就是个人自由之外，政治共同体还要有共识，要承认自身的文化遗产。这可不是多元论的。因此，我们说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西班牙文化、法国文化，或者斯拉夫民族的文化。这些价值观不能是多元的。

至于你把“多元化”和容忍异见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在观念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军队不应该与颠覆分子对话。他们是国家机关，依照国会选出的共和国总统的法令行事，而总统命令军队镇压叛

乱。这是 1975 年，伊莎贝尔·庇隆下的命令。所以军队是作为国家机器行动的。失败的不是军队与颠覆分子之间的对话。对话是在平民的层面上失败的。国家机器无法对话。军队不是去对话，而是去打仗的。危机是平民危机，而不是军事危机。

我认为，我们需要搞清楚一点：政治机构能否让观点不同的人共事，或者领导者能否履行自己的义务。我认为，当代阿根廷最大的危机，是（早在 1880 年建成的）体制的危机。当时的民族国家是大型机构（大学、军队、政治权力与议会）构成的。这些机构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它们属于英国设想的国际政治的一部分，直到一战结束，英国都是国际政治力量的中心。当这个中心转移到美国时，我国制度还是那样，好像什么也没变。然后二战来了，这个国家仍旧保持原样。这就导致了制度的危机。最后，这个制度破产了。

在我看来，现在还缺少合适的主流政治领导核心。人民不信任政客，感到自己选出的国会议员、民意代表并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由于上述体制问题，阿根廷社会没有演变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模式。我国各阶层缺乏对何为全社会共同利益的理解，让主流政治显得复杂难辨。因此，民主化以来的阿根廷社会没有产生良性的民主政治，而让政治生活充斥着“压力集团”，产生了社会无政府状态，尽管它貌似没有取代日常的权力结构。我认为，这是阿根廷目前最大的政治难题。人民需要相信主流政治力量。这也是今日政治人物的重大挑战。不解决民心问题，阿根廷政治就没有出路。这也是国民教育制度必须承担的重大责任。

一群失去亲人的女人

以下片段摘自与几位妇女的对话，她们讲述了各自在图库曼的经历。

比安卡：图库曼的省长是退休将军安东尼奥·多明戈·布西，与军政府时期的图库曼省长是同一位。图库曼发生的八百起失踪案都是他干的。民众投票选了他当省长。这事儿太可怕了，我们一直都想不通怎么来解释它。

安娜：图库曼有三千人遇害或失踪。没人说为啥要杀他们。我失去了五个家人：父亲、母亲、妹妹、哥哥和怀孕的嫂子。他们在一起午睡。为什么是他们？好吧，可能是家里的年轻人：妹妹、哥哥与我本人都参加过政治活动的缘故。我们是庇隆主义者。妹妹和嫂嫂都是学生活动者，而我加入了印刷工会，我认为这就是原因。这些理由足够绑架你了。但为什么父母也受到牵连？完全说不过去。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答案。

政变就是肆无忌惮行凶的开端。我们认为，这场政变与阿根廷发生的其它政变的区别在于，这场政变是有条不紊地反对人民的。他们把“国家安全战略”变为了现实。

加布里埃拉：最早用在巴西、乌拉圭、智利、玻利维亚的方法，也用在了阿根廷上。美国没有直接参与，但一些阿根廷军官在巴拿马受过训练。比方说，当时的图库曼省长布西将军就是在巴拿马受训的。整个社会生活在恐怖主义之下，被迫保持沉默。

比安卡：沉默是因为恐惧，还因为部分人的共识。总之，主导社会的首先是恐惧，其次是同谋。教会和其它机构都是同谋者。

加布里埃拉：我认为，教会作为机构，具有原教旨主义的、麦卡锡主义的自我意识。就像是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圣战。它超出了基督教的本质与启示。在我看来，这是造成当今社会严重腐败的一大原因。因为这种同谋是不道德的。它带给了我许多痛苦，因为我是天主教徒。我丈夫毕业于智利天主教大学，年轻时是天主教领袖。他投身了“人类进步”。这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启示。我们受到了一些最进步思想家的影响，他们在努力帮助穷人。

我丈夫是图库曼人道主义学生联盟的主席，是个出色的学生。我们有很好的国际教师团队。他在 1977 年 7 月 21 日遭到绑架，同一天里，另一位学生领导人也被带走了。此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图库曼省的大学里，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在同一天失踪。他们是大学里的政治对头，没有私人交情。这种巧合让我觉得，这起绑架是有预谋的。他们想消灭所有的年轻领导人物。时至今日，似乎是这些领导人的消失，才使人们想起了失踪者。

有人曾在乌尔基萨 (Urquiza) 监狱待过，见过我丈夫和另一位失踪者，他向委员会提供了证词。这些反人类罪行至今没有下文。在国际社会上，你 (采访者) 作为外国人，觉得人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路易萨：人民是这种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人们在担惊受怕。这

些机构，军队、教会、政党——尤其是政党，甚至庇隆党和激进党也是一一都在作壁上观。比方说，伊莎贝尔还担任总统的时候，他们通过了《独立法案》，表示必须肃清颠覆分子。那是 1975 年，庇隆党和激进党都在法律上签了字。后来军方以法律的名义实行绑架。那会儿还没政变呢。政党的领导人全是同谋。他们还说，杀人很有必要。有人遭到绑架，其他人却压根不知道这回事，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出现。不知为何，政党的领导人却说这是必要的。这就是他们同谋的方式。

许多报纸都说一切正常。是的，报纸也是说过，那是“必要的”。不过，报纸可能无法随意开口。新闻记者的受害人数比其它组织的受害人数要多。当时约有一百位记者失踪，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国家持有并控制了许多电视台和广播站，因此控制着大众媒体。另外，许多报纸、出版社都赞同军方的做法。而反对者啥也做不了。

安娜：我现在给报纸写稿。我必须带着悲痛生活在这个不作为的民主政府之下。将军一伙人控制了政府。最痛苦的则莫过于，明知道这些人的滔天罪行，还得与他们共处。罪魁祸首是布西将军跟他的共犯。他们必须：首先，承认发生在那么多人身上的真相。第二，公开忏悔罪行。第三，向受害者的亲友子女请求宽恕。第四，作为补偿，退出政坛与公共视野。

如今，他们受到了豁免法的保护。法律保护了他们。梅内姆总统赦免了他们。另一些人则受到《应有服从法》¹的保护。大多数人

¹ 《应有服从法》(La Ley de Obediencia Debida)，1987 年 6 月 8 日由劳尔·阿方辛政府颁布，其中规定上校以下军衔的军人在国家恐怖主义和军事独裁期间所

没有受审，而受审的人，又得到了梅内姆的宽恕。出于今时今日的苦痛，这些人物至少要退出公众生活，再让他们继续从政是不道德的。此外，这也是给下一代人的糟糕例子。

比安卡：他们是杀人犯。

加布里埃拉：布西将军是以 48% 的得票率，民选产生的省长。他是“进程”中的省长，而且也参与了屠杀。

路易萨：我个人在感情上无法理解。不过，先不谈它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和痛苦，我可以用理性去解释。显然，其它政党都没有给出可行的出路。

比安卡：人们给杀人犯投票，这怎么解释？布西之前的省长欺骗了人民。人们投票给他，是相信这个人能让图库曼摆脱混乱和经济灾难。帕利托·奥尔特加¹是歌手，图库曼出身，是个非常贫贱的庇隆主义者。他以前当甘蔗园里的工人，六十年代里，突然作为歌

犯的罪行（除了抢走小孩和窃取失踪者财产）将不被起诉，因为他们的行为符合“应有服从”（军事术语，指下级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这项法令的受益人包括阿尔弗雷多·伊格纳西奥·阿斯蒂斯与安东尼奥·多明戈·布西将军。——中译者注

¹ 拉蒙·巴蒂斯塔·奥尔特加 (Ramón Bautista Ortega, 1941 年 3 月 8 日——)，即帕利托·奥尔特加 (Palito Ortega)，阿根廷歌手、演员、唱片制作人和导演。出身于汽车工人家庭。1957 年进入乐坛。1991—1995 年任图库曼省省长。1994 年任制宪会议议员。1998—1999 年任社会发展部长。1998—2001 年任国会参议院议员。1999 年加入正义党，任正义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但未能当选。2013 年获拉丁格莱美音乐卓越奖。——中译者注

手和吉他手火了起来。转眼间，他成了图库曼省长候选人。许多人认为，他代表着脱离生活的混乱与无序的可能性，但帕利托·奥尔特加的政府欺诈又腐败，怎么看都是彻头彻尾的灾难。那是个大骗局。所以他必须下台。但机会到来时，各党都没提出有分量的候选人，布西就赢了选举。我听有人说，布西也许能带来秩序。我们就回答，他会带来让人失踪的秩序。

安娜：这是一种说法。有的说这是“惩罚”。还有的说，阿根廷社会的独裁专制还没消失。它是人们行为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还未成熟。这里没有民主的作风，还很落后。比方说在军队中寻找救世主的历史倾向。我们有过的军政府比平民政府更多。

比安卡：我不认为会重蹈覆辙，因为国际社会现在不支持军方了。但这不是内部原因。我认为，军方仍能够通过民选掌权。民主没有带给人们它所承诺的东西。

路易萨：我同意比安卡的话。我只想澄清一点：在卡洛斯·梅内姆总统的高礼帽下面，也是个出身卑微的图库曼人，但这人是个成功的歌手：我指的是现居迈阿密的帕利托·奥尔特加。我支持激进党，但我不想让布西赢得选举，所以投票给了帕利托。照我看，他们故意让奥尔特加当庇隆派的候选人，就是想保送布西当选。

安娜：还有，至于军方是否会重新上台，我想澄清一件事，我认为军队不再是必须的了，因为他们的角色：国家庞大经济利益的

监护者，如今已为民主总统所取代。

路易萨：现任省长布西就是选举上台的。不希望他获胜的人，投票给了帕利托。他们甚至说，选举有舞弊，否则帕利托·奥尔特加就选上了。

安娜：布西关心富人的经济利益。但非常穷的人也支持他。他的许多票来自贫困阶层。民间传说中，布西将军名叫多明戈（domingo），这是庇隆的中间名和圣日（礼拜天）的名字。因此，他是庇隆将军的象征。

加布里埃拉：我们知道失踪者都死了，但我们想知道他们在哪里。失踪者遭到了绑架。他们无法开口，荣誉受到玷污，至今不得平反。我丈夫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就连最凶恶的罪犯也有权申辩，失踪者却无法为自己辩护。社会不理解，因为每当我说：“我的丈夫失踪了，”他们会问：“他做了什么？他犯了什么法？”出于对孩子父亲的爱，我必须捍卫我丈夫，我也始终在捍卫他。这也是为了孩子，他们必须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无辜的，可他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也希望，那些置身事外的人能够意识到，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人曾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我希望人民能够致力于人权事业。我想，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这种事再次上演。

比安卡：还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教师身上。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我们就看着学生一个接一个失踪。我们留意到有人没来上课，

就问她（大多数学生是女生）是什么情况。没有人能找到她，突然之间，人不见了，要么出现在官方的被捕名单上（上面说她们“依国家执行权力批捕”），这并不表示她们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再也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再也不会见到她。这成了我们的责任，我们中选择留下来，而不是离开国家的人——我选择了留在国内——有责任尽力帮助这些年轻人。但我们面临着伦理问题，我现在仍和学生与孩子面对着这一问题：如何教会她们民主，又不让她们身处险境呢。这是我们的职责。作为教师，教育她们尊重他人，是我永远不会放下的责任。但同时，我必须教她们要小心谨慎，以免成为又一个失踪者或受刑者。

我是外语教师，所以有了解决伦理问题的机会。我的办法是，教授拥有民主精神的文化——非常坚实的民主精神……就像法国文化一样。主要是通过文学，通过那些被禁的文学作品。加缪¹、萨特，甚至圣埃克絮佩里²（《小王子》的作者）都成了禁书。“国家执行权力”禁止了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从图书馆里把这些书拿走了，因为从安纳托尔·法郎士³（首字母 A）起，所有法国作家写的都是禁书。我们把书全都带回家，都分掉，以免这些书付之一炬。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烧了大学中央图书馆的书。我还记得，我们四五

¹ 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 1913 年 11 月 7 日——1960 年 1 月 4 日)，法国小说家、哲学家、评论家，1957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局外人》，《鼠疫》。
——中译者注

²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1900 年 6 月 29 日——1944 年 7 月 31 日)，法国作家、空军飞行员，代表作《小王子》。
——中译者注

³ 阿纳托尔·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1844 年 4 月 16 日——1924 年 10 月 12 日)，原名弗朗索瓦·阿纳托尔·蒂博 (François-Anatole Thibault)，法国小说家，192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金色诗篇》，《波纳尔之罪》。
——中译者注

位法语系的老师来了，把书带回了自己家。这样一来，就保住了我们视为至宝的东西，我们也能继续教书了。这是很冒险的。要是他们发现了，就会逮捕我们，或者让我们失踪。

我们的许多同事丢了工作……比如学院的院长。这里也有黑名单，上面有名字，有个人和院系的活动。心理学系关停了，因为它在黑名单上。全国的社会学系都关停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的都关了。我承认，虽然我不担心自己——当时我不害怕——但我为年轻人担心。我总是告诉我的孩子和学生，要是他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必须组织起来，紧密合作。不能单打独斗，因为国家恐怖主义不是一个人能面对的。

国家拥有权力。不幸的是，我们的民主是假的。按照宪法，人民选出政府，但是各种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导致民主或正义根本无法实现。行政机关拥有无限的权力。司法机关不是独立的，受制于行政机关。是的，最近的宪法改革后，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都服从行政权力的意识形态。梅内姆上台后，撤换了好几个最高法官。梅内姆有权选出法官，因为他的党在国会里是多数。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终身制的。因此，除非是国会决定的政治审判，否则法院都要服从行政机关的意识形态。所以社会变革非常非常缓慢。

第十二章 媒体与国际背景

《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在社论中表达了社会主流对 1976 年政变的普遍看法：

“全国上下松了一口气，意识到剑胆琴心的卓绝人物已接管了政府权力……被迫拯救国家的人们，他们是值得钦佩的革命者……这不是又一场玩弄权术的政变，而是救国行动。站出来挽救危局的那群人并不渴望权力，而是身负使命，又严肃对待这一使命。采取了最初的行动后，我国的新领袖似乎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在言语和行动上，新政府都值得称赞。它业已创造一种气氛，为解决国内问题提供了新颖的思路。过去一年半的道德、经济、社会衰退，宣告终止了。国家复兴并非易事，但已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看样子，军政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内的真诚合作与海外援助指日可待。”¹

西班牙语报纸普遍支持政变，不过它们的社论调子更多是存疑观望的。军政府时期充当官方喉舌的《国家报》表态支持政变，但又有所保留：

“危机结束了。在政府已死、已倒台的国家中，这不足为奇……与其说政变激发了惊讶，不如说巨大期望……鉴于

¹ 《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社论，1976 年 3 月 25 日。
——原注

当前任务艰巨，最关键的是军方的行动要维持现有的凝聚力。国家拥有宝贵的信心，但恐怖主义也在伺机蠢动。”¹

许多社会群体对政变的支持与喜悦持续了数月之久。军队也表现出了克制、清醒、正直。

1976年4月下旬，政府下令“凡涉及颠覆活动、发现尸体，及军警与颠覆分子死亡的题材，除非有官方的可靠信息来源，否则一律不得发表评论和文章。绑架和失踪也包括在内。”²对于任何一个绑架和暗杀不算高发的国家来说，这恐怕是一声警告。但它在阿根廷新闻界中没有激起波澜，正如官方的说法：“国家正在战争中。”阿根廷从未中断过审查制度，伊莎贝尔·庇隆政府更是加大了审查力度。因此人们认为军方的行动是适当的、必要的。

其实，军方并没有下达“审查”的指示，而是鼓励媒体自我审查。它给了一些指引，名为“大众媒体应遵循之原则与规程”，里面提供了大致的指示，以“促进有助于社会健全基本价值观的恢复。例如：在基督教道德下的秩序—劳动—等级制度—责任—身份—诚实……等等；捍卫家庭制度……对一切形式的恶行采取坚定一致的行动”及诸如此类的道德建议。

此外，它还给新闻界定了一套“规矩”，包括“不得涉足不适合公众讨论（粗体是原文就有的）的内容，因为受众还没有对它们的影响做好准备（教育程度不足），或是内容不适合他们的身心；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上，凡是资格或威望不足以发表意见者，均

¹ 《国家报》(La Nacion)，社论，1976年3月25日。——原注

² 《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社论，1976年3月25日。——原注

不得宣传任何意见。包括采访和 / 或街头调查。”¹随着记者和编辑接连失踪、报社遭遇炸弹袭击，这些模糊的指令很快变得更加具体。

自我审查变得比官方指令更严苛，阿根廷的大多数媒体成为了新式国家恐怖主义的无声见证者。这有一部分是恐惧，还有一部分是历届政府对它们的镇压所致。但是，至少在早期阶段，由于庇隆夫人治下的混乱局面，报纸大都支持军队接管政府。

1976 年 4 月 5 日，《拉普拉塔日报》的出版商劳尔·克莱塞尔伯德²（他的父亲遭到蒙特内罗绑架，1974 年在警方突袭中遇害）首当其冲告诉美洲新闻协会说，“现在判断阿根廷的新闻自由还为时尚早。”但一年后，他告诉同一个协会，阿根廷新闻界正遭受着“集体恐吓”³。1977 年 4 月，巴黎《世界报》报道说，自政变以来，共有七十二名新闻工作者在阿根廷遇害、被捕或失踪。1978 年 3 月，《世界报》给出的数字是四十人失踪、二十九人遇害、七十人被捕或入狱⁴。

¹ 译自“新闻与传播国务秘书处”（Secretaría de Estado de Prensa y Difusión）的指示，出自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 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第 118—119 页。——原注

² 劳尔·爱德华多·克莱塞尔伯德（Raúl Eduardo Kraiselburd, 1944 年 5 月 12 日——），阿根廷记者。1962 年起在《拉普拉塔日报》工作。1974 年他的父亲被蒙特内罗绑架并杀害。1976 年他的儿子和妹妹被军政府绑架并失踪。1974 年至今担任《拉普拉塔日报》主编。1994—1995 年任美洲新闻协会主席。2000—2009 年任拉丁美洲新闻学教学鉴定理事会主席。——中译者注

³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 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第 122 页，第 144 页。第二段讲话出自美洲新闻协会（Inter-American Press Association），卡塔赫纳，哥伦比亚，1977 年 3 月 28 日。——原注

⁴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 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第 153 页。附录 A 中提供了“国家执行权力”、大赦国

媒体的报道有多少是真实的，谁也不清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关反游击活动的报道有所增加，几家西班牙语报纸上，充斥着所谓在军警的突袭中发现的“武器库”照片，还有所谓在战斗中打死的“游击队”尸体。

根据安德鲁·格雷厄姆·约尔（时任《先驱报》的政治编辑，1996年接受我们采访时，他当上了主编）的说法，“在阿根廷，历届政府决定的审查和新闻的自我审查之间，只有很细微的差别。”¹到1976年8月底，格雷厄姆·约尔的专栏文章接受的自我审查，要少于大部分的新闻媒体。当时，他注意到（他现在也那么警惕），尽管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做出了保证，“遭到绑架或失踪”的人数依然令人担忧²，而游击活动“正在减少”，这表示政府关于“战争”的说法是在夸大其词³。下一个月，格雷厄姆·约尔就流亡伦敦。《先驱报》继续默默地刊登失踪人员的情况，挑战当时的自我审查。而主编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继续发表着保留意见（但不再唱赞歌）的社论⁴。8月22日，考克斯在名为《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际、伦敦的全国新闻工作者工会（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给出的记者名单。——原注

¹ 同上，第14页。——原注

²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全国盯着变化》（All Country's Eyes on Changes），《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1976年8月15日。——原注

³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没有高潮的屠杀》（Bloodbath No Climax），《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1976年8月22日。——原注

⁴ 考克斯（Cox）主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始终报道在失踪人员的信息与军警犯下的抢劫案，而其它报纸早就不报道这些新闻了。——原注

的社论中，几乎是在指控政府指使了政治领袖等人的失踪，以及爱尔兰帕罗廷郊区神父的谋杀案：

“体面人始终在自我安慰，那些没法归咎于左翼颠覆分子的谋杀案，都属于报复杀人……大多数普通人呢，心存侥幸：那些怪不到左翼颠覆分子头上的死亡与失踪，最终会有一个不至于激起他们义愤的答案，而真相大白的时刻来了，那就神父被残杀。从那一刻起，阿根廷的每位守法公民都看得越来越清楚——除非让偏见蒙蔽了双眼——某些没头脑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已经发疯了。此后，不可能再说无辜者遇害都是左翼颠覆坏分子干的了。没有什么比内政部昨日的新闻公报更接近于证实这样的怪物存在。它拒不承认‘这起野蛮的事件完全是失去理智的疯狂团伙所为’。可我们至今仍未见警方抓获一个‘失去理智的团伙’的成员。”¹

考克斯一家多次受到死亡威胁，于 1979 年 12 月 16 日离开了阿根廷。

以下采访提供了马克西莫·盖恩萨 (Maximo Gainza) (当时《新闻报》的出版商兼所有者)，还有安德鲁·格雷厄姆·约尔 (他在 1976 年流亡前是政治主编) 的看法。

马克西莫·盖恩萨

¹ 《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社论，1976 年 8 月 22 日。
——原注

人权组织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每一家报纸都提供了文件，但只有两家报纸发表。这两家还刊登了六千多人的失踪名单，《新闻报》就是其中一家。《新闻报》刊登了佩雷斯·埃斯基韦尔¹博士的两页广告（后来，他因为捍卫被关押者与失踪者，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广告费是现金支付的。为此我们失去了一万订户。人们不想了解正在发生什么。

我不在乎是三四万人、六千人还是一个人。在任何文明国家中，都不该有人失踪。要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你必须明白，军队只是一家国营的大公司。我们都知道一般的国营公司有多糟糕。你得知道，这个穿制服的武装官僚组织，手上的枪给了他们权力。枪的权力高过法律。人们开始失踪。

好比律师弄丢了所有与案件有关的文件，就会打输官司一样。然后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但这不太现实。可那些穿制服拿枪的人就是这么干的。他们更像官僚，而不是像疯子一样思考。当然，里面也有疯子，但大多数都是穿制服拿枪的地道官僚。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问题。他们就是这么对待人的。

我们有个主要通讯员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如果这些人是有罪的，是所谓的恐怖分子或游击队，无论如何都应该受到审判。如果他们有罪，那就根据绑架和谋杀的法律，判他们死刑。

现在阿根廷约有五万三千名退役和现役的三军军官。他们一般

¹ 阿道夫·佩雷斯·埃斯基韦尔（Adolfo Pérez Esquivel，1931年11月26日），阿根廷画家、雕塑家与人权活动家。出身于西班牙移民家庭。1971年参加非暴力运动。1974年参加解放神学运动。1975年和1976年分别遭到巴西政府和厄瓜多尔政府拘留。1977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遭受酷刑，监禁14个月后获释。198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中译者注

在四十五至五十岁退伍。陆军共有一万五千名士兵，一部分是女兵。没有义务兵了，全是职业兵。在一万五千名陆军中，有一万人负责官僚工作！海军学英国人，陆军学德国人，空军又学意大利人。庇隆当过驻意大利武官，尤其崇拜墨索里尼。希特勒的作风更官僚——要求条理和整齐划——但墨索里尼是鼓动家，懂得适当变通。

二战前夕，我们大学里只有两种人，要么亲纳粹，要么不亲。亲纳粹团体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弗朗哥，因为弗朗哥是天主教徒，而阿根廷是天主教国家。共产主义无法在阿根廷夺取权力，因为人民总会回到天主教。庇隆是全能的，是说一不二的老大。要是庇隆将军觉得哪个工会势力强过头了，就会干掉它。有人试过，然后挨枪子了，就像鲁奇那样。

问：《新闻报》是如何让人们了解军队掌权后的局势的呢？

我们发表了很多社论。但是呢，要是国家感觉不舒服……就像你不舒服，就会怀疑自己得了癌症：一些人会立即去看医生，要是得动手术，那么还有得救的机会。但有些人不去看医生，他们不想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阿根廷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知道军队在杀人，晚上从家里把人带走等等。可他们不想了解这些。当我们发布失踪者的人身保护令时，甚至都没人读。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始终要敬这份报纸三分，最后只是把我们接管了。为什么我没有留住报纸？因为我们忍不下去了。在这个不体面的国家，办不成体面的报纸。1951年，庇隆政府第一次接管了我们。四年后，在阿兰布鲁总统执政的1955年，我们把它拿了回来。但没有政府

喜欢我们：他们不喜欢《新闻报》的独立立场。他们尊重我们，要么是想改变我们。比方说，庇隆没有垄断官方广告，但是昂加尼娅政府干了，还建立了垄断官方广告的代理商。别忘了，那时候的航空、铁路、燃气、石油、电力公司都是国有的，政府手底下有九百家企业，它们的广告生意是非常赚钱的。他们不想支持独立的报纸。你随便写什么社论，但在报纸上，人们读得最少的部分就是社论。占星运势最流行，但我们从来没有这个版面。

问：另一家发表埃斯基韦尔的失踪者名单的报纸是哪一家？

《观点报》，提莫曼的报纸。我们发表的东西一样。在那段时间，提莫曼站在游击队那一边。他变了。大多数的左翼优秀作家都给《观点报》写过稿，左翼总有比右翼更好的写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确实写得更好。他们写得很不错。

问：显然，你们不是左翼报纸，但你们发布了这条新闻。你受过威胁吗？

有一回，新闻局的秘书打电话来，告诉我，我们不能发布与游击运动、战斗相关的任何新闻。我问他：“这是建议还是命令？”他说：“这是命令。”“好吧，那告诉你的上司，拿书面的命令给我。”他说：“你不得发表任何与游击队作战相关的人员伤亡的新闻。”于是，我把这些话放到了头版上。至少读者能够知道，为什么报上没有实时新闻。但当天，附近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我们查了有关枪

击的报道。什么也没有。

问：那么，为什么其它报纸那么害怕？

因为他们经历了长年的恐吓，一直在担惊受怕。他们没法改变。盖恩萨是巴斯克人，巴斯克人都非常固执。所以我们也没法改变。1976年，革命推翻了伊莎贝尔·庇隆，好吧，我们知道这革命（政变）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也收到消息，它会在那一晚发生。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让印刷机待命，得到全国各地的更多消息后，一连出了六版报纸。

第二天，我发现其它报纸关于这场革命连一行字都没有写。因为，新的军政府曾召集了新闻业的所有大人物，给他们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不得印刷有关革命的任何内容。会开完后，他说：“《新闻报》的人在哪儿？”但《新闻报》的人没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发布新闻时，我们不在他们的通知名单上！所以我们是唯一一家（不在场的）报纸。他们在搞官僚主义那一套。这些人的通知名单上，没有他们不想联系的报纸的电话。他们没有《新闻报》的人的名字和地址，多年以来都没发现这一点。

左翼从来没有提过我们出的两页报纸。我在纽约拿了美国基金会的奖，这个奖是因为一直与独裁战斗，还有……出版了两页六千名失踪者的名单。你问他们：“看过那两页了吗？”他们说没看，因为左翼不想表扬敌人发表的东西。你知道的，就算你们是敌人，你也要尊重对手和他们所做的事。那才是正派的做法……

人们害怕你，因为他们知道，假如哪天要我们帮一个违法的忙，

我们是不会做的。他们声称我们是在帮助敌人。公布失踪者名单又不是在帮助敌人。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发表过整份人身保护令，法官会介入，但（名单中的）大多数人——年轻人，没人知道（在哪里）。但那两页印出来的时候，可不是一张人身保护令的事，那事关千万人的失踪。

安德鲁·格雷厄姆·约尔

七十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的政治编辑，在九十年代担任主编。

当你有整整一代人，非常活跃的一代人在讨论政治时，有位将军说，不许搞政治活动，禁止党派，还要派骑警进入大学。第一个结果就是一整代的讲师说：“好吧，我们就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确实走了。一夜之间，学生没有了政治活动，也没有了老师。顺便说一句，这不是道歉或借口，也不是同情游击队，但我认为，当你发现所有讨论政治的门都关上后，你就会用枪打开它。这不会发生在加拿大，不会发生在英国。但这发生在了许多地方。你想表达自我，就只剩下“暴力”一条路了。这就是发生在我们那一代的事情。（当时的）蒙特内罗的领袖要比我还小两岁。

年轻的游击队都来自民族主义团体、天主教团体、左翼团体，他们不是在意识形态下，而是在枪杆下走在一起的。里面也有出色的人。我记得一位朋友，他是那一代的领军诗人，比我大一点点。他死于枪战。是的，就在游击战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有一点：蒙特内罗刚开始只有十二个人。他们绑架和杀死阿兰布鲁将军时，只有

十二个人。那十二个人里，只有一两个人活了下来。之前，我认识还他们几个人。后来，很久以后，我见到了马里奥·菲尔梅尼奇。我是在邦吉公司绑架案之前见到他的，还采访过他。

问：阿兰布鲁事件改变了你和他们的关系，或者你对他们的看法了吗？

我的看法始终如一。你不能到处去杀人，就算为了政治信仰也不行。我不知道，假如我在希特勒的德国会怎么样。但我和这些人保持联系，他们会来报社，而且他们信任我。不信任我的人是菲尔梅尼奇。他下令杀了我，因为我亵渎了艾娃·庇隆的形象。

问：你怎么知道他下令杀你的？显然，你现在还活着。

因为他有个助手是圣乔治学院的盎格鲁—阿根廷人。这人说：“不，不，你不能杀死安德鲁。”他们有些人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报社放了颗手榴弹。桌面是玻璃的。他们在金属桌内放一枚手榴弹，拿根针当保险销戳上去，当有人打开桌子——好吧，我把领带、架子、文稿什么的，统统放在里面——当你打开抽屉时，会拉走保险销，然后炸开花。他们放炸弹的时候，那位同志说，“你可能不喜欢安德鲁，但不要杀了他。”命令就收回了。

我觉得，菲尔梅尼奇要杀我是为了两件事。首先，我朋友写过一本书，关于艾娃·庇隆生平的最早一批书，叫做《艾娃·庇隆传的笔记》(Notes for a Biography of Eva Perón)。它就在我办公室。

警察搜查过一次后，书弄丢了。一两个月前，我在一家二手商店里发现了这本书。我在 1970—1971 年写了书评，是在阿兰布鲁事件之后。他们恼火了，想杀了我。他们也想杀死作者。更糟的是，我们还再版了《纽约书评》的奈保尔¹给《艾娃·庇隆史》(History of Eva Perón) 的评论。那是在前一件事晚些时候，在 1972 年。接着，奈保尔本人来到了阿根廷，写了一篇关于艾娃·庇隆的长文，叫《铁门背后的尸体》(The Body behind the Iron Gate)。我们再版了这篇文章。因为我担任政治编辑，蒙特内罗认为我对此负有责任。

因此，书评加上奈保尔文章的再版——对艾娃·庇隆的恶毒侮辱——这两件事使他们决意杀死我。奈保尔说，艾娃·庇隆是阿根廷男子心目中的女子，她鲜红的嘴唇激起了阿根廷男性对口交的幻想。我们再版了那篇文章，蒙特内罗对我说，“你去吃我的屌”。这就是他们要杀我的原因，但这个命令收回了。

民众对庇隆抱有幻想。因为昂加尼亚想让历史停滞不前。历史的终结不是福山²，而是昂加尼亚发明的。昂加尼亚想彻底停止阿根廷的政治活动，禁止了党派活动。庇隆完全失败了，他老人家的经济政策早在五年前破产了。但一夜之间，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成了狂热的庇隆主义者，要知道，这是幻想的产物。如果你关上所有门，不允许任何政治活动，你也看到了，(庇隆) 成为了教父般的人物。这些人创造了围绕胡安与艾娃·庇隆的政治幻想。

¹ 维迪亚德哈尔·苏拉吉普拉萨德·奈保尔爵士 (Sir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1932 年 8 月 17 日——2018 年 8 月 11 日)，英国作家。200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中译者注

² 指《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兰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中译者注

问：我读过你写的邦吉公司案的报道¹，他们把豪尔赫·博恩（Jorge Born）送回来的地方非常有意思。然后，马丁·安德森书里说，菲尔梅尼奇是情报部门的人²。你知道这一点后，对菲尔梅尼奇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这么说吧，菲尔梅尼奇是顶位的，因为之前的领导人都死了。我一直都不喜欢他。后来在他受审时，我试图掩盖这一点，因为律师本来可以把我的偏见提出来。我非常讨厌他，他也要我死。假如他们问，“你是否与当事人有任何过节？”就会完全摧毁我针对他的证言。既然他们不问，我就不必多说什么。官司就是这么打的。

问：但马丁·安德森认为，菲尔梅尼奇是双面间谍。

我不知道菲尔梅尼奇是不是双面间谍。（假如他是的话）我也不惊讶。我已经说了对他的看法。假如他像著名的恐怖分子卡洛斯³一样，直到最后一刻都扮演着双面角色，那么他就是为钱卖命的。卡洛斯在一通壮举后，说他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钱。我认为菲

¹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满是恐惧的国家》（A State of Fear），发表于博恩交换了六千万美金的赎金后。——原注

²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原注

³ 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Ilich Ramírez Sánchez，1949年10月？日——），绰号“豺狼卡洛斯”（Carlos el Chacal），出身于委内瑞拉共产党人家庭。1970年加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持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1973年开始从事政治绑架活动。1975年12月21日率领一支小队攻占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总部，抓获42名欧佩克部长，劫掠大量款项后逃走。1994年在苏丹治病时被贴身警卫出卖，被法国警方逮捕回国。1997年、2011年、2013年、2014年四次判处终身监禁。——中译者注

尔梅尼奇就是为了钱。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我在法国大使馆，恰巧碰见了一位死去的蒙特内罗的母亲，我对她说：“我对您女儿的去世深表遗憾。但她是为了她的领导人才倒的霉。此人要么是彻头彻尾的原教旨法西斯主义者，要么就是个新法西斯分子。”这位母亲非常生气。我承认，对于她的不幸，她有权利生气。但在我看来，菲尔梅尼奇把年轻人都派去送死了。这位母亲说，“不，从流放中回国与军队作战是个人的决定。”她女儿为信仰而死，虽然我很想，但我总不能跟她说，“我很抱歉，女士，但你女儿是个要命的傻瓜，这就是她死掉的原因。”当然了，你不能对人家这么说。

1974年，我转入地下。有那么十天，我每天晚上都要挪地方。我得说，地下活动对坚强的性格、个人技能、保持思考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你不仅是进入地下。那时我很孤独，我得决定怎么打发这十天时间。我没有去上班，就在天天换地方。你必须知道要去哪里，谁会收留你，而不会吓得把你赶走。菲尔梅尼奇突然宣布，由于蒙特内罗受到迫害，他要转入地下。他把整支队伍留在了地上，方便自己进入地下。你是在告诉安德鲁·格雷厄姆·约尔，让他自己玩去吧，你告诉那些还在台面上活动的人，那些每晚回家和父母妻儿在一起的人……他们……你对他们该怎么说？好啊，这是谋杀他们的同谋。你不该这么做。

回到安德森说菲尔梅尼奇是双面间谍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双面间谍）。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但有些事很奇怪。一名上校曾经渗透了关博恩的房子（我曾作为记者去过现场）。后来这名上校发现，绑架人质很有赚头，就加入了蒙特内罗。那人是个双面间谍。我不记得上校的名字了。最后他进了监狱，因为这样做很容易

被盯上。如果能给一方干，为什么不能给另一方干呢？军方没有公开表示过“菲尔梅尼奇是个双面间谍”。这些都是传闻。更何况，安德森没有援引过菲尔梅尼奇身边人的话。但我不会因此说他的好话。他还和马赛拉谈判。马赛拉尝试和菲尔梅尼奇谈判。马赛拉完全是坨屎。菲尔梅尼奇也是，他们两个都是。

但那是后话了。当时马赛拉正在西班牙寻求支持。还有加林贝蒂（如今成了豪尔赫·博恩的安全顾问）之流，身边全是保镖。还有一位脱离蒙特内罗逃到西班牙的诗人，他指责菲尔梅尼奇的狂妄，因为他派队伍回阿根廷，简直是送死。但即使是他们，也不会说“这家伙是双面间谍”。他们都是臭虫……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是控告菲尔梅尼奇的主要证人。我是记者。因此检察官和法官开了后门，给我看其他证人的证词。我看到加林贝蒂在证词中，详细解释了蒙特内罗内部是如何管钱的。但他从没说过菲尔梅尼奇是从小偷。要知道，他把组织的整个资金管理的过程全盘托出了。

问：你认为，（由于受访者在豪尔赫·博恩的移交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你参与谈判的绑架案里的钱，真的到了蒙特内罗手上吗？

哦，是的。我认为到了蒙特内罗手上，一部分放在古巴。古巴是他们大多数人的银行。古巴没有把钱吞掉。检察官认为钱给古巴拿了，但我认为古巴不会拿走钱。有人给我提供消息——不，不是提供消息，而是干脆告诉我——菲尔梅尼奇被捕时，他手上有六百万美元，足以收买你翻供。到分佣金的时候，我可能就拿到六百美元。我有个律师朋友从伦敦打电话给我，“只要你翻供，就能赚六

百万美元。”但那时，我已经做完证了。所以孩子们一直对我说：“我们本来可以发财的……”

1976 年，我离开了阿根廷。法国为我提供了庇护，但我不会法语。保守右翼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¹下令法航尽快把我全家送出阿根廷。吉斯卡尔签署了命令。我从未见过这个人，这辈子都没见过他。大赦国际叫他做点什么，把我弄出阿根廷。法航给我全家提供了机票和热情款待。那是在 1976 年。我非常感谢法国政府拯救了我和家人的生命，但我想去伦敦，在那儿我能讲英语。

后来，我非常走运，在伦敦的《每日电讯报》找到了工作。我又到《卫报》工作，直到 1984 年。那一年，我回国为菲尔梅尼奇的受审出庭作证。是阿方辛叫我要回来的，他的意思非常明确。1983 年 12 月，阿方辛上任时，颁布了两项法令，一项是让军政府由他们的同僚审判，换句话说，设立军事法庭。另一项是审判游击队领袖，但他们手上没有游击队领袖。几个月后，军事法庭表示，没有针对他们同僚的指控。审判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了。而阿方辛承受了巨大的国内外压力，所以他要让军政府伏法，下令审判魏地拉那

¹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1926 年 2 月 2 日——2020 年 12 月 2 日)，1944 年参加自由法国运动。1956 年发起成立独立派与农民全国中心 (Centre national des indépendants et paysans)。1956—1959 年、1962—1963 年、1967—1969 年、1973 年 4—5 月、1984—1989 年、1993—2002 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59—1962 年任财政部国务秘书。1962—1966 年、1969—1974 年任财政和经济部长。1966 年发起成立独立共和党，并于 1966—1974 年任独立共和党主席。1967—1974 年任沙马利埃市长。1974—1981 年任总统。1977 年发起成立共和党 (Parti républicain)。1978 年发起成立法国民主联盟。1981—2020 年任宪法委员会委员。1986—2004 年任奥弗涅省议会主席。1988—1996 年任民主联盟主席。1989—1993 年任欧洲议会议员。2004 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2020 年 12 月 2 日因感染新冠病毒而逝世。——中译者注

伙人，魏地拉、马赛拉……显然，他们对他说，如果他不至少审判一支游击队，就不能审判军方。后来发生的事情，从法律术语上讲，算是“程序违法”。

菲尔梅尼奇当时在巴西，受到巴西当局的保护。他去领事馆领护照，然后嘲讽了当局。巴西当局在左派压力下，本来是保护菲尔梅尼奇的，结果突然食言，声明不再为菲尔梅尼奇负责。于是他们立即把菲尔梅尼奇带上飞机，抓回了阿根廷。

在公开的法律程序中，菲尔梅尼奇受到了刑事指控，而不是政治指控。指控是在博恩绑架案中，他杀死了博恩的经理博世（Bosch）。而他们在捏造的法律程序中，引用的是我书的某个译本。他们没有其它的合法文件证明自己的指控。所以它是“程序违法”。这是非法的。我不知道（证据有什么用），它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本书的翻译而已。政府部门完成了翻译，检察院负责提出引渡程序。

菲尔梅尼奇押送回国了。有一种说法是，菲尔梅尼奇想要被抓，就自投罗网，然后进行了谈判。他认为自己回国后，肯定是无罪释放。阿方辛不接受，就捏造了假证，所以我说是“程序违法”。然而，他叫我回国，给我书里的一章和自己的经历作证。后来，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法院要求我跟菲尔梅尼奇本人对质，搞得程序更合法的样子。

问：当然了，你一直受到警察保护。但那以后，你受到保护了吗？我的意思是，菲尔梅尼奇获得自由了，然后……

不，不，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不要去旅馆，政府想做掉你。到我家来。”他这么说是要承担责任的。“你就到我家来。”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我的意思是……算了。他只说：“来我家”。我就带了十二个保镖去了。我认出了带队的保镖。我说：“嘿，我认得你，你 1975 年想杀我。当时你还闯我家里来了。”他拍着大腿说：“啊哈，生活没有改变！”而他也没有。换句话说，以前要杀我的人，现在在保护我。我在朋友家里，朋友认为他家比旅馆更安全，旅馆里万事难料。保镖都知道我在哪儿。如果我要过马路，他们就会切断周围的交通。这就是一次“过马路行动”。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感觉有点久。然后我回到伦敦，直到 1994 年，我当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的编辑后，才回阿根廷久居。

还有件事，我该告诉你。1976 年，我在伦敦。一位阿根廷科学家在《新科学家》上发表文章，讲述了军政府时期的学术界发生了什么。一位军官给《新科学家》写信说，“这绝对不是真的。太荒谬了。军方从来没做过那样的事情。”我看到了这段话。我平时不读《新科学家》的，碰巧有人拿给我读。然后，我给《新科学家》写信，给他们附上了我在科尔多瓦被烧的一本书里的一段话：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哪一天发生的云云。你看，记者都闻讯而来了。科尔多瓦的书全烧了。图库曼也烧了非常多的书。他们查封了出版商，烧光了书。我那封信告诉了世界，这里都发生了什么。

国际意见与干预

军方镇压的理由是，他们是从颠覆分子和共产党手中拯救西方

基督教文明。在我们对平民的采访中，听到过类似的解释：“要是他们（军队）没有接管（政府），我们可能就成了下一个苏联或者古巴。”一位到当地出差的加拿大人告诉我们一个说法，说苏联如何在整个七十年代里支援颠覆活动和资助游击队。他声称这是内部消息。假如有证据表明，当时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确实有遭到颠覆的巨大危险，那么这就算严肃的假说。我们采访的一些人仍认为这样的危险是存在的。他们指出，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阿根廷成立了大量游击队，这些组织开展了诸多暴力活动，以及古巴革命者对阿根廷青年的影响。

信仰不一定基于真理就能让许多人付诸实践，但为了验证它的合理性，我们可能要暂时改变话题。首先，是否有证据表明苏联或古巴介入了阿根廷政治？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苏联肯定支持了古巴等盟国，渗透了其它地区。但后来，苏联对南美的直接影响力衰退了。与普遍的观点——如果苏联干预，那么就是站在游击队这一边——相反，有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苏联在 1976—1983 年间是军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同时毫无证据表明它支持过游击队。如下所示，苏联需要小麦，而将军们需要市场，这些需求比冷战意识形态更有力。阿根廷共产党始终听从苏联的指示，从未与军方或资产阶级起冲突。众所周知，它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政党，规模非常小，而且还支持军政府最传统保守的政策。

至于古巴，阿根廷游击队迷上了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的作战方式。在六十年代早期和中期，最初的革命者前往古巴学习游击战。古巴也成了军政府时期的流亡者避风港。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古巴采取过任何境外行动，支援过阿根廷境内战斗的游击队。根据目前的证据，1967 年，格瓦拉死在玻利维亚后，古巴军队就不在南美活

动了。没有证据表明共产党在阿根廷搞颠覆活动。因此七十年代中期，阿根廷似乎没有外部的共产主义威胁。

美国与冷战

共产主义颠覆活动是阿根廷的真正威胁，这一想法与美国（其次是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法国与美国军方对拉美军警的指导有关。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两国培训了阿根廷军警。一些阿根廷人也把国家恐怖主义的使用归咎于法国和美国的压力、渗透、训练。他们指出了一个事实：虽然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打输了殖民战争，它仍有出色的反游击战术知识，也向其它国家的军队提供了这些专业知识。

执着于西半球的国家安全利益的美国，眼看共产党可能夺权——尤其是在 1959 年古巴革命之后——开始向军官传授反颠覆方法。除了军事训练，美国还向拉美军警下达反共的指示。据报道，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际警察学院最初叫“全美警察学院”，位于巴拿马运河区的戴维斯堡，为亚非拉军警提供了培训¹。我们常在采访

¹ 杜瓦尔（Duvall）和斯托尔（Stohl），《恐怖统治》（Governance by Terror），第 246 页；阿吉（Agee），《公司里：中情局日记》（Inside the Company: CIA Diary），第 632 页；郎古特（Langguth），《隐藏的恐怖》（Hidden Terrors），第 124—142 页，第 244 页；乔姆斯基（Chomsky）和赫尔曼（Herman），《华盛顿的联系与第三世界法西斯主义》（The Washington Connection and Third World Fascism），第 252—253 页，第 264—271 页；波尔绍（Poelchau）等人，《白皮书：就中情局与萨尔瓦多之事采访菲利普·阿吉》（White Paper Whitewash: Interviews with Philip Agee on the CIA and El Salvador），第 37—39 页，第 65—69 页。——原注

中讨论这一点。政治理论家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和迈克尔·斯托尔（Michael Stohl）总结这些材料说，“毫不夸张地说，超级大国间接通过第三世界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自己的帝国。”¹

美国政府、美国军方、中情局培训别国军队，雇用代理人参加见不得光的秘密活动，是有战略理由的。有人推测，他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资本的经济利益和美国国家的政治利益。有充分的记载表明，美方参与了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政变。我们也知道，大量美国公司，包括矿业公司，参与了1973年推翻智利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的准备与执行过程。“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参与了皮诺切特将军的智利经济，而皮诺切特的目标就是通过货币主义“自由市场”的经济基础，重建智利社会。因此，世界各国和美国资本、美国军方、中情局秘密干预了阿根廷，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

但阿根廷与智利的情况不同。虽然智利方面的证据确凿，各方也点头承认了，但没有类似的证据表明美国干预了阿根廷。大家都知道，吉米·卡特和罗纳德·里根两届美国政府对阿根廷的政策很不同，虽然政策尚待考察，但两届政府都没有直接操纵阿根廷政治，也没有积极参与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

对于阿根廷来说，“间接干涉”的说法更加合理。这一理论有许多变种，大致内容是：拉丁美洲的南锥体国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债主的货币主义控制。国际资本说服了它们，货币主义是摆脱贫长期债务和通胀问题的出路。受访者经常引述这些理论，或者提供自己的版本，通常把矛头指向了美国和“芝加哥学派”，后

¹ 杜瓦尔（Duvall）和斯托尔（Stohl），《恐怖统治》（Governance by Terror），第247页。——原注

者为货币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理论家大卫·派恩一柏林¹辩称，军方迷信货币主义，认为就像“芝加哥学派”在智利一样，货币主义是能够拯救阿根廷经济的政策。他认为：“经济思想不仅会产生自己的现实方案，从而决定利润如何花费，又如何在社会中分配。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会对当前和过去的经济事务提供判断。”²

军方“判断”问题出在，有人危害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那反对者就是坏分子，结论是：消灭反对者是合理的。派恩一柏林认为，货币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对于解释恐怖主义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包括缩小工会规模、减少穷人和失业者的社会保障、消灭左翼的反对者。我们将在结论章中，进一步考虑这一论点。

大赦国际

无论国际资本和外部军事力量做了什么，大赦国际始终在凭良知发声，反对滥用监禁和失踪。大赦国际不断为“国家执行权力”逮捕的囚犯和军政府统治下的失踪者发声。拉美各国政府称大赦国际的志愿者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天真幼稚”。他们揭露了阿根廷侵犯人权的行为，举行请愿，要求释放“良心犯”。正如伊恩·盖

¹ 大卫·派恩一柏林（David Pion-Berlin），美国作家、记者、政治学家。——中译者注

² 派恩一柏林（Pion-Berlin），《国家恐怖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State Terror），第10页。——原注

斯特在他的详尽研究《失踪案背后》中所说，“对于大赦国际来说，恐怖分子只是普通的罪犯”¹，而政府必须要为恐怖行为负责。当1976年，大赦国际访问阿根廷时，军政府不喜欢对犯人做这种区分。当时，吉米·卡特正在竞选总统，美国已经把人权问题提上议程。美国公众得知了阿根廷发生的故事。

军政府同意大赦国际进行调查。军政府意识到大赦国际不会保护人民革命军或蒙特内罗，因为大赦国际坚决拒绝帮助主张暴力的人。调查人员没有向记者提供任何信息，但报纸上还是报道了相应内容。估计是军政府的公关人员加工的，上面大肆篡改和歪曲了大赦国际的说法。游行是非法的，但一些“民族爱国运动”（National Patriotic Movement）的年轻人在调查人员住的旅馆外示威。警察无动于衷。这些年轻人朝调查员叫骂，张贴告示，反对“侵犯我国尊严的外国人……应该知道我们正与马克思主义作战：为了我们能够继续信仰上帝；为了家庭能够继续作为阿根廷生活的中心；为了父母能够继续成为子女的主要教育者。”²

大赦国际的随行人员给所有敢跟调查者说话的人拍了照。两家报纸——雅各布·提莫曼（虽然他后来成为了受害者，但他当时支持政变）主编的《观点报》和罗贝托·考克斯主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审慎地讨论了大赦国际的访问。其它报纸则付印了军政府提供的“新闻”。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要报纸《新闻报》发表社论：“他们捍卫的是谁的权力？只有那些监狱里的人吗？

¹ 盖斯特（Guest），《失踪案背后》（Behind the Disappearances），第76页。——原注

² 同上，第83页，盖斯特的翻译版本。——原注

显然，他们不关心社会的其他成员。大赦国际仍无视无辜人民遭到残忍杀害的事实。别指望这样就能激起我们国家的信任与同情。”¹

政变一年后，大赦国际于 1977 年 3 月 23 日发布报告，提供了失踪案的细节，包括姓名、日期、地点。这是对军政府公共关系的重大打击，但它没能阻止“进程”。

国际劳工组织与其它干预

政变六个月后，国际劳工组织发表了一份监禁与失踪的工会会员名单。这没有立即见效，但在国际劳工组织及旗下工会的压力下，许多工会会员得以释放。本书对幸存者的采访中，也证明了这一点。

流亡者们——例如，阿根廷律师兼前人民革命军的积极分子罗道夫·马塔罗约²（政变时，他住在巴黎），以及政变前在阿根廷成立，但 1976 年流亡国外的两个组织：阿根廷人权委员会（CADHU）和阿根廷信息与声援中心（CAIS）——也向国际社会提出了阿根廷的境况。阿根廷人权委员会的两位领导人，吉斯塔沃·罗卡（Gustavo Roca）与卢西奥·加尔松·马塞达（Lucio Garzon Maceda）在美国众议院的人权与国际组织委员会上做了证。虽然阿根廷人权委员会解散了，但世界各地又出现了许多流亡组织。它们不断活动，敦促

¹ 同上，第 85 页。——原注

² 罗道夫·马塔罗约（Rodolfo Matarollo，1939 年？月？日——2014 年 6 月 18 日），阿根廷作家、律师，原是左翼杂志《新人》（Nuevo Hombre）的编辑。1970 年起从事律师工作，为工会活动家进行辩护。1976 年政变后流亡欧洲。

1976—1983 年任阿根廷人权委员会委员。直至 2012 年从事国际事务与人权活动。此后在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国际社会关注阿根廷的暴行。

三位从海军学校集中营获释的女子流亡到欧洲，把遇见过的囚犯做成了详细卷宗。她们算出 1976—1979 年，这个集中营里关押了四千七百三十六人，得出结论：幸存者不到百人。她们在 1979 年 10 月向法国国会发表了这些内容，它成了与军政府斗争的重要文件。¹

卡特政府的美国政策

吉米·卡特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对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施加了更多压力。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裁减了对“不断”侵犯人权的国家的军事援助。军政府秘密进行绑架和谋杀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像智利那样，遭到国际制裁。

卡特政府的美国人权事务助理，帕特丽夏·德里安²积极在阿根廷推动变革。同时，美国强烈要求美洲国家组织下设的美洲人权委员会（IACHR）进行调查。经过多次延期之后，美洲人权委员会于 1979 年 9 月访问了阿根廷。尽管被关押与失踪者亲属组织的主要证人失踪了，存放证词的办公室遇到袭击，军警想方设法进行露骨的威胁与阻挠，仍有几千名勇敢的阿根廷人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了

¹ 盖斯特（Guest），《失踪案背后》（Behind the Disappearances），第 230 页。——原注

² 帕特丽夏·墨菲（“帕特”）·德里安（Patricia Murphy ("Patt") Derian，1929 年 8 月 12 日——2016 年 5 月 20 日），美国民权活动家。1959 年起参加民权运动。1976 年协助卡特当选总统。1977—1981 年任总统人权事务助理。1985 年赴阿根廷，为审判军政府作证。2016 年因阿尔茨海默症逝世。——中译者注

指控。调查人员收到了五千五百八十项指控，在墓地看到了满身弹孔的尸体，见到了许多失踪者正被秘密掩埋的证据¹。1979年12月，美洲国家组织发表报告，谴责军政府犯下的诸多罪行。尽管军政府不会在阿根廷发布这份报告，但埃米利奥·米尼奥内走私了五百份，交给失踪者的家属，给予了他们精神鼓励。

阿根廷军政府与苏联的利益关系

军政府相当成功地逃避了联合国的调查。1979年以前，阿根廷驻瑞士大使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Gabriel Martinez）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把阿根廷列入议程²。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是阿根廷的主要盟友，因为它们互有所求：卡特政府对苏联实行贸易禁运期间，阿根廷是苏联的小麦进口来源；苏联又一直阻挠联合国讨论侵犯人权的问题。阿根廷愿意无视谷物禁运，作为交换，苏联无视阿根廷侵犯人权的行径。

最终，美洲国家组织的报告把阿根廷推上联合国的议程。1980年1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设的失踪问题工作组，根据集中营

¹ 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关于阿根廷人权问题的报告》（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Argentina），第186页，同样见盖斯特（Guest），《失踪案背后》（Behind the Disappearances），第177页，及第13章的脚注37和38。——原注

² 伊恩·盖斯特（Iain Guest）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Gabriel Martinez）的阴谋诡计，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整个七十年代未能把阿根廷列入议程的问题。——原注

释放或逃脱的受害者¹及某些施刑者的证词，针对阿根廷军政府编写了证据确凿的案文。那时军政府正在减少“失踪”的使用，转而谈论“和解”。

美国政府的矛盾政策

虽然吉米·卡特政府谴责侵犯人权的行为，制裁了阿根廷，但美国官方并没有对这项政策达成一致。正如在 1943—1945 年一样，美国政府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²。1976—1980 年间，在帕特里夏·德里安发表了强烈声明，吉米·卡特为支持声明采取行动的同时，美国进出口银行继续向军政府慷慨解囊。早先，美国国务院以侵犯人权为由，否决了水利涡轮机的融资。相关公司、商会与许多游说团体（要是生意黄了，它们的成员会受到损失）立即发难。国务院让步了，进出口银行继续向阿根廷提供资金。事后，对此了解颇多的卡洛斯·埃斯库德³认为，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制裁。而且阿根廷经济部长何塞·马丁内斯·德·奥斯受到了美国企业和财政部的欢迎。毕竟，财政部不用像国务院一样考虑政治。这位经济部长也一直在华盛顿游说，有影

¹ 包括海军学校集中营在内，偶尔会有犯人获释，但没人能解释为什么。此外，有些人成功越狱了。还有些人受了一阵子酷刑后，以立即出国为条件获释了。
——原注

² 麦克唐纳(Macdonald)，《干预政策：1941 至 46 年的美国与阿根廷》(The Politics of Interven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gentina, 1941-46)，书中详细研究了那个时期。
——原注

³ 卡洛斯·艾斯库德 (Carlos Escudé, 1948—)，阿根廷外交学者。
——中译者注

响力的朋友可不少。”¹

其实，不仅是进出口银行照常开展业务。在此期间，世界银行更是向军政府提供了巨额贷款。此外，美国让阿根廷享受了普遍优惠制。1980 年，阿根廷向美国出口了总额为 2.31 亿美元的免税商品，数目之大，已经不能用“保持美国贸易平衡”来解释了²（美国向侵犯人权的国家提供贷款时，经常会用“保持贸易平衡”的借口）。

里根上台

1980 年美国大选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突然转变了方向。罗纳德·里根罢免了帕特里夏·德里安，停下了针对侵犯人权的行动。美国立即取消了对阿根廷的武器禁运。对于里根政府而言，如果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颠覆活动，什么侵犯人权行为都不用管。联合国最终判决军政府有罪，但这对于阿根廷的失踪者来说，为时已晚了。

对于国际上不作为的可能解释

对于美国的矛盾政策，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向阿根廷出售商品的跨国公司（及其工会）并不关心人权问题。里根的做法是，如果

¹ 卡洛斯·艾斯库德（Carlos Escudé），《阿根廷：矛盾的代价》（Argentina: The Costs of Contradiction），第 141—142 页。——原注

² 同上，第 142—143 页。——原注

侵犯人权的对象是反共分子，就一律无视。同样的，为了让国际社会注意阿根廷工人的艰难处境，美国工会的行动也很重要。而里根上任之初，没有多少美国公司仍在阿根廷开展业务。

不幸的是，任何诚实的观察者都会考虑另一种解释：哪怕到了八十年代，阿根廷的大多数中产阶级都不怎么关注侵犯人权的行为。当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租车司机，许多私家车司机，还有能在所有物上贴出口号的人，都会在标语上说“阿根廷人正义又人道”，借以反驳外国人权活动家的指责。埃斯库德引用了盖洛普（Gallup）的数据，表明“在 1980 年 3 月，大约 64% 的阿根廷人认为生活水平稳定或正在提高，62% 的人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与上一年持平或好得多”，同时“67% 的人认为收入够满足基本需求”¹。

那些不关心人权、未受到侵犯人权的影响，还有 1980 年因经济部长马丁内斯·德·奥斯的政策受益的人，他们反感美国涉及阿根廷内政的一切言论。尽管卡特和德里安在道义上为失踪者家属做了很多，争取释放了提莫曼这样的模范囚犯，但他们的声明还是激起了许多阿根廷人的愤怒和抗拒，而非对失踪者的关心。这种反应使人们继续服从军事独裁统治。图尔钦对美国与阿根廷关系的研究中说：“大多数阿根廷人民有意接受……进行恐怖镇压的政权，将它视为最好的选择。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美国）对他们政府的外部压力只是激起了敌对的反应与自卫情绪。”²

¹ 同上，第 148—149 页。——原注

² 图尔钦（Tulchin），《阿根廷与美国》（Argent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第 149 页。——原注

第四部分

镇压的中央机构



第十三章

深刻分裂的教会

七十年代的天主教会与它的后起之秀“第三世界神父运动”，正如五十年代的天主教会与庇隆主义一样相差甚远。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类似，不过神父们没有庇隆那样的政治纲领。第三世界神父关心穷人，想要消除贫困，但教会高层关心传统的神学话题——原罪、灵魂、救赎——认为第三世界神父的运动颠覆了教会的真正使命。这一巨大分歧不是阿根廷首创的，也不是阿根廷独有的。它贯穿了基督教的全部历史，但在七十年代的阿根廷，两个意识形态集团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分别与军队和游击队结盟。

埃米利奥·米尼奥内是天主教会的忠实拥护者，也是以直言不讳捍卫人权闻名的律师。他是莫妮卡·米尼奥内的父亲（1976年，莫妮卡·米尼奥内的失踪案轰动了阿根廷），在八十年代中期发表文章，严厉指责了教会的领袖。他指责那个时期的教会领袖，而不是教会机构本身。他认为教会领袖和独裁统治串通一气¹。

大主教阿道夫·赛尔万多·托托洛、红衣主教胡安·卡洛斯·阿

¹ 埃米利奥·米尼奥内（Emilio F. Mignone），见个人采访及《真相的见证者》（Witness to the Truth）。——原注

兰布鲁¹、劳尔·普利马德斯塔²在1976年组成了主教会议执行委员会。当时，身在巴拉那³的托托洛是随军总神父和主教会议的主席。米尼奥内夫妇在寻找女儿莫妮卡的过程中，联系了托托洛大主教，但大主教自称无能为力。后来，米尼奥内和其他失踪孩子的父母一起，再次找上托托洛，当面质问他，指出他明明能够对军方施加影响，让失踪者重获自由。可托托洛无动于衷，于1976年10月公开表示，“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见到证据，表明我国的人权受到什么侵犯。”后来，他重申了自己支持军事统治的立场，说这是必要的，军队正在“履行职责”⁴。

米尼奥内在随军神父比克托里奥·波纳明主教那里也碰了一鼻子灰。米尼奥内上了主教办公室，从秘书那里得知，主教没有处理失踪、逮捕、解雇的问题，“因为他不想插手军队的行动”。1976年10月，布西将军也在场，波纳明发表了讲话：“上帝赋予了军队治理国家——从担任总统到干涉工会——的使命。”后来谈到军队

¹ 胡安·卡洛斯·阿兰布鲁（Juan Carlos Aramburu，1912年2月11日——2004年11月19日），1934年成为神父。1975—1990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主教，积极与军政府合作。1976年晋升为红衣主教。1989年支持梅内姆推行私有化政策，支持特赦军政府。1990年退休。——中译者注

² 劳尔·弗兰西斯科·普里马特斯塔（Raúl Francisco Primatesta，1919年4月14日——2006年5月1日），1942年成为神父。1957—1961年任拉普拉塔副主教。1961—1965年任门多萨省圣拉斐尔主教。1965—1998年任科尔多瓦大主教，1973年晋升为红衣主教，明确反对解放神学，支持军政府的镇压活动。2002年退休。——中译者注

³ 恩特雷里奥斯省(Entre Ríos，意译为“河流之间”)的首府，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北三百公里处。——原注

⁴ 米尼奥内（Mignone），《真相的见证者》（Witness to the Truth），第3—5页。——原注

执行镇压任务时，波纳明还说：“基督带着真理与善良下场了”¹。他把战斗称为“为了保卫道德、保卫人的尊严，最后是为了捍卫上帝……因此，我祈祷主，保佑我们这场‘肮脏战争’。”²他 1977 年 12 月在大学讲话中，告诉听众，世界分成了“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和基督教的人文主义”³。托托洛和波纳明在 1981 年退休时，让位给了观点类似或更保守的人。

红衣主教阿兰布鲁成为了阿根廷主教会议的下一任主席。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座公墓发现了乱坟岗（最终在各个墓园发现了四千具以类似方式埋葬的尸体）。对于此事，主教于 1982 年 11 月在罗马告诉记者，这些并不是失踪者的尸体：“我不知道这个游击队和恐怖主义的问题怎么又来了。问题已经结束了很久……别把事情搞混了。你不知道现在有一些‘失踪者’还好好得活在欧洲吗？”⁴

《永不再来》有好几起案件表明，教会同军方合作。许多神父以“报国”为由，引诱囚犯坦白一切。许多幸存者都说，他们寻找亲人无果，教会拒绝帮助，还把他们的来访告诉军队。当五月广场的母亲寻求帮助，找地方集会时，市中心的教堂都无法或不愿接纳

¹ 同上，第 4—6 页。——原注

² 《国家报》(La Nacion)，1976 年 5 月 6 日与 10 月 11 日，同样见米尼奥内 (Mignone)，《真相的见证者》(Witness to the Truth)，第 6 页。——原注

³ 滨海国立大学 (Universidad Nacional del Litoral) 的演讲，见圣塔菲 (Santa Fe) 报纸《滨海报》(El Litoral)，1977 年 12 月 6 日，米尼奥内的书中第 6 页引用了。——原注

⁴ 米尼奥内 (Mignone)，《真相的见证者》(Witness to the Truth)，第 36 页，引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杂志《广播兰迪亚 2000》(Radiolandia 2000)，采访发生在罗马。——原注

她们。

证据确凿，教会的罪名已经坐实了：教会就是同谋。因此，我们更需要听取教会为自己的辩解。读者得明白，采访教会高层并非易事。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教廷大使毫不含糊地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还说换谁都不会答应采访的。一名位高权重的主教同意接受采访，但拒绝录音。一位级别更高的官员答应接受采访，但我们没能和他谈上话。我们在此不能给出多少采访，因为受访者没有给我们讲述这些故事的许可。

当社会对抗结束，迎来民主时，教会召集了主教会议，讨论教会的社会角色。这场讨论的内容发表在了 1981 年的《教会与市民社会》(Iglesia y comunidad national) 等文件上。主教们说，他们(或前任) 抗议过军方侵犯人权的行为。现在，魏地拉将军的一些信件已经公开。一头雾水的读者或许在信件中看不出教会和暴行有什么关系。可以说，这里面的关系很微妙。但随着新千年的临近，教皇指示全世界的教会领袖承认过去的错误，尽可能地纠正它们。这在九十年代对阿根廷教会的宣传口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章的三个采访分别代表了保守的天主教会的不同立场。第一位受访者在非常传统的神学院里当神父，当他与 1997 年来访的加拿大人(即本书作者)谈论时，没有对军方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表现出丝毫同情。第二位的政治嗅觉非常敏锐，很关注教会的公众形象。他为七十年代的教会高层辩护时，说得非常谨慎。第三位则代表在动荡岁月中，尝试开辟第三条道路的神父们，虽然他谴责了游击队，本人也在胡安·庇隆时期遭受过游击队的恶意。

桑塔诺神父

七十年代，教会内部出现了问题。此前的阿根廷教会有两大天主教派系。从成分上来看，第一种派系可以说更西班牙式、民族式、托马斯主义式¹。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这一派为主流。此后更加自由化的一派发展起来了，它沿着民主的基督教路线发展，导致了阿根廷天主教在思考方式上的分歧。这个派系本质是基督教的民主派，它在大学礼堂里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神父是大学生团体的教区神父。到了七十年代，总而言之，由于这一派的关系，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进入了教堂。

起初，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冒了出来，后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四处渗透。一些神父接受不了教会的社会学说，对国家权力的问题感到困扰。他们认为，1968年梵蒂冈会议就表示教会要向世界敞开大门，所以要更加关心政治和穷人。这种想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在欧洲表现为技术进步的东西，由于缺少技术，在这里都表现为社会方面的进步。在欧洲会导致否定基督神性——教义与神学思想——的东西，在这里导致了否定教会的社会学说在内的社会理论。在欧洲，争论更多是神学上的。而在这里，争论的是社会。

那时候，阿根廷出现了两个游击队运动：一个是人民革命军，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带有任何天主教的影响。另一个是蒙特内罗，它带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成员都是天主教徒。它的

¹ 指圣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74) 或阿奎那的哲学与追随者。一般认为，阿奎那调和了强调经验的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和强调启示的圣奥古斯丁 (Augustine) 的思想成果。——原注

许多成员来自天主教学生团体。因此，人民革命军是好战的，而蒙特内罗则是天主教与神秘主义的混合物。

教会内部出现了“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他们许多是教区神父。他们在年轻人当中煽动不安情绪，还让年轻人走上战场。他们让孩子参加战争，自己却留在教区里。好吧，我相信他们确实参加了一些战斗。一位军人告诉我，在一次小规模冲突中，他中枪倒地，差点送命。后来，他从报纸的照片中认出（开枪打他的）那人是神父。我知道他的名字，但我不会告诉你。这是很常见的。他们（神父）不参加战斗才稀奇。

举个例子，有所大学，一个班上的全部学生都在战斗中丧生了。他们都曾在天主教学校读书，全都死在战斗中，要么失踪了。这表明神父们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有时候，教育过他们的神父说：“不，不。你们没理解我们。你们走得太远了。”男孩们则会反驳说：“我们走了你为我们描绘的道路。”

问：你觉得，那些对学生具有如此影响力的神父们，是受 1968 年梵蒂冈会议，还是受别的东西的影响更多一些？

一半一半吧，但我认为，那不是唯一的原因。“关怀穷人”与一种非常无远见的思想——也就是说，需要发动武装起义——结合在一起。这是毫无远见的，他们把福音的启示世俗化了。他们唯一谈的就是社会话题。没有恩典、原罪、永生、天堂、地狱。超自然的话题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世俗和社会话题。

然后——我不确定是 1970—72 年的哪一年——巴拉那的托托

洛主教主持的主教会议发表了谴责第三世界神父的议案，主要是批评他们单方面坚持关注社会问题。教友萨切里（Sachelli）写了一本叫《秘密教会》（The Clandestine Church）的书，甚至在书里列举了国内几位神父的活动和名字。他是加拿大的教授，在一个地方教六个月的书，又跑去另一个地方。游击队谋杀了他。我不是说第三世界神父杀死了他，我只是说他批评了他们。

问：1971—1973 年那段时间里，你参与教会两派的争论了吗？

是的，我参加过。我写过几篇文章，谴责了当时的形势。我进了托托洛的神学院，他是巴拉那主教，后来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主教。很久以前，托托洛主教把艾娃·庇隆带到那里，后来把伊莎贝尔·庇隆也带了过去。他也和军方打交道，因为他是军队的神父。他用这一身份走遍了全国。我也和军方有些往来，偶尔给他们开会布道。这不是什么结盟，不，只是交心的正常往来。是的，马岛战争那会儿，我们（为军队）提供了很多帮助。每当有人阵亡，我们——包括一位马岛的随军神父——就会上他家登门拜访。

1976 年革命发生时，全国上下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他们现在都否认这一点。当时，我们觉得国家总算步入了正轨。因为上一任政府太腐败无能，没法再执政下去了。然后，军队掌权了，就像前几次革命一样，他们只是希望带来秩序，没有要做什么的明确目的。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建造了道路和桥梁。在我看来，他们想做的就只有这些。

而他们的敌人从两个有利位置发起攻击：军事上的战斗，和文

化上在大学里的战斗。军队参与了军事战斗，但没有参与文化上的战斗。因此，就算赶跑了很多激进分子，文化仍掌握在他们的手上，除非军队任命自己的校长，否则无法彻底改变大学。当时军方没有解雇的人，后来也被“审判”或逮捕了。当然了，我是支持军队的。

问：据说，军队掌权后，动用了非常强硬的手段，包括酷刑、谋杀、失踪。当时，你了解过军政府的做法吗？

是的，那阵子有传言。就是说，我知道，但不是通过内部消息知道的。是的，有传言说，军方在掌权时用了强硬的手段。我大概在 1978 年左右知道了这一点。好吧，我不记得到底什么时候听说的。我了解到的是，有人告诉军方，如果必须处决谁，应该在审判后公开进行。（这个问题）没有经过正式讨论，但军方的回应是：如果在公开场合行刑，立马会有人说：“别开枪！别开枪！”这样是没法打仗的。

问：是谁提出的反对意见？民众？神父？

反对的是军人的朋友，他们不同意，说应该用正确的方式执行。但问题是，有些颠覆分子甚至想建立独立的国家，还妄图得到联合国承认。因此，对军方而言，这是爱国主义的自卫。游击战术是很可怕的，所以军方开始模仿这些战术，因为他们没法（就像在阿尔及尔一样）采用别的战术，这就造成了不公平与不必要的暴力。

还有一些反对者来自我们的教会。是的，是这样的。有些人是

从皮诺切特那会儿开始（反对军方行径）的——并不是直接因为皮诺切特——有些人则建议像智利那样做……但有些人说，这么做一点也不实用。军方说：“你们不了解战争。”

问：为了阻止秘密行动，教会给军方提出过任何政治要求吗？

我不知道教会在公共事务上，有没有给军方提过直接要求。这方面我不清楚，但在私人关系上，我知道是有的。

问：你认为，教会为什么没有谴责失踪案、谴责监狱里关孩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主教们没有谴责失踪案。我听说，他们私下里斡旋过，救出过不少失踪者。他们会和军方交涉，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在我看来，他们深藏功与名的理由是，这样可能给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递刀子。我的意思是，虽然方法不正当，但这场战争是正当的。战争正当就在于它是正确的。因此，虽然教会不想停止这场战争，但确实批评了这些方法。

问：你用了“敌人”这个词。谁是教会的敌人？

敌人是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敌人是教会和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威胁着国家。我不知道所有受害者是否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我指的不是小孩。他们还小，什么都不懂。我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有许多追随者。他们属于镇压的附带损失。

问：按照你现在的看法，他们也是敌人吗？

是的，只要他们保持自己的信念，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敌人。想法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的人也是。

问：我想搞清楚一个问题：你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想法一样的人”是指武装游击队吗？

对的。但它和武装游击队不完全一样。他们有些领导人是怨恨军队才加入的游击队。不是所有人都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他们的一些盟友不是。

问：你认为大部分的死者或失踪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不是，但主要的思想家是的。

问：你认为，军方的做法成功了吗？他们达到了消灭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了吗？

他们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原因我之前讲过了。因为，如果说军队某些方面打赢了武装冲突，在文化上却失败了。正如葛兰西所说，他们（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上赢了。

问：军队有文化上的目标吗？“进程”期间，政府禁止和焚毁了许多书，宣布学校里的新教学运动有害，还禁止了一般不算马克思主义者的让·皮亚杰的书。为什么禁止他的书？

因为军方觉得这是必要的。我没听说过皮亚杰和弗洛伊德的事情，但他们肯定对基督教和传统观念有害。与“进程”无关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写书反对皮亚杰，也在与军事无关的话题上，反对过皮亚杰和弗洛伊德。我本人没有察觉到烧书。这一定是极少数事件。我只知道有些大学的出版物从市面上撤下，换了新书上去。

问：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当时你不知道烧书？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们从市面上撤下来了。军队里有些人很愚蠢。看得出来，没人给他们出主意。为了驳倒马克思，他们就在一些地方烧了马克思的书。

问：军队禁止并从市面上撤下不符合基督教教理的书，是教会的要求吗？

如果“教会”是指教会的高层，我认为不是。但可能有许多激进的天主教部长参与了。

问：回到“进程”问题上，你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吗？

不，肯定不是。它做得太糟糕了，连军政府都要为此接受审判。反军方势力获胜时，军队受了审判。他们做得很糟糕，没能像仍在位的皮诺切特或乌拉圭那样成功。他们把自己交给了会无条件把他们送上法庭的人手中。他们搞砸了不少事情，也没把问题彻底解决。

问：你说“他们”赢了，你指的是谁赢了？

好吧，某种角度上，是军队倒台前的反抗组织：那些允许游击队行动的人、反对军事当局的人、不同意军队做法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彻头彻尾的反对派赢了。你都看到了，在军政府倒台之前，有些自己不是颠覆分子的人对颠覆分子很友好。他们在军队离场后获得了权力。军政府无法建立共同体。他们仿效皮诺切特，但搞得一塌糊涂。他们不懂皮诺切特是怎么做的：他组建了政党。马赛拉将军也在这里搞了一个党，但搞得稀巴烂。

问：你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上取得胜利了吗？

那就很难说了。那些取得胜利的人，没有看到与马克思主义战斗的必要。阿方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问：在军政府的最初阶段，有第三世界神父遭到谋杀了吗？

我认为是的。哦，是的！穆希卡神父。但他们说，是他的同志

杀了他，因为他离庇隆太近了，而庇隆抛弃了他们所有人。没有人知道真相。庇隆回国前，蒙特内罗是靠近庇隆的。阿兰布鲁将军死时，庇隆向他们表示了祝贺。庇隆回国后，五月广场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所有的蒙特内罗都去迎接他，显然庇隆（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个“食草动物”，换句话说，就是在玩弄他们。庇隆抛弃了他们。我想蒙特内罗退场时，穆希卡还跟着庇隆，但我不确定。我的意思是，并非所有的第三世界主义者都死于军队之手。庇隆派也有内斗。

还有拉里奥哈省的安赫雷希主教的事件。我确定他的死是意外。证据就是，他当时和一位住在科尔多瓦的还俗神父在一起。如果是谋杀的话，那么他俩应该都会死（但只有安赫雷希遇害了）。我只能这么认为了。

但“进程”没有摧毁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不，没有，一点都没有。“进程”没有攻击第三世界神父。这是教会内部的事。他们（第三世界神父们）惹恼了教会。教会必须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后来改头换面，但在共产主义垮台后，他们解散了。虽然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分析却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接受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的，但他们接受其中一部分。对于教会来说，这个运动没有以前那么棘手了。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出席主教会议。他们（教会中）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没有表现出来。

问：美国和欧洲的学者认为，在军方消灭一些第三世界神父与学生的过程中，教会高层与军方勾结。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这是在污蔑。我完全否认这一点。看看托托洛为他们做了什么！

我也知道，许多主教走访监狱时，做了很多善事。

问：教会在智利军政府下扮演的角色，与教会在阿根廷扮演的角色有不同吗？

是的，那是不同的，我相信这是因为教会的倾向，换句话说，（智利的）教士们比较左倾。这里的情况不同。在阿根廷，大家所反对的，正是智利的大多数所赞成的。

我现在认为，当时教会高层，还有教会中的左派都很迷茫。教皇坚持圣灵的话题。你应该记得，第三世界神父们坚持世俗的话题。不想违背教皇的主教们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但在拉丁美洲发生了许多变化。我想说的是，更传统的天主教派已经衰弱。大多数主教都选择了中间路线。除了一小部分更左的团体外，中间派没有什么活动的余地。另一些人都没有参与很多（社会事件），只喜欢埋头搞思想。但我并不是说传统派反对这么做。他们反对解决社会问题的特定方案。比方说，麦德林（1968）和普埃布拉（1979）两场大会，表明教皇对南美主教没什么影响力。麦德林大会更像是第三世界主义的，而普埃布拉大会像调和主义的。教皇说：“你必须坚持上帝和耶稣的重要性”。他担心麦德林大会产生的结果，因此在普埃布拉大会时，发表演讲“力挽狂澜”。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说，阿根廷当下的全球化正对教会和国家造成许多恶劣影响。比方说，以前投身战斗、加入游击队的青年人，今天却无所事事，脑子里空空如也，就连坏的思想也没有。他们现在顶多玩玩吉他。切·格瓦拉成了他们的英雄。这是怀疑的一代，

他们彻底失去了理想，甚至比上一代更糟。

莫拉雷斯主教

我在那段时间（1976—1983年）还不是主教。教会里有许多种意见，而“进程”时期的那些主教，他们的意见并不是最重要的。今天的主教已经反思了那个时期，但对它做出评价绝非易事，因为当时的主教并不都还在世。

伊莎贝尔之后的世道很艰难，真是天下大乱。拉美有不少军事政变，人在见证历史。历史学者会遇到困难，是因为他们有某种立场，但我们要兼顾不同的看法。两方都有过火的地方。有人说，为了保卫阿根廷国家，必须要打败游击队，他们的说法就太过了。但在另一方面，那些参加战斗的游击队，今天也没有开口。即使都从流亡中回国了，蒙特内罗也没有开口。五月广场的母亲表示她们不会宽恕，因为国家未经审判就带走了她们孩子的生命。她们说，国家应该按照程序进行审判，而不是杀死他们。当时呢，军人、神父、律师也会聚会，但他们也担心炸弹和袭击，不会太张扬。

我认为游击运动是非常恶劣的事情。游击队组织就像庇隆左派一样，是阿根廷的威胁。比方说，他们为自己的绑架辩护，说是在捍卫穷人。教会说自己也在想办法，但对失踪并不知情。当失踪开始时，许多主教进行了沟通和干预，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不让情况变糟，不让公众知晓此事。他们不想中断与政府的对话。一切都是在对话中进行的。其他主教总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批评的意见也越来越多。情况就是这样，但问题比较复杂。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主教们为自己的疏忽请求原谅。他们说，他们应该为左翼组织成员做更多的事情，因为许多人是天主教徒。他们说，“也许当时我们的认识还不足。”他们为两件事请求原谅。记者说，“仅仅要求原谅是不够的，因为教会默许了那些行为。”既然死了那么多人，这些事件就进行了审判。那些活着的人，比如普利马德斯塔和阿兰布鲁（两位前大主教）就说，他们从来不是同谋。他们在教会里算是老资格了。

问：有记载表明，前大主教阿兰布鲁曾说过所有失踪者都生活在欧洲。

是的，那是真的，但他试着找过失踪的神父。有些红衣主教走访过监狱。阿兰布鲁就去见了每一位囚犯。

问：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在对待穷人方面非常接近。蒙特内罗关注教会中的穷人。为什么教会高层如此反对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士呢？

这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庇隆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就算它支持穷人也不是。它不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它是给穷人食物的主义。这些神父是在教会中接受的教育。那些组织的思想里并没有民主，他们都成为了使用暴力的激进分子。

问：但我记得你说过，教会非常关注共产主义的问题，其中包

括基督徒拥护的主张吗？

是的，但教会的一些人在贫民窟工作。他们说，这是为了建立革命组织。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不一样，但两者之间产生了没人能够阻止的敌对关系。所以民主是重要的。教会高层别无他法，只能保护人民。当时也处在恐怖之下。

问：根据《永不再来》的证词，许多人为了找到失踪者，向教会求助，还说没有教会给予任何帮助。你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也许不是所有能做的事都做了，但教会确实做了很多，因为他们确实和亲属交谈过。他们去找了失踪者。罗马有家报纸写了一些文章，指责当时的教廷大使，也就是红衣主教拉吉（Laghi）¹。这位绅士很有风度，与年轻人很亲密。他与政府建立了联系，一些人在他的帮助下离开了国家。但有些人说，“假如他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他又是怎么帮到他们的呢？”要知道，这是持续的战斗。当时没人听说酷刑。许多人在监狱里。有人看到军队把人带走，但不知道他们正在对人做什么。一些主教公开说出了事实，别人就说，他们应该做得更多。但你必须意识到，当时处在恐怖的氛围中。他们会绑架你，要么开枪打死你。这就需要民主，要能在不受暴力的情况下，表达思想……

¹ 《不义与痛苦之事》（Vicenda ingiusta e amara），《王国时事版》（Il regno attualita），1977年7月，第385—390页。——原注

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教会的意见¹。但我们绝不能仅根据某位主教的意思判断历史，要通过整个历史背景看待教会。谁允许世俗主义与安乐死，那他的立场是有问题的。而教会并不反对死刑。

问：当时军队杀死的那些人就应该判死刑吗？

许多人是的，因为他们是相当坏的人。因此军队才绑架了他们。

问：《永不再来》发表时，你对上面的记述感到惊讶吗？

是的。我对书上的大部分内容都不知情。许多人没有读过《永不再来》。我们想用谅解和对话走出那个时代。可能的话，偿还我们欠下的责任。道歉意味着什么都没发生。教皇遭到枪击时，他原谅了犯人，但“进程”仍在继续。教会想要往前走。不承认这些的话，它是无法前进一步的。

贝亚特兰·拉菲尼神父

1970年，我在天主教大学任教。教会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第三世界神父（大概一共四百人），另一派是极端保守派，主要是跟军方有关系的神父。有人为左派的暴力辩护，也有人为右派和教会的暴力辩护。我试图主张民主，同时反对教会高层和游击队两方。

¹ 见《教会与人权》(La Iglesia y los derechos humanos)。——原注

这样的立场在教会中并不常见。

游击队都鼓吹暴力。他们的目标是接管政府，他们不相信民主。他们是切·格瓦拉，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教会的领导者，以法团主义的眼光把社会看作了商界、庇隆工会（不是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工会）、信教的军队、掌握了文化领域（尤其是掌握了教育）的教会之间的联盟。许多人认为，这种制度安排是发展必需的模式。

我们看到了巴西与秘鲁的军政府，又看到了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智利所发生的事，发现后者其实也很吓人。你知道的，那就是当时的文化。1981年，教会首次发表文件支持民主。这份文件叫《教会与市民社会》（英文版发表于1984年）。我们担心智利的原因有两个：我们从媒体和智利的基督民主党那里得知了情况，以及智利流亡者的到来。我们看到了激进社会主义对经济造成了多少恶果。

阿连德是民主选举上台的，但他只拿到38%或39%的选票。他没有获得过半多数。再说了，纳粹在选举中也拿到了多数票。这不是多数的问题，问题在于民主。需要尊重法律，但阿连德不尊重法律。我们说的是1970年，必须提到背景。1967年，切·格瓦拉死在玻利维亚。1968年，肯尼迪在美国遇刺。同一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所以说，当时这种激进主义在这里非常强烈。

1973年，当庇隆分子进入政府时，我失去了大学里的教职。那时候，耶稣会士完全站在蒙特内罗这一边，在天主教大学里势力强大。学生的立场非常激进，还有耶稣会士撑腰。于是温和派不得不离开大学。这是暴力，他们纵容暴力。一天，我到了学院，看到了谴责我的标语，两根木棒封上了我办公室的门。后来，我的几个

学生失踪了。我们教的学生里面出了游击队。我以前是想教给他们文明、民主、共和的思想的。

我认为教学的耶稣会士中间也有分歧。但当时，那些管理大学的人没有制止暴力，而是恰恰相反。许多教职员辞职了。我们没法在那个环境下教书。社会科学专业至少一半教师辞职了，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后在另一所大学获得了教职。

照我看，教会是暴力的帮凶，因为它没有谴责军队的暴力，也没有谴责左派的暴力。双方都有教会的成员。他们在互相残杀。我认为，至今阿根廷教会仍未对这一事实达成共识。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有责任，因为蒙特内罗来自天主教行动运动和天主教学校。发生这些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政治文化没有对人权的尊重，而且我们没有自由的政治制度。

阿根廷有非常强大的反自由思想体系。我们没有民主的政党，这绝不是偶然。这里的社会基督教很强大，它就是典型的庇隆主义。我想，教会里大部分人都宁愿旁观——他们关心的是政府的效率高不高，而不是这个政府是怎么来的。我说不清，但这对于政治文化的性质非常重要。他们从 1981 年才开始考虑这一点。我认为，许多赞成 1981 年文件的主教，并不十分清楚他们投票赞成的是什么。但无论如何，这都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当时军方还不打算承认民主选举。选举的到来，只是马岛战争的缘故。

教会终于在 1981 年通过了这份文件，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是宪法问题与民主问题；其次是承认阿根廷是个多元化的、而非单一的社会。文件中明确承认了这些。教会也必须做穷人的工

作。慈善是神学的信念，而不仅仅是红十字会的工作。我的意思是，特蕾莎修女做善事，不是因为她是红十字会的修女。她在穷人中见到了耶稣。好吧，目前大约有四十万人在靠博爱会（Caritas）养活，教会运营这些机构，政府也给了补贴。在此之前，有人会指责照顾穷人的神父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都变了。

对于第三世界神父的主要批评是，他们的观点带有政治倾向。他们大多数人和庇隆分子走在了一起，他们说，好吧，既然这里的穷人是庇隆主义者，那我们也要成为庇隆主义者。而且庇隆主义者是天主教徒，他们反对共产主义，他们自己就是人民。同时有这样的看法：这个国家的人民等同于庇隆主义的人民。我强烈批评了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他们没有在政治学与社会学方面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根本不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方面的专家，只是从别的地方拿来一两个理论，根本不在追求基督徒该有的价值观。你也知道，现在至少有一半的神父不像样。我的意思是，他们大都缺乏身为神父的使命感。

第十四章 第三世界神父运动

1974年5月，卡洛斯·穆希卡神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座教堂外遭到机关枪射杀。他遇刺前，曾与前门生马里奥·菲尔梅内奇发生争执，而此人告诉同伴，游击队要杀了穆希卡。同时，穆希卡也是洛佩斯·雷加与社会福利部政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家¹。菲尔梅内奇坚决否认是自己干的，表明了自己对穆希卡的“敬爱与感激”。事后，凶手确认为联邦警察下士，作案时有三A团提供掩护。此人还是洛佩斯·雷加的私人保镖²。

1976年7月，军政府上台后不久，三名帕罗廷修会神父与两名神学院学生遇害。公开批评“教会与军队狼狈为奸”的恩里奎·安赫雷希主教于同年8月遇害。还有许多人遇害，包括一些公开承认自己参与第三世界运动的神父，但一些人仅仅是在贫民窟布道，就成为了受害者。第三世界神父运动始于1968年，仅持续到1974年，最后一年的谋杀与威胁使这些神父根本无法碰面。运动在最强大的时候也只有四百名成员。本章采访对象是对第三世界神父的工作表示同情的神父，或者与那一小部分改革家有关系的人。

¹ 冈萨雷斯·汉森（Gonzalez Janzen），《三A团》（La Triple A），第113页。
——原注

²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110—111页，脚注27和28。安德森提到，虽然法庭上指认了凶手，但有些证据自相矛盾。——原注

帕特里西奥·里赛

1970 年，我从爱尔兰来到这里。我是神父，那时加入了夏尔·德·弗科尔¹的小兄弟会²，开始在查科传教。到了 1976 年，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工作。1976 年 10 月，他们把我抓去用刑，爱尔兰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³为我请愿。起初，我是被绑架的。大约一周后，我被正式逮捕。两个月后，他们把我驱逐出境，叫我离开这个国家。1987 年，我终于才回到阿根廷，参加了普世人权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这事儿呢，不过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卷入了争端。天主教其实是阿根廷的国教，这就导致了某种结果，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深深植根于罗马天主教传统（相当于反国家）的人来说。从一开始，我就卷入了某种争端。我发现没人请我去参加平民仪式、赐福、升起具有明确宗教意味的旗帜。好吧，这里的教会非常露骨地代表国家权力。

在六十年代，尤其是在六八年，阿根廷质疑了梵蒂冈会议和整个教会体制。也许这种情况（在阿根廷）要比其它拉美国家更加普

¹ 夏尔·德·弗科尔 (Charles de Foucauld, 1858 年 9 月 15 日——1916 年 12 月 1 日)，法国天主教神父、神秘主义者。出身于贵族家庭，六岁成为孤儿，普法战争期间逃往法国境内。1876 年进入法军服役，1880 年派驻到阿尔及利亚，一年后因纪律问题被开除，不久又获准归队。1882 年冒充犹太人赴摩洛哥考察。1886 年参加严规熙笃隐修会 (Ordo Cisterciensis Strictioris Observantiae)，1897—1900 年在叙利亚隐居。1901 年赴阿尔及利亚，在撒哈拉沙漠隐居，与当地的图阿雷格人 (Tuareg) 共同生活。1916 年被一伙亡命之徒杀害。——中译者注

² “耶稣小兄弟会”（拉丁语：Institutum Parvolorum Fratrum Iesu；法语：Petits Frères de Jésus）法国天主教教团，1933 年在法国成立。——中译者注

³ 这是拉美唯一一家爱尔兰大使馆。——原注

遍。当时新设立了许多教区，许多新的神父来自中下阶层。主教送他们去欧洲培训，他们也成为了出色的神职人员。1968年，第三世界神父运动诞生。那阵子，每个教区都产生了非常开明进步、能言善辩的神父团体，他们对不少正进行的事提出了质疑。然后迫害开始了，这些神父受到了一系列的镇压。突然之间，监禁神父的事情越来越多。1968年，罗萨里奥一次抓进去了四十名神父。所以，我1970年来到这里的时候，教会已经四分五裂了。这里有反动的主教（现在还在位），还有非常反动的制度。自然，这里发生了冲突。

如何解释这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尤其是庇隆主义的历史呢？这一直是个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教会中有一部分人受到了庇隆主义的迫害。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主教队伍始终无法容纳进步运动的成员。任命进步的主教是非常少见的，进步主教最多只有四五位。说实话，等他们上任后，没几个还是进步的。只有个别人在上任后更加激进。而教廷大使一手遮天，掌控了主教会议。

因为阿根廷跟别的国家不同，按照这里的习惯，主教往往是提名产生的，而提名又往往是利益交换得来的。因此，一些在阿根廷当了十几二十年主教的德国籍、意大利籍、西班牙籍的主教，之所以得到提名，只因为他们有钱，或者做了某些教会认为的“好事”。教区里找不到土生土长的主教，这到现在也很普遍。你能找到阿根廷神父，但你找不到一位阿根廷主教。在委内瑞拉，出生在委内瑞拉才有资格当主教候选人，在阿根廷就不用。

但这不意味着，所有外国主教都是保守派——他们也可能不是。但这确实意味着，有许多非常优秀的神父、优秀正直的阿根廷神父，为社会奉献了这么久，仍处在二十年前我结识他们时的地位。他们仍然是教士，以本堂神父的身份退休，而他们本该是出色的主

教。教会的内部政策耽误了他们。

在镇压期间，教会的体制仍和三十年代一样。科尔多瓦的大主教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主教区等地，向来都是非常守旧的。阿根廷没有进步或开明的大主教，大主教一个比一个保守。这些人支配着教会政策，主导了主教会议。

我认为，镇压期间的冲突影响到了国家稳定，主教们也开始看到这一点。他们认为，维稳必须要靠军队。此外，阿根廷军队一直热衷于对天主教的某种解读，也就是右翼长枪党的天主教学说。军队说服了梵蒂冈，或者对梵蒂冈施加了足够的影响，给军队单独设立了教区。于是军队的主教获得了单独的管辖权。军队没有与当地的天主教人士融合，它有自己的体制。军队的主教是货真价实的十字军，他们为施虐、暴行辩护，为军队的一切行为辩护。他们也有权力干涉任何教区。许多人相信，保守的主教是军政府的同谋，他们决定了谁成为镇压的受害者。这不是因为教会毫无作为，或是俗事缠身。只是因为，右翼教会的门对世界上的苦难者是关闭的，但它又积极支持军方。

阿根廷主教们在一段历史时期里是反民主的。我记得，当我在七十年代第一次来到阿根廷时，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十九世纪的民主制度会让教会失去对学校的控制。政府把宗教分离出了学校。这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但是宗教界仍把政治家视为敌人。后来，在七十年代，蒙特内罗们从教会中涌现出来。然后是第三世界神父。主教们就用这些事实来证明，军队干涉教会事务是正当的，例如在1976年禁用拉美《圣经》或是在1977年审查《教理问答》。

神父在监狱里受到的对待更糟，他们当我们是叛徒，说我们背

叛了信仰。他们认为，我们应该站在他们这一边，而我们的所作所为却像是在另一边，就对我们尤为愤怒。我们有十二人关在了拉普拉塔监狱，就像犹太犯人一样，吃了很多苦。

我们扪心自问，教会人士怎么能为暴力、酷刑、谋杀辩护，甚至参与其中，还能坦然做神职呢？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事。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教会与阿根廷社会。它不会让教会逃避责任，但能够帮助解释。不仅是教会人士参与了、支持了镇压，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社会已经麻木了。甚至 1976 年，我记得市政墓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在烧尸体。我的意思是，他们居然直接把“墓园里烧尸体”这件事讲了出来。

好吧，官方的说法是，人们必须承担牺牲。说什么为了稳定，必须做一些可怕的事情。1975 年 11 月，豪尔赫·魏地拉总统亲口宣布，为了阿根廷的稳定，任何人都必须在必要的时候去死。这句话发表了出来，然后有些人说，“好吧，你知道的，游击运动很强大，所以军队必须跟它打仗。”但真正的冲突是微不足道的。发生的只是国家恐怖主义。

去年，我们社会纪念了军事独裁二十周年。教会曾支持军队，因此受到严厉批评，也丧失了许多威望。教皇为新千年发表了一份文件，建议阿根廷教会忏悔，回顾他们的历史、清扫他们的台阶——也可以这么说。梵蒂冈要求自我批评。好吧，教会在 1995 年试过自我批评。我们建议教会应当坚持真理。意思是，如果教会或军官掌握对和解有用的情报，就该鼓励他们把真相告诉议会正在搞的什么委员会。虽然目前委员会还没有搞成。

我们给每个主教寄去了有关真相问题的信，大概有五六页。我

们说，无法面对自身现实的社会永远不得安宁。最终，今年年底通过一份文件，但教会的右翼势力又否决了它。去年（1996年3月）终于出现了一份折中方案，但这份文件着眼于别人的过错，对主教的过错只字不提。在它对阿根廷社会的解读中，表明这是两个极端之间的全面冲突，而教会则处在中间立场。刚开始，这份文件引起过一些讨论，后来谁也不提了。教皇（的说法）要比阿根廷主教们的文件要明白得多。我们最初的那份文件和教皇说法一样：教会应当承认错误。但是阿根廷教会不肯承认自己的责任。

多明戈·布雷西亚神父

我是第三世界神父运动的神父，从最开始的1968年5月到1974—75年运动结束，我担任过许多职务¹。阿根廷的社会动荡以及军方镇压的开始，迫使我们结束了运动。我们积极与当局作斗争，努力实现社会变革。这让教会内外的保守派和军方人士感到不快。我们的成员受到社会、政治、工会活动家同样的迫害。十六位神父遇害，另有人遭受监禁、酷刑、流放。我们最终不得不停下这场运动，因为我们和工会一样，连开会都没法开。同一年里，1974年5月，穆希卡神父遇害。他是我们运动最知名的代表。当时，我们发表了

¹ 在回答问题时，神父指出，有些教会外人士组成了另一个团体，叫“基督教与革命”（Christianity and Revolution），自称是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的追随者。它与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之间有互动。虽然卡米洛·托雷斯很出名，但他不是这个团体的中心人物。——原注

一些有关迫害、针对运动的攻击以及我们发起的自卫的文件¹。

在白色恐怖下，我们的地下组织无法正常开会。同时，组织内部也无法维持友爱和尊重不同意见的环境，不再能讨论不同想法。本来这场运动就一直有内部争论。在政治意见上，有人同意庇隆的观点，有人则反对。有人与马克思主义结盟，有人没有。有人把教会视为国家机构，有人不这么想。那是时代性的辩论。马克思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必须讨论这一点，因为它对教会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讨论了神父的政治任务、讨论了神父与武装组织之间的关系。什么都要思考。可行动不是比思考更有必要吗？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行动促使我们不断做出选择。我们聚在一起时，就讨论如何与这个或那个作斗争。因此，这场运动从根本上来讲，是行动的运动、声援的运动。它是为了实现全国一切社会需求的运动。这里有各种需求——（于是产生了）罢工、游行、工作、绝食、抗议。庇隆归来后，我们面临新的政治局势。他死后又发生了庇隆主义的危机。伊莎贝尔·庇隆签署了“歼灭”颠覆活动的命令。她给军队下的命令中，说我们也是颠覆分子。

当时的教会高层也把我们当作颠覆分子。主教会议主席托托洛大主教是军队总神父，他在道义上支持所谓“国家安全战略”。托托洛主教企图下手谕把我们逐出教会。他申言第三世界运动的错误与离经叛道，而我们用一份七十五页的文件回应他，证明我们之所行，正是基督耶稣之所愿，也符合正统神学。在文件中，我们也解释了我们所理解的颠覆活动、革命、武装斗争、财产、解放。在当

¹ 布雷齐（Bresci）等人，《第三世界神父运动》（Movimiento de sacerdotes para el tercero mundo）。——原注

时的教会内部，困难在于这是政治行为。我们认为，采取政治行动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从最得人心的政党（庇隆党）与庇隆思想宣告禁止的那十八年间兴起的。我们与许多社会团体（包括中产阶级和学者）重新发掘了庇隆主义的价值观。1973—74年，庇隆主义复兴后，我们能投票选举了。自1955年来，人民第一次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说：“够了！我们需要政治选择！”

好吧，在教会外面，军队的情报部门把我们当成想要摧毁民族、摧毁阿根廷传统的人。他们说，我们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既然如此，对话是不可能的。他们从没试过和我们对话，只给我们扣上帽子。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努力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在社区内寻求支持。我们得到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主教——在七八十个主教里的不到五六个——的帮助。1974年前，我们都在公开场合演讲，后来不行了。整个国家陷入黑暗，我们也一样。庇隆死后，军队就在准备政变，为此实行了审查制度与迫害。

在阿根廷的五千名神父中，约有四百名参加了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他们遍布全国。很少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来的，大概七八十个人里只有十五个。更多人来自内陆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每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神父都成了第三世界神父。甚至修女们也用“第三世界神父”称呼在穷人和工人区与人民共事的神父。我们是一场运动，但是组织很小，没有组织关系或成员名单。它是教会内部思想与行动的潮流，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每一位具有这种责任感的神父，就算不属于这场运动，都给当成了“第三世界神父”。我们没有入会要求，会议都是公开的，而非秘密的。好吧，在“当作”成员的四百人里，我认为有两百人遭受了各种形式的迫害。我本人也受到威胁，他们叫我离开阿根廷。

教会间接警告了我。它根本没有保护我们。我必须想办法自保。政变后，我决定留在这里，留在我现在这所学校里。军队掌权后，盯上了所有人。他们有神父的名单，所有公开活动的人都在上面。我们都是在台面上活动的，我们都在文件上签字，公开演说，公开支持社会活动，所以谁都知道我们的名字。过去是陆军推翻政府，但这次是三军一起谋反。他们决定让全军一起来清算所有人。这是默契，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经常有人问我，我们是怎样幸存下来的？首先（笑）因为上帝不想带我走。话说回来，他们不敢把我们全部带走。他们本来能把我们全带进地狱，把我们都干掉。好吧，我不知道政权是否能够承受消灭一百名神父的代价。此外，军队与教会建立了某种联系，会定期讨论教会成员的情况。军方会拿出名单，上面有参加演说或颠覆活动的神父名字。主教会对他们说，“这人不是颠覆分子。”军人眼里，颠覆分子等于武装团伙，反正是非法的。

主教委员会由三名地区主教代表组成。他们要求军队证明这些神父犯过法。主教说，“你们要是不能证明神父犯法，比方说加入武装组织，他就不是颠覆分子。”我不属于任何武装组织。他们证明不了，因为我从没加入过。要是绑架我，那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这是主教提出的要求。但是主教没有管和武装组织有任何关系的神父。他们遭到绑架后遇害了。

有一次，警察叫我过去做思想调查。他们放了我一马，没有对我做什么，而是给我机会解释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放我出来。我受到思想上的审问。他们问我，为什么我作为神父会有这种想法。我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危害人民的事情？他们说，我们是在把人们带入共产主义、带入死亡。

问：你们有没有因为没有鼓吹将军们想要的思想而遭到批评？

不（笑）。还好吧。后来，当他们再次要求我离开国家时，派我朋友以神父的身份找我（后来我发现他是军队神父）。为了帮我，他派人告诉我，我在名单上，有可能遇到不测，最好还是出国吧。当时发生了许多“事故”，安赫雷希主教也死于事故。

我留了下来。当时呢，有人说要来找我，我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是敌是友，不知道是不是要套我的话，挑出我不想表达的意思。很麻烦。当时就是这样。如果说“我要走了”，就说明我参与过某些事情。如果说“我什么也没参与，我只是宣扬自己相信的东西，做我必须得做的事”，那我就死定了。出走路线和证件什么的，他都给了我。这神父托一个不认识的教友把东西给了我。如果有神父找我问话，我得非常小心，但至少我知道在和谁说话。但来路不明的人来找我，我没法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哎呀，感谢你跑大老远这一趟”。我最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把话说死。这次见面一共花了二十四个小时。

问：所以你留了下来。显然，你没有跑路。那你还出门上街吗？

我上街要留个心眼（笑）。跟其他人比，我这不算什么。别的神父都没有机会出门。他们得躲藏起来，否则就要坐牢受刑。主教把他们赶出教区，要么赶出国。很奇怪，我却得救了。有许多神父献身于这场运动，我想，这就是他们不敢杀死我们的原因。（要不

然)他们得杀死不少神父。这就是他们只故意杀死穆希卡的原因。

问：你认为是谁杀了穆希卡？

洛佩斯·雷加手下的三 A 团。

问：梵蒂冈对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影响吗？

教廷大使皮奥·拉吉的角色很有争议。他帮助一些神父与教友逃走了。但梵蒂冈会怎么说？这是阿根廷主教的职责。皮奥·拉吉说：“不要问我大主教和其它社会政治机构怎么会袖手旁观！”他们对军方的大部分行为都达成了默契。而镇压的具体方式是尚不清楚的。有人提到绑架和谋杀时，许多人都不愿相信。红衣主教阿兰布鲁说，颠覆分子生活在欧洲，失踪者也在欧洲。那是在撒谎。他们都埋在了标着“无名氏”的公墓里¹。更何况呢，要在红衣主教和我的话之间做选择，那么大多数人会选择相信红衣主教。梵蒂冈也听红衣主教的话。

问：你说教廷大使的态度引起争议。它在什么地方引起争议？

1997 年，他接受了罗马的意大利报纸《王国》(il Regno) 的采

¹ 墓碑上的“NN”表示此处理着一具无名尸体。早期，军队埋尸体时，经常这么做。——原注

访¹。标题是《本该做更多的主教》(Di bisogno di fare di più)，意思是他们应该做得更多。主教们为自己辩护说，他们的确出面过，替囚犯说过情，但没什么用。他们没有像智利和巴西的主教那样，后者除了语言之外，还采取了行动。原因就是，阿根廷的保守派教会领袖和军队的看法是一致的！这要比他们的宗教信念还要强大。我认为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支持军队的所作所为。随军总神父与某些神父在神学上为酷刑辩护。这是反对国际颠覆活动、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圣战，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会毁灭教会。

问：阿根廷的天主教氛围浓厚，教会对人们的思想具有很大的权力。为什么阿根廷的教会人士没有更加进步呢？另外，你是怎样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问题的？

关于这方面呢，有过许多研究。有的从教会的起源入手，或者从教育，从它缺乏共情能力等等……还有从他们的恐惧和教权制度进行考察的。他们比教皇本人更加教皇。我的观点和他们不同，因为我是在一场受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启发的讨论会中，形成自己观点的。我们是在那个环境下形成思想的。六十年代的阿根廷发生了真正的社会变革。我们怀有强烈的期盼。那时的拉美处在革命的氛围当中。在那个年头，摆脱了偏见与宗派主义的思考方式得以发展。但主教们更关心的是反共。

¹ 《不义与痛苦之事》(Vicenda ingiusta e amara)，《王国时事版》(Il regno attualita)，1977年7月，第385—390页。——原注

贝尔南多神父（帕特里西奥·托马斯·休斯）

1970年，我是圣十字教堂的本堂神父。当时，我快要四十岁了。那是最美好的岁月，因为在阿根廷，甚至整个拉美，我们都怀着同样的梦想：我们能够建立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人都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公平正义的世界。我们国家经历过一大堆独裁统治与军事政变。因此，尤其在叛逆的青年中，人们心中涌出了希望。在麦德林的主教会议之后，教会也出现了“新人”¹。1968年，十八位第三世界主教写了一份文件，许多阿根廷神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于是，诞生了日后的“第三世界运动”。

这场运动主要关注神父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神父与教会的关系。人民在社会和经济上四分五裂，但在教区中还有许多力量、许多热情。当然了，教会高层不会认同我们。但是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在当时获得了两样新的经历。首先，有许多青年和神父一起，在全国的贫困地区工作，还有些人去了城市贫民窟。他们有位领导人是卡洛斯·穆希卡神父，三A团后来谋杀了他。在贫民窟里，我们希望帮助穷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食物、医疗、教育、组织、就业。我们意识到，教会是属于中上层阶级的。教会眼里只能看到教堂所在的地方！大多数人都是社会边缘人，但他们是天主教徒，他们也是信徒。

1955年，教会与庇隆发生了激烈冲突，在人民与教会之间造成了分歧。人们继续给孩子受洗，但拒绝了教会。因此，第三世界神

¹ “新人”（Hombre Nuevo）这个词是因为切·格瓦拉（Che Guevara）而流行的。
——原注

父走近人民，试图在教会与人民之间，或者说，在教会学说与庇隆主义理论之间，建立共同的基础。好吧，后来游击运动出现了，里面一些人也是天主教徒。为了信仰，他们开始在内陆和贫民窟活动，这就导致了 1973 年的事件。人称“三 A 团”的军事力量出现了。他们 1973 年就很活跃了，庇隆死后，更是肆无忌惮。那年头很混乱，政治非常腐败。但大多数年轻人没有看清这一点。他们相信当选的坎波拉，后来也相信庇隆。不说年轻人了，我们神父也很糊涂，没有怀疑过什么。

那段时期，发生了非常棒的事情：从未组织起来的农民也建立了协会。协会越搞越好，组织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文化体育活动。教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它成熟了，从教会中独立了出来。他们组织起了自己的工会。此外，他们也和游击队非常亲密。

在我看来，游击队是首先进行“思考”的组织。任何改革的尝试，都由于镇压而无法进行下去。他们得出这个结论后，才参加了游击队。有人认为，游击队是在跟民主战斗。他们说这话，就是不愿意承认：游击队存在之前，我们就忍受了多年的压迫与沉默。

问：第三世界神父与更保守的教会势力之间是什么关系？

好吧，主教们更喜欢听话的、不给他们找麻烦的神父。布宜诺斯艾利斯容忍了第三世界神父们（的活动）。有些人支持神父和乡村运动，但他们只是一小部分。这些神父也是圣职人员的一小部分，也许只有两百人，但他们不一定是唯一有这样想法的人。比方说，我不属于这个运动，但我跟他们想的一样。他们在布道时，提到了

“正义”，所以政府和警察把他们叫做“第三世界神父”。当然了，不光是谈论正义，他们还谈论现实。只有谈论天堂、德行的神父才算得上好神父，对吧？所以三A团杀了穆希卡神父。

许多第三世界神父想与穷人共同生活。对于神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经历。儿童的死亡、每日发生的露骨的不公正，有时候会激起暴力的反应。我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这说明了这些人的献身带给人们的力量。

是的，我在1976年有一种感觉：我们将不可阻挡地跌落悬崖。政变发生前，政治家、掌权者、教会，谁也没有做出反应。暴力非常可怕，街头全是暴力。而我们什么也没做。我们本来能审判总统，让平民担任临时总统，召集选举，总得做点什么，而不是接受军事政变。如今我感觉也差不多，那么多的腐败……

好吧，军事政变前的暴力活动很频繁，所以有些人十分欢迎政变。许多人把政变看作出路。军队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我完全不这么想。我很难过，这个国家就这么接受了政变。几个月后，我得去波多黎各学习五周。差不多那会儿，1976年7月4日，帕罗廷修会的三名神父和两名神学院学生遇害。到了八月，安赫雷希神父也死了。他们就给我打电话，叫我不要回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军方给教会打了招呼，说要杀我，说我是颠覆分子。我受到了威胁。他们正在找我，有人警告我不要回来。

问：你并不是第三世界神父的正式成员，为什么也盯上你了？

我们在教区里始终关注现实问题，总是提出批评。当局就说，

我们一直在搞政治。我们照顾过智利难民，这可是严重的犯罪。后来天主教运动的年轻人杀死了阿兰布鲁将军。他们说我教区里的一位神父也参与其中。这位神父的眼睛都看不见东西，压根不可能参与什么行动。七十年代初，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们为他举行了两次弥撒，四十多名神父在场。我们做弥撒时，警察包围了教堂。

问：他们是怎么知道你们在给他做弥撒的？

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想暗中干点啥是白日做梦。我们就像暴露在阳光下，给看的一清二楚。教堂不远处就有国家情报处的据点。

那一阵子，我是本地最高级的神父。当时，有人批评我们，批评来来这里做弥撒的忠实的人们。由于我们的活动，一些人离开了教会，另一些人则慕名而来。我们做任何事都会遭受怀疑。如果在你们的组织里有年轻人——是的，阿根廷的所有年轻人都受着怀疑。如果他年轻又留胡子，他就更加可疑了。如果他又是大学生，那还要更加可疑。而如果他年轻，留着胡子，又是大学生，还为穷人工工作，那么他显然是颠覆分子。你能理解吗？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希特勒有逻辑吗？嗯？道理是一样的……

我去了西班牙，直到1977年12月才回来。那天半夜，我回到教堂时，到处都是涂鸦：“共产党神父”、“游击队的老窝”之类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为啥写这些。无论如何，（教区）这里有许多年轻人。情况就是这样，对吧？

为了描绘当时的印象，我要告诉你一则轶事。某个礼拜六下午，

我正在洗礼。一个短发的年轻人进门，说要跟我谈谈。我让他等我完成仪式后再来。他在门口等着。他告诉我，“我是耶稣基督军队的少尉”。我说，“头一回听说耶稣基督还有一支军队。”他回答说，“是的，我属于一支跟共产党、游击队、嗑药的毒虫、犹太人、无神论者……跟所有人打仗的特种部队。”我告诉他，“有些游击队也是天主教徒。”他说，“那不可能是真的。”我告诉他，“是真的。就像你说的，你来自耶稣基督的军队，可我并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存在。但有些人确实是因为信仰基督教才参加游击队的。”

“让我找到谁是游击队，我就杀了他。你告诉我谁是游击队，我就杀了他。我杀了人，也只是杀了他的肉体。我把他的灵魂献给了耶稣基督。”他还说，“哦，既然你说游击队里有天主教徒，我记起来了，有两个犯人，都是年轻人，一男一女，五花大绑倒在地上。我杀他们的时候，听见了他们在祈祷。啊哈，他们应该是天主教徒吧。”他自述开枪打死了他们。那是在图库曼。太疯狂了。当然，游击队也做了失去理智的事情。想象一下，假设有个神父是游击队，他在教区里制作炸弹：一点逻辑都没有，什么都很荒谬。

警察从来没有打断过我们开会，但有时就待在里面。我们知道谁是警察。某些夜里，开完会后，警察就在门口盯梢，开车跟在走路回家的人后面。要不然，他们干脆在后面尾行。这很吓人。这是为了吓唬人。其实他们跟踪的人都没有失踪。

好吧，回到我的故事。最糟的时期，我头一阵子不在家。他们两次上教堂找我。我的上级告诉他们，我不在家。我没有遇到他们。但他们带走了另一些人。他们带走了帕罗廷神父。我认为，这有好几个原因：首先，因为他们在上层中产阶级社区。而上层中产阶级对政变很高兴。此外，许多军人——与我们的寡头联姻的军人——

也住在那里。许多年轻人和帕罗廷神父们在一起。最后是他们的布道，这些布道对他们来说，可能太过强烈了。他们觉得这是在抨击自己，而不是在说游击队。神父是在批判不公正和暴力。

问：跟他们在贫民窟工作的年轻人是上层中产阶级的孩子吗？

是的。他们害怕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会思考，能自由地献出生命。而老一辈把自己和生活拴在了一起。大人发起战争，青年为之而死。

问：一些士兵是不是也很年轻？

我不认为只有十九岁的士兵会受刑。我们知道，军队里也有士兵失踪。兵役不是只要一年吗？他们失踪了。阿根廷年轻人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想要改变社会。

我认为军队不够聪明，很没有远见。我觉得，有人让军队相信……他们相信，共产主义要毁灭民族，而军队是国家仅存的良心，只有军人才能抵挡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是——我们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另一件原罪——共产主义反对我们的基督教生活方式，你懂吗？于是他们接过了国家和宗教的旗帜。你要成为军人，就必须受洗。

问：你能不能说明一下，为什么你认为教会是支持军方、反对人民的？

也许……我是说也许，是因为我尊重他人的想法，而对于这个话题，你没法绝对地说：教会不关心经济问题，只是害怕左翼运动、害怕革命运动、害怕教会内部的质疑。阿根廷人民信天主教，但天主教的受众是中上层阶级。他们参加弥撒、为孩子洗礼、在教堂里结婚。军队也信教。教会在军队中也有神父，有随军神父。因此，军队和教会是两个举足轻重的机构。它们本质上是保守的。我得说，军队里的某些教士，比起神职人员更像是军人。

圣十字教堂的注解

贝尔南多神父的这所教堂为五月广场的母亲提供了集会场所。1977年12月8日，在这座教堂的院子里，海军中尉阿尔弗雷多·阿斯蒂斯指认了参与组织的几位主要母亲。阿斯蒂斯以为失踪的兄弟哀悼为借口，渗透进了母亲们的运动。在当天和接下来的数日内，包括两位法国修女在内，这个组织的十四名成员失踪了。

第十五章 军人的辩护

大多数现役军官没有表态。军队有明确的“内部指导意见”，空军和海军也一样。臭名昭著的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多·阿斯蒂斯渗透了“五月广场母亲”，向同事指认运动的领导人，绑架她们。最后阿斯蒂斯有件事做过头了，受到处置：他向媒体吹嘘自己杀人的高超手段¹。1998年初，他关了一小段时间，丢掉了退休后的海军英雄待遇。几位受邀采访的空军和海军人员称，军队没有下正式的封口令，但军方希望由“上级”替当事军官发言。而它们的上级不是回绝了采访，就是保持沉默。

然而，我们还是采访到了四位退役的陆军高级军官，两位出现在本章的采访中。另两位与两名下级军官（他们在现参谋长的军队中感到足够安全）的采访将留在下一章。

参谋长马丁·巴尔萨²将军公开对军队的独裁行为表示遗憾，尤其谈到了文官治军的必要性。此外，他对于军队在现代民主国家中

¹ 《拉美周报》(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1998年1月27日。——原注

² 马丁·安东尼奥·巴尔萨(Martín Antonio Balza, 1933年6月13日——)，1955年入伍。1978—1979年任炮兵学校教学部主任。1979—1982年任第三炮兵团团长兼陆军高级战争学院教员。1982年参加了马岛战争。1984—1986年任国家军事学院副主任。1987年任炮兵督察。1987—1988年任第六山地旅旅长。1989年任军事研究所所长。1989—1990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1990—1991年任陆军副总参谋长，1991—1999年任总参谋长。1995年在电视节目上公开承认军政府在独裁时期犯下的一切罪行并致歉。1999年退役。2003—2011年任驻哥伦比亚大使。2012—2016年任哥斯达黎加大使。——中译者注

的作用，表达了较自由主义的看法¹。为此，他受到了各方势力的责难（最露骨的是阿斯蒂斯，他管参谋长叫“白痴”，于是进了监狱）。尽管上级比较宽容，但就现实来说，下级军官与军外人士说点心里话依然是有风险的。

1976—1979年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务总探长的米盖尔·埃切科拉茨²还不松口。他指挥了针对游击队（他称为恐怖分子）的行动。埃切科拉茨是少数在军事独裁结束后，受到起诉，锒铛入狱，然后在大赦中获释的人。他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出了本书指责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企图为镇压辩护³。他的说法是，颠覆势力是对社会的真正威胁，而军警是在打一场全面战争。他认为，委员会完全没有考虑到颠覆分子的活动，而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了军队和警察。他认为，委员会夸大了受军方行动影响的人数，低估了恐怖活动的受害人数，他还列出了其中七百十一人的名字和职业。

¹ 出自马丁·巴尔萨（Martin Balza）的采访，报道于《军号》（Clarín）数字版，1998年1月16日。——原注

² 米格尔·奥斯瓦尔多·埃切科拉茨（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1929年5月1日——），阿根廷警察。1976—1977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探长，参与数十个秘密监狱的设立，残酷镇压反对派。1986年被捕，判处23年徒刑，判决撤销后，又因盗窃失踪者婴儿，判处7年徒刑，但因健康问题软禁在家。2006年因在家中搜出枪支而撤销软禁。2006年和2014年两次判处终身监禁，2018年入狱服刑，2022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³ 《永不再来》（La otra campana del Nunca Mas），未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日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火车站的小店可以买到，但1997年9月再普通书店里买不到。当月，一项电视访谈节目（“Flore Clare”）同时邀请了埃切科拉茨（Etchecolatz）和阿尔弗雷多·布拉沃（Alfredo Bravo），后者是德高望重的议员，在七十年代曾是前者手下的囚犯。节目引起了广泛的声讨：观众非常反感，虽然埃切科拉茨特赦出狱了，但不能让这个罪人这样挑战布拉沃。在我们的采访中，布拉沃表示了宽容的重要性，提到他作为议员，必须天天带着理性与友好与曾经的迫害者沟通，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原注

另一种辩护是“两个恶魔”的理论。既不同情镇压者，也不同情颠覆分子的人，通常会提出这种说法。它说的是，两股势力进行了疯狂的战斗，其他人则沦为了人质。它忽视了双方的军事能力与人数之间的差异，也无法解释“发疯”的原因。相信这种理论的人，无视了催生游击队与当时军队捍卫的政治经济利益的社会条件。

拉蒙·赫纳罗·迪亚斯·贝索内¹提出了更具说服力的观点，他详尽又繁琐地描述了他的“侵略”和军队的“保卫民族社会”的说法²。军官俱乐部出版了他的书，书里对“进程”的看法写得非常详细，我们的受访者屡屡引用这本书。

第一篇的受访者是在“进程”期间担任要职的军官。他承认军方的一些行为是无法辩护的，但这些行动大致是合理且正当的。我们的第二位受访者否认发生过任何事情。我们详尽给出了这些采访，因为它们明确为国家恐怖主义辩护。

洛伦佐上校

我在四十年代中期参军，在军人政府结束前，以上校军衔退休。

¹ 拉蒙·赫纳罗·迪亚斯·贝索内 (Ramon Genaro Diaz Bessone, 1927 年 10 月 27 日——2017 年 6 月 3 日)，1943 年入伍。1973 年 3—5 月任门多萨临时总督。1975—1976 年任罗萨里奥第二集团军司令。1976 年后在军政府内部属于强硬派，鼓吹民族主义和“军民民主”，反对自由主义。1976—1977 年任计划部长。1985 年受到起诉，但最高法院在 1988 年驳回了起诉，1989 年被梅内姆特赦。2004 年再次被捕，2010 年受审。2012 年判处终身监禁，但由于精神原因免于入狱。2017 年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² 迪亚兹·波纳索 (Diaz Bessone)，《阿根廷的革命战争 (1959—1978)》(Guerra revolucionaria en la Argentina, 1959-1978)。——原注

在颠覆活动的年代，我负责指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步兵团，所以我能够参加这场战斗。我不是旁观者。我是当事人，还是团长。

我要澄清一点，颠覆活动不是从 1973 年开始出现的。1959—60 年，图库曼出现了阿根廷的第一支游击队乌鲁伦科¹，这支游击队企图建立一块小根据地。到了 1964 年，萨尔塔出现了另一支游击队，但也垮了。然而，游击队活动在 1968 年变得极端暴力，蒙特内罗杀害了阿兰布鲁将军。游击运动这才全面爆发。因此，游击队不是在 1976 年同军政府一起出现的，也不是与 1973—76 年的庇隆政府一起出现的。早在这些事件之前，它就已经诞生了。过去十年里出现过游击队，但都垮了。

问：你自己估计下来，游击队总共有多少人？

游击队有多少成员，你搞不明白的，因为它们是以小组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只有游击队的最高领导人知道有多少战斗人员，又有多少后勤支持。情报部门有游击队人数与补给的信息，但我不在情报部门里。我前几天碰巧听来一些数字，可以跟你说说。刚好有律

¹ 乌鲁伦科（盖丘亚语“Ururunco”，意为“老虎”），1959 年 12 月在图库曼成立。这位上校参考的是迪亚兹·波纳索（Diaz Bessone），《阿根廷的革命战争（1959—1978）》（Guerra revolucionaria en la Argentina, 1959-1978），第 11—12 页。
——原注——原注

“乌鲁伦科”（Ururuncos）原名“民族解放军—庇隆解放运动”（El 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Movimiento Peronista de Liberación, ELN-MPL），1955 年成立，旨在推翻军政府，帮助庇隆回国执政。1959 年起与军政府进行大规模战斗，因寡不敌众，多数成员被俘，遂暂时解散。1963 年少数成员重组，转向马列主义，但仅坚持四个月即宣告解散。——中译者注

师指控了伊莎贝尔·庇隆政府，因为在军事政变前，政府剥夺了人身自由，导致了 1975—76 年的失踪案。他说有九百零八人受害。这么说吧，这位律师以前是个游击队，他指控庇隆政府与 1976 年政变后的军政府负有相同的责任。

劳尔·阿方辛总统的政府¹决定审判 1976—83 年发生的事，此前的事既往不咎。但许多游击队的失踪与遇害都是在之前发生的，伊莎贝尔·庇隆政府没有作壁上观，而是下达了镇压颠覆活动的命令和指示。因此，这位律师指控庇隆政府在 1975 年和 1976 年头三个月犯下了谋杀案。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庇隆政府也应该和军政府一样接受审判。这位律师还起诉了阿方辛政府隐瞒事实与拖延司法公正，因为阿方辛早就从调查委员会手上得到了 1976 年前的失踪与谋杀案的证据。律师说这是持续的犯罪，绝不是从 1976 年才开始的。因此，他指控了当年庇隆政府的所有成员、阿方辛政府、所有知道失踪案内情却只审判军政府的法官。

我提这个，是因为你对数字有疑问。这位律师称，是当局挑起了战争，与影响广泛、拥趸众多的游击队组织发生冲突。根据《国家报》的文章（1997 年 1 月 12 日），人民革命军仅存的少数高层，也就是路易斯·马蒂尼承认人民革命军大约有六百名武装人员，加上与他们合作的、借房子的、提供情报的，共有八千多人。这是在 1975 年。而蒙特内罗有两千名武装人员，影响的人更多。如果比例与人民革命军等同的话，那么它共有两万六千六百人。所以说，你没法知道谁是战斗人员，谁又提供了后勤、技术、通讯支持等等。

¹ 劳尔·阿方辛（Raul Alfonsin）是军政府倒台后，第一任民选总统。他在 1983 年上任。——原注

据说在游击活动中，每个战斗人员的背后有许多人在提供支持。

问：当时军队一共有多少人？

我给出不出确切的数字，但我认为三军加在一起，大约有七八万人，包括各级别的军官、士官、士兵。当然，人数最多的是陆军。这七万多人里有一半是陆军，另一半是空军和海军。军种的区别是很大的，因为作战环境、服役规定什么的，都不一样。因此，你很难确切地区分谁是战斗人员，谁又不是。只能说，我们对游击队有显著的数量优势。我觉得是十比一。这和世界各地的游击战地区差不多，正规军通常都要比颠覆力量更强。

正因如此，游击队才是恐怖主义者。只要革命颠覆运动还无法在人数上匹敌正规军，游击队就无法跟正规军公开交战。革命学说规定了革命组织的各个阶段：首先是建立小分队的形式。每当革命组织获得了支持者后，就要增强自己的战斗力，逐步建立正规的革命军队。中国的毛泽东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最后用传统的方式击败了蒋介石军队。

阿根廷游击队尝试过建立正规军，但失败了。他们试图在图库曼建立正规军。游击队都去了那儿。他们有制服，有旗帜，有一套军事纪律。虽然他们在山区打游击战，但组织方式类似于军队。因此，庇隆政府在当年实施了“独立行动”¹。伊莎贝尔·庇隆下令消

¹ “独立行动”（Operativo Independencia）是图库曼地区反颠覆战争的代号。唐纳德·霍奇斯（《阿根廷的“肮脏战争”》，第102—103页）认为，1975年2月，这项命令开始了图库曼的“肮脏战争”。1976年9月14日，魏地拉总统在图库曼省举行的军事统治半周年庆典上致辞，使“肮脏战争”一词广为流传。

灭游击队。军队进入农村作战，在图库曼山区歼灭了游击队组织。

游击队想在图库曼建立所谓“解放区”。军队获胜了，游击队势力消失了。他们失去了战斗能力。我们要弄清楚“歼灭”的概念。它是克劳塞维茨¹提出的。歼灭不是指消灭对手的生命，而是破坏他们的战斗能力。事到如今，游击队还能做什么？他们没有全死掉，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散了，各回各家，回到了城市里。他们逃脱了，但组织被歼灭了。我认为人民革命军的情况是这样的。

问：军队在 1976 年 3 月接管政府时，仍然认为有庞大的游击队势力在反对他们吗？

当然了，因为游击队能够利用任何手段、任何能想到的方法、各种地形来战斗。这是一场多方面、多维度的颠覆运动。当他们在图库曼失败后，明白了自己还不能公开战斗。之后，他们就把心思花在城市里，只要进城，他们就能混在人群当中。对于执法部队来说，情况更棘手了。图库曼的战斗是在空旷的地方进行的，就算在丛林里，什么都一清二楚。游击队在山里，军队在外边，战斗就在双方之间展开。除了少数山民，没有平民卷进来。因此，这是发生在战斗人员之间的分明战斗。游击队打输后，战斗就转入了城市里。

问：军队的战斗是在思想上还是肉体上？

——原注

¹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1780 年 6 月 1 日——1831 年 11 月 16 日），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

——中译者注

都有的。军人俱乐部主席出了一本书，收录了游击队的全部文件¹。这些文件非常清楚地表明，游击队的目的是改变阿根廷的政治制度。他们想掌权，建立像古巴那样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政府。他们都是切·格瓦拉的狂热追随者，格瓦拉也想在这里建立类似的东西。格瓦拉去了玻利维亚，那里离阿根廷的萨尔塔非常近，山脉和丛林很多，（军队）难以控制。因此，游击队很可能在萨尔塔和玻利维亚建立据点，从那里策划在阿根廷境内的行动。这就是1964年他们企图在萨尔塔建立解放区的原因。

所以，战斗是对付他们革命思想的，他们想在这个地方，不仅是阿根廷，建立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府。战斗也是对付支持这些思想的武装的。你如果问，战斗是否是对付左翼思想的，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左派可以是和平主义者，也可以是恐怖分子。当左派是和平主义者时，大家相安无事，因为谁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当左派想要通过武力和恐怖手段，强加自己的思想时，当左派想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时，那么战斗就不是在对付思想，而是在对付阿根廷政治的异端。这意味着，战斗是对付游击队（也就是颠覆分子、恐怖分子）的思想的，他们想通过武力强加阿根廷未曾有过、也不想有的政权。阿根廷想要的是民主政府。

问：1976年，军队接管政府时，用了失踪和谋杀等手段与游击队作战。为什么使用了这些手段？我想要解释。

¹ 迪亚兹·波纳索（Diaz Bessone），《阿根廷的革命战争（1959—1978）》（Guerra revolucionaria en la Argentina, 1959-1978）。——原注

好吧，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首先，它们不是从 1976 年开始的，而是从伊莎贝尔·庇隆治下就开始了。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段？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阿根廷的司法系统和政治人物此前没有正视反游击战。我来解释为什么。

在阿根廷革命期间——不是指“进程”期间，而是昂加尼亞和拉努塞执政的 1966 年革命期间——游击运动正在扩大。1968 年，拉努塞当总统时¹，他们暗杀了阿兰布鲁。那时起，游击队成为了阿根廷的急迫问题。政府想通过现有的司法体系与游击队进行合法斗争，但由于恐惧和恐怖，调查和判刑都搞不成。为什么？很简单。假如法官要调查一起恐怖行为，一起暗杀或者炸弹袭击。恐怖分子只需要打电话给法官或他的妻子，比方说，“你女儿多少多少岁，每天都去某某学校，每天都会走这条路……给我当心点。”普通法官受到恐吓，没法对付这种恐怖主义。因此，常规司法系统无法调查和审判游击队，当局必须建立特殊的机构，出于多方原因，它的法官准备豁出命、舍弃个人安宁，能够调查、审判、惩治游击队。像这样，他们把许多游击队关了进去。

当阿根廷革命在 1973 年结束时，庇隆政府回来了。坎波拉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放走所有狱中的恐怖分子²。这就导致了军队接管政府。如果司法系统无法判决恐怖分子——或者判刑后，又不能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阿根廷的游击队问题又该如何解决？答案

¹ 上校给出的日期有误。阿兰布鲁在 1970 年遭遇暗杀。当时的总统是昂加尼亞。拉努塞是在 1971—73 年担任总统的。——原注

² 大赦释放了政治犯，包括七十二名在维拉德沃托（Villa Devoto）监狱服刑的人民革命军成员，共计两千名囚犯。——原注

就是“我们要消灭他们”。

采用严厉的可怕手段是有原因的，而主要原因是法律程序、司法系统、政治人物没有履行职责。出于许多原因——恐惧、意识形态等等原因——军队和警察拿生命做赌注，与游击队作战，抓住人，送到法庭上，宣判有罪后，又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人放出来。因此，军队对付游击队的战术是完全军事化的，因为很明显，司法系统或政治家会放走他们。

坎波拉政府是左翼政府，和游击队走得很近。那段时间，游击队袭击了军事基地，比如阿苏尔的一个团长和他的妻子遇害¹。庇隆不得不取代坎波拉，主要是因为坎波拉的政策和游击队的关系非常紧密。同样作为军人而不是共产主义者的庇隆不再袖手旁观。他无法容忍坎波拉政府跟游击队合作。庇隆死后，伊莎贝尔·庇隆上台后，她要用你刚问我的方式作战。这是全方面的战斗，一方赢，另一方输。我们生活在战争中。在战争中——在任何战争，甚至常规战争中也是——为了取得胜利，都会经常使用违反人权的手段。

只要想想看二战这些战争中发生的事就好了。战争哪有文明的。看看军事史，你会发现有多少平民、妇女、儿童在战争中遭殃。军队这才意识到，是时候该把它卷入的这场内战，以及多年前就已经存在的游击队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问：可是最大的武装游击队不是已经在图库曼打输了吗？

¹ 1974年1月，人民革命军袭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位于阿苏尔（Azul）的军营。——原注

没有的事。图库曼的游击队相比城市游击队来说，规模还算是小的。图库曼山里是个一两百人的组织。对于军队来说，这一两百人只是个小问题，因为军队拥有数量优势，敌我关系又很明确，所以仗不难打。混在普通人里的两百名游击队才是问题。因为，你要找出谁是游击队、在哪里、要做什么，是非常困难的。最危险的游击队不在山里，而在城市里。此外，根据我给你的数字，假如山里有两百名游击队员，那么全国城市里要多得多。顺便一提，把游击队的战斗人员与活动、后勤、情报、通讯支持等等，所有方面的人数都算进去，至少有三四万人是游击队。

问：这些手段包括酷刑，还有对怀孕妇女和青少年用刑。这为什么是必须的？

酷刑是为了取胜，别无他法才使用的最后一招。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年轻人像成年人一样，用手里的枪杀人。颠覆战争、恐怖主义战争是非常不同的，很难理解。但在这场战争中，年轻人、孕妇，有时连小孩都必须要死。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让另一些人——孕妇、小孩、年轻人——参加会造成死亡的战争呢？谁让妇女儿童打仗的？我们该怎么对付放炸弹的小孩？你知道警察首长卡多佐（Cardozo）将军怎么了吗？卡多佐将军的女儿有个朋友，她往卡多佐床下放了炸弹。凶手只是个小女孩。

问：但在《永不再来》里，委员会报告了近九千起失踪和酷刑。这些都是事实，当然了，你的观点是在另一边的。但那是九千起！那是个非常大的数字，而且失踪的许多人没有参加过战斗，他们从

来没拿过枪，还有一些是老老实实上班的人、不参加战斗的孕妇。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为什么这也算是战争？

这是观念问题。据我所知，很少有罪犯会承认自己是罪犯。我的生活经验——不是作为军人，而是作为公民——告诉我，大多数罪犯都否认自己参与犯罪。报告中的八九千人，谁知道他们是无辜的呢？就因为他们是这么说的吗？报告说他们是无辜的，因为这些人……好吧，关押与失踪人员里，可能有些人的确是无辜的。没有人知道，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是无辜的，因为游击队组织的主要特点就是，它是秘密的。这些是秘密，所以没人知道某个人是不是游击队。那是非常难办的，所以有可能搞错。也许有倒霉蛋是清白的，但这是战争的不幸。我认为所有战争都是这样。在战争中，死的不仅是那些有罪的，或者积极参与的。而在恐怖主义战争中，事情就更难办了，尤其在阿根廷这么大的地方。

问：按照五月广场的祖母和《永不再来》的说法，军人带走了一些刚出生的婴儿，在母亲死后，把他们交给了别人收养。这是真的吗？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是的，我认为这是真的，因为有确凿的证据。我不知道发生过多少，但确实发生过。我认为这是错误，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可能是亲戚带走了他们。但是，如果怀孕的母亲和游击队待在一起，只会发生两件事。首先，没人知道她的亲人是谁，因为她用的是假名。这样的话，让别人带走孩子是人道主义的行为。不过，如果能够找到亲人，那么带走孩子就是犯罪了。那是不应该的。

问：报告中经常写道：军警抓人时，常常把房子洗劫一空。这种事发生过吗？

是的，这事儿发生过，这是犯罪行为，他们是卑鄙的罪犯，应该要问责——许多人在“进程”期间（而不是之后）就进了监狱。抢劫对实现胜利没有任何帮助。这是犯罪。为了把阿根廷从恐怖主义罪犯中解放出来，是会发生需要反省的暴力事件。但这是为了达成目标，有一定的正当理由。抢劫与目标没有什么关系。这是犯罪，是卑鄙的，应当受到惩罚。

问：另外，“进程”期间查禁和焚毁了许多书。人们不能公开谈论某些想法。我们这些局外人很不理解。你能解释吗？

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多。看来游击队的宣传被禁止了，因为颠覆本质上是心理过程，而不是军事过程。真正颠覆制度的是思想。这些思想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它们与暴力结合在一起后，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有你的想法，我也有可以有我的。我要接受、尊重、讨论你的想法，我应该探讨、接受、拒绝它们。但你拿着枪或炸弹，想把想法强加给我，你的想法就不再是干净的东西了。那是肮脏的东西。这个想法和死亡联系在了一起。有人要把想法强加给我。所以，必须批评与暴力有关的思想，别的无所谓。

比方说，如果有一支游击队，有一个袭击民众的游击队领袖，还有一个人，他的想法导致了这场袭击，那么思考和行动的人都是

一回事。那么只与拿着武器的人战斗，而不与把武器交到凶手手上的人战斗，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这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没法把它拆开来考虑。为什么和这些想法战斗，因为它们与革命的、犯罪的暴力有关，让这个国家充斥着鲜血、死亡、破坏。还有人想改变制度。这些就是思想（的作用）。

现在，我可以听取记者们的想法，他们曾是蒙特内罗领导人，曾支持过游击队和颠覆活动的思想。我也可以听听年轻又能干的年轻人的话，他们把切·格瓦拉当成了偶像和圣人——埃内斯托·萨瓦托¹在电视上说过：“他既是英雄也是圣人。”切·格瓦拉带着武器去了玻利维亚，准备去战斗、发起战争，强加自己的思想。但今天我听这个消息之后，不会去杀死萨瓦托，也没有人会去杀死萨瓦托，因为现在不在打仗。这些想法脱离了暴力。

即使我认为某种思想是极端和错误的，它都应该得到尊重。当这个思想和左轮手枪、炸弹搞在一起时，那就糟糕了。所以说，要把这些放在背景条件下考虑。因此，没有了当时的背景，很难事后下结论。死者离我们很远了，现在人们可以在学术和法律上，分析战争中发生的事了。但在它们发生时，事情还没有这么清晰可辨。

¹ 埃内斯托·罗克·萨瓦托（Ernesto Roque Sabato，1911年6月24日——2011年4月30日），阿根廷作家、画家、评论家与物理学家。早年参加大学改革运动，曾加入阿根廷共产党。1933—1934年任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1934年起开始怀疑共产主义，脱党后流亡法国。1936年从事写作。1938年转向超现实主义。1940年回国。曾激烈反对庇隆主义。1955年也反对推翻庇隆的政变。1958—1959年任外交部文化关系司司长。1983—1984年任全国失踪人口调查委员会主席。1984年获塞万提斯奖。20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011年逝世。
——中译者注

问：让我们回到 1976 年。刚刚问了你几个关于当时的大致问题。你能否以更个人的方式告诉我们，在 1979 年以前，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做法？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怎么看待你们打的这场仗？你认为自己是在消灭颠覆分子吗？是在拯救国家吗？

1976 年吗？从 1976 年开始，（军方）有两套基本方案。一套是政治方案，是根据阿根廷的特点量身定制的。而另一套是消灭游击队的军事方案。我不知道你具体是指“进程”的政治方案，还是摧毁游击队的军事方案。

问：针对游击队的军事方案。

嗯，我觉得，我到现在也觉得……消灭游击队是有必要的。很不幸，我们不得不在一场没有军人想要进行的战争中，履行作为军人的职责。这场战争牵扯到普通民众，是反对同胞兄弟的战争，是战线不确定、敌人不确定，又难以保持清醒与理智的战争。但是军队没有选择的权利。当时，我们不得不参加这场战争。我们不想打，但不得不打。我们没有选择它的时间、地点、特点：一切都是不由我们决定的。我们必须按照游击队设下的条件，接受这场战争。游击队选择了炸弹、暗杀、破坏、威胁、犯罪，而我们被迫用类似的武器对付他们，因为这是打败他们的唯一办法。

阿根廷的游击队活动规模非常大，没有国家能相提并论。我认为，你没法拿阿根廷的游击队与意大利或德国比较，那是错误的。在那些地方，只要关进去四五十个、一百个人，游击战争就结束了。

它的规模很小，没有影响多少人，也没有渗透到机构当中。

游击活动在阿根廷要多得多。它渗透了所有机构，甚至是军队和警察。多年来，游击活动愈演愈烈。甚至在 1973—76 年的庇隆政府时期，游击队与政府都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因此，游击活动严重损害了阿根廷民族、国家、民主的根基。我知道，从参加推翻宪政政府的“进程”的人口中说出这话，好像没什么说服力。但是生活中有不少悖论——生活不总是非黑即白的，它还有灰色——听上去很矛盾，可“进程”是为了在阿根廷实现更好的民主。

然而，它采取的形式，终究还是扭曲了目的，最后遭受了失败。我认为失败的点在于，军队绝不该试图领导国家的政治进程。因为重组国家或军队是徒劳的，对所有人都不利。如果它再次发生——但我认为游击运动绝不会在阿根廷死灰复燃——那就要好好考虑我们的经验。需要明确一点：必须打倒想要通过暴力强加思想的游击运动。方式可能需要改变，但任何想要通过暴力强加自己思想的人，都必须要打倒。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军队付出重大代价后，完成了把国家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从大多数国民不想要的政府中解救出来的使命。那些死去的、活着的、进过监狱的人，都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

有人认为必须等到二三十年后，才能剖析明白这一系列历史事件。而我相信，要把这场内战讲清楚，得等到主要参与者及其下一代退出人生舞台以后，到了孙子一代，才能更平静、更客观地看待战争中的一切。不仅是参与者，旁观者也很难客观。自视旁观态度的人，其实也是参与者。许多人在旁观这场悲剧，等待结果。人人

都参与了这出戏。演员和观众都是……

完全客观是办不到的。由于某种原因，我上了剧院。由于某种原因，我看了这出戏。由于某种原因，我见了剧作家。客观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客观是态度，而不是结果，因为每个行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思想、情感、偏见……受一切事物的影响。但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生活，人就是这样的。

好吧，不知道这些话是否对你有用。那个时代非常复杂，不能把它看得那么简单。它有许许多多方面。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又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而且我相信，妖魔化是错误的。我这样说是因为，阿根廷总是在说“两个恶魔”的理论。一个恶魔是军队，另一个恶魔是游击队。我认为，当时还有另一些魔鬼影响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我们两方。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多角度、多方面看待。

问：其它魔鬼是谁？你是在指谁？是境外势力吗？

是的，境外势力，我指的是美国。美国正面临着招致毁灭和自杀的反共战争。你了解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理论吗？嗯，根据他的理论，农村要包围城市——他就是这样取得胜利的。从世界范围来说，共产主义想通过农村包围它的敌人，也就是美国和欧洲。农村就是第三世界……因此，苏联在第三世界支持共产主义游击队，开辟与资本主义战斗的新战场。所以，这是两个巨人之间的战斗，它把这场颠覆战争带给了拉美和第三世界。这就是苏联支持游击运动的原因。正因此，美国扶持了军事政权，用来对抗游击队。在没

有游击队的地方，比方说在智利，阿连德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府，美国就亲自下场推翻了它。俄国借助游击运动统治世界，而美国则利用军政府对付游击队。

等战争结束后，苏联和美国就撒手不管了。拉美国家就像又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而为这场战争卖命的军事政权都受到了制裁。阿根廷的游击冲突是世界冲突的一环。我们是棋子，在这个大棋盘上，一个棋手是苏联，另一个棋手是美国。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感觉遭到了背叛，因为我们全心全意给资本主义卖命，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统治世界而战斗，而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却批评我们的战斗方式。他们得了好处，却不愿承担战争的代价。不仅只是苦命打仗的人，这世上还有很多魔鬼。

问：既然说到美国，你有什么具体例子能说明美国鼓励阿根廷军队发动这场战争？

好吧，首先，美国给军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法国人有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的经验，他们也来到阿根廷，在军校教我们如何与革命者打仗。以智利为例，历史已经证明了美国是军政府的后台。

我要说清楚一件事。我用“魔鬼”这个词，是因为习惯。人们总说世上有许多魔鬼，包括美国和欧洲。但我觉得它们都不是魔鬼。是这样的：谁都以自认为最好的方式捍卫本国利益。美国知道与共产主义作战，支持拉美政府对付游击队颠覆分子，就是在保卫自己的利益。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了每一个国家。美国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冲突中，利用拉美国家捍卫盟国的利益，我一点也不奇怪。

我无法接受的是，在这充满利益纠葛、暴力、战争、冲突的世界中，最终受到惩罚或道德制裁的只有阿根廷军队。

很少有国家会对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感到自豪。在二战中，美国摧毁了不少德国城市，而这些城市里没有军队，只有老弱妇孺。他们应该知道丢下炸弹会杀死无辜者。他们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炸弹时，也知道会有无辜者死去。因此，没有几个打过仗的国家能说，“我从来没动过无辜的人，从没做过野蛮的行为。”我难以接受它们有指责我们的权利，就好像只有我们是野蛮人、是魔鬼一样。

问：你是受过法国或美国的培训吗？他们有给你上过课吗？

当然了，法国人教过我。因为我在阿根廷的军校上学，法国军官担任革命战争的顾问。我从法国人那里学了有关反革命战争的理论与实践的一切，他们又是从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学到的。因为我上的军校里，有法国的教官和顾问。

问：法国输掉了在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的战争。当时有人担心这一点吗？他们会不会担心，法国人是否真的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了解（战争）？

我对你说过，事情是这样的，每代人、每个社会都始终处在特定的背景下。当时，法国在反革命战争领域拥有更多的经验。阿根廷军队没有考虑过别的顾问，因为有革命战争经验的只有法国。此外，战争不仅只是军事，它是很复杂的。一般来说，战争是在军事

失败之前，就已经在政治上输掉的，因为政治在不利的条件下发起了战争。所以说，军事战争的失败，是因为它首先在政治上失败了。政治层面的失败，是因为国际政策没有创造出获胜的条件。

因此，我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失败，是因为殖民主义在政治上就是失败的战役。殖民者是无法击败想要独立的人民的。法国输掉了这些战争，因为它发动了在政治上无法获胜的战争。法国输掉印度支那是必然的。美国在越南没有吃败仗。美国是拥有庞大核武和军事力量的超级大国，却在政治上陷入了注定失败的战争。所以说，你不能怪军队。军队被迫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政治手段的延续。政治导致了好的战争或坏的战争，导致了胜利的战争或失败的战争。

问：假如游击队只是希望改变世界的年轻人。如果你用这种方式看待他们，意识到（年轻人里）只有一小部分人拿起了武器，那么回头来看，你是否认为有可能用不同的、没那么暴力的方式来控制它？

我认为，虽然共和民主制的缺陷众多，但依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因为它包容了所有人，年轻人也能实现理想、开拓自己的乌托邦。我认为丘吉尔说得对，民主制度很糟，可世间没什么更好的了。所以理想主义者与许多一流知识分子所犯的主要错误是：他们认为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平等、自由、博爱的世界。我认为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还没搞清楚，真正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实现他们的理想。当社会主义在19世纪诞生时，或者共产主义随着《共产党宣言》诞生时，它们并不

以民主为目的。1917年，共产党在俄国夺取政权后，还有六七十年代，没有人不知道它们带来了什么吧，除非是不想认清现实。后来，卡斯特罗在古巴掌权后，我觉得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这些民主理想是无法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的。

我认为，这些理想主义者对“进程”的看法是错误的。我无法理解用暴力实现的理想主义。我认为，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或乌托邦的想法，对于进步是非常重要的，能使我们比现在——今天、昨天、明天——看得更远。但绝不应该使用暴力。如果他们想用暴力实现想法，就会发生武力冲突。发生了冲突，随之而来的是犯罪、凶杀、破坏，那是没有出路的。我不理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或者决定参加革命战争、使用恐怖主义的人的想法，我只知道他们事情是干了，等到他们失败的时候，就开始哭鼻子抱怨。

阿根廷输掉了马岛战争。你听说过哪个军人为我们遭受的牺牲与战败抱怨过吗？这就是战争的风险。他们去参加战争，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都不会哭鼻子。但在这里，颠覆分子参加战争、杀戮、破坏，却觉得有后果，永远不会轮到他们的失败。因此，他们进行了暴力的军事活动，再用民法保护自己。这是作弊的游戏：我杀了你，但你反过来打我时，我就要求人权和民法。这样怎么输呢。

年轻人的不文明行为可以容忍，但也是有限度的。的确，年轻人还不成熟，所以他们不尊重人，更加放肆、暴力，喜欢大喊大叫等等。我们需要接受这些，因为他们还年轻，我们也年轻过。但当这个年轻人拿了枪，朝别人头上开枪时，不管他几岁，都是罪犯。

法尔孔将军

这场反颠覆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3—78 年，战争达到了高潮，这是暴力的高潮。然后是 1978—83 年，进行了民主过渡。当然，政变后，军队就是国民政府。

想要解释这一切，我们得弄清楚：坎波拉政府靠的是庇隆左派的支持。当时，人们非常不安。坎波拉打开监狱，放出了所有的恐怖分子，此后，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哪儿，国内到处都是恐怖组织。因此，坎波拉上任一个半月后，庇隆就逼他下台了。过了五六个月，1974 年 5 月，庇隆在五月广场上解散了蒙特内罗。这些恐怖分子失去了政治支持。接着，革命战争开始了，权力之争引发了暴力。但后来庇隆死了，伊莎贝尔接管了政府，发生了危机，所以军队不得不在 1976 年 3 月接管政权。新闻界、工商业、普通民众施加了压力（要求军方上台）。甚至反对派政治领袖里卡多·巴尔宾也公开宣布，阿根廷只剩下政变一条路了。

问：庇隆之死至 1976 年 3 月间，军队参与了反颠覆活动吗？

是的。1975 年颁布了一项法令，命令军队镇压颠覆活动。国家下令实施“歼灭”。“国家执行权力”的所有部长和临时总统路德¹在

¹ 伊塔洛·阿尔亨蒂诺·路德 (Ítalo Argentino Luder, 1916 年 12 月 31 日——2008 年 5 月 25 日)，1946 年加入激进公民联盟，但同年庇隆出任总统后，参加了正义党。1949 年参与起草新宪法。1955 年在军政府起诉庇隆“叛国罪”的审判中，担任庇隆的辩护律师。1973—1976 年任国会参议院议员，1975—1976 年任参议院临时议长。军政府重新上台后，于 1981 年领导正义党和反对军政府的各党达

上面签了字，因为总统……好吧，我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她有两三次不在位，一次是因为生病，另一次……总之，1976 年起，军政府控制了局面。军方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连一场罢工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接管了政府。此后，国家重组进程开始了，当然了，它的主要目的是打击颠覆活动。1976 年后，军方对付颠覆活动的手段其实和以前一样。唯一区别是，现在政府掌握在军队手里。

问：谁发明了这些手段？

伊莎贝尔的政府。国家划分为了治安区，每区除了宪政当局外，还有负责打击颠覆活动的军事当局。每个区域又划分为子区域，每个子区域又划分为片区。因此，整个地区按照地理划分进行管理。三军负责各自的治安区。陆军的地盘最多，出的力也最大。

说实话，到了 1978 年，军方与颠覆活动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因为颠覆活动明显减少了。然后，(军)政府试图寻找政治出路。(军)政府希望过渡到民主政治下，因为“进程”的首要目标是在阿根廷建立民主。1981 年，我们的总统从豪尔赫·魏地拉变为了罗贝托·维奥拉，同年晚些时候，加尔铁里上台。1982 年 4 月，加尔铁里或军政府下令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后来的结果，你都知道了。然后进行了选举。历史就是这样。

成政治同盟，反对军政府。1983 年代表正义党参加总统大选，但败给了阿方辛。1987—1989 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89—1990 年任国防部长。1990—1994 年任驻法国大使。2008 年去世。——中译者注

问：回到 1976 年，这场反对颠覆活动的战争造成了大量失踪。
为什么军队选择了这个方法打击颠覆活动？

这确实是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我没有证据证明失踪者的存在。我读过这些东西，但我看不到证据。没有办法能让人们失踪。据我所知，没有叫人“失踪”的命令或办法。

问：但人们确实失踪了。一些人就是失踪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能说什么好呢？当时，我只是中校，我在反颠覆战争中的任务是巡逻。我负责一个片区。我们只是执勤，没有让任何人失踪。我们检查汽车和人员，如果发现可疑的东西，就把人交给司法当局或警察。所以，我们的活动不会让人消失。我们整天都在巡逻，防止那块地区受到袭击。我们监管当地居民，检查他们的房子，看看是否藏有武器。我们大白天穿制服执行勤务，没什么见不得人或者反常的。所以说，不可能发生失踪这种奇怪的事。

问：你意识到阿根廷在那段时间发生了失踪案了吗？

不，坦白说，直到 1983 年，我读到那本著名的《永不再来》后，才了解到这些的。但我仍然不知道这到底是事实还是宣传。

问：你是说，当你发现可疑的东西，你会把人带到警察那里？

当然了，警察逮捕他们，然后……

问：那个时代谁管警察？军队控制警察吗？

军队对警察有一定的指挥权。这是什么意思？比方说，如果我们需要一支巡逻队，或者要开展行动，到二十个街区外进行搜查，检查证件，看看是否藏匿武器，就能要求警察出动。但警察有自己的上级，有常规工作要做，不好随便差遣。我们只有到了当地，才对当地警察有指挥权，而且只对刚刚提的几样工作有权限。

问：你在辖区里，你是穿制服搜查房间的吗？

是的，是的，我们执勤时是穿制服的，搜查房子和进行民事行动时，也都穿着。民事行动的意思是，打个比方，请医生去看护人。这些行动是在边缘地区进行的，因此，我们往往会把整个诊所的医生和牙医带过去。我们一直都要穿制服。人们来到诊所，看医生。我们就检查他们。有时，我们会在一个地方呆一周左右。

问：根据《永不再来》里的证词，有些案例里，他们的房子遭到军人抢劫。你知道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事情吗？

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因为我们从没做过这种事情，我不知道发生过这种事。我不知道有任何这样的……所以说，不，我不知道。

问：你如何看待当时的颠覆分子？他们是共产党还是什么人？

我们认为，颠覆分子是想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权力的组织。当然，他们的意识形态来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蒙特内罗和人民革命军完全不同。蒙特内罗的思想更多是民族主义的，而人民革命军的思想更多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重点是，这两个组织都希望通过武装斗争、恐怖主义、颠覆活动来掌握权力。

问：你认为，有多少人参加了颠覆组织？

我没法准确告诉你，只能猜一下，我觉得大概有两万五千名蒙特内罗和两三千名人民革命军。我说的是 1977 年左右。你应该和情报专家谈这个。

问：如果三千万人里只有三万多名颠覆分子，为什么要挨家挨户搜查武器？

你问我们为什么要进屋搜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要阻止他们。是这样的：游击队不像正规军那样行动。他们渗透了人群。

问：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如何行动的？

他们的手段很简单。他们埋下炸弹，炸死人，还搞绑架，抢劫

银行。另外，他们做过什么之后，自己也会大肆宣扬。

问：所以，你关于游击队的信息，都是通过他们的公开行动得知的？你对他们的手段有过什么特别的研究吗？

手段就是这样，非常简单。

问：军队里有人专门研究过颠覆作战吗？

有些人研究过这个问题，比方说，有个将军写了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

问：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准备，或者受过什么指导吗？

说实话，我没法告诉你。我不确定，但我相信阿根廷的反颠覆战争学说是其它国家，尤其是法国和美国提供的。他们有这方面的理论。我们的军事理论经常参考别的国家。

问：在七十年代，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出现了颠覆组织，但只有一些国家开展了反对颠覆活动的全面战争。为什么阿根廷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因为在阿根廷发生了很多颠覆活动。

问：比其它国家更多吗？

我认为是的。肯定比欧洲国家更多。比方说在图库曼，游击队控制了一些地区。国家面临“割据”的危险。游击队占领了几处地方，控制了道路。表面上，他们人数很少，但他们有两万八千名战斗人员。而且，如果把他们所有的支持者和其他人员加在一起，那么数字还要大。他们还有后勤、情报、宣传人员等等。加上这些的话，人更多。

问：你认为，为什么阿根廷在当时有那么多的颠覆分子？

颠覆活动增长如此之快，是因为那四年间——从 1973 年开始，颠覆活动已经渗透了许多地方，在大学和工人区也有所增加。

问：为什么它增长得如此之快？

政府没做好的时候，全世界都是这样。伊莎贝尔搞砸了。颠覆活动就有了可趁之机。

问：回到 1976 年。你是多年以后，才知道很多人失踪的……你怎么解释这些失踪？

我没法解释，因为我没有参与。我没法解释这是怎么发生的。

问：当你读到委员会的报告，或者说，当军政府受到审判时，你是怎么看待“进程”的？

我坚持我的看法。我没有见到任何证据，不知道这些指控是否属实。不，不，我没有能给长官下判断的学问。

问：你认为审判是公正的吗？

从法律和宪法的角度来看，审判确实问题不少——有些毛病和错误。我无法解释它们，因为我不是律师，但我读过一些论文，说整个过程有严重的错误，是违宪的。

问：你是说，你不能对失踪者发表看法。那你能对死亡人数发表看法吗？

现在我没法给你数字，都过去二十年了。但我相信你能在迪亚斯·贝索内的书里找到它。

问：你认为，现如今，经过了马岛战争和审判，人们反感军队是不公正的吗？

公不公正？我认为人们没有理解我们。我们在军政府时期犯了一些错误，马岛又是另一个错误，我说的不是（武力收回）马尔维纳斯这回事，而是说后续的处理。另外还有经济问题。可以理解，

军队非法掌握了权力六年，人们自然会厌恶它。

问：为什么你用“非法”这个词？

因为政府不是选出来的。此外，还有一些机构，比如国会没有起到作用。这就使政治失去了生命力。

问：为什么军队解散了国会？

我不知道。我想，唔，不一定非要解散国会。有些军政府能与国会共存，比如乌拉圭的博达贝里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策划政变和“进程”的人觉得没法和国会一起执政吧。

问：他们还使用了非法手段；绑架人后，不给走法律程序或进行审判。为什么他们觉得必须做这种……

我无法回答，因为在我服役的时候，军队从未使用过这些手段。而且没有证据能够说明军人使用过这些手段。

¹ 胡安·玛丽亚·博达贝里·阿罗塞纳 (Juan María Bordaberry Arocena, 1928年6月17日——2011年7月17日)，乌拉圭独裁者。出身于政治世家。1958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69年加入“红党” (El Partido Colorado)。1969—1972年任畜牧部长。1972—1973年任总统。1973年6月27日发动政变，解散议会、政党及一切社会组织，实施独裁专政。1976年被军方推翻下台。2006年被捕，2007年因病改为在家中软禁，2010年判处30年监禁，2011年死于蒙得维的亚。
——中译者注

问：你说颠覆活动在 1978 年减少了。这是为什么？

颠覆活动从未停止过，但从 1978 年开始减少。我想是因为，到了那时候，颠覆分子的选择更少、进行颠覆活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另外，新闻里都说绑架、爆炸、恐怖主义已经停止了。很显然，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安全了。

问：但在 1978 年，好多颠覆分子都死了。这是他们的活动减少的主要原因吗？

不，但颠覆分子的领导人都离开了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们离开了，因为他们意识到，还呆在国内就要进监狱。不管什么组织，要是老大逃跑了，就会树倒猢狲散。

问：但你看，问题来了。我读了所有的报道，所有的国际通讯、《永不再来》以及各种历史研究，都说失踪和遇害人数众多。

是的，但你要找它们的作者核实，我反正是没听说过一起失踪案。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任何人失踪，所以我没法说什么。

问：回到你的经历上，你认为军方为国家做了正确的事情吗？

我认为，我们的主要错在 1976 年接管政府。军队接管政府总归是不好的，因为这是白费力气。我认为，军方应该在宪制政府下，

想出一条出路来。

问：除了国家重组进程之外，军队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

目的是正当的。我没法说行为是好是坏，或者能否做得更好。这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会怎么样？阿根廷会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颠覆活动越来越猖獗。

问：这也会很糟糕吗？

很糟糕，因为那是用武力强加的，是很糟糕的。它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人们想要它，而是一小群人用武力——恐怖主义和暴力——强加了它，然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问：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天主教会对“进程”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军事当局是信仰天主教的，阿根廷有 95% 的人口是天主教徒，但我认为，教会对此没有什么政治影响。

问：你认为，当时教会支持你们的行动吗？

我得说，全体民众都支持这些行动。没有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与恐怖主义的敌人战斗的。而且我还可以说：1976 年政变的发生，正是因为人民给了非常大的压力。

问：我想再问一次，当你读到事后记录和《永不再来》的时候，你个人怎么想？

我不相信这些报道，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我没法相信从没见过的事情。

第十六章

其他军人的观点

参加过七十年代镇压的高级军官通常会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但奥拉西奥·P·巴耶斯特¹严厉地攻击了自己服役多年的军队，他在采访中告诉我们，他以前的一些同事要靠酒精或宗教聊以自慰，有些人选择了自杀。正如他在《民主派上校的回忆录》中讲述的那样，他本人选择反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²。

巴耶斯特上校当了一辈子军人，退伍后，建立了争取军队民主的组织，即阿根廷争取民主军人中心³。组织办公室在1984年遭到炸弹袭击。我们来访时，炸弹炸毁的区域还清晰可见。组织的五百名成员有半数在这起袭击后退出了。上校说：“我们只是谈谈话，一些人就失踪了，还有一些人进了监狱。贝林赫尔（Perlinger）上

¹ 奥拉西奥·巴耶斯特（Horacio Ballester, 1927年7月18日——2015年10月24日），阿根廷陆军上校，1943年入伍，1950年加入正义党。1966年参加了推翻伊利亚总统的政变，但在事后表露了悔意。1972年参加了推翻拉努塞总统的未遂政变，事后采访庇隆，曾参与策划庇隆回国的活动。1982年反对马岛战争。1984年创建阿根廷争取民主军事中心，曾在军政府审判中作证，2015年去世。
——中译者注

² 巴耶斯特（Ballester），《民主派上校的回忆录》（Memorias de un coronel democrático）。——原注

³ 阿根廷争取民主军人中心（El Centro de Militares para la Democracia Argentina, CEMIDA），阿根廷退役军人组织，1984年成立，支持民主政治。2012年解散。
——中译者注

校不经审判就关了七年半。我好多次软禁在家。大家都吓跑了。”他认为，军政府遵从了人民的意愿，但镇压期间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为某些国家效劳。下文我们从与他的采访中摘录了一段。

有些军官在“进程”期间理性地考虑了个人出路，选择了退役。这些人今天可能在从事其它职业。他们对军方策划或影响的事件了解颇多，他们并不忠诚，但有军人里少见的批评视角。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位受访者，比耶加斯（Villegas）少校，他也采用了上一章里洛伦佐上校的思路，指出了军队的冷战思维，表明法国和美国在革命战争中的指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一些采访所示，军队内部也一直在讨论七十年代的事件。最常见的看法是，军队做了人民希望的事——也就是说，肃清共产主义颠覆分子、重建法律与秩序、为民主铺平道路——自己不该为此受到指责。一些人说，他们应该因英勇表现受到称赞。许多人的想法是，社会的态度十分虚伪，先让军队把脏活全揽下来（因此“肮脏战争”一词挥之不去），再唾弃他们的行为。

但军队中还有新的声音，特别是当时年纪太轻，没有参与政变与镇压的军官，他们能以崭新的视角看待这些事件。较开明的参谋长马丁·巴尔萨主持军队后，我们采访了两位少校，他们在本章中坦率地讲述了过去。以下两场采访，一场采访是与卡洛斯·博比奥单独进行的。另一场是与博比奥和他的同事埃内斯托·布尔特拉斯共同进行的。可以明显看出，新一代军官对七十年代的事件有新的见解，了解的公开信息也更多。

读过蒙特内罗领导层与军队情报部门的关系之争的读者，会发现这些采访非常耐人寻味。马里奥·菲尔梅尼奇是情报部门的人吗，

或者是双面间谍吗？其他在 1977 年出逃的领导人也和军队情报部门有合作吗？是军队内部人员绑架了阿兰布鲁将军，再交给新成立的蒙特内罗吗？阿兰布鲁是死于心脏病，而后蒙特内罗伪造了这场暗杀吗？这些似乎都是蒙特内罗的敌人炮制的阴谋论，像是军队放出的“假情报”。但是，似乎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菲尔梅尼奇与军方）合作的假设，尤其是菲尔梅尼奇等人在 1977 年奇迹般地逃脱了，活到了现在，而他们成千上万的追随者都失踪了。假如军方故意放出菲尔梅尼奇是双面间谍的消息，说明军队在政变前就掌握了敌人的情报，那么不必大量杀戮，就能阻止颠覆活动。假如我们相信是军队放出的消息，那就必须相信，他们一开始的动机就是杀死大量的人，而不管这些人与颠覆分子有什么关系。这是一种可能性。但为什么他们会在二十年后吹嘘这些呢？

这些采访提到掌权者（包括军政府高层）为一己政治私利，指示了绑架与谋杀，这也同样耐人寻味。根据我们的受访者所说，马赛拉海军上将自认为庇隆的继任者，所以他要先下手为强，杀死潜在的竞争对手。因此，他下令撕票一些并非敌对的庇隆派。

最后，我们得知阿根廷的情报部门在各机构中只手遮天，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它。它令人嫌恶的作风正在逐步摧毁包括军队在内的所有组织。这是汉娜·阿伦特定义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¹。七十年代的阿根廷情报部门，就像四十年代纳粹德国的一样危险。

¹ 见阿伦特（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原注

奥拉西奥·P·巴耶斯特上校（退伍）

在军政府治下，军官担任的职务都是为了镇压服务的，而与国家未来（比如经济或外交）无关。我不是在为军队的行为辩护，但有很多平民也参加了这个政府。许多知道自己永远无法通过选举上台的政治家，利用军事政变夺得了权力。然后，他们对军方说：“国家召唤你，国家需要你，不能再继续抢劫下去了，不能再继续蒙羞下去了，都停下吧。”不乏蠢货相信了这些号召。

军队被捧上了天。他们甚至在巴拿马的美国学校里接受了培训。他们自以为在保卫民族、保卫传统。同样，幕后势力（我不是在故意抹黑美国）在学校里教授了酷刑、谋杀、勒索、绑架的方法。就在几天前，美国学校才正式废除这些课程。那就是阿根廷军官接受的职业教育。

阿道夫·比耶加斯少校（退伍）

少校首先讨论了六十年代的冲突与乱局，及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的危机。他说，在六十年代末，“法国上校们指导了阿根廷陆军军官革命战争的基本原理。”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法国人？”

首先，因为法国人是“革命战争”理论的发明者。想想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吧。法国人输掉了战争，但保留了革命战争的学说。根据学说，所有印度支那的反政府活动都是苏联干的，在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活动也是同理。阿根廷军官全盘接受了这种看法。这一

点非常重要，因为一整代的阿根廷军官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他们都是冷战的老古董。所有事件都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发生的，这也解释了革命战争……

革命战争，换句话说，后来美国人提出的反颠覆方案，就是阿根廷的根本问题。我的意思是，这就是军队最关心的东西。尤其在肯尼迪时代，它是美国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想想肯尼迪、绿色贝雷帽（属于美国特种部队）之流吧。所有国家的军队大差不差，始终都在寻找敌人。而革命战争采用了非传统的方式作战。军官的智囊团非常重要，他们教授了革命战争的理论……

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所谓“颠覆活动”。其次，它试图组织经济，重建共和国体制。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它一直说要恢复共和制。没有军事政变会说，“我们将创造新的政治体制”。这场反颠覆战斗，用了从法国和绿色贝雷帽那里学到的方法来重建宪政。

他们从美国学习了绿色贝雷帽的招式。美国人经常访问阿根廷，传授学说和方法——有时在阿根廷，有时在巴拿马的什么美国学校。人们普遍认为，敌人使用什么，你必须有样学样。假如敌人使用核武器，我也必须使用核武器。这是基本的军事思想。你必须把敌人用的所有手段都用上，否则你会自然而然地处于劣势。

问：关于这一点，游击队参与过暗杀，抢劫过银行，但有证据表明他们也使用酷刑吗？

用得不多，但有个例。游击队给许多“肉票”上了酷刑。换句话说，双方都不尊重人权，这不是好事，因为军方代表了国家和阿

根廷社会。我不是在给他们找借口，而是在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所有反颠覆战争、殖民战争都是肮脏的战争。极少数情况才不会使用坏的手段。即使是善良的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对付反殖民组织时，也使用了坏的手段。

对于非法手段，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事情。我用了“非法”这个词，是为了表示委婉。在 1982 年的马岛战争中，使用这些非法手段的空军却遵守了所有法律和国际条约。马岛战争是个教科书般的例子，双方军队遵守了所有规则。这一点支持了这种假设：冲突的性质导致了非法手段的使用。

在颠覆战争中，政府军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敌人。一旦确定了敌人，政府的军事力量就远远处于优势。对此，军事情报最重要。主要目标是寻找、识别、定位敌人。而酷刑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还要记住一点，警察一直在使用非法手段。在反颠覆活动的战争中，警察是在军队的指挥下行动的，可以说，是警察把非法手段带给了军队。除了道德与法律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比方说，当你受到指控时，你干脆承认罪名，往往是为了掩盖什么。假如你绑架了某人，对他动了刑。之后，你要掩盖罪行，只好承认杀了这个人。那段疯狂的日子里，军警觉得自己是无敌的。所以犯罪行为如此猖獗……使用非法手段时，也会失去“犯罪”的概念。有时候，他们会拿走不属于国家的东西，拿走犯人的东西，当自己应得的战利品。应当弄清楚这里的区别。

问：军队在 1975 年知道游击队的势力有多大吗？

我不清楚，但（军方）非常担心游击队壮大。换句话说，游击队是重要的敌人。颠覆战争无法用常规战争的方法来衡量。游击队的军事手段较少，但他们会搞袭击、谋杀、绑架，还能对公众舆论和政府产生重大影响。那就是他们的目标。

当时，谁能料到社会要清算军队呢。假如军政府没有在政治上输掉，要求清算战争罪犯，也许要困难得多。比方说，你能看到，要求智利军队自我清算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是在强势地位上放弃权力的。而阿根廷军队在经历军事与政治上的失败后，不得不放弃权力。他们处在绝对弱势的地位，没法谈什么条件。

1982年7月的马岛战役失败后，军政府迅速倒台。连政治家和工会活动家们都对军政府倒台的速度惊讶不已。所以他们现在说，“阿根廷军队对文官政府多么服帖！”他们之所以听话，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极端无力。马岛打输了，他们失去了自尊心。他们作为军人的专业能力受到了质疑。

大多数军人都觉得，自己当初是为了保卫阿根廷社会而战，因此，要求清算反颠覆战争很不公平。在军队内部，“保卫军事机构”能唤起强大的道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引起了一些美国研究者的注意。例如，派恩—柏林注意到了这一点，问道：“为什么（军队）没有产生更多的分裂、更多的分歧？”¹

少数“揭开伤疤”的人，例如阿道夫·弗朗西斯科·希林戈等人——大概有五到十人——从军中除名了。他们许多人犯有不名誉

¹ 见派恩—柏林（Pion-Berlin），《美洲研究与国际事务期刊》（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和《拉丁美洲的自由化与再民主化》（Liberalization and Re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原注

的罪行，比如诈骗和盗窃。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在向军队报复。他们说的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

问：但在将军们受审时，有人替他们辩护说，许多事情不是高级军官的命令，而是下级军官自作主张，做了多余的事。下级军官会不会感到愤怒？为什么他们要接受指责？

这让我想到了阿方辛执政时期（1983—89年）有关内乱的话题。长话短说吧，阿方辛对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有一套政治方案。他在竞选时说：我们要区分下命令的人、遵守命令的人、把命令推向极端的人，听上去是个好办法。你知道阿方辛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吧。他不得不让军人相互审判，搞了一年多，才让军队的高级顾问揭发军队，但由于我所说的那种凝聚力，他没法追责军队，只能把军队送上特别民事法庭。

军队的凝聚力激起了种种反应。首先，有些军官没有参加（审判）。海军也是，而海军在打击游击队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陆军士兵说，“我们不会参加（审判）。”另一些人说，“我们会参加（审判），因为这是上级的命令。”他们还说，“军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卫社会。我之所以参加这些行动，就是因为下了命令，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既然如此，现在为什么要对这些军事行动做出说明和解释？”

这总是让我想起法国上校和绿色贝雷帽。你知道的，阿方辛面临三起叛乱。他一直试图通过法律把他的说法——区分下命令的人、遵守命令的人、把命令推向极端的人——付诸实践。然后，他

尝试通过《应有服从法》把最年轻的和最年长的（责任人）分开。最后，他终于法律手段，挑动了军政府的一些成员或高级军官与警方作对。他最终搞定了三十来个人，解决了军队叛乱的政治问题。

最终几位军政府成员入狱。然后阿方辛的继任者梅内姆总统宣布大赦。梅内姆总统在 1989 年 12 月最后试了一次，但这些问题还是成了糊涂账。阿方辛没有赦免他们，而是惩罚了他们，把他们送进了监狱。阿方辛政府官司打个不停，因此花费了大量政治资源。当我和激进党朋友聊天时，他们都说阿方辛为此“不得不和最丑陋的女人跳舞”。

军事政变是个问题，阿方辛的处境举步维艰。威胁现在消失了。但当时，我们认为军方已经大势已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都无法彻底解决它。只有在大赦之后，梅内姆才能改组军队。但梅内姆仅仅是削减军事预算，保持军力处于休眠状态。报纸和电视上经常出现侵犯人权的事件，这在政治上起不到太大作用。当然了，失去丈夫或儿子的人们永远不会遗忘。只要他们活着，思念和悲伤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问：他们试过让军方人员参与讨论人权问题吗？

我认为有过，是的，军队的思考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不是超然物外的，他们也受社会的影响。参谋长马丁·巴尔萨的公开讲话非常间接地表明了，军队对失踪者负有责任。但军队顾不上什么“责任”了。目前军队正在有限的预算下苟活。无论如何，人们会遗忘，政治家也会犯错误，变得腐败。所以目前来看，在民意调

查中，军队的社会形象处于中间位置。工会领袖的受欢迎程度要低得多。你要记住，1976年时，绝大多数人和政治家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支持军队。当时，军方在为政治家干脏活。

问：到马岛战争都是如此吗？还是军方在这场战争前就失去了支持？

军政府在马岛战争后倒台了。（打仗）那是白费力气。反颠覆活动的战争在1978年就结束了。之后，政治家、商人、教会不再担惊受怕。他们从此（在社会中）变得分量更重了。

问：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估计约有三万人死亡，这个数字准确吗？

杀多少人都是一样的。颠覆战争的悲剧在于，你不知道颠覆分子是谁。也许在你找到一个有罪之人同时，会有三个无辜的人倒霉。这是非常糟糕的。

卡洛斯·巴尔宾少校

巴尔宾少校1974年参军，时年十七岁。他向我们解释了自己对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局势的看法，讨论了蒙特内罗的领导层。

我讲过，我来自庇隆派家庭。军队上台后，压制了庇隆主义的左翼和右翼。庇隆主义的右翼死了很多，但没有任何人权组织为

它讲话。另外，蒙特内罗自己也承认：他们的领袖支持政变。我认为菲尔梅尼奇是军方的人。这是我的个人意见。我读过一些东西，说明阿兰布鲁之死是军队内斗导致的。蒙特内罗也希望伊莎贝尔倒台。菲尔梅尼奇在内的（蒙特内罗）最初领导人都离开了这个国家。

问：其他领导人也是军方的人吗？还是只有菲尔梅尼奇是？

关系藏得很深，但可以肯定，当菲尔梅尼奇离开、当这些领导人离开时，第二线的领导人开始与军队合作，或者为军队效劳，换取自己活命。所以才死了那么多的年轻人。这些领导人揭发了部下。此外，还有军队的内斗，埃米利奥·马赛拉与陆军的内斗，也导致了许多的死亡，最后全怪在镇压头上。这个社会无法无天。

马赛拉有政治野心，想充当庇隆主义的代表。为了个人野心，他杀死了许多庇隆派的领导人。他这人很阴险。政府的内斗更厉害。每个地方的小军阀都在大行其道。当权者想让谁失踪，就让谁失踪。现在你问魏地拉将军，“死了多少人？”他也不知道。长官控制不了下属。这在军队这样的等级制机构中，是很可怕的……

我那一代人没有参加战斗，但庇隆最后一次视察军校生时，我还在军校里。他带着一点哭腔对我们说：“愿上帝在今后的道路上帮助你们。”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懂，现在我想起了他的话。我觉得，他知道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么。¹

……军队实施了酷刑，但我们从没学过如何施刑。我当时还在军校里，没人提到酷刑之类的东西。他们以准备常规战争的方式培

¹ 巴尔宾少校的第一次执勤就是去图库曼。——原注

养我。这场战斗是中产阶级各派之间的战斗。阿根廷大多数人民没有参加武装组织。游击队里都是中产阶级的激进子弟。军队是另一方，它属于压迫者。委员会报告给出的名单上说，这场战争造成了游击队这边五千人死亡，另一边两百人死亡。真是可怕。但它没有五月广场的母亲声称的三万人那么多。你知道母亲们为什么说三万人吗？因为她们在 1976 年里挑了一天，拿这一天的数字推测整个国家的失踪人数。这只是推断而已。而她们给出的名单又是另一回事。我想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发生的事情都是很可怕的，但只影响到一部分的中产阶级。这场对抗是中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尤其涉及到艺术与学术界，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应和影响。

问：但我们仍需要解释，为什么军队掌权后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镇压。不管死了多少人，问题在于，为什么军方认为这是必须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阿根廷的暴力事件从 1955 年开始增加。全是平民的广场上发生了爆炸案、枪击事件。游击队参与了暴力活动。我得提醒你，当年有位上尉和女儿死在了图库曼，几个军事基地发生了枪击事件——我理解不了，既然游击队想和资本主义斗争，为什么把工会和军事基地当作目标？1975 年，游击队占领了两个驻军单位，杀死了所有人。他们在莫雷沙还杀死了应征兵，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与仇恨，也使他们失去了支持……

现在的参谋长巴尔萨将军说：“我们曾错误地认为，通过模仿他们的方法就能打败他们，而无需遵守法律。现在，我们绝不能使用违背法律的方法。”

问：军队相信，或者有证据证明游击队使用酷刑吗？

是的。有个非常著名的例子，一位中校在井里关了九个月，等到发现尸体时，只重二十五公斤。还有不少例子。

问：游击队有多少人？

我认为蒙特内罗人数众多，它是南美最大的游击队组织。确切的数字搞不清，但我认为蒙特内罗至少有一万人。相传他们有五万人。军队把它当作不容轻视的敌人。军人认为自己和家人处在危险中。有些人死了同僚，有些人死了儿子。冲突和对抗时有发生，他们觉得这是错误的。要从客观上解释为何会发生这些暴力，我认为1974—75年的军队是不会想起1955年对庇隆主义的禁令的，而正是禁令导致了当时的局面。蒙特内罗在民主时期转入了地下！他们不仅反对独裁统治，还与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宪制政府走向了对抗。

问：有些人说，军队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救世主。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吗？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1800—1930年的阿根廷没有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然而，国家把重要的职能交给了军队。1910年，《普遍和强制性投票法》把军队当作选举过程的透明性与合法性的保证人。1920年，由于技术原因，国家把石油的开采委托给军队。只要是国家搞不定的东西，都当甩手掌柜交给军队。三十年代，国家把

一家高新技术控股公司也交给了军队。1940年，军队制定了“政务计划”。这一切的结果是，军队参与了不属于军人本分的事务。阿根廷有很多问题。你觉得为什么会实施《普遍和强制性投票法》？因为政客习惯舞弊，他们比军队还要腐败。1930—83年间，选举舞弊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问：回到七十年代的问题上，假如菲尔梅尼奇等游击队领导人是军方的人，那么军队肯定知道蒙特内罗总共有多少人。

1970年，军队对这么小的组织不感兴趣。之后，蒙特内罗大变样了。他们和革命武装力量合并。革命武装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的蒙特内罗是一回事，但后来加入了另一些人，他们就变了。

问：但在1976年，假如菲尔梅尼奇是军方的人，那么他应该能给军队提供情报。

我不知道在1976年（菲尔梅尼奇和军方）是否还有联系。我想，他们在推翻政府这一点上，正好有共同的利益。我说的联系是情报交换的意思……五十年代末，他们让一些军官去了巴拿马的美国学校。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对付游击队的军事学说是美国给的。其实阿根廷军队受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学说影响更大。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蒙特内罗在七十年代出现，美国当时丢了越南。我们在军校里读让·拉尔泰吉¹的小说，特别是《百夫长》（The Centurions），

¹ 让·拉尔泰吉（Jean Lartéguy，1920年9月5日——2011年2月23日），法国

安东尼·奎恩¹出演了改编的电影，叫《阿尔及尔之战》。法国人的理论让我们了解到，为了打胜仗，军队必须与人民形成“鱼水情”，这是毛泽东说的。需要理解他们的文化。（美国在）越南太失败了，丢了那么多凝固汽油弹、死了那么多人，却没多少成果。

问：但法国也输掉了阿尔及利亚战争。

是的。但那更加“浪漫”一点。

问：你认为，军队在1975年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游击队停止了国内的活动。他们彻底垮了。我认为，刚才提的“重新确定国家方向”的问题提上了首位。军政府时期是有史以来苏联在阿根廷的影响力最大的时期。真是矛盾！

问：军队为马岛战争做了多少准备？

作家、战地记者。原名让·皮埃尔·吕西安·奥斯蒂(Jean Pierre Lucien Osty)。1939年入伍。1942年经西班牙赴非洲，与法西斯作战。1950年参加朝鲜战争。1952年起担任巴黎新闻社记者，参与报导了印度支那革命、阿尔及利亚革命、越南革命、拉丁美洲革命等。2011年逝世。——中译者注

¹ 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 1915年4月21日——2001年6月3日)，原名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鲁道尔佛·奎恩·瓦哈卡

(Manuel Antonio Rodolfo Quinn Oaxaca)，墨西哥裔美国演员、作家、画家、导演。1953年、1956年两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1987年获金球奖终身成就奖。——中译者注

那可说来话长！马岛问题要从 1962 年军队的内斗讲起。马岛的步兵没有为真正的战争做好准备，因为他们连打仗要用的武器都没有。这是六十年代军队内部关系导致的结果。六十年代，在拉努塞的主持下，装甲部队很强大。步兵坐了冷板凳，去打一战都嫌落伍。因此，步兵只能在山区和城市作战，要进行常规战争的话，是缺乏作战理论和装备的。

问：你认为，民主化后的军队扮演了什么角色？

就像普通国家的军队那样：保卫领土完整的工具、与其它国家谈判的筹码。当然，它应该受到平民的控制。因为我们犯了错误，摔得很惨，还输掉了战争，我们认为，军队服从宪制政府才是重中之重。我们不是国民的救世主，而是国家内部的机构，拥有特定的角色。对我们来说，最糟的就是改变了我们本来的角色。

卡洛斯·巴尔宾少校和埃内斯托·布尔特拉斯少校

卡洛斯：七十年代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所有拉美国家的下层阶级共有的，不过各有各的不同。这些结构性问题最终导致了武装组织（的产生），而且受到南北（美洲）关系和冷战的广泛影响。英国和梵蒂冈在阿根廷的影响力最大，比美国还要大。至少在八十年代前，英国在阿根廷的地位一直都比美国重要。给你举一些事实吧：美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对阿根廷的人权问题施加了压力，而苏联却为阿根廷辩护。这表明，所有事情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

为复杂和矛盾。

在一次世界共党大会上，阿根廷共产党宣布阿根廷将军们是进步的，表示支持魏地拉将军。这很有意思，因为极左派的武装组织随后给共产党打上了叛徒的烙印。阿根廷的共产党是苏联政府的直接代表。人们还能看到，当时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没有中断。即使美国总统卡特下令禁止向苏联出口谷物，阿根廷还是向它出售了谷物。不仅如此，阿根廷与苏联的贸易在“进程”期间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是以“反共战争”的名义进行的。一支主要的游击队人民革命军自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到了最后，蒙特内罗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埃内斯托：我不认为蒙特内罗是庇隆主义的，但它确实是庇隆主义的产物。庇隆主义是非常宽泛的政治定义。庇隆轻而易举就能招来一大堆拥趸，再把他们说成庇隆主义者，就像蒙特内罗那样。庇隆主义具有非常深刻的矛盾，这也是它最重要的特征。我们要把镇压的背景考虑在内。一方面是冷战。另一方面，军政府遭到了某些意识形态的反对。

在 1930 年以来的阿根廷，某种权力格局使得一些机构永久化了，但它们又不能靠自身维持下去。阿根廷算不上民主制，算不上共和制，也不能算是一—至少在这场如此暴力的冲突以前—具有稳定的传统机构的国家。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暴力的经济制度，那么冲突是能够通过机构来解决的，不必升级为武装冲突。可是阿根廷没有这样的政治。

我和卡洛斯不同，我觉得庇隆主义是阿根廷的魔鬼。他们当我

的家庭是“同盟”阵营（亲同盟国），就是二战的“同盟国与中立国”中的“同盟”，也是反庇隆派。可以肯定的是，庇隆主义遭到的迫害是七十年代初爆炸案的一大原因……

切·格瓦拉有首歌这么唱道：“西班牙、英国、葡萄牙，现在又轮到美国佬统治我们。”所以我们的历史是不断受到统治的历史。六十年代里，一种新的想法冒出来了，就是冈德·弗兰克¹的依附理论，对阿根廷的影响很大²。我们的理解是，人民的出路不是苏联，而是胡志明。是的，就是胡志明，是的，就是阿尔及利亚，但不是苏联，人们不向往苏联。即便如此，边缘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反对着帝国主义。在当时古巴革命的经验下，这种六十年代的思想表明，边缘国家是能够通过斗争击败帝国主义的。

卡洛斯：这里的民族主义运动吸收了欧洲的左翼思想。就是说，民族主义运动以各种方式提炼了它。教会变得更左或者更右，从来没有作为旁观者。教会传播了思想。比方说，美国把新教等宗教引入中美洲，这些教会却为反美运动提供了领导。中美洲和南美洲一直都有反殖民主义。教会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影响很明显，比如萨帕塔运动³……

¹ 安德列·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年2月4日——2005年4月25日），德裔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出身于德国犹太人家庭，1941年移居美国。70年代初赴智利，在智利大学任教，参与了阿连德政府改革。1973年阿连德倒台后，流亡欧洲。1981—1994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执教，1994年退休。
——中译者注

² 弗兰克（Frank），《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原注

³ 萨帕塔运动（Zapatismo），指1911年墨西哥革命期间，墨西哥南方解放军的土

贫穷并不是这些斗争的主要原因。我相信，如果考察六十年代阿根廷的经济形势，你会发现，当时比今天过得还好。六十年代消灭了小儿麻痹症，控制了流行病，降低了文盲率，把预期寿命提高到了七十岁左右。

埃内斯托：发生了很多事情。还有一些外部条件引发了武装斗争。比方说，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发生在了拉美工人阶级收入最高的地方。那里的经济条件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我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况且游击队尝试进入农村，进入图库曼，进入贫困省份的时候，它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民众的支持。

卡洛斯：人们不需要游击队。

埃内斯托：他们想要打仗，但是民众不答应。

卡洛斯：他们进入农村时，内省的穷人很反感他们。

埃内斯托：一位在图库曼作战过的军官告诉我，游击队在图库曼开展颠覆活动，早在军队参战前，人们就一直抵制游击队。不说军队，连当地人就在抵抗他们。

卡洛斯：你必须了解一些关于武装斗争的事情。他们选择了图

地政策及军事活动，因领导人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得名。——中译者注

库曼，据说是因图库曼的客观条件适合游击战。游击队选择去那里，但不是在当地拉起队伍的。游击队是外部势力的产物。游击战是格瓦拉“游击中心”论的产物，而游击队员基本上是科尔多瓦中产阶级的大学生，还有些来自图库曼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决定上山，认为山里能够发展“游击中心”，从而引发革命。但游击队只是中产阶级现象，它是大学的、城市的现象。他们自视为雅各宾式的先锋队。这里没有穷人的代表，没有社会主义的政党表达他们的观点。这不是人民的运动。穷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什么关系。

图库曼的情况不是贫穷造成的。昂加尼亚将军决定关停蔗糖产业，这才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关闭了制糖厂，搞起别的产业，在利益集团和工会中造成了动乱和冲突，但这是特殊情况。好吧，游击队觉得局面对革命来说已经成熟，就到那里活动了一年。大家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们在非常简单的战斗中一触即溃了。

问：从我读过的材料来看，派去图库曼的军队数量要远远超过游击队人数，人民革命军大部分都死了。这份材料说的正确吗？

卡洛斯：是的，军队发狠镇压了他们，是的，确实是这样。我来跟你讲讲图库曼山里的情况吧。我那时在图库曼。1975年2月，游击队伏击了军队，发生了第一次遭遇战。游击队算是打赢了。死了三四名军官和几个士官。之后，游击队召集了所有“战士”，大约一百号人，企图进攻图库曼的军事指挥部。他们开拔的时候，遇到了一队在农村学校执勤的士兵。他们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就手足无措了。他们试图进攻学校，但没成。因为他们的训练水平很糟糕，都不知道要扔手榴弹，连拔掉保险也不会！他们四散而逃了。他们

混乱地撤退了。我得告诉你，这场失败体现了游击队的组织水平。

他们其实只遇到了十名士兵，连一个军官都没有。只有两个士官，剩下都是士兵。几个月后在阿切拉尔（Acheral），在图库曼的一个叫阿切拉尔的地方，军队发现游击队正在转移指挥部，于是发起了进攻。这场行动中，他们领导人（马里奥·罗贝托）的兄弟桑图乔死了。这是 1975 年（军方）在图库曼的最后一次重要行动。我想，当时只有十六名游击队员，但他们都是领导人。军队通过情报部门，得知了游击队领袖“接头”的位置。游击队的领导人会面时，军队掌握了情况，派了两个团发动了袭击。所以在图库曼，我们只遇到了很少的游击队，他们受的训练很差，军方派出了一大批人消灭了他们。但不要低估了他们。军队付出了巨大努力，许多士兵阵亡了。这是我们本世纪的第一场战斗。

埃内斯托：确实不该小看它。但我认为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让暴力达到那种程度的原因，是在早些年，是在其它方面的镇压。比如 1955—56 年叛乱中的暴力事件；1956 年枪决庇隆派；军政府为了防止庇隆主义上台，采取的反庇隆主义措施；1969 年科尔多瓦的镇压，同年罗萨里奥的镇压，警察杀死一名抗议学生，在科连特科，警察又杀死一名学生。这些积年累月的残虐行为，最终让革命暴力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拉努塞政府下，也发生过一件大事：“特雷利鸟逃亡案”。在游击队当中，这件事激起了与图库曼事件同等程度的仇恨与暴力。可以说，上述事件一定程度上封死了各政治派别互相周旋的途径。历任执政者的暴行，导致了后来的游击队暴力。是的，军政府咎由自取。

卡洛斯：……我们讨论过，当蒙特内罗的领导人决定离开国家时，第二线的指挥者为了自救，是如何和情报部门搭上关系的。这些人出卖了部下。所以有那么多次要的——对“行动”来说次要的——人死了。米盖尔·波纳索写过这方面的东西¹。好吧，这个过程中，军队内部也在争权。三军都试图控制国家。比如，教育部里都是军方人员。在教师群体的内斗中，假如我看上了你的位置，我不会去找你的老板，我会到情报部门那里，告发你是蒙特内罗。像这样，情报部门的手段改变了军方组织。曾经有段时间，每个机构的内部问题都“妖魔化”了。任何工会、大学、军队的内部问题，无论牵扯到什么，都要由“特别”部门，也就是情报部门处理。

有点这种意味：“进程”实施的方法赋予了情报部门绝对的权力。没有人能控制它们。科尔多瓦的一位将军利用“特别”部门，在工会、学校、大学里肆意妄为。这种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大量毫无理由的杀戮。许多人的死，压根不是因为什么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我有一些庇隆派的朋友，他们是强烈反对蒙特内罗的——他们曾和蒙特内罗打过仗——仍然遇难了。没有人权组织问过他们的事情，就因为他们是军人。打击颠覆分子的战斗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人人自危。这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我跟你讲讲阿科蒂斯（Actis）将军的故事吧。有本书是讲这个的。阿科蒂斯将军是 1978 年阿根廷世界杯的组织者，似乎和拉科斯特（Lacoste）海军中将在“用哪种彩色电视机”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在 1977 年遇害，据说是蒙特内罗突击队打死了他，但人人都说是拉科斯特海军上将干的。然后在 1978 年，布宜诺斯艾利

¹ 波纳索（Bonasso），《死亡的回忆》（Recuerdo de la muerte）。——原注

斯电力供应公司的经理索尔达特（Soldate）先生遇害。据说是蒙特内罗突击队杀了托尔达特，海军又打死了他们。但那时，阿根廷国内已经见不到蒙特内罗了！有人指控说，此事是海军与陆军的权力斗争引发的，马丁内斯·德·奥斯是索尔达特之死的幕后黑手——更不用说后来伊达尔戈·索拉¹大使的死了。

我在图库曼的时候，制糖工会领袖安蒂利奥·桑迪杨在 1977 年遇刺²。人民革命军最重要的领导人戈里亚兰·梅洛（现在还在监狱里）承认他们杀死了安蒂利奥·桑迪杨，他还承认在乌拉圭杀死了阿纳斯塔西奥·索莫萨³，在 1989 年袭击了拉普拉塔的军事据点。人民革命军认为，备受尊敬的工会领袖桑迪杨正在摧毁革命的条件。矛盾的是，桑迪杨坚决反对“进程”与马丁内斯·德·奥斯的经济政策。游击队打死了他，而他的死只对马丁内斯·德·奥斯有好处。一直有人说，戈里亚兰是为钱卖命的佣兵。桑迪诺派指控他是叛徒。他在尼加拉瓜活动，后来人家把他驱逐出境。他在巴拉圭杀死阿纳斯塔西奥·索莫萨一事很有疑点：因为他巧妙地逃出了罗网，还能自由出入任何地方。许多人说他为中情局卖命。

¹ 艾克托·伊达尔戈·索拉（Héctor Hidalgo Solá，1937 年？月？日——1977 年 7 月 18 日（存疑）），早年担任律师，后加入正义党，在党内属于右派。1976 年政变后任驻委内瑞拉大使。1977 年遭到绑架后失踪。军政府指控是游击队干的，但后来证明凶手是军政府麾下的 3.3 小组。——中译者注

² 这里在时间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桑迪杨实际上是在 1976 年 3 月 22 日被杀。——原注

³ 阿纳斯塔西奥·索莫萨·德瓦伊莱（Anastasio Somoza Debayle，1925 年 12 月 5 日——1980 年 9 月 17 日），尼加拉瓜独裁者。早年从事家族生意。1956 年老索摩查遇刺身亡后，于 1956—1979 年任国民警卫队局长。1967—1972 年、1974—1979 年任尼加拉瓜总统。1979 年尼加拉瓜革命胜利后流亡巴拉圭。1980 年在巴拉圭被阿根廷人民革命军的特工用炸弹炸死。——中译者注

埃内斯托：但我不认为美国希望索莫萨死。另外，阿根廷左派坚持认为，“进程”时期的经济权力更加集中，军政府为了推行经济政策，便高压控制社会。这些政策又让利益集团巩固了权力。

在我的印象里，军政府不太了解政治经济学。但军政府的协助者推出了马丁内斯·德·奥斯当经济部长，执行了当时的政策。一方面是军事镇压，另一方面是经济政策。如今我们把这些政策称为新自由主义。马丁内斯·德·奥斯放弃了关税，结果摧毁了中小企业，导致了巨额债务，最终使阿根廷国家崩溃。然后还有私有化。

卡洛斯：石油公司、钢铁公司、航空公司，还有汽车公司（进行了私有化）。说起来，资本家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改变国家状况。为什么？因为在当时，人们已经看到维持福利国家多么困难了。我们的通货膨胀很糟糕，无法再维持过去的福利水平。1975—78年左右，我们经历了经济危机。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又导致了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

埃内斯托：我觉得不能光用阶级术语谈论这个。我认为，当时的整个权力体系里，分量最大的是国家。国家作为仲裁者，倚重某个部门，以此决定经济政策的方向。庇隆时期，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与国家达成了协议，但后来，国家倒向了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部门，而它们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们当时的财富不过只有三、四亿美元。如今，“进程”的一位发起人格雷高里奥·佩雷斯·康

潘¹坐拥四十五亿美元的资产。经济权力的集中是从马丁内斯·德·奥斯的私有化开始的。最初私有化规模很小（科连特科的一家旅馆），后来慢慢涉及了非常重要的部门，比如伊塔洛（Italo）和电力公司。但我不认为外国势力直接参与了私有化。它是从中东石油的石油美元开始的。资本流向美国和欧洲，又从那里贷给拉丁美洲。

卡洛斯：庇隆死后，经济混乱与权力真空的局面摆在各方面前，在精英、游击队、三A团和某些边缘团体——我告诉过你，他们都是投机分子，从这一边跳到那一边——之间，发生了战斗。我们有高通胀和许多问题。人们形成了普遍共识：需要一场军事政变。人人都希望军队接管权力，建立秩序。政变发生时，大家都表示欢迎。刚开始，一切都很好，但军队对义务和使命有自己的想法：军人掌权是为了拯救国家。

埃内斯托：拯救民族。但他们彻底搞砸了。那代军人是本世纪最不合格的。他们的文化水平和专业能力非常低，每支部队都极为腐败。强硬派夺得大权。经济集团随心所欲。你必须意识到，与梅内姆总统最近搞的东西相比，当年的私有化只能算是皮毛。最近的私有化规模达到了一百二十亿美元，而起初只有八千五百万美元。

私有化。好吧，这是大生意。军政府的镇压力度减轻、游击队活动减少后，大多数人就放弃了这个政府。接着，（军政府）与工

¹ 霍尔赫·格雷高里奥·佩雷斯·康潘克（Jorge Gregorio Pérez Companc，1934年8月23日——），阿根廷商人，曾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阿根廷第四富有的人。——中译者注

会发生了激烈对抗。此前，政府一直牢牢压制着工会，或者凭借合作控制着工会。更有斗志的工人阶级走上舞台。而加尔铁里将军呢，打算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以此保持手中的权力。

卡洛斯：我猜加尔铁里以为，打胜仗就能解决国内问题，但我认为，战争的起因，主要还是加尔铁里与美国走得太近。美国隆重欢迎了加尔铁里的来访。他向阿根廷军队发表讲话：“我们属于西方世界”。我认为是有人使他相信，如果他入侵马岛，美国会支持他。我不是在指责美国政府，这就是他本人的解释。加尔铁里将军的脑子不是很灵光。

埃内斯托：确实。

卡洛斯：这人相当无能。

埃内斯托：货真价实的蠢货。

卡洛斯：是的，货真价实的蠢货¹……收复马岛的行动表现出，这些指挥官缺乏对世界的理解能力。他们犯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价，到今天还没“还完债”。我认为，（发动战争是因为）军方意识到他们失去了支持，其次是他们内斗不断。

埃内斯托：军政府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四分五裂。在（军政府成

¹ 以下省略对马岛战争策略的进一步讨论。——原注

立时的)君子协议中,每个军种各负责三分之一的行动,如此平摊责任。此前,掌权的是昂加尼亞将军或者拉努塞将军。现在是整支军队,就像是他们全都在掌权,又没有一个人在掌权一样。不是说,是我魏地拉将军下令动手,军队才实行“进程”的。到头来,权力没怎么分配。陆军控制着政府。海军试图获得更大的权力,制定自己的政策、实行自己的镇压,而空军呢,什么对自己有利就支持什么。因此,权力分配从未落到实处。

问:根据今天一期《十二页报》的报道,前内政部长阿尔金德古伊说,有一些关于整个镇压过程的档案。你认为他们会曝光这些档案吗?

卡洛斯:不。他说的是他为自己的继任者留下了档案。他不是说这些档案还在。他说的是留过档案。也许是有一些还在——可能不止一份,而是上百万份。每个据点肯定都收集了文件。但也可以肯定,政府更迭的时候,这些文件都销毁了。阿尔金德古伊是魏地拉将军的内政部长。内政部的检察官是埃斯特拉赛达(Estraceda)博士,此人后来审判了军政府。他也是军政府的首席检察官。但在镇压最残酷的1976—77年负责国内政策的内政部长阿尔金德古伊却没有受到审判。审判对象完全是随意决定的。

问:谁随意决定?

卡洛斯:阿方辛。

埃内斯托：阿方辛有个政策，但这种“随意决定”并不是出于这项政策的。他的政策是分三类责任人进行审判：下达命令的人、服从命令的人、越出命令权限的人……¹

卡洛斯：我想（把话题）回到马里奥·菲尔梅尼奇的事件和蒙特内罗的起源上。我想澄清情报部门和菲尔梅尼奇的关系。昂加尼亞将军的军政府里，大都是反对阿兰布鲁将军的民族主义军人。他们都是陆军军官，但空军也有反对阿兰布鲁将军的人。这些人非常痛恨阿兰布鲁，因为阿兰布鲁在 1955 年取代了洛纳尔迪将军，抛弃了军队中的民族主义者，包括推翻庇隆的功臣。而且在 1956 年，为了争夺权力，阿兰布鲁杀红了眼，连不是庇隆派的军人都杀。1955 年，阿兰布鲁把他们赶下台，杀死了他们的同僚，这帮人就加入了昂加尼亞政府。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也有反帝思想。他们身边有群年轻人，日后许多成为了蒙特内罗。举个例子，其中就有奥拉西奥·韦比茨基²。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后，大家都在讨论怎么赶昂加尼亞下台。假如利用选举过渡，很可能又要让阿兰布鲁将军上台。阿兰布鲁的绑架案，就是在人人对他恨之入骨的背景下发生的。

最初的十二名蒙特内罗都不是庇隆派。这支队伍借用了胡安·何塞·巴耶（Juan Jose Valle）将军的名字，这位将军也是非庇

¹ 以下省略对阿根廷的策略与成果的讨论。——原注

² 奥拉西奥·维比茨基（Horacio Verbitsky，1942 年 2 月 11 日——），阿根廷作家、记者。60 年代末参加庇隆武装组织。1973 年加入蒙特内罗，后流亡秘鲁。1976 年回国，积极报道军政府的暴行。90 年代参与创立阿根廷捍卫言论自由记者协会。——中译者注

隆派，1956年死在阿兰布鲁手上。蒙特内罗的第一位领导人费尔南多·阿瓦尔·麦地那曾是民族主义领袖桑切斯·索伦多（现在还活着）的一个民族主义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出过一本叫《蓝与白》（Azul y Blanco）的非常重要的刊物。

阿兰布鲁的绑架案十分离奇。据说绑架案那天，阿兰布鲁是跟着熟人一起出门的，不是有人把他从家中强行带走的。因此，可能是情报部门让熟人把他带走，再交给了蒙特内罗。目击者提到与阿兰布鲁一起离开家的人，要比当时的蒙特内罗年纪大得多，像当时的阿瓦尔·麦地那只有二十到二十一岁。这是阿兰布鲁的人说的。不同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阿兰布鲁的人声明，昂加尼亚政府是绑架案的幕后黑手。不久后，蒙特内罗宣布自己实施了绑架。但最开始，他们没有自称庇隆主义者。当时的蒙特内罗充满疑点。好吧，蒙特内罗若要立足，只有开展军事行动。他们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加林市（Garin），最后以惨败告终。据说这次“占领”是要趁着阿兰布鲁事件，一口气动摇昂加尼亚政府。蒙特内罗想出了进攻加林的计划，目的是在政府中制造政治活动的空间¹。几个月后，在为阿兰布鲁的死收钱时，费尔南多·阿瓦尔·麦地那与警察交火，中枪死了。

问：绑架的赎金？

¹ 1970年发生在加林（Garin）的这些事件，其实是革命武装力量（FAR）策划的，而不是蒙特内罗。见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第107页，以及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71—72页。蒙特内罗是在1970年7月占领了科尔多瓦省的拉卡雷拉（La Calera）。
——原注

埃内斯托：是的，当然了。但发生了什么？本来应该交钱的商人没有来，反而叫来警察，那两个人——拉姆斯和阿瓦尔·麦地那——就给打死了。

卡洛斯：嗯哼，是这么个说法。有两本书，作者的政治倾向不同，但都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是政府出钱，帮助蒙特内罗出国的。他们无法直接付钱，所以要通过第三方。而第三方中有一人出卖了他们，打电话给了警察，拉姆斯和阿瓦尔·麦地那就是这么死的。几个月后，蒙特内罗打死了这名商人，后来再也没人提起这回事了。为什么？因为打死商人的人后来自杀了。他是蒙特内罗十二名创始人之一，姓“克鲁兹”（Cruz）。

需要强调一点：在阿兰布鲁死前，蒙特内罗没有接触过庇隆。绑架案整整一年后，双方才第一次接触，而且可以肯定的是，1974年以前，军队没有把阿兰布鲁当作颠覆活动的烈士，或者颠覆分子杀死的军人。这件事很蹊跷。1974年，蒙特内罗才冒出来，公布了阿兰布鲁之死的完整说法。他们提到死亡和审判，提到阿兰布鲁带着尊严而死。他们证实了自己杀死了他。然后军队声明，颠覆活动的第一位牺牲者是阿兰布鲁，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几支陆军部队。蒙特内罗需要打出旗号，军队也需要树立与颠覆分子战斗的“烈士”。但这些书的说法相反，它们说阿兰布鲁在军事医院死于心脏病。这并不奇怪。军队中的民族主义与第一批蒙特内罗的思考方式非常类似。他们具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他们都不是庇隆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尤其在阿兰布鲁的事件中，他们还有共同的利益。这些联系仍持续着，军队与蒙特内罗始终保持着联系。

卡洛斯·古斯塔沃·拉姆斯死的时候，菲尔梅尼奇逃走了。他在每场战斗之前都逃走。当阿瓦尔·麦地那走进酒吧，与拉姆斯一起遇刺的时候，菲尔梅尼奇却安然无恙。一段时间后，菲尔梅尼奇和另一位蒙特内罗的最初领导人卡洛斯·卡普亚诺·马丁内斯¹喝咖啡，菲尔梅尼奇上了洗手间，然后警察冲进来，二话不说杀死了卡普亚诺·马丁内斯。短时间里，除了菲尔梅尼奇和诺玛·阿洛斯蒂多，所有最初的领导人都死了。后者又在几年后死于海军学校集中营。此后，庇隆武装力量加入了蒙特内罗。那时，最初的领导人都死光了。再后来，菲尔梅尼奇和马赛拉在欧洲建立了联系。他们在1978年签署了某种和平协定……

如今，大多数参加过镇压的人都离开了军队。陆军强行退役了所有涉嫌侵犯人权的军人。但是海军相反，海军中“亲马赛拉”势力仍然掌握权力。后来，阿道夫·弗朗西斯科·希林戈的事件东窗事发。当时有两名海军军官准备晋升将官，由于人权方面的记录，国会不让他们晋升。然后这两名军官现身国会，说，“海军做事都是有流程的。要是不让我们晋升，那么现在的所有海军将官都和我们一样有罪，要么罪责更深，因为他们是上级。”海军首长随后撤回了这两位军官的晋升要求。

接着，希林戈讲述了他的故事，把“活人入海”的事告诉了记者奥拉西奥·韦比茨基。我怎么看？我认为这是海军的内部问题引发的。希林戈的说法是：“我知道不少对你们大家都不利的事情。

¹ 卡洛斯·劳尔·卡普亚诺·马丁内斯 (Carlos Raúl Capuano Martínez, 1949年4月3日——1972年8月16日)，1969年加入蒙特内罗。1970年参加了绑架并杀害前总统阿兰布鲁的行动。1971—1972年任蒙特内罗西北纵队领导人。1972年与警方交战中身亡。——中译者注

要是不给我们升职，我们就把知道的全都捅出来。”海军诬陷希林戈犯有诈骗罪，把他扔进了监狱。但希林戈把一切都告诉了韦比茨基。之后，人权组织开始给“悔过者”寄钱。比方说，一位薪水很低的退伍陆军军士说：“我看到在某地发生了某事”，他们就会给钱。有人给他钱，他就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

不过呢，委员会和相关审判提出的大量指控，基本上覆盖了所有反游击战期间犯下的人权案件。军队为七十年代的事发表了自我批评的声明。巴尔萨将军就军队的做法进行了公开道歉。

第十七章

结论¹

马岛战争失败后，军事独裁走向末路。1983年阿根廷举行自由选举。劳尔·阿方辛领导的激进党获胜，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成立，专门负责调查失踪案。军队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拒不服从政府的命令，局势剑拔弩张，但调查没有停止。起初，阿方辛把审判军官的任务交给了最高军事法庭。拖了很久之后，最高军事法庭在1984年9月宣布，由于指控是在反颠覆战争中犯下的，所以无法进行审判。当时，委员会的听证会已经向公众开放，进行了电视转播，因此引起了公众对军方的强烈反感。随着《永不再来》的出版与广泛传播，声讨愈演愈烈。人权组织积极奔走，为听证会收集证据，它们坚信，既然得到了公众支持，军队必须在民事法庭接受审判。198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上诉法院开始了冗长的审判。

在收集证据和传唤证人的几个月里，法院遭到炸弹袭击，证人受到威胁，暴力事件频出。最终，最恶劣的军方领导人因反人类罪行入狱。军方以1976—83年是“肮脏战争”为由提出辩解，但是遭到驳回。军方肆意的“越界”行为证据确凿，军方领导人坐实了罪名。但检察官提出的跨军种（甚至跨国）密谋的指控也遭到驳回。

¹ 校订过程中，我也编译了结论章，删去了大部分主流学术的废话。——中译者注（2024.7.30）

军政府的五名成员：豪尔赫·魏地拉将军、罗贝托·比奥拉将军、埃米利奥·马赛拉海军上将、阿曼多·兰布鲁基尼海军少将、奥兰多·阿戈斯蒂空军准将，均判处有罪，刑期不等。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首长拉蒙·坎普斯犯下六百起谋杀案，获刑二十五年。整个 1986 年间进行了许多逮捕和审判。针对中高级军官的控诉在法院里堆积如山。军队躁动不安，四处为非作歹、行凶作乱。最后，政府出台了两项法律限制法院程序：首先是为酷刑案定下了六十天的时限，使一千多名被告逃脱了审判，但偷孩子的罪行不受影响；其次颁布了《应有服从法》，限制了在上级命令下所犯罪行的定义。人权组织对这两项法律表示强烈抗议，但在军队叛乱的威胁和经济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这两项法律还是通过了。

阿方辛在 1989 年的大选中落选。卡洛斯·梅内姆领导的庇隆派政府大赦了所有在押的军方人士与少数在押的游击队领袖。而军事预算也在逐步削减。军队勒令许多将官和高级军官退役，尤其是陆军开除了许多涉嫌酷刑的军人。

1998 年，“祖母”组织成功起诉了魏地拉将军、比尼奥内将军、马赛拉海军上将，罪名是绑架婴儿，这项罪名不受八十年代后期的法律与大赦影响。

独裁时期活跃的军人仍然声称，他们是为捍卫民族和基督教履行职责，我们也在采访中听到了这种想法。但是在其它采访中，我们从新一代军人口中得知，他们的领导人不再自命为民族的救星。他们说，军队现在甘愿做民主国家的仆人。阿根廷的民主制度尚不健全，但长期以来服从军事权威的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恐怖时期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居民，夜里常常听到惨叫，看到军警的车辆运来犯人。附近居民的活动受到限制。穿便服的武装人员会擅闯人家，或者当街把人抓走。邻居们察觉到了绑架事件，对此一无所知是不可能的。但人们一直患有“健忘症”，忘掉了这些骇人的记忆，或者只是不愿承认这些事发生在自己身边。另一些人则说，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无能为力，否则会引火上身。一次采访中，有位妇女说，“我们能听见惨叫声。我们放大收音机的音量，不让孩子听见惨叫。军队说‘噪音’是士兵唱歌跳舞弄出来的。难道他们天天唱歌跳舞，连吃饭也不忘吗？”

1996年，一群志同道合的公民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和以“不只是回忆”为名的一些活动，以此纪念军事统治二十周年。他们想通过亲历者的讲述，使年轻人了解历史。他们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采访了集中营附近的居民。一位制片人向我们描述道：

“我们采访了曾住在各个集中营附近的人，问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他们（军警）随时会来打家劫舍，把东西统统抢走。我们认为，居民一定听到过受刑者的惨叫声，或是看到过一些独裁时期发生的事情。”

另一位制片人继续说道：

“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恐惧仍在继续……只有少数人愿意接受采访，许多人都拒绝采访。我们对此的理解是：自那以后，令人不快的恐惧还阴魂不散。民主是脆弱的。我相信，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恐惧。他们不会开口，吓得不能开口。他们什么也不肯说。他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忘记恐怖是更好的选择。

“有时，他们还有一种负罪感。我们管它叫‘幸存者的负罪感’。在国家恐怖主义时期，一些人尽力以各种方式与被迫害者合作，帮助他们离开国家，把人藏在自己家里或者向国外通风报信。当然，这些都是地下活动。而社会上的其他人拒绝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了保命，他们否认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了，社会上还有些人支持军事独裁。”

拍摄的视频中有位中年男子，他声称从未在集中营附近听到什么、看到什么。甚至是最直爽的人，在措辞时也显得十分谨慎。

我们没有系统性地采访三十五岁以下的人，但在与父母辈的采访中，我们听到了困惑：没有经历过这些的年轻一代，对当时的事情没什么兴趣。他们父母一辈曾梦想过新的社会，有些人甚至对这样的父母表现出敌意。他们和全世界年轻人一样，热衷于同样的活动与想法——跳舞、恋爱、听音乐（尤其是美式音乐）、打扮时髦、买新潮玩意儿、读书上学、在社会中向上钻营。过去——即使是我们父母的过去——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他们也不怎么同情受害者。他们的激情来自消费主义，而不是政治；推动他们的是消费，而非公民权利。

阿根廷近代史上有不少讽刺，其中两件是：阿方辛政府的继任者是庇隆派，卡洛斯·梅内姆内阁的几位大员还是幸存的蒙特内罗。当时，报纸把政府的腐败归咎于他们与黑手党和毒贩之间的政治交易。黑帮风格的谋杀常常震惊全国，比如1996年调查记者何塞·卡

维萨斯¹遭到谋杀，凶手用了典型的三 A 团手法。尽管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梅赛德斯·索萨²举行了一场纪念演唱会，民众也发誓绝不忘记卡维萨斯，第二年又发生了许多谋杀事件，它们也同样令人震惊，而针对这些犯罪行为的调查也把矛头指向了主流政治人物、只手遮天的警察、富甲一方的商人之间的黑幕。老派的庇隆主义者坚信，梅内姆没有忠于庇隆主义的理想。但当年，连庇隆自己都违背了这一理想。

内斗和腐败层出不穷，但是阿根廷总算有了民主的样子。对于社会而言，容忍异见并非易事，但众议院等机关已有了开放包容的苗头。比方说阿尔弗雷多·布拉沃，他当过教师工会的领导，因此遭受无妄之灾，受了几个月的拷问，如今能跟当初的拷问者及其支持者同坐在一个会场，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领袖风范³。政变前，阿根廷仅仅只有一个人权组织，但现在到处都是，而且都相当强大。这些

¹ 何塞·路易斯·卡贝萨斯 (José Luis Cabezas, 1961 年 11 月 28 日——1997 年 1 月 25 日)，阿根廷摄影记者。1989 年起在《新闻杂志》(Revista Noticias) 担任摄影记者，1995 年曾获昂宿星团奖最佳新闻摄影奖。1996 年获得与黑手党有关联的富商阿尔弗雷多·亚布兰 (Alfredo Yabrán) 的一张独家照片。1997 年夏赴旅游胜地皮纳马尔 (Pinamar) 摄影，1 月 25 日被黑手党和当地警察联手绑架后遇害。这一谋杀案成为阿根廷媒体争取言论自由斗争的标志性事件，迫使梅内姆改组内阁，对 1999 年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译者注

² 海迪·梅塞德斯·索萨·吉隆 (Haydee Mercedes Sosa Girón, 1935 年 7 月 9 日——2009 年 10 月 4 日)，绰号“拉丁美洲之声”(la voz de América Latina)，阿根廷民谣歌手。早年支持庇隆主义。60 年代参加了阿根廷共产党。70 年代初赴智利演出，但在 1973 年皮诺切特上台后，拒绝在智利登台表演。1976 年阿根廷军政府上台后，禁止她在国内从事音乐活动，1978 年因在拉普拉塔举办独奏表演被捕，获释后于 1979 年流亡法国和西班牙。1982 年马岛战争结束后回国，举办演出，致力于推翻军政府，不久被迫流亡尼加拉瓜。1983 年阿方辛上台后回国。2009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逝世。——中译者注

³ 布拉沃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过此事。——原注

组织敦促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开展过多次调查，为起诉军政府领导人打下了基础。没有人权组织的坚决行动，调查与审判就不会那么深入。虽然没讨来多少公道，但至少事实是确定下来了。阿根廷是第一个调查本国人权犯罪的国家。关于这些罪行的报告《永不再来》在真实性与全面性上独一无二，人们很容易就能从公共图书馆、街头小店、全国的火车站售货亭免费获取这本书。

与社会运动相比，独立的常设机构发展缓慢。例如，没有真正的新政党扎下根。左派仍然没有强大的政党，因为庇隆主义（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社会运动）仍然是左翼政治的社会主流。读者应该不会忘记，共产党从未在左翼当中享有声誉，还一度支持军政府。阿根廷有社会党，但它吸引不了选民，也提不出有力的领导人。国家的经济精英还未下注，没有投资一个能代表他们与其它保守派利益的政党。尽管国家私有化了许多国有资产，向投资和贸易开放了边界，但国家本身仍是集中的机关。

大众媒体重新活跃。大量批评与独立的出版物崭露头角：《新闻报》（卡维萨斯工作的报纸）、《十二页报》等报纸杂志。那些在军政府时期为军队摇旗助威，或者始终置身事外的普通报纸，如今也有足够的勇气，报道起了警察暴行与政治腐败。他们的报道仍然会引起法律上的麻烦。许多政治家还未学会容忍独立的新闻界。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整个司法系统破坏殆尽，使得阿根廷建立法治尤为困难。目前，没有强大的制度力量能够保证司法的公正性。执法也远非公正，人民缺乏安全感。人们普遍认为（报纸也经常报道）警察日常收受贿赂或者索要保护费，仍在施行残忍的酷刑，常常涉嫌谋杀（比如说，警察在卡维萨斯案中有很大的嫌疑），人民

无法相信他们的执法。此外，曾经的镇压者、准军事团体、警察、退役军人的数量庞大，其中一些人当了私人保镖和公司保安人员，另有许多成了游民，伺机蠢动。

尽管问题不少，这个社会并没有那么暴力。其实，对于九十年代的普通居民来说，阿根廷城市要比许多美国的内陆城市安全得多。天黑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对行人也比较安全，就算没有巡警，公民也不会在街头遇上暴力或不文明行为。国家仍然不受民众监督，但今天不再有系统性的恐怖主义，这就是成就。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早期的革命组织列表

这一列表包含了阿根廷动荡岁月中的革命组织。

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突击队。1967 年成立于哈瓦那。组织的名称取自一位牺牲的哥伦比亚神父游击队员，领导人是胡安·加西亚·埃洛里奥（Juan Garcia Elorrio）神父。这个武装组织最终加入了蒙特内罗。

赤膊者（Descamisados）。这个词在十九世纪初用于形容工人和农民。后来，艾维塔·庇隆用这个词称呼她的追随者。六十世纪末，庇隆主义者、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的组织都使用过这一名字。作为政治军事组织的“赤膊者”在 1972 年并入蒙特内罗。

人民游击队（Ejercito Guerrillero del Pueblo，EGP）。格瓦拉派组织，领导人是“第二指挥官”里卡多·马塞蒂¹，1964 年宪兵摧毁组织后，此人失去行踪。

¹ 豪尔赫·何塞·里卡多·马塞蒂·布兰科（Jorge José Ricardo Masetti Blanco，1929 年 5 月 31 日——1964 年？月？日），阿根廷记者。出身于意大利移民家庭。早年参加极右翼组织，支持法西斯主义。1947 年转向庇隆主义。1958 年赴古巴报导革命，曾采访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1961 年起与古巴政府合作，发起成立了“人民游击队”（Ejercito Guerrillero del Pueblo，EGP），在丛林中作战。1964 年 4 月 21 日在与政府军作战中失踪。——中译者注

人民革命军 (Ejercito Revolucionario del Pueblo, ERP)。1970 年于工人革命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是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治军事组织。尽管人民革命军在意识形态上属于格瓦拉派，但它却是第四国际的阿根廷支部（见下文的“工人之声”词条）。它是武装组织。理论上，它属于工人革命党，但并非所有的人民革命军成员都是工人革命党的党员。1973 年 6 月，人民革命军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正式决裂。它与民族解放运动（乌拉圭）有联系。人民革命军和庇隆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在 1973 年选举中也没有支持庇隆派。

庇隆武装力量 (Fuerzas Armadas Peronistas, FAP)。组织成立于六十年代，为格瓦拉主义的军事组织。它的一些领导人于 1968 年 9 月 19 日在图库曼的圣米盖尔被捕。1974 年，庇隆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带领组织与蒙特内罗合并。

革命武装力量 (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FAR)。成立于 1970 年左右，领导人是卡洛斯·恩里奎·奥尔梅多²。它是格瓦拉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庇隆主义的组织。1973 年 10 月加入蒙特内罗。

美洲土著人民革命阵线 (Frente Revolucionario Indoamericano

² 卡洛斯·恩里奎·爱德华多·奥尔梅多 (Carlos Enrique Eduardo Olmedo, 1944 年 1 月 5 日——1971 年 11 月 3 日)，出身于巴拉圭移民家庭。早年参加阿根廷共产党。1966 年退党，赴古巴接受军事训练。1970 年发起成立“革命武装力量” (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FAR)。1971 年起与蒙特内罗共同行动，11 月 3 日在试图绑架冶金公司高管的行动中与警方激烈战斗，壮烈牺牲。——中译者注

Popular, FRIP)。马里奥·桑图乔 (Mario Santucho) 于 1960 年左右在图库曼省成立。1962 年访问古巴后，桑图乔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与工人之声达成协议，1965 年并入工人革命党。

庇隆主义青年团 (Juventud Peronista, JP)。最初在大学中成立，反对昂加尼亞政府。拥有各种附属团体，包括大学支部 (JUP)、地区支部 (JP-R)、工人支部 (JP-T) 等等，后进一步发展。1970 年后，蒙特内罗主导了这个组织。

蒙特内罗 (Montoneros)。前身可能是卡米洛·托雷斯突击队，受到格瓦拉主义、约翰·威廉·库克 (John William Cooke) 诠释的革命庇隆主义以及对艾娃·庇隆的崇拜影响，但受右翼天主教民族主义的渗透。蒙特内罗的建立日期尚不清楚：一说 1968 年宣布成立，但后来有研究表明，它是在 1970 年阿兰布鲁将军死时成立的。

塔夸拉民族革命运动 (Movimiento Nacionalista Revolucionario Tacuara, MNRT)。1962 年从成立于三十年代的法西斯青年组织塔夸拉民族天主教组织 (Catholic Nationalist Tacuara) 中分裂出来。它拥有西班牙长枪党的意识形态，但结合了庇隆主义，旨在建立工团国家。蒙特内罗的前身。

庇隆主义武装组织 (Organizaciones Armadas Peronistas, OAP)。1973 年庇隆武装力量和革命武装力量合并而成。

拉丁美洲团结组织（Organizacion Latinoamericana de Solidaridad, OLAS）。1967 年于哈瓦那，由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发起成立。切·格瓦拉担任名誉主席。决议：在各个国家成立民族解放军（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LN）。

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人民团结组织（OSPAAL）。1966 年成立于古巴哈瓦那。成立于 1955 年的亚洲与非洲人民团结组织（OAPPA）的后续组织。

工人之声（Palabra Obrera, PO）。六十年代初，安赫尔·本格切阿（Angel Bengochea）成立了这一组织。这是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受到格瓦拉的游击战略影响。本格切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组建了一支突击队，在萨尔塔地区打游击。本格切阿在队伍炸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栋公寓时牺牲。组织在 1965 年与美洲土著人民革命阵线合并，最终加入工人革命党。

工人革命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 los Trabajadores, PRT）。1965 年，马里奥·罗贝托·桑图乔合并了美洲土著人民革命阵线与工人之声，成立了这一组织。1966 年成为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加入第四国际。1973 年 6 月与托洛茨基主义正式终止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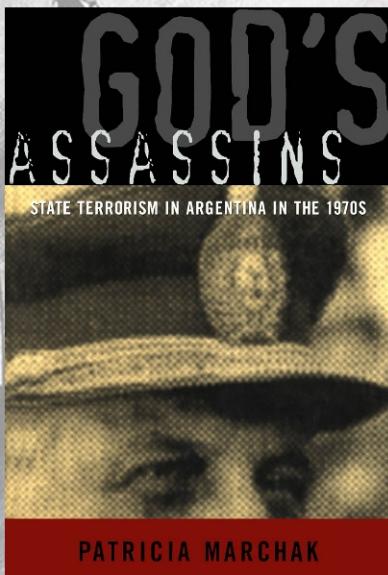
工人革命党—人民革命军（PRT-ERP）。1976 年合并，自称属于第四国际。几乎全部的领导人和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在 1979 年牺牲。

社会主义工人党 (Partido Socialista de los Trabajadores, PST)。1972 年, 在乌果·布雷萨诺 (Hugo Bressano, 党内化名纳维尔·莫雷诺¹) 领导下, 脱离阿根廷社会党 (PSA) 的激进分子成立了这个组织。

乌鲁伦科 (盖丘亚语 Ururunco, 意为“老虎”)。最早的亲庇隆组织。1960 年于图库曼圣米盖尔附近成立。组织以格瓦拉主义为行动指南, 进行过一次规模很小的军事行动。

¹ 纳维尔·莫雷诺 (Nahuel Moreno, 1924 年 4 月 24 日——1987 年 1 月 25 日), 原名乌果·米盖尔·布雷萨诺·卡帕塞特 (Hugo Miguel Bressano Capacete), 出身于商人家庭。1942 年起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4 年起参加各地罢工活动。1953 年起支持“打入主义”, 号召托派打入庇隆派。1956 年被军政府逮捕, 在遭受酷刑后不久获释。1959 年诬蔑古巴革命为“大猩猩革命”。1964 年立场急剧改变, 吹捧菲德尔·卡斯特罗为“天才”。1965 年发起成立工人革命党。1973 年鼓吹建立“合法的左翼中派主义政党”, 另立社会主义工人党

(Partido Socialista de los Trabajadores, PST), 并参加了两次总统选举。1976 年军政府上台后, 多方为之辩护, 谴责庇隆派游击队的行动, 遭到全国声讨, 被迫出国。1978 年反对抵制阿根廷世界杯, 同年参加了西蒙·玻利瓦尔旅, 企图参加尼加拉瓜革命, 后在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干预下被驱逐, 旋即退出统一书记处。1980 年加入第四国际重建委员会, 诬蔑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过时”。1982 年回国, 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运动” (El 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并积极参加总统和议会选举。1987 年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六七十年代社会斗争的历史对今天的国内读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这不仅因为它所发生的社会环境与思想背景已经不复存在，还因为它不合时宜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而遭到了集体的沉默。

同样，拉丁美洲和整个第三世界也都很少出现在我们公众的视野里。提到阿根廷，给人的印象似乎就只有足球、探戈和经济破产。但在当年，阿根廷曾经是城市游击队最活跃的地区，那里的人们几度推翻军政府，但革命从来没有接近过胜利。这里还发生了比起同时期的欧洲更为残酷的国家恐怖主义，即“肮脏战争”。

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残酷的斗争就始终有着重演的可能。我们需要深入了解阿根廷历史斗争的经验，认识到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为了让历史上的牺牲不再白费，需要帮助起而斗争的工人阶级辨明方向，看到陷阱，避免这样那样的错误。